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精装
珍藏版

短线大师伯纳德·巴鲁克自传

全身而退

[美] 伯纳德·巴鲁克◎著 柯艾略◎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全身而退

短线大师伯纳德·巴鲁克自传

【美】伯纳德·巴鲁克 著

柯艾略 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身而退 / 巴鲁克著; 柯艾略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82—2341—6

I. ①全… II. ①巴… ②柯… III. ①巴鲁克, B. (1870~1965) —自传

IV. ①K83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583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1.5

字 数 / 28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9.80 元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

前言

伯纳德·巴鲁克：从学徒到投机大师

设想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 2 200 点暴跌至 250 点，会怎么样？这样的惨剧在美国就发生过，也就是著名的 1929 年股市大崩盘。这场让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倾家荡产的大危机，有一个人却能全身而退，成就了投资史上的永久传奇，也造就了经典的投资哲学。

这个人叫伯纳德·巴鲁克，有史以来最伟大、最传奇的投机者。巴菲特的导师是格雷厄姆，而格雷厄姆最敬佩的投资者就是巴鲁克。他有许多头衔：“投机大师”“独狼”“总统顾问”“公园长椅政治家”……但是，人们最愿意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白手起家

1870 年，巴鲁克出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坎登镇。他的父亲是位出色的医生，母亲以教授钢琴和声乐为业，他在四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1889 年，巴鲁克进入华尔街的一家股票经纪行当学徒工，开始学习风险投资，周薪 3 美元。1891 年，巴鲁克开始担任纽约大银行家豪斯曼的办事员，相当于办公室的勤杂工，平时只做一些接电话、整理交易记录和买三明治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种身份激发了他。从此，巴鲁克把闲暇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他参加了速记班和商业法夜校，熟记各铁路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业务范围，通读了一些专业书籍。他还学着画了一幅精致的全国地图，

添上了各条铁路干线及其运输的主要商品名称，这样无须再花费大量研究时间就能迅速掌握每条新闻的重要金融价值。

1895年初，昔日的跑腿小伙巴鲁克升级为一名初级金融分析员。

通过不断努力，被迅速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后，他倾其所有，购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开始操作股票。

一战成名，再战封神

1897年，年轻的巴鲁克创造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奇迹。

当年春天，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开始暴跌，陷入悲观情绪的人们开始疯狂地抛售。因为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一项降低外国糖进口税的提案，同时众议院正在进行类似的立法程序。议会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股市的涨跌。但巴鲁克坚信参议院通不过这项提案，他认为西方的甜菜种植主们和华尔街一样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他用300美元为定金，购入了3000美元股票。后来，果如巴鲁克所料，参议院否决了这项提案，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连续暴涨。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鲁克只能购买价值300美元的股票，因为美国当时允许投资者进行保证金交易。也就是说，以300美元的保证金就可以操作价值10倍的股票。当年的4—5月，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是每股115美元，随着参议院议程的进行，到7月底的时候每股已经涨到了139美元。在股价不断攀升的过程中，巴鲁克频繁地买进卖出，将每一次赚取的利润再以保证金交易的方式投到他选定的股票上。如此滚雪球式的股票积累，使得短短几个月之后，巴鲁克就操作了价值十几万美元的股票。

熟悉巴鲁克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狂热的赌徒，但实际情况是，他喜欢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做一种近于疯狂的投入；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的头脑却并不狂热，相反还相当冷静和敏锐。巴鲁克知道，股票在异于常态的攀升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迅猛无比的下跌，整个股市会这样，具体

股票也会这样。所以在这段疯狂投入的日子里，巴鲁克时刻提醒自己要看清楚局势，一有下跌迹象就赶快退出。那段时间，巴鲁克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行情的变化，随时准备从危险的陷阱中及时抽身而出。

巴鲁克的赌博成功了。参议院在8月初否决了降低糖进口关税的提案，再次带动股价的上涨。8月31日，一条财政部将禁止进口荷兰糖的消息传出，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立刻飞涨，一天之内每股狂升8美元，达到156.25美元！这个时候巴鲁克展示了一个伟大投机家的本色，在股市最疯狂的时刻，他却是最冷静的一个。当天，巴鲁克抛出，全身而退。他当初投入的区区300美元，最终却足足赚了6万美元。

果然，美国炼糖股票经过几个月直升机式的狂涨之后，开始逐渐回落。

这次疯狂的赌博让巴鲁克赢得了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胜利。

1898年，巴鲁克的投资才华再次让华尔街震惊。

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发生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战争爆发之前，纽约股市遭受重创。但是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出，巴鲁克相信美国一定会最终得胜，而且战争一结束，股市必定会快速反弹。

局势发展证明他的预测没有错误。1898年7月3日，正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陪妻子和家人共度周末的巴鲁克得知，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已经被美国海军歼灭，美军已经取得了美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这一胜利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美国的金融市场将随之快速反弹，甚至有可能出现强劲势头。第二天是7月4日国庆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按照惯例将停业一天，但是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应该和往常一样正常营业。此时如果在伦敦低价购进股票，然后在纽约高价抛出，中间的差额利润将是可观的。

可难题是，巴鲁克如何在第二天伦敦证券交易所敲钟开盘之前，赶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由于时差，伦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纽约才刚凌晨5点钟。由于国庆日前一天已没有到纽约的火车，巴鲁克急中生智租了一列

专车连夜向纽约狂奔，最终在天亮时赶回办公室，向伦敦发出了大量买进股票的电报。

当纽约其他人一夜安睡之后，伸着懒腰起床打开收音机，才听到美国获胜的消息，但是面对停盘的纽约证交所和其他地方股价已经上扬的交易所，也只好望洋兴叹，这场“闪电战”令巴鲁克和他的公司都赚了大钱。

资料显示，从 1897 年到 1900 年短短 3 年的时间里，巴鲁克的个人资产上升到了 100 万美元，而他刚入行时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就赚取了上百万美元的资产，这真是一个奇迹。而与此相关的却是，为获得这些财富，巴鲁克表现出了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投资手段。

巴鲁克时代来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巴鲁克继续披荆斩棘，屡创辉煌。在他的成功案例中，有几件获利最丰、影响力最大。

1899 年 5 月，华尔街大亨、前纽约州州长弗劳尔突然去世，与他关系密切的几家公司股票狂跌不止。巴鲁克趁此机会，以很低的价位吸入了一批股票。在他看来，公司的基本面并未改变，几家根基稳固的公司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陷入困境，所以这次股价狂跌不正常，稍后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准。果然，几天后，几大财团联手吸进这些公司的股票，股价又逐步回升。等到价格回升到合理位置时，巴鲁克又抛出先前低价吸入的股票，小有斩获。

接着，那几家公司中的 BRT 公司因政府政策的改变，盈利下降，股票价格再次下滑。巴鲁克又如野狼嗅到猎物的气息一般，敏锐地察觉出从中获利的机会。1899 年 9 月，BRT 公司股票跌至破产边缘的水平。此时，打算收购 BRT 公司的人向巴鲁克提出以每股 100 美元的价格购买 2 000 ~ 3 000 股的 BRT 股票。当时，巴鲁克手里并没有那么多该公司的股票，但是他大

胆决定向其他人借来股票凑够 3 000 股，然后转让给向他购买的人。等 BRT 公司的股票再次下跌后，再以很低的价格买回来，还给那些借给他股票的人。巴鲁克这次卖空赌博时机的选择真可谓恰到好处。就在他卖出股票的当天，BRT 公司的股票就一路狂跌，巴鲁克按原先计划低价买入，偿还了所借股票，赚了不少差价。

平时，巴鲁克有一个习惯，每天比较伦敦股市和纽约股市同一股票的价差，然后从中耐心寻找赚钱的机会。巴鲁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周一用最短的时间发现伦敦和纽约市场上价格差异最大的股票，然后经由套利买卖使两地的价格趋平，并从中赚取暴利。这一办法可谓屡试不爽，巴鲁克也依靠这种投机获得了大笔财富。

1901 年 5 月，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突然出现反常攀升。巴鲁克得到内幕消息，某集团阴谋收购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以达到打击该公司的目的，使其在与自己并购其他公司的竞争中失败。根据这一点，巴鲁克制订了周密的应对计划。他推测，在该股票攀升过程中，绝大多数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交易人会采取卖空行动，这些人会把手中所持有的其他股票卖出以筹集资金，造成其他股票价格的下跌。到那时，他就可以低价买入其他股票，等这次风波过后，其他股票价格回升时抛出，就能大赚一笔。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巴鲁克所料，在这次投机行动中，巴鲁克赚得了从事投资行业以来的最大一笔财富。

不久，巴鲁克从客户那里了解到市场中铜的供应充足，但价格却依然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引起了巴鲁克的注意。经过认真的分析调查，巴鲁克认为当时市场上铜的需求和原料供应之间不平衡，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定会下降，于是决定通过做空交易进行投机，从中大赚一笔。巴鲁克的目标是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但联合铜业公司是由洛克菲勒家族联合其他大财团出资组建的，还有许多华尔街投资专家为其出谋划策，从这些巨头身上赚钱可不是容易的事。因此，有人认为巴鲁克的做法是在跟这些巨头作对，不可能成功，可巴鲁克依然我行我素。华尔街的许多头面人物，以及联合

铜业公司的高层们，他们都对铜业股票持乐观态度。

多年后，巴鲁克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的见解上犯错误，但是没有人拥有对事实犯错的权利。”结果，坚信事实并胆识过人的巴鲁克笑到了最后，铜业股价果然遵照市场规律越滑越低，他的卖空投机又一次以胜利告终。

1903年年底，巴鲁克进入由40位交易人组成的纽约证交所管理委员会，将证券业务重点转移到矿业公司的风险投资。巴鲁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他有机会进行更高层次的资本运作。1903年，他听取了一位露天采矿工程师的建议，相信贫矿土层露天开采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出资组建了犹他矿业公司。通过自己的社交关系，巴鲁克最终说服了美国矿业巨头古根海姆家族向他投资，并于1906年发行了公司的可转让债券。第二年，他又发挥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影响，让犹他矿业公司进入纽约交易所交易。此后的10年间，犹他矿业公司成为世界铜矿开采业中数一数二的企业，该公司的良好业绩也为巴鲁克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作为独立风险投资家和投资经纪人，巴鲁克的投资事业主要依靠对市场行情的准确判断、坚强的意志和善于游说的本领。他信奉：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掌握所有行业的投资要领，最佳的投资途径就是找到自己最熟悉的行业，然后把所有精力都投进去。

自1897年以300美元做风险投资起家，到32岁巴鲁克便积累了320万美元的财富。即便在经历了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他仍能积累起几千万美元的财富，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和摩根等人相提并论。

1943年6月28日，伯纳德·巴鲁克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后来，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历任六届美国总统的顾问，为罗斯福“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社区公益的贡献也很卓著，被列为100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

巴鲁克逝世于1965年，享年95岁，可谓福寿双全、充满传奇的投资大师。

巴鲁克的交易哲学

美国共同基金之父罗伊·纽伯格说：“巴鲁克是能最好把握时机的投资者，他的哲学是，只求做好但不贪婪。他从不等待最高点或最低点。他在强市中买，在弱市中卖。他提倡早买早卖。”

巴鲁克提出的投资十守则，看起来平淡无奇，运用起来稳扎稳打，非常有效。

1. 除非你能将炒股当成全时工作，否则别冒险。
2. 对任何给你“内幕消息”的人士，无论是理发师、美容师还是餐馆跑堂，都要小心。
3. 在你买股票之前，找出公司的所有资料，它的管理层、竞争者，它的盈利及增长的可能性。
4. 别试着在最低点买股、最高点卖股，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撒谎。
5. 学习快速干净地止损。别希望自己每次都正确。如果犯了错，越快止损越好。
6. 别买太多股票，最好只买几只股票，以保证你能够仔细地观察它们。
7. 定期有计划地检查你的投资，看看有什么新的发展可能改变你的想法。
8. 研究税务情况，在卖股时争取最大的税务效益。
9. 永远持有一部分现金，不要将钱全部投入股市。
10. 不要尝试成为万事通，专心于你了解最多的行业。

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风险投资家，一位先征服了华尔街、后又征服了华盛顿的风云人物。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位“既赚了钱又保存了胜利果实的大作手”，多次能够从风口浪尖全身而退。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自序

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最初还是我的孩子们提出的建议。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们经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上刚刚起步的青年男女，他们还会像您当初那样做事吗？”他们还会问：“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还有什么固定不变、持久存在的呢？”

有些人一直希望我讲一讲华尔街职业生涯，对他们的意图，我是这样想的——他们希望能从我这里发现一条致富的捷径，一种成功的魔法。

还有一些人，他们仿佛更关心我对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七任总统的看法和评价，因为我对他们非常熟悉。

另外，还有一些人让我总结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结和平期间的经历。说实话，他们的要求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试图从我的观察和观点中找到解决今天世界生存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我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就开始撰写回忆录，但因为拖延而没有完稿。在希特勒称霸欧洲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国家备战，为国家争取最佳的战争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力以赴投身其中，组织动员战争资源，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同时还要尽力避免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犯错误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依然在为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寻找方法，为国际核能的控制等问题寻找答案。

因为这些职责的原因，我没有时间用来写作回忆录，但却给我又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正是这些经历，又使我从更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所以，已经写完的东西也有了修改的必要。

我最初的想法是等自传完成后再出版，但对于一部跨越南北战争、战后重建、原子弹研制成功漫长历史的自传来说，要将它压缩进一部书稿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回忆录的发表，最好的时机就是趁着自己尚在人世。这样，谁对回忆录中的内容有异议，就可以和作者当面切磋。

现在，我已经 87 岁了，时日无多，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能出版最后一卷。为此，我正在积极写作中。

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更多提及的是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经历，这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在长大成人后，孩提时代的烙印并不会随着时光消散。成年人在解决各种问题时的方法，都会留下孩提时的烙印，相差不会太远。

小时候，我是个胆小腼腆的孩子，在社交场合总有一种恐惧感。我总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经常发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赌博发生了兴趣。现在，我在观看赛马、球赛和拳击赛时，还会像年轻时那样感到紧张刺激，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看到别人在做事，看到别人的成功，我就希望自己也尝试着去做。在自己努力后，才会领悟到应该怎样对自己的情感加以掌控，认识到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而将无力做好的事情留待别人去完成。

对于这样的成长经历，要说有什么“关键因素”，我认为，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严格的自我审视和评价，要为此做出系统的努力。当我对自己有了认识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的经历，也是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是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差不多都是怎样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随之产生的人类心理因素小心地分离开。离开华尔街后，我开始涉足公共事务，这时，我发现在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同样永恒的谜——怎样能让我们周围的事物性质和人类的天性达到一个平衡。

毫无疑问，人类天性的变化要比外部环境的变化慢得多。对于新生事物，

一些人总要抱着老皇历，固守过去，尽管你苦口婆心相劝，他们依然认为必须遵守惯例。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好像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全新的方法，必须要用试错法加以反复检验。

为了对自己加以有效的治理，必须摒弃这两种极端的做法。真正的问题在于明白，什么时候要遵循古老的真理，什么时候应该采用创新的方法。在回忆录中，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我的行动哲学。一直以来，我都在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随时准备冒险做新的尝试，同时又采取措施避免过去的错误，让这二者融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会遭到非议和责难，但我愿意叙说自己曾经的错误和失败。因为，根据我的观察，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于成功。

在准备这一卷回忆录的材料时，我得到了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我深表谢意。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的编辑建议也是很有价值的，对此我致以深切的感激。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第1章

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战争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漫长的余生都无法使之消弭。只要有乐队演奏起南方的“迪克西爵士舞”，无论身处何种场合，他都会下意识地蹦跳起来，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大喊，像一个反叛者。

001



第2章

北美殖民地的先祖

作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自由不朽，无论经济已经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改变，无论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这片土地仍然会包容一切自由的人格，而我认为，这正是美国国民性经久不衰的原因。

015

“ 第3章 乡村孩子

每个男孩子在童年时代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人。于我而言，他们似乎并非出自书本杜撰的英雄传说，而是来自我身边的那些亲戚和本地几个我曾经亲眼见过的人，比如罗伯特·李。

025

“ 第4章 来到大城市

纽约就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令人难以适应，感到惊慌失措，尤其是对于我们四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男孩子来说。

045

“ 第5章 我的大学时代

“只要一个人没有被打得不能动弹，那这场战斗就还没结束，”他强调说，“只要你不是那个不能动弹的人，在这个拳击台上，你就有机会翻身。要想成为冠军，你就得学会索取，不索取你就不会给予。”

059

“ 第6章 寻找工作

当时，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可以不用再去矿场卖苦力，这时赌场的老板却把我叫
到一边，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这里不再需要
我的惠顾。

075

“ 第7章 在经验教训中成长

股票市场对一个人性格的作用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
大，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这种影响有些不可思议。

091

“ 第8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提议让我窃喜，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于是，我
年纪轻轻就成为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合伙人。那年，我
25岁。

107

“ 第9章

第一次重大交易

第二天，果不其然，纽约交易所开票，意料之中的全线飘红。巨大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腰包。我们是纽约证券经纪行无可争议的冠军，胜得干净彻底，一丝一毫都不拖泥带水。

115

“ 第10章

犯下的一个错误

每当在交易所会员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姓名，我就像喝了一杯醇厚美妙的烈性甜酒，精神振奋，无比满足。但接下来的惨痛教训给了迷醉中的我当头一棒——使我终于明白，赚到钱是一回事，留住钱又是另一回事。在资本市场上赌红了眼的人，想要留住赚到的钱实属不易。

131

“ 第11章

当恐慌降临

人类也跟飞禽走兽一样，每当有恐慌侵袭他们的心时，一切优雅的做法都会被他们忘记，甚至有时候就连最基础的举止礼貌也都被他们抛诸脑后了。

143

“ 第12章 华尔道夫的名人

虽然在之后的几年里，也陆续地发生过一些所谓的“巨人”之间的权势争夺战，但是就斗争的强度、时间和影响力来说，无论哪一次的斗争都无法与哈里曼和摩根的这场大战相提并论。

163

“ 第13章 耿耿于怀的憾事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命中总有些憾事让你耿耿于怀。于我而言，从未拥有或者经营过一条铁路，至今仍让我无法释怀。

179

“ 第14章 转折点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十拿九稳的事情”在市场上是没有的。况且，我也不希望别人依据我的判断行事，为此而承担责任。哪怕是最优秀的投机者也难免会犯错误，操作中会出现一些失误。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就要迅速地悄然撤出。

189

“ 第15章

与古根海姆家族合作

我是个求新求变的人，每当这些公司发展到了有一定阶段，可以分配股利、坐享其成的时候，我就会撤出公司，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我享受的是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

201

“ 第16章

寻找橡胶

因为持有这家企业的股票，也促使我对橡胶消费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激发了我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来整合橡胶产业的念头。洛克菲勒家族就曾这样涉足石油行业。

215

“ 第17章

为美国寻找铜

当时间的脚步走到世纪之交时，我逐渐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件在你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在证券市场或者商品市场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227

“ 第18章

J·P·摩根从来不赌

在多年的股市生涯中，我之所以能无数次躲过灭顶之灾，守住自己的财富，是因为我能克制自己贪婪的欲望——一次又一次地在股票上升的途中便抛出。虽然继续持有，可能会挣到更多的钱，但适时抛出，也让我避免因股票崩盘而落入深渊。

243

“ 第19章

我的投资哲学

“当我刚开始参与交易崭露头角时，人们说我是个赌徒，”阿尼斯爵士说道，“随着交易范围和交易量不断扩大，我投机者的名声也因此被广泛传播。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我就成了受人尊敬的银行家。其实，从赌徒到银行家，我所做的事情始终没有变过，风险与我同在。”

255

“ 第20章

世外仙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繁杂的时代，所以要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匆忙的世界和繁忙的事务做些审视，看看这一切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慢慢地梳理一下心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271



第21章

黑人的进步

虽然河流的前方险象环生，但每当想到我们已经踏上
征程，我就信心百倍，相信将来有什么困难，我们都
能勇敢地克服。

289



第22章

未来岁月

有些人早早地就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规划，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如何让梦想成真。说实话，我并没有这样
做。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相互冲突的愿望，我常常
被它们所困扰。在人生中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就是由
这些突发事件所决定的。

303

第1章

我的父亲

南方邦联的医生

我出生于 1870 年 8 月 19 日，当时，我家的房子位于南卡罗莱纳州卡姆登镇的主街上，是一座用木材搭建的二层小楼。这里虽说是镇子，但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是视野开阔的乡下。我们的房子后面建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远一些的地方是一块 3 英亩^①大小的辽阔田地，这块田地经过父亲的打理，颇有些“试验农场”的感觉。直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父亲不辞劳苦地在田地里种满甘蔗，那个劲头就像以种植为生的农夫一样。

父亲在他的“农场”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此，母亲有些不满。她认为，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当时，父亲是本州最具声望的医生之一。他年仅 33 岁就被南卡罗莱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为会长，并且在州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他还积极投身于混乱且血腥的政治运动。

最近，我一直在翻阅父亲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本病历记录。在那些潦草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起到的作用。他不仅给白人看病，也给黑人看病，无论是重病还是小创伤都来者不拒；这些伤病五花八门，有小孩被鱼钩扎了腿，有年迈的黑人奴隶在主人去世后绝食而奄奄一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父亲有一辆两座轻便马车，他驾车出去给人看病的时候，经常带我一起

① 1 英亩 = 4 046.86 平方米。

去。等我年纪稍大一些，他就很放心地让我掌控缰绳，自己就坐在我旁边读书看报。偶尔我转头一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已经睡着了。有一段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们把马车停在一座非常简陋的小木屋门口，父亲下车，让我待在车上等着，不要走动。不一会儿，他匆忙地跑出来，从车上拿了一把斧子，开始拼命地砍木窗板，一边大声叫着：“这里有人要死了！屋子里没有新鲜空气！他要窒息了！”

我们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时候，父亲还自己种东西，他把他的那块土地叫作“试验农场”。当时州里并没有农业服务机构来尝试更好的耕作方法，但我父亲认为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而且他对耕种作物非常有天赋，尽管此前没有任何经验，也没受到过任何培训，但几乎很快就成了一位农业专家。他一直致力于让当地人过更好的生活，一生都拥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家在我 10 岁零 6 个月的时候搬到了纽约，纽约城高楼林立，拥挤不堪，是他第一个在城区中开设公共浴室，造福于很多人。

我父亲订了许多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每本他都会仔细翻阅，攒了一大沓，堆在他诊所的医学书籍旁边。他在自己那 3 英亩田头上试验从书里学来的理论。后来我们县开农贸展会，我们家田里长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都得了头奖。

父亲收集的作物种子品质都很好，还经常主动把种子送给农民们。别人要是在种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会来问他，每次他都很耐心地帮他们解决。我父亲想证明可以通过铺设砖块来给农田排水，他买了几英亩地势较低的土地，做了当时我们那个地区的第一次同类的试验。

我父亲相貌不错，甚至可以说长得相当英俊——他身高 6 英尺^①，腰背笔挺，像个军人，他的络腮胡茂密黝黑，瞳孔的颜色是碧蓝的，眼神总是很温柔，但你能感到其中暗藏的坚定。他穿衣打扮总是一丝不苟，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衬衫袖子的样子。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友善，声音柔和，吐字发音也标准，没人能从口音里听出他是在国外出生的。

① 1 英尺 = 0.304 8 米。

///

1840年7月29日，父亲出生于一个小村庄，名叫什未森，在那个年代属于德国管辖，离波森很近。父母给他起名叫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但父亲很少提到自己的先辈们，要是有人问起，他总是如此回答：对一个人来说，去路要比来处更加重要。

直到我20岁，跟父亲回到欧洲探望我的祖父母时，才真正开始了解巴鲁克家的历史。我的祖父名叫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他的名字里隐藏着我的名字。他给我看了一块颅骨，那是我们家的古老的传家之宝，上面记载着一代一代的家族成员。巴鲁克家族最早起源于一个拉比家族，流淌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液，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又汇入了波兰人或是俄罗斯人的基因。

古代有个叫巴鲁克的人，从事档案编纂的活动，《耶利米语言》就是他编辑的。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祖父一直声称我们家族是他的后代，我父亲却对此不置可否。

我与祖父结成了忘年交。他虽然对英语一窍不通，但我的德语非常熟练，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愉快。他跟我父亲差不多高，有6英尺，头发很柔软，是棕色的，虽然年纪大，但脸上总是有一层红晕，厚重的镜片之后，那双黑眼睛异常深邃。祖父最爱的事情就是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消磨一下午，抽雪茄、聊天，甚至什么也不想，他像个学者，但更像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空想家。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但我父亲要务实得多，每当这时候，他就待在家里，和我的祖母在一起。

祖母未成婚时名叫特蕾莎·格伦（Theresa Gruen），她跟祖父并不是同一类人，她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并且非常节俭，我觉得她可能是波兰人的后裔。祖母个子矮矮的，眼睛则蓝得像海，她把这双眼睛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又把它传给了我。

1855年的时候，我父亲只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他孤身一人，悄悄远渡到美国。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他举目无亲，

唯一认识的人名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在卡姆登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和父亲是同乡，也来自什未森村。

曼内斯·鲍姆收留了我父亲，成了他的监护人。于是当时还年少的父亲在杂货店里负责收钱与记账。就连工作的时候，他的手边也放着一本英德词典，磕磕碰碰地阅读历史书籍，以此自学英语。我父亲为人聪明得体，工作又勤奋认真，鲍姆太太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男孩可能前程无量，于是她向鲍姆先生提出，要把他送到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莱纳医学院去读书，毕业之后，又送他去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鲍姆太太还有个侄女，她介绍她和我父亲认识，没过几年，她成了我的母亲。

曼内斯·鲍姆对我父亲很好，父亲从未忘记过他的恩情，我的中间名就叫曼内斯。曼内斯身材虽然矮小，但他壮实又勇敢，照当地人的话说，他的勇气“跟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不相上下”，我为跟他同名感到自豪。

小时候，父亲总爱重复说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气势汹汹地跑到杂货店，手持锄头，逼着曼内斯收回曾经说过的某句话。曼内斯当然拒绝了，那家伙就举起锄头打他。曼内斯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下，满头是血，但他固执地说，自己不会收回任何一个字。那个恶棍听到后，更加怒不可遏，将曼内斯压倒在地，拿大拇指抵住曼内斯的双目，声色俱厉地威胁他，如果他不从命，将会失去这一双眼睛。

“我不会收回的！”曼内斯大声喊道！

那个恶棍居然真的将威胁付诸行动，开始动手抠他的眼睛，曼内斯在地上试图闭上双眼，无助地挣扎、扭动身体。突然，他感到加害者的两根大拇指有点松动，连忙抓住机会，咬住一根，死死地咬紧，任凭他疼得哇哇大叫，拳脚相加，也撬不开他的牙缝。那个恶棍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交换曼内斯的一只眼睛，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肆意变通。

我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在南卡罗莱纳州，个人尊严和荣誉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捍卫它们的必要，哪怕生死决斗也在所不惜。这种传统观念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他对曼内斯在那面临威胁时刻的勇气与决绝大加赞赏，并告诫我：“有的屈辱是无法忍

受的，甚至值得用生命为之抗争。”

1862年4月4日，父亲22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在一家医院做助理外科医师，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外科医生准备工具，他曾经不无幽默地说，彼时的他，“甚至没有切开过一个疖子”。正是如此青涩的父亲，穿着曼内斯·鲍姆送给他的制服，佩戴好从同一个人那里得到的佩剑，踏进了南卡罗莱纳州步兵第三营。

当时，州内有血性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加入南方邦联军队，对我父亲来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卡姆登镇上他认识的年轻人几乎都应征了。他们既没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甚至包括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在内。但他们都像我父亲一样，认为应当站在自己所居住的州的立场上，对它尽忠。

父亲随军开赴北方之前，一身军装，严厉地告诫17岁的弟弟赫尔曼（他也已从德国渡海而来），远离硝烟，战争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要跟它沾上边。9个月之后，兄弟再度碰面时，赫尔曼成了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骑兵了。父亲愤怒地质问弟弟，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赫尔曼也无辜而气愤：“你应该知道那些女人谈起没从军的男人的时候流露出的鄙夷，我甚至不敢朝他们看一眼。我受不了，我也要当一名军人。”

我父亲本是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因此他对战争的观察更为透彻细微。那些最悲惨、最恐怖的东西全都巨细无遗地展露在了他面前。他几乎不谈自己身为军人时遭遇过什么，就算是我和三个兄弟一起恳请他，“给我们讲一些打仗的事情吧”，他也常常保持沉默，支使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只有在极其难得的情况下，我父亲才会回忆那一段战争岁月。每到这时，四个儿子全都热切地围挤在他的身边。他会讲在赛达河边，是如何试图阻止南方邦联部队退却的。在一个早晨，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从温彻斯特驾马而来，这使得故事更加跌宕离奇，成为我们最爱的内容，因为历史听上去如同近在咫尺。

“当时，我亲眼所见，厄尔利(Early)将军在马上挥舞着军旗，他刚开始用严厉的语气斥责士兵们溃逃，后来渐渐变成恳求，”父亲陷入了回忆，“当时情况混乱，我快马加鞭，一边高声呼喊：‘战友们！打起精神！上帝

保佑你们，振作起来啊！’四面八方，炮弹的轰炸声连绵不绝，有一颗就在我眼前炸响了。我胯下的母马受了惊，驮着我横冲直撞，我勒不住它，只听到身后到处都有人大喊：‘见鬼！’‘你们快振作起来！’”

我父亲作为军医，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的经历，是另一个我们爱听的故事。那是他到野战医院报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资格的外科医生，正准备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他对我父亲非常不屑，因为父亲太年轻，看起来毫无经验——事实上的确如此。伤员已经麻醉了，躺在手术床上，老医生在他身边拿着手术刀，阴阳怪气地问父亲：“医生，或许这台手术你会想主刀？”我父亲心高气傲，毫不犹豫地接过他递来的手术刀——结果他的第一次手术相当成功，后来，这位外科医生对他赞不绝口。

南北战争中，许多战役都打得非常激烈胶着，我父亲亲身经历了其中最为惨重的部分，遍地都是呻吟的伤员，以及或完整或残缺的尸体。对此，他总是一语带过，而那些我父亲爱讲的，是虽然战争双方处于对立的位置，却依然高尚仁慈、尊敬对手，像中世纪的骑士们一样。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父亲听到许多报道之后，颇为不齿，更认为南北内战才算是真正的“绅士之间的战争”。

战争中有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21年他临终弥留之际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作为他观点的佐证最好不过。当时在怀尔德尼斯战役阵亡的北方联盟军人中，有一名名叫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S. Wadsworth）的少将，他的孙子后来成了代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当时，少将因流弹射中头部阵亡，南方联盟发现他的尸体后，递信给北方联盟防线，表示愿意送还少将的尸身，作为敌军，他的英勇一样令人敬佩。救护车载着沃兹沃斯将军的尸体一路穿过南方联盟的防线，休战旗在蓝天下猎猎飘扬，而所有亲眼见到这一幕的穿着破烂灰军装的军人们都摘下了军帽。

///

我父亲在南北战争中有过两次被俘的经历，然而当他在北方联盟的军营中逗留的时候，这些敌人待他却十分宽厚，因此他从未对北方联盟表达过什么强烈的敌意。

第一次是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南山发动初步猛攻时，南卡罗莱纳州第三营溃不成军，部队阵形因慌乱而挤成一团，潮水般向后撤退。整个营队伤亡惨重，指挥官乔治·詹姆斯(George S. James)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我父亲接到命令，负责在布恩斯伯勒的一个教堂墓地中照顾伤员。那里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桌子不够，只能把门板仓促卸下铺在地上，下面再垫两个炮管用以保持平衡，就是一座手术台。有一次，一位受了重伤的军人被抬上台子，护士给他注射了三氯甲烷麻醉剂，我父亲刚刚拿起手术刀，突然一阵弹雨呼啸而来，炮弹坠落发出巨响，地动山摇，溅起泥土，手术不得不告一段落，伤员被转入教堂接受手术。

更凶险的是，手术还没做完，北方联盟的骑兵就已经包围了教堂。战马的嘶鸣从窗外传来，还有军官发号施令的呼喝。然而，我父亲对此充耳不闻，只是和给他打下手的医护人员继续做着手术。而几英里^①之外的夏普斯堡，激烈的战火正在蔓延，总是有炮声突然炸响，由远及近，震耳欲聋。这时候，北方联盟有一位外科医生恰好路过，得知这里有手术在进行，就进来问我父亲是否需要帮忙。这份主动援助完全出乎父亲的意料，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生都记得这位高尚的医生的姓名——戴利(J. P. Daly)。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我父亲成为北方联盟的俘虏，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很快就会重获自由，因为南北双方之间定下了尽快交换被俘军医的约定。他以俘虏的身份和另外几个医务人员一起被送上开往布恩斯伯勒的火车，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火车行驶的过程中，他们得知，前方某个小车站上，支持南方邦联的民众们会接他们下车，并安排他们在一些有声望的平民家中借宿，等待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刻到来。事后，他回忆这段经历，都说这两个月是他在北方联盟军队中度过的最自由自在的日子。

但是，那个北方佬中尉军官好像并不愿意看到俘虏如此安逸，强行将被扣留的囚徒们押解到宪兵司令面前。但是，宪兵司令并没有做出令他满意的决定，反而放我父亲和另一位军医自由活动，只要他们保证第二天能来宪兵司令部报到。于是，两个南方邦联的年轻人被带到一个富有的平民家中，他

① 1 英里 $\approx$ 1.609 千米。

们不但住得很舒适，还在一场舞会上受到了特别的款待，一直玩乐到凌晨2点才回房休息。

吃过早餐之后，许多年轻的女士见他们年轻英俊，就要求他们去照相。于是他们乘坐一辆没有围护的马车，来到一个摄影师的照相馆。在那里，父亲与每个女士都摆好姿势合影留念。仰慕父亲的这些异性拍完照片之后，都送了副本给我父亲作为纪念，其中有一张在我小时候还挂在卡姆登的家中。第二天，这些被俘的南方军医就离开了布恩斯伯勒，前往弗吉尼亚州，并将在那里被交换回南方邦联的军营。

不幸的是，10个月之后，父亲就在葛底斯堡再次被俘。当时，皮克特（Pickett）将军率部队向皮奇奥查德推进，南方邦联部队临时接到命令，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导致所有伤员都是因为被北方佬的纵射火力击中身体侧面而受伤的。那画面真是惊心动魄，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父亲特意带我去了一趟葛底斯堡，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将那场战斗的激烈描述得巨细无遗，一边还取下头顶的黑色帽子在空中挥划，一头长长的白发在风中四散飘拂。

之前，南方邦联已经将野战医院设在了黑马酒馆，就位于马什一带，父亲将方位远远地指给我看。当年医院里的勤务兵就是从那儿取水给外科医生救治伤员用。父亲说，如果伤员太多，就必须连续进行强度很大的手术，或者一刻不离地照看他们，有时候甚至两天两夜无法睡觉，连闭目养神的机会都很少。

终于，南方邦联部队收到了令人心碎的撤退指示，但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突然接到了留守在医院，等待下一步通知的命令。他们全都知道，留下来的人必然会成为敌军的俘虏，却只能听从。

在等待北方联盟部队到达期间，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决定找点乐子。有一只孔雀，此前一直在医院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招摇地到处乱晃，后来就成了烤架上鲜美的烤肉。这是父亲他们三天里第一次吃到好东西，他们刚刚心满意足啃完最后一块骨头，甚至来不及擦干净手指上油腻的肉汁，北方联盟的一队骑兵就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我父亲本以为这次不再会受到温和的对待，但北方佬们对待战俘的方式再次使他瞠目结舌。他们静静地等着被逮捕关押，不一会儿，有一个文书模样的男子走了过来，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名叫温斯罗，并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急诊所需的医药用品。然后，他指给父亲看设在葛底斯堡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仓库。仓库里，一切军需品应有尽有，堆积成山，几乎要涌到大街上——对南方军人来说，这真是太奢侈、太罕见了，士兵们有时候甚至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这位文书向父亲提议从军需官那儿申请一辆马车。父亲对此半信半疑，犹豫地坐到了军需官办事处的客座上，结果又一次对北方佬的态度感到大为震撼。

“医生，您请坐吧，”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这里有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我猜测你会想看，上面报道了李将军的近况。你可以在这儿边看报边等我们的一辆马车过来。”

父亲翻阅了一些感兴趣的报道，然后发现一辆骡子拉的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外，任由父亲驱策。他用它装上了足足可以维持一个月的医疗物品、必需品，还有一桶埋在锯屑里的鸡蛋、一些葡萄酒、柠檬和冷藏的黄油，并又一次由衷感叹物资的丰富。

此外，马里兰州两位善良的女士和一位年长的英国护士都自愿过来看护伤员。布恩斯伯勒的一名医生还给父亲带来一套精良的外科手术器械，装载器械的盒子还刻上了父亲的姓名。后来，父亲把所有的器材寄到了卡姆登镇，他觉得战争结束之后，还能靠这些东西混口饭吃，继续行医生涯。

这次，父亲身为战俘度过了六个星期。没有任何预兆地，有一天，他与其他南方邦联的俘虏们一同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位于布恩斯伯勒的麦克亨利堡。传闻战争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他和其他被俘军医不得被视为人质扣押。

后来他得知，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一名叫拉克尔（Rucher）的医生，因为被判谋杀罪即将处以极刑。但他向来支持北方联盟，他的妻子便向联邦当局申诉，声称南方邦联的法官纯粹是不认同丈夫的政治立场，甚至

没有公正地审判。于是，华盛顿方面只好暂缓交换双方被俘的军医官，直到处理完拉克尔的事件才重新开始交换。

即便如此，拘押在麦克亨利堡也并非难以忍受。相反，我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会悠然地说“就像在海边的度假胜地度过了一个夏天一样”。北方佬们允许这些战俘在要塞内的地面上自由活动——几乎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们踢球、下棋，互相教授自己学过的异国语言，并就各种深刻的问题巧舌如簧地开展辩论。最让他们精神振奋的，莫过于每天都有年轻女士们来到要塞，陪这些被限制自由的俘虏们消磨时间，为他们加油鼓劲、讲笑话、调情，使这些男士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人质的事实，每天都要花费时间在打扮自己上面，还一窝蜂地购买时新的纸质衬领。

俘虏们贿赂了要塞看守队的一些军士，在晚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夜间去布恩斯伯格风流快活，但要保证在早晨换班之前能赶回来。这项私下订立的约定确实被安稳地践行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天早上，好几个医生没有赶回来，偷偷逃走了。点名的时候，其他人替外出未归的人答到，试图蒙混过关，但终于还是被发现了。从此以后，拘禁就变得严厉多了。最后，留下的军医官全都赌咒发誓不会企图逃跑，看管才稍微放松一些。两个月之后，拉克尔医生在狱中脱逃，打破了南北双方政府之间的僵持状况，麦克亨利堡的囚犯们也统统被赶出要塞，遣返南方。

这段时间里，我父亲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他抽空撰写了一篇论文，后来以《胸部两处刺刀穿透性刺伤的救治》的题目公开发表了。事隔许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军方公共卫生部的部长梅里特·艾尔兰（Meritte. W. Ireland）特意告诉我父亲这篇论文对外科军医仍然意义非凡。

///

当然，和每一个经历过战争岁月的士兵无异，我父亲也曾经有过艰难的回忆。1864年7月，他刚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外科医生。次年3月，南方邦联军队正在竭力阻拦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向北推进时，我父亲被指派往北卡罗莱纳州的托马斯维尔，帮助南方邦联军队准备布置野战医院的相关设施。

身为外科医师的父亲将一些和他一样的半职业军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

分队，并指挥他们把两个小型工厂的厂房和一家旅馆统统改建成战地医院。一天，有消息传来，说 280 名从埃弗里伯勒战役归来的伤兵正赶来这里救治，父亲连忙派出一名武装警卫员，把附近能帮忙的人都找来了。所有的男人，甚至是半大的男孩子，都被强制干活。比如，拆除两座教堂里那些碍事的长木椅，腾出更多的地方安置伤员。同时，另一部分人出去收集松针和松树节——把松针塞进麻布袋子里就成了简陋的床垫，松树节则可以点燃照明，使伤员在夜间乘火车抵达临时医院时，可以驱散沿途的黑暗。

那些士兵身上的伤痛令人心碎，火车抵达时，我父亲听见他们躺在车厢里不停地呻吟，用痛苦无助的语调咒骂着天地和敌人，身下垫着的棉花团原本松软，但因为浸透血液，都凝结成了坚硬的污块。

父亲向来深思熟虑，早已经预料到大批伤员到来之后食物储备可能不够，事先就挨家挨户嘱托妇女们帮忙烘焙面包，并准备黑麦、咖啡和熏猪肉等饮食。他甚至想到了有的伤员可能没办法自己进食，请了一群女人帮忙喂伤兵吃饭，把每个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我父亲自己，用两个小时安顿好他们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就开始做手术了。

把每个伤员都包扎妥当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父亲和那两位协助他的医生一直不眠不休地忙碌着。其他任何经历对我父亲来说都没有这次累，哪怕是彻夜不眠地等某个动员信号，或者是睡了没多久就被叫起来行军。唯独这一次，父亲感受到了彻底的精疲力竭。做完所有手术之后，父亲给战区医疗首长拍电报，说他精神不振，脑袋持续隐隐作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必须请求休息一阵子。结果拍完电报，他竟然当场昏厥了。

人们把他抬回家，他一直在床上昏睡了两周，中间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在此前救治伤员的时候，他已经染上了伤寒，只是忙于工作才疏忽大意没有发现。结果在一切结束之后，我父亲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伤寒也就乘虚而入了。等我父亲苏醒过来，发现战争竟然已经结束了。在他失去意识期间，北方联盟军队穿过了医院所在的地区，“逮捕”了父亲，随后对他适用了假释，父亲对这些跌宕起伏的变化一无所知。

等父亲的身体痊愈到能够承受舟车劳顿，他立刻就返回了曼内斯·鲍姆

在卡姆登的家中，这几乎是父亲在整个美国唯一熟悉的地方，是他的港湾。我父亲回到家之后身体仍然非常虚弱，一开始不得不拄着拐杖，而且他这时候几乎一文不名，跟南方邦联另外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本来指望着布恩斯伯勒那位朋友送的医疗器械能够帮他开始在乡间的行医生涯，却发现谢尔曼的部队已经把这些东西洗劫一空。

战争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漫长的余生都无法使之消弭。只要有乐队演奏起南方的“迪克西爵士舞”，无论身处何种场合，他都会下意识地蹦跳起来，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大喊，像一个反叛者。我父亲在平时，一直都是个庄严自持、不苟言笑的人，但我却见过他在大都会的歌剧院里，当着许多陌生人的面，失态地上蹿下跳，像动物一样扯着嗓子尖厉地嘶叫。

每次这种旋律一响起来，母亲和我们几个兄弟就都知道什么事情将会发生。母亲十分紧张，近乎哀求地抓住父亲手中的鸡尾酒杯，说道：“安静，医生！安静会儿吧！”虽然从来不管用，但她每次依然会这么做，因为她对这样的父亲感到慌乱、无所适从。

第2章

北美殖民地的先祖

若根据父亲那一系的血统而言，我的祖先是欧洲移民，但若顺着我母亲的家世，则又是另一回事，我成了一个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 90 年代的古老美国家族的后裔。

伊萨克·罗德里格兹·马奎斯（Isaac Rodriguez Margques）是我母亲的先祖中第一个抵达北美海岸的人，在一些老旧的文件中，他的姓还有马奎兹、马奎伊斯、马奎赛等各种各样的拼法。他来到纽约是在 1700 年的某个时候，当时他驾驶着船只从事亚欧与美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并作为船主确立了地位。他与拥有传奇人生的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者最终因为海盗行为被判处了绞刑，但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他被处死是有人伪造了证据。基德死后，他的遗孀依然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出没于社交场合，最终与一位家境富裕而颇有名誉的市民重新缔结了婚姻。他们的宅邸与马奎斯家仅仅隔着一条街道的距离。

事实证明马奎斯对商业有着敏锐的嗅觉，才会选择在纽约这个城市定居并开展海运生意。当时的纽约城区虽然狭小简陋，在木板拼成的城墙北边只有两三条街道，但这丝毫不影响纽约城的喧嚣熙攘，约 3 500 个居民拥挤地生活在此。当时英国皇家任命的该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雷切尔（Benjamin Fletcher）对海上贸易（包括海盗行为）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纽约城的兼容并蓄与迅速发展。

弗雷切尔几乎欢迎每一位来到纽约城的海员，里面不乏一些臭名昭著的家伙。比如著名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弗雷切尔曾经在自己的总督公馆里设宴款待他，并将他形容为“一个和蔼可亲、温柔友善的人”。托马斯·图也确实没有辜负弗雷切尔的恩情，他投桃报李，放弃了曾经作为据点的纽波特（Newport），而将纽约作为自己新的常驻港口。

纽约在弗雷切尔总督放纵的治理之下，渐渐成长发展，成为足以和纽波特、查尔斯竞争的城市。在这里，处理与海洋贸易有关的事务极为便捷，没有人会多事去问一些货物来源和途径之类的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有传言说，弗雷切尔在位期间，几乎每一个在纽约城外从事海上贸易的船主都难以洗清身为海盗的嫌疑。

我倒希望自称是某个海盗的后裔，为自己家族历史添上一丝传奇的色彩。可惜的是，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都可以证明，马奎斯谨小慎微地将他的海上冒险生意全部都限制在了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在马奎斯成为纽约城的自由市民仅仅一年之后，弗雷切尔就被一位名叫贝勒蒙伯爵的总督替代，海盗行为也被严格地禁止。他的执政理念和弗雷切尔大相径庭，发动了强有力的反海盗运动，纽约城风云突变，许多原本耀武扬威的海盗被一一送上了绞架，基德船长便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之一。这样，马奎斯就更加不可能去从事海盗行业了。

然而，海盗行业作为纽约曾经的经济支柱，一旦显露颓势，必然会对纽约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贝勒蒙的改革之下，纽约一些杰出的市民精心架构起来的商业组织也受到了伤害，我的祖先马奎斯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其成员。但马奎斯本人因为与海盗业没有太大联系，进行改革运动的贝勒蒙的黑名单里也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一切都显示着他没受到运动的牵连，在这一时期，他的财富反而增长了。

马奎斯确切的生日和国籍无迹可寻，也没有留下任何文档记录，只有家族里一些不靠谱的传言。传说他原来是丹麦人，或者是牙买加人，后者的可能性要稍微大一些。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祖先是西班牙裔葡萄牙犹太人。

我找到了一份文件，上面记载着这位第一个到达美国的祖先，最早的日期是 1697 年 9 月 17 日。就是在这一天，马奎斯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一级一级地踏上了市政厅的台阶。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对他的身份背景进行了例行审查，然后宣布他正式成为一名纽约市的自由民。这一身份使他能够在当地的选举中享有合法的投票权，同时带给了他在军队服役的义务。

这一天之前马奎斯到底已经在纽约居住了多长时间，现在仍未找到任何资料记载，但当时的法律规定：“除自由民之外的任何其他身份的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城市不得……不得从事任何……行当，不得出售或致人得知出售任何类型商品。”而马奎斯在成为自由民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海上生意这种忙碌的“行当”了，可见他从外来移民到自由民之间的过程可能并没有拖延太久。

传言马奎斯一共拥有三艘海船。我只发现了其中一艘船的有关记录，它叫“海豚”号，有两条常规航线，时而往返于纽约和英国，时而从纽约到英国，然后前往西印度群岛海岸装运黑奴，最后再返航回纽约——这是最著名的三角贸易航线。但偶尔，马奎斯也会开辟一条从非洲至纽约的直达航线，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将奴隶劳动力大规模引入纽约殖民地的黄金时期。

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文件记载，至少有一次海上航行途中，“海豚”号上载有一名外科医生。这表明马奎斯对海员和奴隶们的健康状况比较关心，这种关心在当时的商人和奴隶贩子当中几乎绝无仅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奎斯确实通过非法而残酷的贩奴贸易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但他的子孙后代们在南北内战中绝对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无论身处南方北方，他们都受到了严酷的人身折磨和侵害，几乎财产尽失。

马奎斯的妻子拉切尔（Rachel）在他成为自由民的一年之后生育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雅各布（Jacob）。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名叫伊斯特尔（Easter），这个名字是马奎斯亲自起的。

发迹之后，马奎斯花了 550 英镑在女王街购置了一处房产，房契上形容这栋房子为“一座大砖房”，占地极广，一直延伸到东河附近。现在，这座房子的门牌号已经变成了珍珠街 132 号。

在那个时代，治理纽约的一些规章制度实在很有意思。我在资料上读到，当时纽约城市管理条例上记载着，女王街会在每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用灯笼提供照明，每隔六座房子，就必须在房前的杆子上悬吊灯笼，而居民们得按具体接受的照明服务支付费用。每天夜里，都有一名看守人手执铃铛沿着街道四处巡逻，并负责大声报告天气和钟点。烟囱和壁炉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接受官方检查，为了杜绝一切火灾隐患。

马奎斯死后，从他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中可以发现，他毕生都生活在一个显赫的上流社交圈子里，成员们衣冠楚楚，声名显赫。他在女王街的家离纽约市的一位前任市长亚伯拉罕·德佩思特（Abraham DePeyster）的府邸仅仅一个街区的距离。而富裕的食糖进口商尼格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正是这一城区的市政委员会委员。

在马奎斯遗嘱上签字的几位见证人也都拥有高贵的地位，他们分别是：市长伊本内兹·威尔森（Ebenezer Willson）、第一位出生于美国的纽约州殖民地总督里普·万·达姆（Rip Van Dam）、威廉·皮尔特雷（William Peartree）。最后那位本来只是一位水手，攒够钱之后，就用所有的积蓄换来一只海船从事奴隶贸易。后来他成为纽约市长，并在任职期间建立了第一所免费学校。

我的祖先马奎斯有两个特别信任的朋友：亚伯拉罕·德·卢森那（Abraham de Lucena），他是海狸街（Beaver Street）上一座犹太教堂的拉比^①；还有鲁伊斯·高梅兹（Luiz Comez），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市民。马奎斯在遗嘱中特别指定由他们两个协助妻子管理他的遗产。

遗嘱开篇用华美的花体字写着一段话：“由于……由于航海前往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鉴于此举有一定危险性，死亡随时都有可能突然降临……”

接下来就是正式而具体的遗嘱内容，他留了一部分财产给自己的母亲，还让遗产管理人为她购买一个女奴，作为用人照顾她。剩下的财产则由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均分。除此之外，伊斯特尔“享有 50 英镑，等 18 岁成年或者婚嫁时，可以经其母的同意购买一件珠宝”。

① 拉比：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

没有人会料到，马奎斯在立好遗嘱之后突然就去世了。此外，我查阅文件中没有记载他的妻子拉切尔和两个孩子伊斯特尔以及雅各布的任何信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当我乘坐的轮船驶入纽约港，我站在甲板的栏杆边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抬头就能将整个海湾尽收眼底。碧蓝的天空下，纽约城的轮廓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与马奎斯当年在此登陆时所见到的木板城墙已经迥然不同。这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位我素昧平生的祖先，并感慨于这世间的沧海桑田。

然而，在城市日益耸起的广厦高楼背后，这个国家依然是几百年前的那个美利坚；它的轮廓改变了，内里却坚定不移，是马奎斯的目中那片放射着自由光芒的土地，一个机遇遍地的所在；250 多年来，这种光芒也没有丝毫褪色。

作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自由不朽，无论经济已经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改变，无论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这片土地仍然会包容一切自由的人格，而我认为，这正是美国国民性经久不衰的原因。

///

马奎斯之后，仍然有所记载的我的母系祖先叫作伊萨克·马科斯（Issac Marks），他本人至少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档案里他被列为马奎斯的儿子，但马奎斯在资料里并没有一个叫伊萨克的儿子，而且他出生于 1732 年，因此更可能是马奎斯的孙子。

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撤出纽约城开往阿尔巴尼的时候，马科斯加入了阿尔巴尼县民兵第四团，然后跟随着军队离开了纽约。

他的儿子萨缪尔（Samuel）1762 年出生于纽约城，长大成人后，他搬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在这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是我母亲在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位祖先。他的一个孩子德波拉（Deborah）嫁给了查尔斯顿的一位犹太教拉比哈特维格·科恩（Hartwig Cohen）；她就是我的曾外祖母。

我第一次见到曾外祖母德波拉的时候，她已经年届 80 了，但即使在这

个年纪，她仍然举止优雅，对穿着也非常讲究，总是披着一块整洁的披肩，手上也从来都戴着“半只手”^①。

跟大多数老人家一样，我的曾外祖母已经很难记住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但对遥远的回忆却一清二楚，仿佛一遍遍重复经历。在我 11 岁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她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到紧张的地方，我会屏息静气，有时欣喜若狂。她总是不断地提起 1825 年拉法耶特（Lafayette）于全国巡演期间，在查尔斯顿的一场舞会上与她跳的那一支舞，这是她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能够源源不断地酿造属于一个女人的浪漫。她对 1812 年美英战争也有印象，虽然那时候她还小。我的曾外祖母非常擅长讲故事，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身临其境；这种天赋，她继承自她的母亲，她母亲孩提时代在纽约度过，当时正处于独立战争时期，英军曾兵临纽约城下。

每次我想起这位曾外祖母，都情不自禁地感叹，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年轻啊。我通过自己某些亲身经历，和她给我讲述的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仿佛荣幸地目睹了这个国家从独立到现在欣欣向荣的历程。

我的外祖母萨拉·科恩（Sarah Cohen）——德波拉和科恩拉比夫妇的女儿，在妙龄时代受到一个年轻商人的追求。商人名为萨林·沃尔夫（Saling Wolfe），还管理着一座种植园，家乡在南卡罗莱纳州人烟稀少的“内陆”温斯伯勒，他后来成了我的外祖父。他们的婚礼在 1845 年的 11 月举行。婚约是用希伯来文起草的，要求遵循犹太教堂的婚礼仪式，并事先确定新娘的嫁妆和新郎婚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根据摩西律法和以色列律法，伊萨克之子泽埃布（即萨林·沃尔夫）于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请求牧师的后人泽比之女萨拉（即萨拉·科恩）成为他的妻子……而萨拉确实已经同意成为泽埃布的新娘，她带来的嫁妆包括镶金带银的华服、床上用品、家具等等，价值共计 1 000 美元；而新郎在此基础上添加其财产 2 000 美元，作为信托财产支付给财产信托人，即牧师后代耶切尔之子泽比（即哈特维格·科恩）和伊赛亚之子耶胡达（即 L·I·摩西），以便从今日起能够永远约束新郎及其继承人、财产受让人、财产执行人，

① 半只手：当时人们给妇女用的无指手套起的名字。

上述财产合计本城流通货币 3 000 美元……”

萨拉和沃尔夫夫妇总共生了 13 个孩子，其中活下来的有 10 个。我的母亲伊萨贝尔·沃尔夫 (Isabelle Wolfe) 排行第三，同时也是年纪最大的女儿，出生于 1850 年 3 月 4 日。

沃尔夫家的家用《圣经》上记载了我母亲的出生，扉页上写着一行字：“上帝赐福予她。”我始终觉得这预示着我父母在未来将会缔结婚姻，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巴鲁克”的意思就是“得到赐福”。

我外祖父曾经是个富裕的人，拥有许多奴隶。后来南北战争爆发，不但使他倾家荡产，更摧毁了整个社会结构。4 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他本以为可以留下一点财产，却被谢尔曼的突袭部队再次毁灭殆尽。

为了逃过军队的洗劫，外祖父沃尔夫把银子悄悄藏在井中。北方佬的军队到达了他的房子，并开始到处搜刮财物。他们的气势汹汹让几个站在井边上的黑人慌张地开始哭泣起来：“这可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找到银盆子的。”他们当然找到了。不但如此，他们就连房子也没有放过，建筑、棉花地全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牛群也被赶跑。

包括我的外祖母在内的一些女士，联合当地圣公会的那位牧师，向谢尔曼将军提出了申诉，希望他能阻止军队这种肆无忌惮的扫荡，但他的回复是：很抱歉，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小时候，外祖父拥有的几座种植园都在逐渐走出战争的影响，他期待着它们或迟或早能够恢复往日的兴盛。尽管外祖父竭尽全力拯救家业，这一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加之南北内战中他欠下了许多债务，他 84 岁去世的时候依旧一贫如洗。我的外祖父的死法挺痛苦，他年老多病，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在床上休养，但家人允许他爬起来坐在火堆前烤火。有一天，身边没有看护，他将坐着的椅子倾斜着，好让脚能离炉火更近。然而椅子突然失去平衡，外祖父跌入火堆，全身都被严重烧伤，并因此失去了生命。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一个大衣柜的抽屉里装满了南方邦联时期使用的旧纸钞，虽然这一切没办法改变他已经一无所有的事实。

在我父母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被家族里的人传为佳话。那件事发生在母

亲老家。南北内战爆发之前，父亲就曾到沃尔夫家做客，似乎是水到渠成地对他的大女儿伊萨贝尔产生了好感。战争期间，父亲如果回家休假，就经常约她出去。有一次会面的时候，贝尔^①（Belle）提议给父亲画一幅画像，这个年轻的外科医生欣然答应。

当谢尔曼的突袭部队到达附近，开始对沃尔夫的财产进行劫掠，并纵火焚烧他的房屋时，我母亲只有 15 岁。这幅画像原本也注定要毁于火中，但我的母亲冲入火中，冒险救出了它。跑出火场，我母亲松了一口气。这时一名北方士兵突然出现，猛地从她手中夺过画像，拿刺刀对着上面一阵乱刺。我的母亲气愤却无能为力，抗议时甚至还挨了一记耳光。

这时，有一位名叫坎廷（Cantine）的北方军上尉发现状况，急急忙忙跑过来，并抽出长剑，用阔面拍打那个欺软怕硬的士兵。我的母亲当然被这种骑士般的高尚举动所感动，于是在北方联盟的军队逗留在温斯伯勒的这阵子，一段恋情悄然萌生了。

我父亲从战场回来之后，发现贝尔对自己有些心不在焉。北方联盟走后，她跟坎廷上尉依然书信不断，从未中断过联系。我父母的感情一度处于危险之中，但父亲很快就重新掌控了局势。1867 年，他作为一名乡间医生开门营业，有了能养家糊口的生计之后，很快就和贝尔结婚了。

我的父母生了四个男孩。兄弟里，哈特维格（Hartwig）年龄最大，生于 1868 年，而我出生于两年后，排行第二，赫尔曼生于 1872 年，赛林（Sailing）则生于 1874 年。

这里还有个后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华盛顿的办公室找我，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赶赴海外前线参加战斗。然后他给我看了随身带来的一封介绍信，信上的字迹我非常熟悉，正是我母亲的。

“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母亲在信上说，“就是坎廷上尉的儿子。你应该记得这个人吧？我希望你能尽力去帮助他。”

我母亲家里曾经很富有，她从小娇生惯养，甚至从不需要自己穿衣戴帽，

^① 贝尔：贝尔是伊萨贝尔的昵称。

用人包办了一切杂务。谢尔曼部队发动袭击之后，母亲家境大不如前。在我父亲的诊所变得声名远扬之前，母亲还要通过教人弹钢琴、唱歌来贴补家用，一节课只收取 25 美分的报酬。她还会把家里的奶牛产的牛奶和黄油拿出去售卖，家里那群泽西种奶牛一直是父亲的骄傲，它们健壮又高产。

然而我母亲并没有放弃所有大小姐时代养成的习惯，比如，每天早上她总是坐在床上用早餐。我们三兄弟在早餐之前会恭敬地到她房间报到，并排接受她的仔细检查。“伸出你们的手来，让我看看手指。嗯，很好，再把耳朵转过来。你刷牙了吗？”她的检查非常细微，结局往往是我们得重新往洗手间跑一趟，再把自己搓一遍。

卡姆登镇在当时大约有 2 000 人口，其中有一半是黑人。独立战争时，这个镇子被高恩沃利斯（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占领了。有一个女人，是高恩沃利斯将军的情妇，名叫爱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她跟随心上人高恩沃利斯将军来到美国，但却因故死在了卡姆登镇。将军没有将她的遗骨带回去，而是将她埋在了当地。传说附近每年都会发生涝灾的沃特里河，之后再也没有漫上卡姆登镇的农田，镇上的黑人们都说是爱伦的灵魂在阻止洪水淹没她的坟墓。

第3章

乡村孩子

在南北内战中，卡姆登为南方联盟贡献了 6 位将军，这一点让所有镇民引以为傲。但不管为军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战争唯一的作用还是使人贫穷。卡姆登在战后千疮百孔，经济艰难，但我却不记得我们家是否遭受过什么物质上的困厄。

自我能记事起，我一直居住在一个宽敞而舒适的家中，日常用品应有尽有，丝毫不比邻居家差。父亲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直接兑换成物品和劳务：一捆木柴、一车玉米、几只鸡、一头牛、一大包的棉花，或是一匹小公马，当然如果病人或他的家属们愿意，也可以选择到父亲的田地里干一天活。我们的食物——蔬菜、水果和浆果——都是我父亲种的，为了过冬，我们会把吃不完的东西晒干、腌起来储藏。我家的院子里有几棵李子树和核桃树，还有一棵是桑树。我们都很喜欢吃桑葚，但是有几年桑树不结果，每当这种时候，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就会让我们拿根细软的柳条抽打桑树，她相信这样做，来年我们就一定能吃上桑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们家还会自己熬制食糖，其实在搬到北方之前，我一直以为食糖只有褐色的。等秋天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采集山核桃和核桃。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最期待的就是圣诞节了，因为像糖果、橘子、香蕉和葡萄干之类的零食，只有在圣诞节这么隆重的节日才能吃到。平日里，我们会购买的东西大概只有布料、咖啡、茶叶、食盐和香料，其他的，像书籍、杂志以及查

尔斯顿的《新闻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都是非常罕见的奢侈品，会在居民中一家一家互相传阅。

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草莓节和难得一见的马戏团巡演了。其实当地还有个剧团，他们花好长时间排练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然后在卡姆登镇政厅演出。剧团还演出过威廉·特拉福尔斯（William Travers）的《我钟情的凯瑟琳》（*Kathleen Mavourneen*），猜猜担任主演的是谁？是我的母亲！纳森·巴鲁克（Nathan Baruch）叔叔扮演剧中的反派角色，在剧情高潮时，高举匕首威胁女主角。母亲惊慌地退缩，蜷起身体保护自己，而纳森叔叔步步紧逼，挥舞着匕首，这个场景成了我童年的噩梦。当时，我分不清现实和演出，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来，大声哭喊恳求：“纳森叔叔！不要伤害我的妈妈！”被我这么一闹，叔叔记不起下一句台词，而母亲心疼地注视着我，观众们都出戏了，我被人推搡着赶出了剧院。

我小时候有点儿恋母情结，性格又软弱，敏感，害羞，喜欢跟在妈妈身后。每次吃饭时，我都坐在妈妈的右手边。其实，那是每个兄弟都想得到的位置，只有在这件事上，我的态度非常强硬，跟他们争得很凶，最终才得到了这一特权。结婚后，我让妻子坐在我左手边吃饭——也就是我母亲原来坐的位置。

母亲把做演员的时候学会的演讲经验都教给了我们，比我大2岁的哥哥哈特维哥在这方面天赋过人，总是能得到妈妈的夸奖。实际上，长大之后他真的成了一个演员。像我就非常不喜欢演讲，站得笔挺背诵诗文简直成了一种煎熬，但我又很害怕母亲会因为我表现不佳而不喜欢我。

之前说的曼内斯·鲍姆家中的那次灾难性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一次，我的母亲牵着我的手，领我到房间中间的位置，让我说点儿什么。我就这么站着，两腿吓得直打战，却还是用唱歌的调子开口朗诵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劫难烙印在我的头脑之中，直到今天，当时引述的那首诗的开头几句，我仍然能够脱口而出，即便当时我念它们时有多费力。那是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霍亨楸》（*Hohen linden*）。

太阳低垂在椴树上，
白雪皑皑一片苍茫；
急速奔流的伊赛河，
像那冬季一样昏黄。

我艰难地背完四句话，我父亲突然抬起手，用一根指头按住一边鼻孔，学我的语气发出奇怪的声音：“啊—嘟哆儿—哒！”

父亲的嘲弄让我觉得羞耻不堪，接下来该诵读的诗句都缩回了喉咙深处。我冲出房间，头也不回地投入黑夜，跑回了家。我一度惧怕的黑夜这时候变得没什么大不了了，因为那个房间更加使我害怕。我父母到家的时候，我已经哭着睡着了。我妈妈事后调侃我，说是她帮我擦干了泪痕。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父亲经常向我倾诉，说他对自己开的那个小小的玩笑非常后悔。虽然他没什么恶意，但这个小插曲结结实实地毁掉了我试图掌握在公开场合说话技巧的愿望。此后数年中，只要有任何类似的场合，我一站起来准备开口，那句“啊—嘟哆儿—哒！”都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中回响。

我曾经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伍德鲁·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他安慰我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人喜欢说话了，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更喜欢做事的人。更何况，大部分人说的话都很少有人在乎。我甚至不建议你去学习说话的艺术，现在这样就足够好了。”

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对一个男人而言，拥有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能够精确地表达自己，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技能。

后来，在我的请求下，威尔逊总统帮了我一把，当时我们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教我，怎么做才能让演说不那么糟糕。一天晚上，他几乎一直在向我演示什么手势才是优雅的，而不应该莽撞、随意地摆动双手。“像这样，”他打着手势，并示意我跟着一起做，“不不不，不是这样。”他将手猛然往前一伸，同时开始示范说明那些我不太能领悟的要点。

还有其他朋友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我有个坏习惯，说话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咬紧牙关，声音就从唇齿的缝隙间艰难地挤出来。赫伯特·贝雅德·斯

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经常对我说：“天哪！能不能把你的嘴巴张大点儿！”1939年，皮亚斯教皇十一世（Pope Pius XI）谢世，有人邀我在广播里发表简短的演说，歌颂他的功德。我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斯沃普在边上不断提醒我：“要张开嘴啊。”他的表情甚至差点把我逗笑了。

///

我四五岁的时候开始上学，学校是威廉·沃利斯（William Wallace）夫妇创立的，离我家大概有1英里远。每天早上，我和哈迪^①一起步行上学，我们用一块带图案的圆形纸巾，把午餐包裹起来，放在一只锡盒子里。在那个时代，“纸巾”有个奇怪的用途——垫在婴儿身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隐隐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照现在的说法，沃利斯夫人是办学前班的。她家的厨房就是所谓的“教室”，当我趴在地上从A到Z练习书写时，她就坐在旁边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或者在一旁准备午餐的菜肴。沃斯利先生教授高年级学生的数学课，还管理学校所有的行政事务。这些事务他会在另一间房间里进行，那里有长椅和课桌，课桌做工粗劣，桌面往往都开裂了。

沃利斯先生是个好老师，尽管他的一些教学方法死板又过时，放在今天来看，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他上课的时候常备一条教鞭，要是有人胆敢走神、不专心听讲、搞小动作，教鞭就会突然精准地落在某人的手指或者掌心。要是玩物丧志的惯犯，或者有其他严重的违规行为，准逃不过一顿噼里啪啦的痛打。为了更加方便地惩罚那些不良行径，教室的一角摆着一根柳条，随时都能使用。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挨过那根不断更换的柳条的“抚摸”了，但是在沃利斯的学校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些武器是可以由人的良知挥舞的。

一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孩放了半块没吃完的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在课桌里。这种糖果非常稀有，虽然商店有售，但并不是孩子们可以经常吃到的，是个稀罕玩意儿，深受我们的喜爱。之后，我一直想着它，馋得口水直流，就算看不见它，也知道那块糖一直在召唤我，而我无法抵抗这种诱惑。于是，我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同学一起谋划着要把它搞到手。

^① 哈迪：哈迪是对哥哥哈特维哥的亲切称呼。

我们在附近玩耍，等最后一节课结束、学校空无一人的时候，偷偷溜回来。我们在房子下面镇定自若地行走，然后用手使劲儿顶开墙角下一块松动的模板，缩紧身体钻进去。我们直奔那块糖，把它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然后离开教室，在一棵树底下把它分着吃掉了。

甜味在我口腔里漫开的同时，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也涌上我的心头。嘴里的带着薄荷香气的甜蜜味道，一下子被酝酿得酸苦起来。而且，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块糖的价值很高，所以这件本该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今后的人生之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

最初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我还是个愣头青。有一次，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请我去调查一家新公司——布鲁克林煤气公司（Brooklyn Gas）的股票承销情况。他可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投机大师之一。我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认为这家公司不管从什么方面来看都值得投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位年轻男士愿意支付 1 500 美元的酬劳，委托我出具一份美化这家公司的报告，他与这家公司股票承销团似乎有什么关联。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违心的差使，我只需要把我调查到的事情写下来而已。

对当时的我而言，1 500 美元简直是一笔巨款，但那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不知为何又出现在记忆中，我立刻觉得，这笔钱不能拿。不仅如此，我甚至感到害怕，这笔横财让我觉得这只股票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于是我又把之前的调查结果全部推翻，重新实地取证。在给基恩先生的报告之中，我坦诚地告诉他有人主动要付给我那么大一笔“佣金”。

沃利斯学校的那片场地，说实话有点像古罗马的角斗场，大家毫无同情之心，胜者为王是通用法则。那里可以考验一个人的意志，你得拼命地争斗，勇猛地打架，否则就会被视为胆小鬼，为人耻笑。我哥哥天生是个勇敢好斗的狠角色，所有人几乎都对他服服帖帖，然而我花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学会打架的技巧，要如何思考才能在疼痛和愤怒之中保持头脑的冷静。

我小时候是个胖胖的男孩子，手脚圆润短小，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雀斑。别的孩子们给我起了一个难听的外号——“一团肉”。每次听到这个称呼，我都要发脾气，虽然无论父母兄弟，都让我淡定一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我就是忍不住。然而不知为何，每当与人发生争吵，我总是落败的那个。遍体鳞伤的疼痛和沦为败者的羞辱，既没有让我变得自信，也没有让我变得温和。

让我后悔的是，有一次哈迪抢走了我的鱼竿跑上街，我就在后面追他，想把鱼竿要回来。但他跑得可比我快，我气不过，捡起一块石头就朝他丢过去。石头一出手我就后悔了，连忙大喊让他当心，结果他听到了转过身，那块石头正好砸中他的嘴巴，磕出一条很深的伤口。之后，他的嘴上一直有一道伤疤，直到去世时还在。

还有一次，父母带我去看望外祖父沃尔夫，我在早餐桌上不知因何突然大发雷霆。原因我至今都没想起来，应该不是多大的事，但当时我却气得发抖，甚至猛然探身从餐桌对面一把抓起一整块肉，嚼都不嚼就囫圇吞了下去。幸运的是，我没有噎住，但外祖父母的责骂却让我噎着了。

卡姆登镇的男孩子被分成两个派系，“上城”和“下城”。我们属于前者，家境较富裕，所处的社会等级也要高，而“下城”那帮家伙，远比他们听起来要更难缠。在这种泾渭分明的派系背后，可能有某种更深层、更难以调和的社会冲突，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回忆里，当时我们觉得自己和他们不同，是因为所有“上城”的男孩子每晚必须泡脚，而下城人则正相反。说实话，我有时会因此羡慕他们。

我们之间的较量非常激烈，体现在各个方面。卡姆登上下两区之间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棒球赛。对镇上居民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盛事。比赛场地在一座旧监狱后面。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也上过场。在一场比赛中，我试图将球击到三垒，但却不小心失手了。跑垒的时候，我又和守垒员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他摔倒的时候，手里的球滑了出来，守垒员把我压在了身下。一场打斗又爆发了，而我依然是失败的那个。

我一直觉得我孩提时代的生活充满了马克·吐温写的少年冒险小说的气息，哈克贝利·费恩或者是汤姆·索亚。实际上，每当我阅读马克·吐温的小说、克莱尔·布里克斯（Clare Briggs）的连环画或者韦伯斯特（H. T. Webster）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Life's Darkest Moment*），都会涌

起一阵对童年那段天真岁月的怀旧之情。

我们这些男孩热爱冒险，认为事物会因为危险而更加迷人。就好像每年春天的时候，沃特里河上涨，卡姆登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镇上的农业遭受重大打击，大人们个个愁眉苦脸。而我们每天都兴高采烈地蹚水玩耍，砍下树干造木筏子，在被水淹没的方圆几英里的地上探险打闹。我们爱极了那些深浅刚好的水面，一想到现在乘着木筏到处漂流的地方原本都是实地，就更加兴奋了。所以每当汛期结束，河水退去，大地又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我们就会感到怅然若失，很久都不知道该玩些什么。

蝉鸣声会将夏季拖长，在那个炎热的季节，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水里，即使手脚的皮肤发白发皱都不愿意出来。出门的时候，我们在父母的目光下潦草地穿上衬衣和长裤，出了门就一路小跑，一边解着上衣的纽扣。到了池塘边上，像一条鱼一样钻出衣服，一头扎进水里。

对于钓鱼和游泳来说，工厂塘（Factory Pond）是最佳去处。这个池塘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用来给马龙（Malone）的工厂提供动力的。我们弄不清工厂到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里面有一台棉花压包机和一台玉米磨粉机。有时候，加入教会的时候要举行洗礼也在这里进行。然而，夏天的工厂塘被一群孩子霸占了，我们就像牛蛙一样，扑通扑通地跳到水里。

池塘里有许多排成行的木桩，一共四根。我不知道它们是出于什么目的被插在里面的，反正异常适合绕着游泳。我一开始不擅长游泳，第一次游到第一根木桩，又游回来，是非常惊险刺激的经历，很久以后我都记忆犹新。

渐渐地，我摸索到了门道，又想方设法地游到了第二根木桩。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我们家离开卡罗来纳州，我都没能跨越那第四根木桩的难关，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体能见长的人，游到第三根木桩的位置已经足够使我自豪了。

小镇上的男孩几乎都爱爬树，而哈迪几乎是其中最擅长爬树的。哈迪爬起来又快又灵巧，简直像是一只猴子，他总是能掏到最多的鸟蛋，这几乎是所有的男孩子们上树的理由。我们之间还经常互相交易鸟蛋，因为不同的大小，或者一些独特的花纹。然而，母亲总是看不惯我们做这种事情，可能因为宗

教教导她要对所有生灵仁慈，所以我们后来总是瞒着她。哈迪和我还经常在树林里用老式猎枪打一些小野味，偷偷烤了吃掉。

六七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学会打枪。我、哈迪和父亲有一个约定：如果我们到父亲的种植园里和黑人帮工们一起摘棉花，他也会按照帮工的薪水标准给我们结算工钱。后来，我们攒了一些钱，就都拿来买了火药。我们找到一只老旧的皮质小袋子，就把猎枪用的铅沙弹装进里面。火药则被装在一只牛角里，那是我们捡来的，已经被挖得很薄了，不用对着光源都能看出是透明的。

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猎，这时“尖牙”就会吐着舌头跟在我们后面。父亲的一个病人把这条浑身雪白的英国獒犬送给了父亲，作为一部分诊疗金。

“尖牙”真是个非常好的伙伴，任何男孩都会感激自己的成长有它的陪伴。除了打猎，我们游泳的时候，它会跟着，而且一点也不害怕下水；我们去学校上课，它也会一路跟着，而且很安静乖巧，绝对不会惹麻烦。它还很会抓老鼠，用它的爪子在玉米槽下面刨地捉老鼠时，身边尘土飞扬。我们很喜欢看它这么做，因为特别好玩儿。然而，令人伤感的是，因为我们要搬到北方，带不走“尖牙”，父亲只好把它送给了一个朋友。这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之一。

其实，我们兄弟爱胡闹、擅长惹麻烦的性格多少是父母自由放任的教育方式养成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极少惩罚我们，最多就是训斥一顿。我甚至不记得父亲或者母亲曾经打过我的屁股。虽然父亲要更严格一些，但每当他疾言厉色，好像就要动手的时候，我母亲总会跳出来唱白脸，制止他的下一步动作。我现在耳边都能回响起母亲劝说父亲的的悦耳嗓音：“巴鲁克医生，你确定要对孩子们那么凶吗？万一他们不喜欢你了怎么办？”

但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就不太赞同我父母教养孩子的方式，她认为循序渐进的感化，作用并不比一顿痛打来得明显。因为我和哈迪常常使坏，我们没少挨她的揍，也确实因此收敛不少，但我们并不讨厌她，甚至觉得这些疼痛是有好处的。后来，她年纪大了，白发苍苍，还常常到我在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来探望我。要是碰巧有客人来访，她还会眉飞色舞地对大家讲起

她抄着木板子追打我的故事。

我以前总是不敢站在米纳娃的右手边，哪怕我知道她不会毫无理由就动手打人。我只是下意识地对她那只黝黑有力的大手感到敬畏，即使是哈迪也一样害怕她。几十年后，这种畏惧已经淡褪得几乎无影无踪，但除此之外，米纳娃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她给我们讲述或哼唱的那些故事和歌谣。

米纳娃非常迷信，满脑子都是未开化的黑人里流传的那些传说。她相信，一切树林、水域、田地，甚至我们自己的院落和花园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幽灵寄居着。鬼魂无处不在，看不见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不想被看见。黑人都不喜欢给木屋装上玻璃窗，米纳娃有一次就向我们解释，那是因为玻璃是透明的，阻挡不住幽灵的视线。

我所听过的那些关于兔子兄弟、狐狸兄弟、乌龟兄弟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动物的故事，都是米纳娃讲给我听的。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后来写过一系列的故事书，叫作《雷默斯大叔》（Uncle Remus），主角就是这些动物们。

米纳娃经常唱一首悲伤的歌曲，是讲一只名叫波雷姆（Bolem）的狮子。有一天，它失去了自己的尾巴。甚至现在，我都能听到波雷姆用米纳娃的嗓音低沉而忧伤地反复吟唱：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去哪儿了？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去哪儿了？

离开了身体的尾巴听到了，远远地回答道：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啊。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啊。

这首歌传达出的凄凉情绪结结实实地击中了我幼小的心灵。有很多次，我都快睡着了，却突然想到波雷姆可能仍然在四处徘徊，寻找自己那条尾巴。于是我又开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波雷姆失去尾巴的哀伤和对尾巴永恒的

寻觅，我像亲身经历一样感同身受。

我爱米纳娃，一如她关切而深沉地爱着我。每次见到我，她都会给我一个用力的拥抱，慈爱地亲吻我，在她眼中，我永远是她“宝贝”，直到她离开人世。

米纳娃一生未婚，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男人是谁，但她却有自己一群亲生孩子。她总是很羞涩地告诉我的母亲：“贝尔小姐，我又不小心做了件错事。”她的孩子们跟我们兄弟的关系也很好，附近的其他黑人孩子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长大之后，我才理解使得黑人和白人差异如此巨大的社会隔阂到底是什么。我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只是觉得残酷。要知道，米纳娃有个儿子叫弗兰克（Frank），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无论钓鱼还是打猎，他都比我们这些白人小孩儿要技高一筹，设陷阱诱捕野鸟更是一门绝活。我小时候非常羡慕他，不明白他哪里比别人差。

///

每到秋天，哈迪和我就像小松鼠一样搜索捡拾落在地上的坚果，把它们收集起来并储存在某个地方，直到来年。我五六岁时的一个秋天，我们就像以往一样，为了寻找某个能放坚果的地方，在我家的阁楼上翻箱倒柜。突然，角落里一个大木箱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它用马皮盖着，差点让我们错过了。我们觉得这个箱子用来装坚果非常合适。我们打开箱子，却在里面发现了父亲曾在南方邦联部队中穿过的旧制服。我们就对这个看起来年岁不小的木箱更好奇了，又往下面继续翻找，从底部扯出了一件白色长袍，带有蒙面的头罩，胸口还绣着一个深红色的十字架——在三 K 党内部，那些拥有爵士头衔的人就会穿成这样。

三 K 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确实劣迹斑斑，以至于今天人们看见它就会联想起偏执与仇恨，我对现代三 K 党的特质有着尤其深刻的体会，因为我曾经就被它攻击过。然而，在当时这个党派拥有众多成员、深远的背景，以及相当雄厚的力量。在南方之外，它的活动十分频繁。

我的童年时代，美国南方还未彻底走出战争带来的阴影，百废待兴。彼时的三 K 党是由纳森·贝福德·弗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将

军领导的，他们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为了将南方从那些投机提包客^①的荒诞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孩子们的眼中，他们无疑是一些英雄人物。我和哈迪突然得知了父亲也是其中一员，对他更加敬仰与崇拜了。

然而，三 K 党已经被联邦政府正式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甚至愿意提供高额悬赏让证人给出党徒们有罪的证明，还向南方各地派出间谍，想要将所有党徒一网打尽。我们对那件衣服的观察是如此投入，连母亲走上阁楼时的脚步声都完全没有听到。母亲看到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勃然大怒，大肆责骂了我们一顿，并让我们发誓守口如瓶，否则父亲将有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这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离开阁楼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因为心里藏着它而成长了许多。

南方后来的经济凋敝不仅仅是南北内战所造成的恶果，投机提包客政府在他们当权的八年里也对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影响深远而长久，难以革除，以至于他们下台时，所有人都对他们感到无比愤怒。即使如今南方各州多少已经显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提包客在政治和种族问题当中造成的仇恨与冲突，要完全消解，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

北方提包客用一种卑劣的方式维持着政权，他们通过自身及其共和党南方白人盟友（scalawag allies），以人数和制度上的优势，在选举中限制黑人的投票权。他们乐于见到黑人们毫无长进，保持着愚昧无知，并以这种弱势群体的落后作为政治压制的工具，使得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沉浸在内战和奴隶制度造成的阴霾与痛楚之中。种族关系在十几年间所取得的进展土崩瓦解，黑人们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州有个参议员是个黑人，县里一位稽核员兼教育局长也有着黝黑的肤色——尽管他们在县一级官员中所占的比例从未超过 1/3。所有的黑人都可以投票，选举自己心目中的政府。那些曾经在南方邦联军队中服过役的白人则全部都失去了投票权。为了这种状况能够持续下去，华盛顿的黑人共和党就曾公开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① 投机背包客：指外来政客，尤指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内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南方政坛上活跃的北方人。

我父亲在旧时代中长大成人，本来将奴隶制视为一种正常的存在，可就连他也觉得这种专制、压迫、不平等的现实能带来的只有矛盾与愤怒，他提笔给南方邦联部队里的老战友写信，大发感慨，这样黑暗的社会形势一点盼头都没有，有时候他宁愿选择死亡。“你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世上的一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了手中的长剑，”父亲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我无法想象，生活竟然充满了暴政、精神与物质的重压，我们愿意为正义而死，这种觉悟才略微带来了一些幸福。”后来，《悲剧时代》（*The Tragic Era*）中，克劳德·鲍沃斯（Claude Bowers）还引用了这句话。

在1876年的州长竞选中，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将军和当权的提包客州长丹尼尔·钱伯莱（Daniel H. Chamberlain）针锋相对。投票的结果几乎一边倒地倾向汉普顿将军。有一次，汉普顿还来过卡姆登镇参加聚众集会，对这件事我印象深刻。当时，人们点燃了一桶桶的树脂，把每个街角都照得通明。竞选活动中，所有人都唱着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来的胡编的歌，我们这些男孩子是唱得最卖力的一群：

汉普顿吃鸡蛋，
钱伯莱吃蛋壳，
汉普顿上天堂，
钱伯莱下地狱。

这首歌比我之前听过的所有歌曲都更加吸引人，因为我第一次使用“地狱”这个词，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连我父亲也跟着唱了几句。

到了选举日当天，汉普顿将选票分给了一个到镇外去演出的马戏团；但就像他的提包客对手一样，汉普顿也利用了黑人们性格质朴、头脑简单的特点——这是汉普顿在黑人选民占绝大多数的形势下，为了赢得竞选耍的两个小手段。这些道理，是几年后父亲觉得我的年纪足够理解这些事了，才慢慢告诉我的。

父亲讲起这些故事来栩栩如生。比如，当时每个候选人都会被分到一个

属于自己的投票箱，但大多数黑人实际上并不认识票箱上的标签上面写的到底是谁的名字。提包客政府事先派人告知他们，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箱摆在哪个位置，到时候他们只要闭着眼睛走过去，把票扔到里面就万事大吉了。然而，那一天，当黑人们在投票处聚集准备的时候，汉普顿的人突然朝空中放了一枪。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担心有危险而陷入骚乱，等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抚下稳定了秩序，汉普顿和钱伯莱的票箱已经被调换了。等选民急匆匆地跑到票箱前，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时，许多票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汉普顿的票箱。

我10岁那年的选举日，父亲正好不在家，有病人找他出诊，或是有些政治事务让他不得不出去忙活。当然这两件事并不是没有同时发生过，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医生在治病救人之外，往往也会出于社会责任感参加一些政治集会。父亲不在，我们突然听到房子周围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有许多人到了外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母亲非常小心，吩咐我和哈迪去把枪取来。

两支枪都是前装式长枪，一支单筒的，一支双筒的，我们握得手心出汗。在母亲的授意下，我们又往弹夹里填满了弹药，蹑手蹑脚上了二楼阳台，找到一个隐蔽之处藏了起来，静观事态变化。

——“小心别碰到扳机，”母亲郑重地叮嘱我们，“除非我叫你们开枪。”

我们紧紧盯着下面的街道上，一群黑人结伴四处晃荡，从前进方向来看，有的要去投票站，有的则是去参加集会。他们都醉醺醺的，一看就是喝多了廉价的劣质威士忌，虽然红晕在黑色的肌肤上并不明显。我们就那样站着，屏息静气，唯一的声是一颗心在七上八下乱跳。我们握着的枪几乎跟身高差不多高。

突然间，所有人都四散逃开。一个黑人摇摇晃晃地从一棵树后面走出来，然后闷声倒下。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想知道那个黑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们走到他旁边，却发现地上蜿蜒流动着一片血液，他的后脑勺都快被劈成两半了，看伤口像是被斧头砍的。我的母亲赶紧端来一盆清水，为他做了清洗、包扎等一系列的急救措施。对这件事，我的记忆也

很模糊，甚至无法肯定他是否真的伤得如此严重，而不是我在回忆中无形夸大了严重性。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活下来，但我觉得很难，因为那道伤口实在是触目惊心，在我一生中几乎都没见过更严重的伤势了。但对黑人来说，受伤到这样的程度似乎并不鲜有，他们是经历最多苦难的种族。

我们发现父亲是三 K 党的成员，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但我们还是觉得父亲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力的，而慈悲更理应是医者的本能。我的父亲确实不太喜欢面对那些惨痛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共和党南方白人临终之前，说想见父亲一面。我父亲结束了这次令人伤感的道别之旅，回到家后和我们说：“政治分歧让人变得冷漠无情了，人性不应该只在立场相同的人之间存在。”那个临死之人身边没有曾经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亲密的亲戚，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

我父亲厌恶、谴责战争，他认为南北内战本来可以避免，双方的极端分子应该为这些惨剧负责，他们身上假使有理性存在，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比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我父亲是个种族平等主义者，虽然他没有这么宣称过，但他对黑人没有任何偏见，对白人既不偏袒，也不怀恨在心。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是我父亲大加赞赏的伟人，他感慨林肯命运的跌宕与脆弱，否则，他或许能让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我父亲参加战斗的原因，是他认为战后重建时期的南方政府走了一条极端的路线，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唯一能使南方重获自由的方法，就只有斗争一条路而已。而这场斗争也使得种族之间的仇怨结得更深，我父亲不止一次叹息——黑人们也被卷进了这场不幸的混乱。

///

每个男孩子在童年时代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人。于我而言，他们似乎并非出自书本杜撰的英雄传说，而是来自我身边的那些亲戚，和本地几个我曾经亲眼见过的人，比如罗伯特·李。

对我来说，他几乎是所有美德的典范，而且我越成长，就越相信这一点，他的人格和才华都让我十分钦佩。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要恪尽职守地做每一件事情，但切记不要好大喜功，也不要偷工减料。”我父亲还经常引用

这句话，教导我为人处世的态度。

博勒加德（Beauregard）、“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和杰布·斯图沃特（Jeb Stuart）这三位将军，也是我所崇拜的杰出人物，就连乔治·华盛顿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没有那些在沼泽地等恶劣环境之中苦战的士兵来得高大，这三位将军的赫赫声名，不亚于独立战争中的马里昂（Marion）、萨姆特（Sumter）和皮肯（Pickens）。

之前我谈到过赫尔曼叔叔参加南北内战，是因为受不了女士们的谴责这个听着有点儿轻浮的理由。其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讲究精致的饮食，痴迷于社交，而且一掷千金，难以自控。他曾经给曼内斯工作过，那时候曼内斯的杂货店生意已经非常红火，成了卡姆登镇最大的一家商店。后来，赫尔曼叔叔跑出去另立门户，也开了一家自己的店。我们爱听他讲那些去纽约采购时路上的见闻，但更期待的是他每次返回时给我们带的礼物，每一个人都有。

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乔叔叔，他曾经在德国乌尔兰骑兵团服过役。叔叔体格健壮，在我们家后院立了单双杠之后，就一直带着我们锻炼，并教我们一些在单杠、双杠上玩耍的技巧。我们过去常常说他“堪称运动健将”，后来干脆去掉了“堪称”。我的姨妈萨拉性格也非常狂野，她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住在温斯伯勒。每次她来看望我们时，总喜欢在单杠和双杠上挑战我们。一开始，我们对这个女人嗤之以鼻，但当她只凭脚趾就把自己倒挂在杠上时，我们全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从此对她服服帖帖。

还有费什尔舅公，哈特维格·科恩拉比的独生子。他一给我们讲起战争故事就口若悬河。当时，他在博勒加德将军手下收发电报，知道不少紧急机密的军情。

他会用非常幽默的语气说：“没错，在战场上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勇敢，总是待在子弹最密集的地方。”顿一顿，他才接着说：“比如，运弹药的马车下面。有时候我躺在下面睡觉。”

他还会弹班卓琴，我们甚至很少听到他重复弹一首曲子。我还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宁愿做一个私人住家保姆

不愿当抬回家中等死的准将

每当费什尔舅公弹奏班卓琴，母亲也会弹起钢琴。很多个夜晚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非常快乐。我们家里经常宾朋满座，大家齐声跟随乐器伴奏，唱起熟悉又动听的南方歌曲。我至今仍然记得有一首我钟爱的歌，每节歌词的结尾都是一句“钟声为萨拉响起”，虽然我已经 70 多年没有听到过了。

遗憾的是，我们兄弟数人无一例外地没有继承母亲的艺术天赋，也无法满足她对孩子们擅长唱歌或是弹琴的期待。她可是个才华横溢的演员，虽然只是业余的。只有哈迪和赛林学会了弹拨一点乐器，而且是简单的班卓琴；我几乎是最没音乐天赋的那个，至今连口哨都只能吹一两个单音。

博根·卡什（Boggan Cash）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他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县一个人人皆知的决斗世家——卡什家族。他的父亲，E·B·C·卡什上校，当兵的时候和我父亲在同一个旅里，他是个团长。那时候，博根年少青涩，还不到允许参战的年龄，于是他想方设法地在各种场合展现自己那神枪手的绝活，以求弥补未曾亲身踏上战场的遗憾。

在南卡罗莱纳州，决斗一度非常盛行，这是绅士们解决某种问题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卡姆登镇，决斗异常频繁。我观看过博根的一次打靶练习，在工厂塘的岸边放着一个铁人，他有时会喊一个年纪大一点、老实的男孩为他喊射击的口令：“预备！开枪！”但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默默练习，给枪上完子弹之后，突然转身朝铁人开枪。

我父亲就是因为卡什家族卷入其中的一场决斗，被迫离开南卡罗莱纳的。可以说，正是这次决斗，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不知道为何，一群人纵酒狂欢，醉倒了一片。卡什夫人的一个兄弟也在里面，暴打了一个人。那人被打得怒火中烧，第二天就找到了法院要求起诉。打人的家伙慌了，为了逃避惩罚，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了他姊妹，也就是卡什夫人的名下。但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威廉·沙农（William M. Shannon）上校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在

起诉中对卡什夫人的兄弟追加了一项推定欺诈罪。

卡什家族的人都很护短。卡什上校和他儿子博根将这场官司视为对卡什夫人的不敬，宣扬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凭借家族的地位和人脉，侮辱和欺凌了沙农上校一年。沙农上校为人性格温和，不喜欢争斗与辩驳，但最后，他厌倦了这些无端的谩骂，忍无可忍了。一个清晨，他走到卡什上校的宅邸前，正式向他提出了决斗的请求。

我的母亲认为沙农是附近最为谦和有礼、又能以身作则的人物之一，经常教导我们要向他学习。事实上，他一向来都和我家关系很好。他也曾经致力于激励人们使用更加精细的耕作方法，通过各种方法，来恢复乡村集市的活力。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领头人，很了不起。

1880年7月5日，这场决斗在达灵顿县的杜波斯桥正式拉开了序幕。两方人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检查枪械和子弹。我父亲不希望有子弹夺走任何一个人的性命，因此瞒着沙农将决斗的时间地点告诉了县里的治安官，请求他出面解决矛盾，化解这场决斗。治安官答应一定会及时赶到，然而决斗即将开始的时候，却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沙农上校先到达了决斗地点，他的私人医生博纳特作为决斗助手也随行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医生在场总能让人安心一些。随后，沙农上校的几个朋友也匆匆赶了过来，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卡什上校在几分钟后也到了。我父亲心中暗自着急，治安官理应出现了。

决斗者的站位选择是通过抓阄决定的，两位决斗助手在各自的位置用步伐测量着地面。连开始的信号都已经通知好了，但这时治安官仍无影无踪。

两位主角面容严肃地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开枪的信号一响起，沙农上校就心急地射出了子弹。然而枪声过后，卡什上校毫发无损，子弹只是击中了他身前的泥土。他趁沙农上校攻击的间隙，从容不迫地瞄准对手。再一声枪响，沙农上校缓缓倒下。

决斗结束几分钟后，治安官才姗姗来迟。这时候沙农上校已经死了。在他中枪倒地之后，博纳特医生跑到他身边，就已经确认——伤势严重到无法救治，唯有一死。

这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带来了非常大的持续影响。威廉·沙农是卡姆登镇最为令人尊敬的居民，也是全美国最后几个因为决斗而死亡的人。

决斗过后，有一群人来找父亲，他们全都是与沙农上校亲近的人，此刻表情严肃，难掩悲伤。他们全都骑着马，背着来复猎枪。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是沙农上校女儿的未婚夫，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们群情激奋，到父亲的诊所里来商议如何为沙农复仇，要卡什付出代价。但我父亲劝告他们，法律的存在自有它的意义，虽然他也为失去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感到难过，但还是觉得他们不应该代替法律行事，卡什罪有应得，一定会受到惩罚的。父亲的劝告产生了作用，他们不一会儿就离开了诊所，我在窗口望着他们骑马远去。这件事之后，卡什几乎遭到了卡姆登全镇人的排斥，他本来在这里也相当有名望，然而晚景却甚是凄凉，命运就跟亚伦·布耳（Aaron Burr）一样。

正是这场悲剧导致南卡罗莱纳州开始正式立法禁止决斗；要是决斗者有公职，那么他将职位不保。令我觉得好笑的是，1951年，詹姆斯·拜耳尼斯（James F. Byrnes）州长在就职典礼上，甚至郑重其事地特意强调自己从未参加过一次决斗。

母亲早已一直在催促父亲，想让他搬到北方去。她觉得，北方对一些事情更加包容开放，机会也更多，但我父亲一直犹豫是否要离开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但卡什和沙农的这次决斗，令他下定了离开南方的决心。我父亲曾以为能够阻止决斗的发生，然而在他的努力下，还是有人去世了，这使父亲感到震惊与失望。

我父亲变卖掉了诊所、宅子，以及后院里面他那块灌注了许多心血的“小农场”。这些钱加上他之前攒下的积蓄，使他拥有了18 000美元的现金资产。我父亲做了16年的乡村医生，这不足2万美元的钱，已经是他16年来所有的劳动所得了。

1880年冬天，父亲先动身去纽约城，等他在那里做好了准备，母亲就带着我们四个男孩子过去。我们先乘坐自己家的旧马车到温斯伯勒，那里才有去北方的火车。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就是外祖父沃尔夫亲手做的小甜饼。

可是旅程漫长，很快我们就吃完了这些小甜饼，得下车在停靠的车站吃东西了。一路上，伙食非常糟糕，最好的一餐是在里士满吃的，令人印象深刻。因此，直到今天，提到这个城市我还是忍不住会咽口水。最终，在一个昏黄的傍晚，我们结束了漫长的火车之旅，下车是哈得孙河边的新泽西河，坐船过河，就是纽约了。

第4章

来到大城市

纽约就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令人难以适应，感到惊慌失措，尤其是对于我们四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男孩子来说。当时，我其实已经快 11 岁了，但待人处事仍然十分羞涩。加上以前住在南卡罗莱纳州时的一次经历，也给了我纽约不太友好的印象。

我们家族里有一位亲戚是纽约人。有一次，这位女士来卡姆登镇看望亲人和朋友的时候，爸妈让我们去探望她。我们四个为了去见她，特意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路上，我们心里都在好奇：从纽约来的亲戚，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但那天的经历可把我吓坏了。这位纽约亲戚从一副长柄眼镜后面直直地盯着我们，她看了看我们的脚，不屑一顾地扔下一枚 10 美分的硬币，漫不经心地说：“把硬币捡起来吧，你们去买双鞋穿！”我还记得，当时是天气炎热的夏天，我们谁也没有穿鞋。她的意思可能是和孩子们开个玩笑，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能笑得出来的事，转身就跑回了家。

来到纽约最不习惯的事情是每天都要穿鞋子，生活在卡姆登镇的时候，只有天气恶劣、不穿鞋子就会十分难受的时候，我们才会不耐烦地把穿上它们。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犹太教信徒在星期六的安息日，出于礼节考虑，也必须穿鞋子。就是因为穿不穿鞋子的问题，我们走在纽约人行道上的时候，觉得不如在卡姆登镇的森林边行走那么舒畅。

我现在还能想起一些内心对纽约这座大城市最开始的印象，尽管这些记忆是模模糊糊的。扑哧扑哧的声音，那是高架火车呼啸而过而发出的响声，它们还在烟囱上喷出烟柱，构成了我童年时的奇观，令我感到惊诧而新鲜；水会自己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直接能流向厨房的洗涤槽，也让我感到十分神奇。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让我觉得生活在纽约这件事变得好玩了起来，洗澡也不用一次一次地从水井挑水、来回奔波，要知道，这在南方十分普遍。

哈迪带给了我很多勇气，如果没有他来到纽约后对这里真诚的喜爱与赞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忍受初来乍到时的日子。没有什么人或者事能让哈迪颓丧，他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热情，经常勇气十足地走在纽约的街头，气势高昂地对这座让人害怕畏惧的大城市回以凝视，就好像他只把纽约当作一个身材健壮、难以对付的毛头小伙，即使面对的是一整座城市，也总摆出一副“要来打一架吗？我随时欢迎”的样子。

当时，我们租住的地方与卡姆登镇的宽敞房屋比起来，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并因此显得拥挤不堪。

父亲租下了西五十七大街 144 号的一座四层褐石公寓楼的顶楼的两个房间，他和母亲带着赫尔曼和赛林睡一间，我和哈迪睡另一间。我还记得在北方那里度过第一个冬天时的情景，我们六个人为了更暖和一点，总是靠着墙在矮小的房屋里依偎着互相取暖，而有点讽刺的是，一座冒着热气暖洋洋的烟囱，就在我们依偎着取暖的那堵墙的背后。

就连吃饭我们也是在那寄居的房子里吃。过了几年，我痴迷于歌舞杂耍一类的曲艺表演，对于滑稽演员讲的那些好笑的笑话我常常乐不可支，在座位上笑得停不下来。但要是滑稽演员讲起发生在他们住的寄居公寓里的笑话时，我就没办法发笑了。因为这种笑话总是能让我记起在纽约最开始的那段生活到底有多艰难。

好在我们的女房东心地善良，她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使我们尽量过得舒服一些。在我那个年纪区分女人的称呼还不算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叫她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但我还记得她的样子，身材粗大四肢强壮，额头前面总是垂着一撮头发。

随着我们的相处，她好像对我们几个男孩子很有好感，葡萄干和水果总是会突然出现在她的桌子上，任我们随便吃。我们的口袋里经常也是她塞进来的糖果，她动作十分迅速，我们根本来不及拒绝。当时我们初来纽约，对于到底要如何融入这座大城市仍然焦虑不安，但她的友好和对我们细微的照顾很大地缓解了我们这种躁动的心态，就像母亲一样，她能让人感到安心。

我们才到纽约后没过多久，父亲就身体抱恙。医生经过诊断得出的结论是父亲的心脏出了问题，才导致他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告诉父亲说他未来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听到这样的话，一开始，父亲就冲动地想要回到南方，他说死也要死在南方，那是他的故乡。幸运的是，我们后来又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艾尔弗雷德·卢米斯（Alfred Loomis）先生，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他认为父亲并没有心脏上的任何疾病，只是过于忧虑在纽约是否能拥有立足之地，而引起了消化不良。我们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好笑又暗自庆幸。后来又多了些病人来找父亲看病，父亲身体的苦痛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父亲生病的这段日子里，母亲给我们找了学校让我们去念书，那是位于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五十四大街上的公立六十九学校。还记得校长的名字叫作马休·艾尔格斯（Mathew Elgas），一想到校长就会有股暖流从我心田流过。当时去见老师时是校长亲自送我过去的，这成了我最开心的回忆之一。这位老师就是凯瑟琳·德福罗·布莱克（Katherine Devereux Blake），在克服我对于纽约这座大城市的忧虑愁绪和惊诧的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她对我的帮助。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根本不用努力就能回想起来，当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开心认识你，伯纳德同学。我想其他男孩子一定也很乐意认识你。”

正午的时候，她在班上问同学们：“哪位男孩子能来主动报名，在放学以后带着伯纳德同学回家，等到上学的时候再带他一起来，直到他认识从家里到学校的这段路以后？”一开始她让我坐在教室前面，以后就没跟我有过任何交流，我还以为她不是很在意我。结果当天放学的时候，她在班上又将

同样的话问了一遍。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子很快就举起了手说愿意负责接送我，他的名字我记得十分清楚：克莱伦斯·豪斯曼。因为在这件事的14年之后，在华尔街我成了他的合伙人之一。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奖品正是凯瑟琳给予我的，那是一本至今还被珍藏在书房里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上面还有凯瑟琳给我的题词：“这本书奖励给具有绅士精神并且综合表现十分优秀的伯纳德·巴鲁克。于一八八一年六月。”

后来她于1950年去世，在约翰·海尼斯·霍尔姆斯社区教堂我为她致悼词，她逝世之前我们一直都还保有联系。每次想起凯瑟琳，我都为如今这个社会对学校里的老师缺乏感激之情而遗憾愤慨，我认为所有老师都应当像她一样温柔负责。

前不久的时候，我看到一份调查，一群高中生投票，结果表明他们将来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就是教师。美国人民的国民性和良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个职业看似非常普通，不需要高学历和什么复杂的技能，但在时代潮流的发展中，我们还是要依靠着老师给未来的后代培养正直端庄的心态和各尽所能的毅力。

所以应该承认教师为这个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支付给教师足够的富足的工资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舒适，他们甚至应该公开获得荣誉。既然演员拥有“奥斯卡奖”，那这种有形的荣誉每年颁发给最受之无愧的老师，就跟定期授予演员们、作家，运动员，以及这个社会上许多行业的奖项一样再合适不过，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

随着在纽约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对纽约这个大城市愈发熟悉亲近起来，它不再像之前那么不近人情。我们把纽约和卡姆登镇拿来对比的那些差异也在逐渐地趋于消失。举个例子，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也有很大的空余场地让我们这群男孩子在一起疯玩。在五十九大街那里，现在建了广场饭店，有很多的空地，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个人私自在这片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棚户区，他还养了一只小恶狗，经常凶悍地朝我们叫唤。除掉在第六大

道上还剩几座楼和一个铁匠铺，在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五十七大街向北，也还有许多空地。铁匠铺店主的名字是高德纳，他的儿子也和我们在一个班念书。我们常常跑到这里来看高德纳在火炉边打铁，都在羡慕他那一身强壮的肌肉。

这些空地对于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的意义就是一大片供他们肆意玩乐的场地，但对于年少气盛的青年来说，也是打斗干架的战场。事实上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卡姆登镇的时候，“上城人”与“下城人”之间就爆发过一次打斗，在这里我们也感受到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紧张气氛。我们把这片地区里最凶狠最强硬的一帮人叫作“五十二大街帮”。

在卡姆登镇时，哈迪就担当着打架抵挡攻击的重任，没想到到了纽约，依然扮演这个角色，捍卫着跟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兄弟的名声。“五十二大街帮”中的好几个人都被他击败过。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斯顿的人，是个长相帅气的爱尔兰籍男生，经常能在战斗中打败我的所有小伙伴，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哈迪和约翰斯顿积怨已久，但他们最后一次打架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楼梯上痛打了约翰斯顿一顿，约翰斯顿打不过，就向老师告了状。哈迪因此受到了处罚，老师暂时取消了他上学的资格，让他在家反省一段时间。不过他接着就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这场争斗虽然有老师插手，极不公平，但是就此也将约翰斯顿带给我们的那些困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华盛顿高地“上北区”基本还算是乡下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这里度过夏天，这对我们来说格外让人高兴。因为连续好几年，我父亲都受威廉·佛罗辛汉（William Frothingham）的雇用，替代威廉医生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主持诊所里的医疗服务工作。威廉医生的房子位于一五七大街和圣尼格拉斯大道交界处，我们夏天就住在这里，这是一所住着很舒服的大房子。

现在波洛球场（Polo Grounds）^①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球场算是位于整座房子的后面。当时的这里，树木、黑莓、忍冬和荆棘丛交错生长在一起，占据着大片地方。因为我离它们实在是太近了，所以我知道这

① 波洛球场：原是马球场，现为棒球场，但仍然沿用马球（polo）之名。

其中还有有毒的常春藤。

在那里只用花 50 美分就能让我们租到一条小船。划小船是在这里游荡最理想的办法，它能把我们带到随处可见软壳蟹的哈莱姆河边的小溪去，还能带我们到咸水沼泽那边去玩，就像汤姆·索亚那些马克·吐温式的少年一样。

但这些活动也常常伴随着危险，有一回在河上的探险经历差点就成了我人生经历的尾声。那天上午我和哈迪钓鱼、捉螃蟹，玩得不亦乐乎。中午大家吃过野餐以后，我和哈迪还有另外几个男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在纽约中央铁路上设立的一个临时支架上坐着。中央铁路顺着哈莱姆河一直向前延伸，直到我们视线所不及的地方。为了逗这群新认识的朋友开心，我和哈迪开始胡说八道，一人一句地瞎编了一些虚构的在南太平洋群岛的野人中经历冒险的故事来讲给他们听。

跟新朋友告别后，我跟哈迪划着小船回家，一路上我们忍不住地大笑，我坐在船尾，靠在船舷边保持平衡，还在心里回想着自己是怎么聪明地编造故事来糊弄那几个坐在支架上的男孩子的。我们的船和另一只船撞上也就是眨眼的工夫，我还沉浸在欢笑里，一只船桨打在了我身上，让我一头就栽进了河水尚浅的哈莱姆河里。

为了使我自己从满是淤泥的河水底部挣脱开来，我努力向河面上浮。那段奋力挣扎的情景就好像是被慢放了一样，一瞬间却仿佛经过了很多年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怵得发冷，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掉进水里挣脱不开，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可恶的骗子，都怪我胡编乱造了那些南太平洋群岛见鬼的冒险故事；第二个念头则是不应该在明明知道黑猫会招致厄运的前提下，还执意弄死他；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死了，我母亲会是多么的悲痛万分。这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我直到今天都还清楚地记得，任何人对濒死的经历大概都会印象深刻。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露出了水面，那时我脸上应该全是河底稀软的黑色污泥。我看到跟与我们相撞的船上的男人都在用船桨试探着寻找我，而哈迪在船舷上蹲着，可能是准备着跳进河水里救我。他们都朗声笑了起来，大概是因为我这时候狼狈不堪的模样吧。不过接着看到我呛到河水呕吐不止

的样子，他们又都止住了笑声，将我拉上了岸。为了帮我把体内的水吐出来，他们把我放到一只桶上，又把我翻来覆去地折腾，难受极了。

我和哈迪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害怕母亲是否会发现我的衣服全部湿了，因为这一段刺激的小插曲，所以我们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母亲一直在等着我们吃饭，看到我们平安地回来就放心下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

在当时，纽约这座大城市像泉涌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团体，站在我父亲母亲的角度和立场来说，这些团体的出现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使我父亲能四平八稳地获得了一些他本应有的声誉。这些声誉在后来为他在医学界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父亲在美国首创科学水疗法是他所有成就里最负盛名的，同时他也成为美国国内的第一个水疗法教授。在这之前，他不但在医学上最早确诊出一例阑尾炎穿孔的病例，并且也是成功实施外科手术的几位医生之一。他还关注公共问题，倡导为穷苦的百姓也修建公共浴室，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健康。

赫尔曼叔叔的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Samuel Wittkowsky）的一个儿子在纽约游玩期间突然生病，按照当时的医疗术语来讲，他患的是“肠道炎症”，这是在1887年圣诞节那一周发生的事。为了救治这个男孩，父亲请来了两位外科医生会诊，分别是桑兹（H. B. Sands）和威廉·布尔（William T. Bull）。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父亲建议把这个男孩的阑尾彻底切除。当时桑兹医生表示了反对，他说要是做阑尾切除手术，这个男孩子会死掉的。父亲跟他产生了争执，并坚持道：“如果我们不动手术，这个男孩子才是真的会死呢。”

在1887年12月30日父亲为他施行了手术，男孩发炎的阑尾被切除，不久以后，那个男孩子的身体就痊愈了，后来也一直健健康康的。

维耶斯（A. J. Wyeth）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1889年在给纽约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这件事情，维耶斯医生郑重地说：“对于阑尾炎外科手术的发展而言，全人类和我们医疗行业对巴鲁克医生的感激之情，都应该比其他任何个人都要多。”

父亲对于大众浴室感兴趣，应该是在当时帮威廉医生主持诊所里的医疗服务工作时萌发的，因为当时父亲还负责管理着纽约少年精神病院。漂流浴盆是将木质的平底大货船从中间切开，年轻人夏天可以在这中间游泳，而在那个年代，城市还在继续使用这种被我们称为北河上“漂流浴盆”的东西。但是纽约整座城市里下水道的污水其实都排在北河中，父亲一直把曼哈顿岛称作“被污水包围的一处陆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上述问题，作为纽约县的医疗协会卫生委员会主席的他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结果是纽约城和芝加哥都建立起了市办的公共浴室。1901年，里温顿大街上的一些浴室也重新开放，后来为了纪念父亲在这次改革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浴室都被重新命名了。

我那能说会道的母亲也对与市民有关的事务变得热心了起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和慈善组织都希望她能够加入。她不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和南方邦联女儿会纽约分会的成员，还对各种慈善活动都怀抱着极大的兴趣积极参加，不管是犹太教或者是新教又或者是天主教。她不关心慈善活动属于哪个教派的背景，她关心的只是这个活动是否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事业。

母亲跟胡德·伍莱特夫人（J.Hood Wright）结识是在某一年的夏天，伍莱特夫人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 Morgan & Company）里的一位合伙人的妻子。有一次，伍莱特夫人为设立胡德·伍莱特医院筹集款项而组织了一次社团展会。我母亲正好在这次展会中帮忙，并且受到了伍莱特夫人的赏识。她觉得母亲是个很机智、善于应付交际的助手。后来，胡德·伍莱特医院改名为尼克尔－博克尔（Knicker-bocker Hospital），父亲也成了那里的内科医生，只不过是采取一种上门问诊的方式。

母亲对于在纽约这座城市里能去犹太教堂做礼拜这件事，怀有极大的满足感。因为卡姆登镇甚至连一座犹太教堂也没有，之前母亲只有借着偶尔去查尔斯顿的机会参加礼拜仪式。

母亲不仅上犹太教堂做礼拜，她还是基督教堂的常客，经常和她那些不信仰犹太教的朋友一同前往。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牧师来自南方，脾气十分暴躁，曾写过一本叫作《宗族男人》（*The Clansman*）的

著作，母亲很喜欢听他布道。在布鲁克林有一位叫亨利·沃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的牧师，母亲也经常去听他布道。

然而有意思的是，大街上随处游玩的三五成群的孩子过去常唱一首歌，唱的就是比切尔牧师曾陷入一桩丑闻的事，歌词粗鄙，不堪入耳。有一次，我的一个兄弟来我家里时嘴上就反反复复地哼唱着这首歌：“亨利·沃德·比切尔，主日学校的老师……”但是当我哥们儿注意到我父亲脸上的神情时，他立刻识相地闭上了嘴。

记得有一次母亲被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母亲作为一个犹太妇女，她怎么可以进入把崇拜基督当作一部分信奉经典的教堂里去呢。而母亲当时的回答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母亲说：“如果说他不具有神性，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包括他的生命和死亡都是具有神性的。”

///

还记得冬季里的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和哈迪，还有两个名叫德拉克尔的男孩，一起在高纳德的铁匠铺附近愉快地玩耍。突然，有几个男孩子挑衅我们。他们拿雪球砸我们，于是一场雪仗就爆发了。他们是属于另一个帮派的，我们向来不友好。可是谁能够料到，打着打着他们竟然拿起了石头朝我们砸过来。因为我们势单力薄，就不断后退，一直退到了寄宿房子的门廊上。那些拿石头追打我们的家伙没敢走到台阶上来，但是他们不断地谩骂我们，就站在屋檐边的滴水沟的那个地方。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到“sheenie”这个词语，因为我们是从卡姆登镇搬到纽约的，所以说的是南方口音。之前引发打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敌对的男孩子像鹦鹉一样学着我们说话。但是这回，“sheenie”是一个讽刺挖苦人的新词语，我们谁也不懂，直到那两个叫德拉克尔的伙伴向我们解释过后，我和哈迪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原来是辱骂犹太人的意思。

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人的长相——一个身材还算强壮的男孩，蓝色的眼眸，睫毛偏暗，长了一张娃娃脸，是故意惹恼我们的那群人的头儿。哈迪恼火地从台阶上冲了下去，追着打他，却被那一群人围在一起揍，虽然哈迪擅长打架，但也挡不住那么多人。我连忙跑过去救他，但是人数还

是悬殊，我也被打倒在地上。哈迪大声叫喊，让我去楼上的客厅取他的马车辐条来。我立刻就冲出人群，飞也似的跑上楼去取来交给他。哈迪有了马车辐条，如鱼得水，狠狠地揍了那个蓝眼睛的头儿一顿。一会儿，这群人就被哈迪打得跑到远处站着去了。

哈迪说要和这帮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一起打架，还骂他们是胆小鬼。然后，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站了出来，说想跟哈迪一对一单挑。哈迪毫不留情，暴打了他一顿，从此就在这条街上名声大噪，甚至我们附近街区的代名词也变成了哈迪这两个字。“sheenie”这个词再也没人敢对着我们说出口了，他们要是在背后偷偷地说，我们也不在乎，但谁也别想当面侮辱我们。

我之前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我从这场架里才第一次知道。但在后来的漫漫人生路中，我还遭遇过许多次对犹太人的偏见。

原先我们居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卡姆登镇时，那里还居住着五六个家族的犹太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从来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过任何的歧视。有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就定居在卡姆登镇的家族，分别是德·里昂（De Leon）和列维（Levy），而鲍姆家族和维特考斯基家族都是在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才来到这里的，在这个小镇上，他们受到大家的尊敬，没有差别。尤其是人口众多、享有盛名的德·里昂家族非常优秀，一名派往法国的外交官和南方联邦的一个公共卫生部部长都是来自这个家族。我从未见过老德·里昂，他和南方联邦有些拒绝接受投降条件的军官一样，后来逃到了墨西哥，在几年后受到格兰特总统的邀请才回来，在西部开医疗诊所度过了余生。

每逢星期六，我们虽然不被允许跑到家里院子外面去，但都还是会听从母亲的话，换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因为在卡姆登镇上一座犹太教堂都没有，母亲只能在家里给我们念祷词。可是那天，方圆几英里的人都会从乡下的农场来到镇上交换货物。星期六对于卡姆登镇来说是一周里最热闹的日子了，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参与其中，实在是十分难熬。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母亲的逼迫下穿上正式的衣服，那些衬衫勒得我们很不舒服，妨碍我们玩耍。但母亲教导我们要遵守规矩，对人礼貌友好，因为这样做能表达出我们对邻居的尊敬。

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宗教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差异也只是成就了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的态度。我们全家搬离卡姆登镇三十多年后，大概是 1913 年，我回到了久违的卡姆登镇。返乡那一天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得。来火车站接我的司机是一个黑人，当他开车经过我家从前的住处时，他这样说：“过去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医生，北方佬花了很多钱请他到北方去了。自他离开，这附近很多人生病了就没人照看，像苍蝇一样轻易卑微地死掉了。”他的话让我大受震动。幼时，我可能并没有什么体会，直到这一刻，我才充分地认识到父亲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犹太人的节日里，奉行宗教习俗尤为重要。母亲是在严格遵循犹太教教规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对于这一点，比父亲看得更为庄重。父亲在南卡罗莱纳州时曾经领导过希伯来施善协会，他准备搬到纽约时，向协会递交的辞职信，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是个品德端庄、正直高尚的人，他在这封辞职信里也特别主张将犹太教和《圣经》中关于“高尚品德”的教诲继续施行下去，但我还记得他告诉过我：“我不相信，真的会存在一个复仇者形象的上帝，提着一把锋利的剑站在倒下的人们的身旁。”

有一天，父亲把我和兄弟们叫进他的书房，并且关上了房门。父亲说：“在这最后的日子，欺瞒上帝也没什么用处了。”他让我们兄弟答应他，在他将死之时，母亲如果要请一位拉比来为父亲做犹太教的临终祷告的话，我们不能答应。

父亲 81 岁时患了中风，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将尽，到了大限之期。当时母亲也病倒了，夫妻似乎总是相继离世。母亲去世的日子离父亲去世只差六个月，当时他们都已经不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一个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躺着，另一个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躺着。

母亲把我们叫进去，为的是让我们去把西八十二大街犹太教堂里的费雷德里克·门迪斯拉比请来为父亲做一次临终祷告。让人纳闷的是，就在这之前的前几天，父亲说：“我最不能为你们几个兄弟所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你们看看怎么样死去。”他还特意提醒了我们那天曾答应过他的事——在他将死之时，绝不要答应母亲请一位拉比来为他做犹太教的临终祷告的请求。

所以，我们只好跟母亲道歉说：“妈妈，我们实在是做不到啊，因为我们已经答应过父亲了。”她听到这话就开始轻声地抽泣了起来，还侧身转过了脸，让我们离开，说想一个人静静。

父亲临死前都很克制，神志清醒，他之前还一直担心自己整个人会变得疯狂起来或者精神错乱，说出一些奇怪的话来。弟弟赫尔曼后来也做了医生，他想试探父亲是否还清醒，就坐在床边上对父亲说：“我是哈迪，我是哈迪，父亲。”父亲那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来说话，但是他的眼珠转向了哈迪，这清楚地说明父亲是清醒的，他在临终之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世后将父亲火化，后来母亲也故去之后，就把父亲的骨灰放进了她的棺木里，放在她的脚边。这也是遵从了她的愿望。

早些年里，我在遵守教规方面跟母亲十分相似，比我的兄弟们更像母亲。后来在门迪斯博士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希伯来语，阅读到达可以看懂祷词的水平。我去犹太的教堂参加礼拜，甚至还去上主日学校。每个犹太教圣日我都会过，在赎罪日也会一丝不苟地按照犹太教规禁食，哪怕是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也这样做。

即使我在读大学时深受班级同学的喜欢，被推选担任了好几个班级职务，但那个所谓的“秘密社团”——现在众所周知的叫法是兄弟会，我从未被接纳加入过。我一直忍受着类似的歧视，包括在华尔街，甚至还存在于我从事公共事务期间的一段时光里。

当我在社会上获得过一些声誉后，情况也没有好转，实际上，我反而成了那些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偏爱攻击的一个靶子。《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被亨利·福特收购后，有一次专门用一篇大篇幅的文章在报纸上说我是“国际犹太人阴谋”的领导人之一。这些毫无根据的攻击和污蔑，后来竟然还得到三 K 党、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Smith）还有杜德雷·佩里（Dudley Pelley）的附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就更不用提了。

这些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还在其次。我的两个女儿是在我妻子信仰

的新教圣公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她们被舞蹈学校拒之门外，即使这所舞蹈学校跟她们的母亲是同一所，即使在新教教堂的牧师也干预的前提下，她们还是被许多私立女子学校所拒绝。我的孩子们遭遇到的这种不公平的歧视对我的伤害才是最大的，每个孩子都不该因为种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我并不想让这些歧视事件令她们对社会怀有愤恨、感到挫折，但是要给她们解释清楚，她们为何遭遇到这些毫无道理的偏见，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让他们把这些生命中的歧视当作一种鞭策，使自己加倍付出努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成就。

当初，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些人真的很有智慧，这群人在界定自己设想的不可被剥夺的人权时，慎重地写下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不是直接谈“幸福”，而是谈一种持续的“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承诺给予人们追求幸福的机会和条件，但是拒绝做出任何乌托邦式的承诺，因为他们知道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如此，我一直努力教导孩子们不要因为某些美国人狭隘的心胸就把自己的眼睛遮住，而不去看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时常想，偏见和偏执的立法如果能够被铲除，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该有多美好，但人类的秉性不会被轻易改变。只有承认了个体努力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就，在对种族和宗教的理解上才能取得质的飞跃。

美国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其实恰恰就是美国本身，这代表着我们被给予了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起点都是相同的。因为能够给予我们更多东西的政府形式如今还没有诞生。我们手里正握着这种宝贵的遗产，当越来越多的人的价值被认可的时候，进步的其实不只是个体本身，进步的还有我们对于宗教和种族的理解。

第5章

我的大学时代

我是在纽约市立学院（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念的大学，那时我只有 14 岁。在这里值得补充的是，我 14 岁念大学的行为并不能说明我本人有任何特殊的早熟或异禀。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是没有设立公立高中的，只要你符合大学的入学要求，就可以在文法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那时我还一心想上耶鲁，为了能够支付得起读完大学的学费，我甚至做好了计划，靠去做餐馆里的侍应生来赚钱，但是我的母亲觉得我年龄太小，没有能离开家独自生活的能力，我就只好在纽约市立学院就读。

纽约市立学院坐落于二十三大街与列克星敦大道的交界处，当时被简称为 CCNY，这个简称被延续至今。旧的学院大楼已经被拆除很久了，现在的原址上还遗留着学校里的工商和公共管理学院。当时，我们家还住在东六十大街 49 号，这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上学往返一次就要穿过四十多个街区。

我读到毕业班的那一年，父亲将我的零花钱涨到了每星期 50 美分，以前只有 25 美分，但要是肯穿过四十多个街区步行上学的话，每天可以多加 10 美分零花钱。但有一天早晨我一路步行到学院去，这并不是我为了赚那 10 美分的零花钱，而是因为这一天遭遇了 1888 年那场著名的暴风雪。那么大的风雪之下，街上所有的有轨电车都不运行，除了走着去学校，我没有其他办法。第三大道东 1 号下面全是大堆大堆的积雪，但因为从这里走，能更

好地躲避暴风雪的袭击，所以我还是从上面艰难地踩了过去。那天到校的学生不多，老师也不多。

我的午饭一般都是从家里带到学校的。在念大学最初的那两三年里，我穿的衣服都是父亲穿剩的，然而当时正是我长个的时候。没过多久，我的腿就变得很长，没有办法再继续穿父亲的裤子了。即使这样，母亲还是把父亲的外套改小了给我穿。

现在的纽约市立学院和当时比起来一点也没变，还是一所男孩子想接受教育就能免费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我们不但不交学费，连书籍和笔记本也会发给我们，甚至还有铅笔。而我们对这种免费教育的回报就是必须努力地学习。学校不但在入学时要求高，平时上课的学业标准也十分严格，学校每学期会举行两次考试，要是学生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就要被退学。

我上课的班级大概有 300 人，最后只有 50 人毕业。尽管有很多人是因为经济缘故辍学，并非课业没有达标。

很多男孩子在下课以后都出去，加诺·杜恩（Gano Dunn）一边读大学，还一边在公园大道宾馆做一份晚间电报员的工作，供养着寡居的母亲。而我则是为父亲管理收账的事务，还为他保管书籍。

其实，一开始我在学校里注册学习的是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对理科的各个学科和现代语言的能力非常看重。但不久我就转学到了古典教育课程，这门课则更加注重对古典语言的学习，因为中途转学的缘故，我不得不雇用了一位家庭教师帮我补习功课，如此才迎头赶上。

要在五年里学完大学里的全部科目——其实第一学年也可以被叫作预科班，学习的是高中知识，用这一年来过渡，以便能更好地学习更高领域里的知识。学校里既没有那些“快餐”类课程，也没有选修制度。

我在公立学校是以班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的，这听起来似乎还不错，但是在大学里我基本上把自己的机会都浪费掉了。绘画和科学是我学得最糟糕的科目。我对于化学课唯一的记忆就是把一些硫酸倒在一个烧杯里混合起来，调制成一种发臭、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还把这种东西倒进另外一个学生的口袋里面。那些被叫作“某某学”的科目——比如生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

等——是由身高有 6 英尺 4 英寸^①，长相英俊五官标致，有着一溜金色小胡子的威廉·斯特拉福德教授负责上课。我一直都觉得他偏心，他只对有些学生好，然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这事，我对斯特拉福德教授极为不满，导致我本来还可能知道一点知识，他一向我提问，我就忘得一干二净。

政治经济系的一位教授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作乔治·纽科姆，戴着金边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位老牌的英国绅士，上课说话的音量不大，但音调却很尖厉。他为了让声音变得好听，就把糖果含在嘴里吮吸，他经常说一句话：“想要在课堂上下棋的先生，可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想要听我讲课的先生，可以坐在前面的座位。”

虽然我也会下棋，但我总是坐在前面，很少错过这位教授所讲的内容。

可惜纽科姆教授已经去世，我后来在商业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他的教导。说一句冒犯的话，要是如今纽科姆教授还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赞成当今流行的那些经济理论。他向来坚持向我们灌输供求基本法则，教导我们信赖这一重要法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正是在他的课堂上：“在价格上升时会出现两个过程，一是产量增加，二是消费下降。如果价格下降得太厉害的话，就又会产生两个过程——人们不愿意亏本进行生产，从而导致产量的减少，另外一个过程便是消费的增加。在这两者的合力作用下，市场经济正常的供求平衡就会被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靠跟着纽科姆教授学习的东西，还有这些话，我在十年之后才能变得富有起来。

不仅政治经济学是靠纽科姆教授来教，他还把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都在一门课程中讲授。在今天，恐怕这些科目要分开，由好几位专门的教授来承担。我确信，由同一个人讲授这些科目会让学生获得足够多的好处，很多的教育者好像已经忘记，这些科目除非被当作整体的一部分，聚合起来放在一起思考，否则就教不出好的经济学、好的政治学、好的伦理学和好的逻辑学。

经济学在大学里的授课情况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糟糕的，伴随着过度

^① 1 英寸 = 0.025 4 米。

的专门训练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趋势，那就是错误地把获得信息当作接受教育。这样一来，就造就了“考试专家”这么一类人，而这些“考试专家”的大脑里因为填鸭式教育的缘故，装满了有用的细节，却并没有受到如何真正独立思考的训练。

我还有一个意见。学校不再把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所有学生的必学科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在纽约市立学院阅读了大部分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著作的原文，还可以用拉丁语跟别人交谈。在学习了这两门语言以后，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和欣赏我们文明背后的文化背景；但是如果没有学习这两门语言，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感受。

市长波罗伊·米切尔（Purroy Mitchell）在位期间，我还是纽约市立学院的一名理事。当时学院启动一次变革，想要将学校变成一所工业学院。一天，所有理事被召集起来到市政厅里跟市长交谈。而当时充满我脑海的全是留在华尔街的一次股票操作，我一直凝视着窗外，忽然听到有人说话：“废除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

听到这话，坐在椅子上的我猛然转过身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有人开始给我解释。

然后，我接着他的话发言。有个人试图让我不要开口说话，但我就是固执地继续说。我跟他们争辩说，一种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你往自己脑子里不断储存着事实资料，而在于你获得过一种怎样的思想训练，在于你因为认识了了解过去的伟大思想而获得的关于生命的一般性哲学。教育的使命是为学生去开拓能够引起脑力思索兴趣而展开的视野。倘若纽约市立学院学生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权利被剥夺，那将会让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变得一贫如洗，空空如也。

我猜想，这些参加会议的人谁也没有料想到一个整天忙于在华尔街投资赚钱的人竟然用这样的言辞来表示反对。但不管怎么样，我的那番发言还是阻止了将纽约市立学院变成工业学院的计划。我在对待所有使课程变得“自由化”的提案方面，到头来也成为所有理事中“最反动”的人。我甚至对引入选修制度也表示了反对，我向来坚持不受欢迎的课程对年轻人反而有好处

的主张，因为那些课程具有磨炼思想的价值。我们在生活中并非总是在做我们希望自己做的事情，但是选修制度还是像火车的机车一样从我的心头碾了过去。

如果我现在还是学院理事的话，我一定会据理力争砍掉那些“快餐”课程，让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两门死语言”，恢复它在过去的重要地位。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相当“老派”的小教育实践，就是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让学生发表正式演说。这种做法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非常盛行的一件事，而现在也可以复兴起来，这能够让学生获得相当多的好处。

那时的每天早晨，全校师生集合起来，我们都会排成纵队。当时的学院院长是亚历山大·斯蒂沃特·韦伯将军（Alexander Stewart Webb），他总会先给我们诵读《圣经》上面的文章，以此来拉开师生大会的序幕。然后，就会有一名大二学生爬上讲台，在讲台上发表一次“严肃讲话”——背诵诗歌或者是散文；紧跟其后的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和一名毕业班学生，发表他们为这个场合特别撰写的“正式演讲”。

我在大二第一次发表“严肃讲话”时，心中惊恐万分，那种恐慌的心情就跟遭遇“啊－嘟哆儿－哒”突发事件一样。大三发表正式演讲的时候，我特意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打扮。那天，我穿了一条不同颜色条纹相间的裤子，上衣是一件带马甲的黑色外套。我爬上讲台以后，首先对着韦伯院长鞠了一躬，然后又向全体老师鞠了一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双膝一直在颤抖，心里就好像小鹿乱撞。当时，还有学生故意逗你发笑，他们会做鬼脸，打滑稽的手势，在这种场合下保持镇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回首我的那次正式演讲，我能够想起来的只剩下一句开场白，那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快乐。我甚至都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捡来的一句话，不知道是引用他人的还是自己独创的，但是我知道这句话是一句真理。

///

在上面所叙述的内容中，你可能会得出结论，那就是我们在学校的内外并没有获得过多少快乐，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我第一次成为歌舞杂耍表演的热烈崇拜者就是在大学期间。只需要掏 25 美分的价钱，就可以在戏院的顶楼包厢中观看精彩的表演。那时，我们经常在售票处门前排着队买票，站队时可能会推推搡搡，但是一买到票就飞奔到楼上去，希望能抢到前排的好座位。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地方是西二十三大街上的尼布罗园（Niblos Garden）和一家戏院。随着在远些的闹市区有新的戏院建起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好了起来，也会去新建的那些戏院里看戏。这里要说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母亲和父亲总是尽量让我们多接触那个时代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剧演员的戏，但是我现在对那些莎士比亚戏剧演过的情节，能回忆起来的部分还没有《黑钩子》（*The Black Crook*）的多。

我看到戏剧里妇女穿着紧身衣的第一部戏就是《黑钩子》，你要是也看过那部戏，应该也会有不一般的感受。

对于当时国内的政治风云，我们当中如果说有的话，也很少有人提得起很大的兴趣。尽管我有模糊的印象，曾经有人给我开出 50 美分的价格，让我举着火把参加一次支持格鲁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游行活动。当然，我们对于学校内的政治还是十分热衷的。大学毕业班的上学期那一年，我被选上了班里的班长。跟我关系最亲密的哥们儿是迪克·莱登（Dick Lydon），后来成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这一年，我和他轮流担任着这两个班级职务。另外，我所在的毕业班的班日活动委员会主席也是我。

在大学里发挥着很大作用的，除了班级的那些管理组织，还有那些由两三个希腊字母命名的大学生联谊会或者被称为兄弟会的社团。尽管很多的犹太学生在大学里的表现都很优异，但是兄弟会却还是严格地把他们限制排斥在外。每一年，加入兄弟会的提名我都会得到，接着就是他们因为我的提名而引发的长时间的争吵和辩论。然后，我一直没能被选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认为南方人没有北方人心怀宽容的人来说，非常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我弟弟赫尔曼在南方的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刚怀有加入学生会的意向，立刻就被接纳了。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在时髦这一点上仅次于“秘密社团”的社团就是文

学和辩论类协会。我参加了两个协会，一个叫 Phrenocosmia，另一个是只限于毕业班的学生参加的协会，叫 Eiponia。

Phrenocosmia 是一个以辩论为主题的协会，喜欢探究深层次的话题，对一些“浅显”的主题一直都持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协会辩论的“问题”大概有如下这么几个：

辩题 1：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辩题 2：培根写作过莎士比亚戏剧；

辩题 3：托拉斯对合众国的至高利益极为不利。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曾经参与过哪一场辩论，尽管因为能够作为辩论协会的会员为人所知而感到得意，但是想到要在公开场合说话，我还是感到惊恐不已，所以要是一旦遇到有实际辩论的机会，我就会默默地离开。

Eiponia 协会轮流在成员家中集会。每次在集会中，一开始会听成员讨论霍桑（Hawthorne）、爱默生（Emerson）或者梭罗（Thoreau）等人的作品。然后，会有此次特别指定担任批评责任的会员，对发言者的论述进行不留情面的批驳。协会记录上显示，我对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发表过一篇论文，并且就另外一个 Eiponia 协会会员关于奥利弗·温道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观点展开了批评。

虽然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那么腼腆了，但是我在聚会时或者是参加大型集会时，仍然会有很不自在的感觉。有一次，我们全家人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而且还是一个远房表亲。在那里，我感觉到坐立不安，只待了一会就偷偷地从客厅里溜了出去，一直在地下室躲到婚礼结束才出来。

我第一次参加多人派对，是迪克·莱登三个可爱的姊妹当中的玛丽首次公开参加社交的庆祝聚会。那时，心里感受到的那种恐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迪克经常会到我的家里来，我也常常去他家，所以我对他的几个姊妹都没有什么陌生感。即使是这样，但只要一想到要参加一次正式的聚会我就紧张，并且是那种直冒冷汗的紧张。迪克知道我爱害羞，便告知了我的母亲邀请我参加，还跟我母亲说一定要让我过去。不出意料的是，母亲告诉我是她自己要求我去参加，要不然的话，我会有宰了杰克的可能。

我提醒母亲，我没有晚礼服穿，她回答说父亲的晚礼服套装就很合适。当时是我大学毕业那年，或者是倒数第二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尽管父亲有6英尺高，但我确信此时的我比父亲要高。

那天聚会的当天傍晚，母亲把父亲穿的套装、衬衫、领带摊开，我费力地把它们套在了身上。裤子是我们男孩子所说的那种“高脚裤”，但是太短了。母亲取来了几枚安全别针，将布料用吊带拼接了起来，让裤子又长了点儿，这样做的结果是裤子垂了下来盖住了我的鞋面。马甲也短得厉害，母亲就把它别在我的衬衫上了。这样一来，马甲太短的缺陷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我的双手瘦得厉害，显得格外细长，长长地垂落在外套的袖子外面，母亲对于这个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弥补。而且，只要我稍微摆动双臂，外套的背部还会向上拱起，这也没有任何的补救措施。当我看向镜子时，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有大颗大颗的汗珠，脸也像纸一样惨白得吓人。

母亲为了确认她别牢了所有的别针，最后又检查了一次，然后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前厅，拉下我的头，然后在我脸上落下一个吻。

母亲说：“你是世界上最英俊的小伙子。”

她的鼓励让我的心情稍微好了点，对自己有了一点点信心。

“要记住，”她又接着说，“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可是王族的血液。”关于这一点，我想解释一下，母亲总是说自己是大卫王（King David）的后裔，而且，她要是说点什么那就一定是要说这件事。“谁也没你更优秀，但是在你能证明自己之前，你也不比任何人更好。”

我匆忙地把大衣套上，母亲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让我自己确信每个人见到我时都会感到愉快。我关上了门，然后脚步轻快地走向莱登家，但我还没走出多远的距离，刚刚的勇气就开始慢慢地从我这里溜走。当我走到莱登家门口的时候，夕阳最后的光辉就像披肩一样盖在他们家的前门，我感觉到自己心里怕得要死。我从他们家门口走过去好几次，最后鼓足了勇气才敢走进去。

我在被请进门时，注意到了那个让我进去的门童所穿的服装，我觉得他穿的衣服比我穿的要合适多了。

他给我引路道：“先生，请上二楼的后面。”

我找到了那个房间，把大衣脱下，里面就我一个人。看样子其他所有的客人都在楼下，那里的音乐声和欢笑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匆忙地看了一眼镜子里脸色惨白的自己和一点也不合体的衣服，下楼的步子也迈不开。

也不知道我在梳妆室里待了多久，突然听见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噢，伯尼·巴鲁克！你在那里干吗呢！”

说话的人是贝茜·莱登（Bessie Lydon），是迪克第二个妹妹。

她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拽着我走下了楼梯，我能感觉到自己一路上把身上的安全别针全都弄掉了。贝茜把我介绍给一个美丽的姑娘时，我还恍恍惚惚地站在原地。她仿佛在空中飘然而行，驾着天蓝色的云朵。反正，当时对于思绪杂乱的我来说，这就是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接下来，我能知道的是，我在跳舞了，安全别针又有一些掉到了地板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但似乎并没有人去注意这些细节。尽管那个时候，我跳起舞来的样子还是那么的笨拙别扭，但我还是开心地度过了礼服带给我的不太愉快的时光。在这之后，我便一直玩得很开心。

晚餐的时候，天知道我一直不停地吃了多少东西。几天来，我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度过这令人厌烦的难熬的时光，一直没什么胃口吃东西，我相信我当时真的是饿坏了。

也许，那天晚上，在对我的外表滑稽可笑这一点上，描述有点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家一定都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得到我穿的衣服就是很不合适。不过，那些可爱迷人的人让我忘记了这一点。我能在第一次的大型社交聚会上玩个痛快，都是靠他们的帮助。

在这之后，每当我看到一个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人与我在一起因为陌生而感到尴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我总是尽力去做点什么，好放松那些感到尴尬的人的心情。

///

除掉个性腼腆以外，主要困扰我的难题是脾气的暴躁。这样的情形会经常出现。母亲看到我的怒气值越来越大时，就会伸出一只手来拍拍我的肩膀，

借此来阻止我发火。她经常劝告我的一句话是：“要是没人让人愉快的话可以说，就不要张口说话，保持噤声。”

我脾气不是很好，追根溯源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我在孩提时代总是被人打敗、被人欺负。四十二大街那里当时有一个年轻男士希伯来协会（YMHA）的健身房，到那里的训练花了我很多的时间。

那个时代存在着一项很流行的运动，“随心所欲越野赛”（Go As You Please Races）。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运动的方式，比如奔跑、慢走或者行走。我常常尝试着去效仿那些获胜者的姿态，围绕着中央公园进行行走、奔跑和慢跑。

到了毕业的那一年，我对运动已经相当擅长了，我的身高达到了6英尺3英寸，已经算是长齐了，体重大约有170磅^①的样子。非常奇怪的是，大部分的体重都集中在我的上半身，双腿细得像烟斗柄一样，这跟我看起来挺宽的胸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每当我穿着棒球服或者是跑步短裤出现的时候，我上下身的这种反差总会引来他人的开心，让人又叫又跳。

我不仅仅是学院里曲棍球（Lacrosse）队的队员，还是拔河队的队员，体重不足的遗憾在这两个队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弥补。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还自命不凡地以为自己在竞走和短跑方面的能力都很优秀，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跑完100码^②的最短时间是13秒时，我那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消失了。

但我还是会突然雷霆大怒。有一天在学院里面，当我正走上一段楼梯的时候，忽然听到前面有个学生骂我，顺带着还骂了我的母亲。我使出一招摆拳将他击倒。后来，我们两个人都被传唤到韦伯院长的办公室。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严格遵守军纪的典范性人物，因为他曾在葛底斯堡指挥过属于北方联盟军队的一个旅。

被我打过的那个学生的脸上还流着鲜血。韦伯先生严厉地盯了我一会，突然大声地谴责我：“你不仅是绅士，还是一位绅士的儿子，竟然也会做出斗殴打架这种事情来。”

① 1磅=0.453 59千克。

② 1码=0.914 4米。

“院长大人，我是打了他，”我向韦伯院长回答说，“我甚至还想打死他，因为他骂了我的母亲，而且骂得十分恶毒。”

韦伯将军命令我走进他那间里屋的办公室，很快他也进来了，他对我说：“你这样的年轻人就应该去上西点军校，但是我还是得对你做出暂时停学的决定。”

我决定听从韦伯将军的建议，争取考上那所军事学院。父亲给我进行了仔细的身体检查，当他拿起一只转动着发出声响的钟来靠近我的左耳边时，我听不到理应听到的嘀嗒嘀嗒的声音，我感到非常震惊。原来，我左边的那只耳朵差不多已经全聋了。

后来，我想起一场棒球比赛，我确信就是跟曼哈顿学院一起打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是在一个叫作莫宁赛德高地的一块空地上举行的，当比赛进行到第九局的时候，垒上有两三个人，我代表跑垒制胜的那一方。几个男孩子在那里大喊大叫起来：“本垒打，矮子，本垒打啊！”

我击的第一个球不偏不倚地就击中了，我到现在都好像还能感觉到击球时的那股强大的撞击力，跑垒员安全地跑回了本垒。在棒球被接球手接中的同一时间，我也跑到了本垒板上。我撞到了接球手的身体上，把他手中的球撞丢了。裁判大声叫着：“安全上垒。”

就这样一场架就打了起来，打架过程中，有个人用球棒对我的左耳进行了猛击，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实际上那一击将我的耳膜打坏。当然，我上西点军校的前程也被左耳全聋的后果而断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与一些部队里的军官一起工作，共同解决战时动员士兵入伍的问题。我总是会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起这件事情的经过，说到如果要是没有那场棒球赛的话，我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将军了。

直到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的时候，由于我积极参加班级里的政治活动，还是一个热爱运动并且相当擅长运动的人，我的自我感觉开始变得良好，觉得自己在纽约城里已经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了。

在离开了大学之后，我没有放弃运动，继续执行着强身健体的计划，定时

到约翰·伍兹（John Woods）经营的健身房里锻炼，成了那里的老客户。位于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二十八大街就是伍兹的健身房的位置，下面还有一家马房，专门替人养马或者出租马匹。伍兹的这家健身房就相当于运动员俱乐部，非常受欢迎。健身馆的常客中有律师、经纪人、牧师，有一些当时知名的男演员，甚至还有职业拳击手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运动员到这里来健身。

我在伍兹的健身房里打了很多手球，但我还是将大半精力都花在拳击这一项上，在这里定期健身的“职业人士”，包括鲍勃·菲茨西蒙斯（Bob Fitzsimmons）、乔·卓恩斯基（Joe Choynski）、比利·史密斯（Billy Smith）、塞勒·沙凯（Sailor Sharkey）和汤姆·莱恩（Tom Ryan）等人。我常常在一旁观看他们的训练，并且一看就会看很长时间，试图能够得到他们的一点指点。要是这些职业人士哪天心情好，他们也可能会纡尊降贵，指出我们的不足所在，还会给我们演示如何克服动作笨拙的错误。

菲茨西蒙斯指导过我，他觉得出拳不够凶狠是我的主要问题，“当你击打一个人的下巴时，”他向我建议，“就要带着尽力去把他的整个下巴给打掉这种想法出拳。当你击打他的腹部也是一样的，就要让你的拳击手套刺穿他的身体。”菲茨西蒙斯还经常鼓励和提醒我，他说，“在打拳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气馁。”

在伍兹健身房里发生的一场拳击赛，到现在都是我感受到的最惊险刺激的记忆之一。那次是一个红头发警察跟我的一次较量，第五大道是他的治安巡逻路线。这个治安警察大概跟我一样高，但是体重要比我重许多磅，他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拳击手。

我们开打后不久，他很快就在拳击台上满处追着打我。我的鼻子和嘴巴都往下流着血，但我还在坚持着，我用尽每一个学过的招式和技法跟他消耗着，但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开始头晕眼花，眼冒金星，感到天旋地转。我的对手可能也变得稍微松懈了下来，对我有点大意。反正就是有那么一瞬间，他没有护着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使尽全力用我的左拳击中了他的腹部，紧接着就用右手对他的下巴进行了猛击。

看到那个高大壮硕的警察倒在了拳击台地板，蜷成一团时，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我感到惊讶的了。当时，在拳击手击倒对手以后，裁判不会命令拳击手再次站到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去。由于我刚刚出拳的力气太大，现在的双肩已经毫无力气。我站在被我击倒的警察旁边，等他站起来，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直到一桶水泼到他的脸上时，他才轻轻地动了动。我转过身去，因为刚刚感觉到有人突然间拍了一下我的背部，面前站着一个满脸雀斑、正咧着嘴冲我笑的人，他是鲍勃·菲茨西蒙斯。

“可惜啊，职业拳击台失去了你这么好的人才。”他大笑着对我说，“你本来都快被击败了，但是你能坚持下来，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现在知道自己的感觉了吧。或许你现在的感觉很不好，但是你并不知道另外一个家伙是什么感觉，他现在的感觉一定比你更加糟糕。”

“只要一个人没有被打得不能动弹，那么这场战斗就还远没结束，”他强调说，“只要你不是那个不能动弹的人，在这个拳击台上，你就有机会翻身。要是想要成为冠军，你就得学会去索取，不索取你就不会给予。”

这一行动准则被我始终努力带到与拳击台截然不同的领域里去，虽然这并没有能让我总是发挥出色而处于一种领先的地位，但是的确让我赢得了非常多的如果不遵守这一准则就一定会失败的斗争。在任何一项努力中，要是想要达到顶峰，你就必须含辛茹苦，这些苦涩包含着其他男孩对你的嘲笑奚落，包含着其他男人的冷言冷语、恐吓威胁、不分昼夜的对抗，或者是自身因为希望破灭而带来的极度痛苦等很多负面的东西。

一直到今天，我始终都还是一个对拳击狂热的职业拳击迷。我在年轻的时候收集了一些杰出的拳击手的照片；即便是在我和妻子结婚之后，我甚至还设置了一个拳击台，就在自家房子的地下室里，这让我能够经常在房间里对着沙袋来练习。

我还总是会做一些体能上的训练。毋庸置疑，这些训练有助于我长期保持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从拳击这项训练中获取的主要益处，却是让我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些坏脾气，以及我因为体格的不断增强而渐渐建立起的与日俱增的自信心。有人告诉过我一句话，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和谅解的时候，当你

知道给予痛击就能达到你自身目的的时候，与人和解和理解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我对这点也表示同意。

在大约 22 岁的时候，我摆了个姿势照了一张相片，每当看着那张相片，我就会想到最初刚来纽约的那个矮胖小男孩到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照片上的我蓄着一撮小胡子，满头几乎全是卷曲的黑色头发，肌肉发达的双臂交叉抱在裸露着的胸前。直到现在，那张照片依然摆在我家客厅的台子上。每次看到，都会有许多回忆涌上我的心头。哦，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矮胖的小男孩儿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6章

寻找工作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家庭都一样。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们寄予厚望，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按照父母设想的未来发展。然而，现实就像是个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总喜欢另辟蹊径。父母希望我们兄弟四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后却是只有赫尔曼和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我的最小的弟弟赛林在十二三岁时——正是最顽皮捣蛋、最叛逆的年纪，被送到一所军事学院读书。后来，他因为打架事件，不得不离开学校。在跟着我进入华尔街奋斗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也做过许多生意，从一个店员到经营一家服装厂，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赫尔曼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医学院，更是 PBK^① 联谊会的荣誉钥匙。他的成绩无疑是我们四人中最好的，接近满分的成绩为他的医学事业增色不少，即使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几年后，他毅然放弃自己的诊所，转而投入华尔街的怀抱，在另一个战场厮杀。凭借着优异的口才，他先后被派往葡萄牙和荷兰做大使。他 81 岁离开人世，我记得那年是 1953 年。

母亲的外祖父哈特维格·科恩是一名犹太教拉比，母亲给哈迪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哈迪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她以哈迪的未来换取健康的身体。然而事与愿违，哈迪并没有在母亲的期望中像曾外祖父一样投身于宗教事业，反而成为一名舞台工作者，其

① PBK：即 Phi Beta Kappa，是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组织。

中还有我的功劳。

哈迪是我们四人中最英俊的。6英尺的身高，不输于真正的战士的强壮，符合女孩子们追求的偶像的标准。他更像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前空翻、后空翻、单杠、双杠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还会举重。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他对力量的掌控。一次，我在百老汇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等他，突然有一个相当强壮的男人被人扔进了咖啡馆。我惊讶地发现，在咖啡馆旋转门外赫然站着的人竟然是哈迪。

然而，即使强壮如哈迪，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后，在他84岁那年就去世了，比我们的弟弟赫尔曼早两周。

我至今都记得哈迪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样子，即使这件事本身平淡无奇，并不能当作炫耀的谈资。然而，威尔逊总统有一次却突然说起这件事，他觉得这件事还是挺有趣的，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比较严肃敏感的时期。

哈迪的一位好朋友，约翰·高尔登（John Golden）是一名戏剧制作人。他总是很愉快地向威尔逊总统描述这部戏为“伯尼·巴鲁克的戏剧性退出”，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伯尼·巴鲁克作为一名戏剧人的辉煌介入。

在我还有一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哈迪的眼中，我还是那个对他又敬又畏的弟弟。那时候他还在戏剧学院上学，就是迪昂·波西考尔特（Dion Boucicault）开办的那所学校。他和一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在交往，一个在他的生命中影响非常深刻的人。当然，在我们面前他只是把她评价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她为两个人设想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演艺未来，一个演员能够达到的顶端的世界，燃起哈迪的满腔热血。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缺少一个伯乐，一个能够为他们未来事业提供机会的投资人，尽管只需要一次机会，就可以展露出他们的天赋才华。

不可否认，这位女士浑身都散发着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至今仍旧会把戏剧魅力的化身这样的形容词用在她的身上。当哈迪和他的女朋友来找我商谈投资计划的时候，我被她所勾勒出的致富前景所深深吸引。况且她是马克·吐温的书迷，设想出一个美丽的场景，能够容纳几千人的戏院，好多卖座的座位，而成本算得上微乎其微。每个人听了都会动心的：这么轻松

方便就能挣到好多好多美元，而且全部都进入投资人的腰包，甚至还能获得一个创造艺术辉煌的荣誉。

当时的我是如此年轻，即使我每周只能挣到 5 美元，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筹集出一笔钱，并且准备在新泽西州森特维尔剧院首演《东林恩》（*East Lynne*）。演员班底的招募是异常的顺利，出乎我意料，但是对于这些演技精湛的演员来说，排演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多此一举。

首演那天，我提早下班，迅速赶到渡口码头和所有的演职人员会合。我们乘坐渡轮到达新泽西。可能是过于激动紧张，我连沿途欣赏风景的念头都没有，只期望着那一刻到来。在分发完火车票后，这部剧的男主角却提出支付 10 美元的酬劳，对于这种类似在演出前提出的最后通牒这样的情况，我别无选择。毫无意外地，他得到了那 10 美元。

首演的那晚，春意融融，当我看着舞台大幕徐徐拉起、观众席坐满三排时，心情格外舒畅。我一直对整个演员团队充满信心，在我看来每个成员都可以称为艺术家，尤其是其中饰演城中大骗子这一角色的男主角——至少他还是提前得到报酬的。为了戏剧的第三幕，女主角会在舞台上抱着一个婴儿，我们特意借到一个真正的小演员。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并不是每一场《东林恩》都能看见一个真人婴儿，这恰恰是一个宣传的噱头。然而，事实却是整部戏只演出了两幕。后来，我还戏称，可能是我扼杀了一个优秀的舞台演员。

或许是因为他们只是符合自己定义里的艺术家，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并不熟悉《东林恩》的台词。第一幕上演的时候，观众还会因为演员对剧本的不熟悉而愤怒，或者是因为念错台词被逗得挺开心的。然而当第二幕时，就只剩下愤怒这一种情感了。

虽然观众数量不多，但是至少比演职人员人数多，所以我让售票处的伙计把钱退给那些赞助人。我非常庆幸地跑向后台，就像《哈克贝利·费恩》里的“公爵”一样，通知所有的演职人员：幸亏我已经买好了往返的火车票，只要穿过一条昏暗幽仄的街道，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达火车站。

在观众还不知道竟然没有第三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冲到火车站了。正好这时候，一辆火车刚刚进站，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关心这趟车是开向哪里的，

就都急忙地爬上火车。值得庆幸的是，这是一趟开往纽约的火车。

哈迪并没有因为这场糟糕的演出而丧失信心，反而越挫越勇，不但仍然在波西考尔特的指导下学习，还在波士顿会堂（Boston Lyceum）学习。就是在波士顿会堂，哈迪结识了约翰·高尔登。在当时，高尔登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演员，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连母亲也经常叫高尔登“我的小五子”。

在不断地努力参演各种巡回路演之后，哈迪的才华终于被人发觉。《科西嘉兄弟》（*The Corsican Brothers*）的导演邀请哈迪参演，哈迪就以南森尼尔·哈特维格（Nathanial Hartwig）这个艺名第一次在纽约登台演出，而这部剧的主演正是罗伯特·曼特尔（Robert Mantell）。后来，哈迪又加入了由玛丽·韦恩莱特（Marie Wainwright）创办的剧团，并最终成为她的台柱子出演了一系列优秀保留剧目，比如《卡米尔》（*Camille*）、《丑闻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以及好几部莎士比亚的剧作。

在《卡门》一剧中哈迪和素有“奈瑟索尔之吻”之称的奥尔伽·奈瑟索尔（Olga Nethersole）演对手戏。而“奈瑟索尔之吻”还有哈迪的功劳在里面。在剧中，哈迪饰演的唐·何塞（Don Jose）站在酒吧门口看着卡门在自己面前翩翩起舞时，最精彩的一幕出现了。哈迪迅速勇猛地将奈瑟索尔小姐揽入怀中，抱她快步走上楼。一路上，两人都在激情拥吻，如胶似漆，甚至在演出的海报上将这一吻划归为有史以来舞台剧中最长的热吻。巧合的是，哈迪在后来出演的《萨福》（*Sappho*）一剧中，又和奈瑟索尔小姐合作演绎一场耗时更长的拥抱，再创历史新高，甚至引来了警察的突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当时的哈迪已经有了隐退之心，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华尔街上了。

///

最初，家里计划由我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医生，可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母亲很快就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改变了她的想法。

在我们全家都搬到纽约之后，我的叔叔萨缪尔·维特考斯基，也就是弟弟赫尔曼的合伙人，从南卡罗莱纳州来到纽约办理采购事务。在和母亲谈论

我们兄弟四人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的时候，维特考斯基先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见福尔医生。当时的我是极为反感的，我又没有什么生理、心理问题，为什么要去看医生。但是维特考斯基先生说 he 是一名颇相师，我想他的办公室应该就在斯迪沃特商店的对面，至少不是什么医院诊所。后来，这个商店改名为约翰·瓦纳梅克商店。

我记得福尔医生是一位带着双片金眼镜的绅士，言谈举止温文儒雅，令人印象深刻。他非常仔细地看了我的头，然后又用手指抚过我双眉的上方，问道：“您打算让这个年轻人未来做什么，女士？”

“我在考虑让他成为一名医生。”母亲回答道。

“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福尔医生附和道，顺便点点头，“但是我更建议您带他到做大事的地方，比如政治或者金融等领域。”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正是这次和颇相师的见面，她才决定不让我做一名医生的。

1889 年，当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前途一片迷茫，虽然我立即开始阅读医学书籍，想着为秋季进入医学院而做准备。实际上，心里还是觉得很踏实，尤其是家里在提到关于我的前途未来的话题时，母亲总是会适时地提起那个颇相师说过的话。父亲睿智地看出，母亲这是为了促使我向商业事业方面发展做铺垫，他沉吟很久之后，只留下一句话：“孩子，不要做医生，除非你是真心喜欢救死扶伤这份工作。”

经不住母亲的一再规劝，我只好随她的意思，开始寻找工作。事实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或者说这次求职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经历。就像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样，我也是不愿意从最底层做起。我回应了很多“招聘启事”广告，最后都如石沉大海，即使我仍然期待着我的那些求职广告能够得到回应。最后，无奈之下，我将父亲的病人列了一份单子，以期能够在其中找到什么人，能够向他寻求一份职业。

我决定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家族的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当时的我虽然只有 19 岁，我还是比丹尼尔先生高出 1 英尺，这使我感到非常不自然。

丹尼尔先生微微笑了笑，笑得极为绅士得体，显然他也注意到我的尴尬。他的笑容让我恢复了一丝镇定，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丹尼尔先生告诉我，古根海姆家族计划进军采矿业和冶炼业，并且问我：“你想不想给古根海姆家族做矿石采购员？不过，工作的地点在墨西哥。”

即使母亲向来行事果断，却坚决不同意我去墨西哥。即便她总是不停地告诉我们兄弟四人，男孩子要胸怀大志、心存高远，内心里还是希望我们四人能够留在国内，甚至是留在她的身边。

她一直在考虑着我们能不能住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有一天，我和母亲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她指着威廉·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公馆，就在五十七大街的角上，说道：“将来的哪一天，你也会住到那样的房子里。”

在很多年之后，当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八十六大街和第五大道交界处的角上置下了一处房产时，她又想起了这次谈话。

后来，我又尝试着找到父亲的另一位病人查尔斯·泰特姆，他是在位于巴克莱大街 86 号的惠特尔－泰特姆公司（Whitall & Tatum Company）工作。他们公司主要是向药剂师提供玻璃器皿的批发。泰特姆先生是基督教费城贵格会教徒。在我刚毕业那年的夏季或早秋，他雇用了我，让我做学徒。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所得到的工资是周薪 3 美元。

有一天，泰特姆先生突然叫我到“摩根先生的事务所”去取一些证券。“摩根先生事务所”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银行业务商号。我走进那幢属于华尔街最老的楼房之一的老楼——就是现在矗立着的宏伟的摩根大厦，没有被工作人员耽搁，更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了摩根先生面前。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摩根先生是否和我说过什么，也许是说过什么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记得我当时非常仔细地瞅瞅他那非常有名的鼻子和黄褐色的眼睛。这为他增添了一丝人格魅力，使他显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的我对拳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花时间练习了一段时间，在我头脑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摩根先生在拳击台上会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人物。然后，我又想到，如果现在面前有一匹高头大马，那么摩根先生

跨在马上，会和查理曼大帝多么相像，手执战斧，就像这位法兰克帝国的国王一样。

如果说与摩根先生的令人难忘的会面激励了我进入华尔街，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文学素材。然而，真正引我进入华尔街的，并不是什么激励人心的故事里所描绘的那种场景，实际上是因为我光顾了一家赌场——一个叫作“赌博地狱”的地方，大多数品行端正的人都是这么称呼这种地方的。

///

我们居住的城市夏天总是非常炎热，每当蝉鸣响起，夏日降临，父母就会带上我们去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度假消暑。朗布兰奇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划船、钓鱼、游泳和赌博的度假胜地之一，最重要的是，气候很清爽。

父亲就在西端宾馆做宾馆内的专职医生，宾馆给他配置了一个套房，是两个房间的，正好一个作为办公室，另一间是卧室。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城里做学徒，只能强忍住对与家人见面的期待，周末的时候就会和哈迪一起去朗布兰奇和父母度过周末。我们一般在星期六的下午出发，朗布兰奇离我们那里很近，没多久就到了。晚上我们两个就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个折叠床是专门为我和哈迪准备的。

新泽西的小银盘有一家寄宿屋，是当地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经营的，他叫迪克·伯登大叔。因为寄宿屋临近快乐湾，住在迪克大叔这里的人可以在快乐湾赛帆船，这是一项非常带劲的户外运动。偶尔，我会在寄宿屋借宿一夜。至今，我还记得我驾着迪克大叔的小帆船——他的宝贝“艾玛 B”号绕过普莱斯码头，穿过什鲁斯伯里河。我就穿着平时经常穿的帆船服——一条帆布裤子，不穿衬衫、鞋子，也不戴帽子，肆意地享受轻松自在。

我熟练地操控舵柄和主帆索，尽可能地擦过堤岸，来显示我高超的驾驶技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位女士的说话声，声音甜美动人。我抬起头，四处寻找这个美妙的声音。其实很好找，就在码头上，非常明显的地方，站着一个光彩夺目的大美人，她的身边是著名的运动员弗雷德·杰布哈特（Freddie Gebhardt），两个人的关系想必有些暧昧。那个大美人正在试图逗弗雷德开心，环顾四周找了一遍，就开始对我的外表评头论足，还说得头

头是道。各种词汇都落在我的身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不太愉快，所以后面的也就没有再怎么仔细关注了，这里就不再说。

虽然古话总说谦逊是美德，但是那时我还是很感谢大美人的评价的——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也会这么觉得，当时我过于专注地听美丽女士的评价，就一时疏忽放松了对帆船的驾驶。突然袭来一阵狂风，正好打在我的帆上。其他帆船的人粗哑着嗓子朝我高声叫骂，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迅速放下主帆索，让险情缓解下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心情卖弄技术了，小心平稳地返航。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心神不宁心乱如麻，一直想着那位美丽的女士赞美我的话。后来，我才得知那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士正是著名演员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

我回到迪克大叔的寄宿屋后，为了省下 50 美分作为赌注，就步行将近 3 英里到蒙茅斯，赌完马再走回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算不上什么。为了“脊背”特尼、汉诺威、矫正这些正名动天下的骏马，就是再走 3 英里，也没有问题。当时，杰出的马主有很多，他们有很好的马厩，最闻名的还是奥古斯特·贝尔蒙、弗雷德·杰布哈特和劳瑞拉家族。而卓威亚斯家族算得上是给这些人的马下注最大的人。我现在仍然记得的赛马骑师就有墨菲和麦克拉弗林，当然少不了加里森，那个因“最后出人意料地获胜”（the “Garrison” finish）而闻名的加里森。

朗布兰奇这个地方有很多赌场，成为度假娱乐的天堂。靠近父亲工作的西端宾馆的是费尔·达利开的赌场。我不会在他的那个赌场里赌，不是因为靠近父母的住处，而是那里的赌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点贵，那里的一枚筹码最少都要 1 美元，我还是囊中羞涩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那里闲逛，看别人玩。那里很是热闹，有赛马赌注登记的人、沿街兜售的小贩、运动员、经纪人、商人、银行家等等，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里全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当然，还有一个专门为那些有身份的人士准备的包间，他们不希望被人看到公开赌博。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轮盘赌和法罗牌。突然一个非常有名的赌徒朝我走过来，他叫帕特·西迪。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小伙子，

我有话想对你说。”他示意我到外面的游廊上说话，我跟随他走出赌场，

“年轻人，我注意到你一直在这里吊儿郎当地瞎逛很久了，听听我这个精通此道的人的一句劝告，不要再到这种地方来了。前几天的晚上，我突然闹肚子疼，就是你父亲给我看的病。他看起来品格不错，我也看到了你的母亲，她为人温柔敦厚。你的父母一看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要是你不远离赌场，就一定会让他们伤心的，而且你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帕克·西迪的劝告没有打动我一丝一毫，我仍然流连在各个赌场里。又过了几个晚上，狄克·邦索尔（和我年龄相仿，是一个富家子弟，父母很富有，在花钱方面向来慷慨大方）建议我们到另一个赌场去玩，也是达利家人的场子。不过，那个场子里的筹码只要 50 美分。我换了两三次筹码，坐在轮盘赌桌边观察，内心踌躇，不敢轻易下注，只是押颜色。不久，我就挣到 2 美元，感觉当时的运气还不错。突然间，整个屋子就安静下来，甚至可以用一片死寂来形容，就连那个转动轮盘的人也停下了手。

我一抬头，正好看见父亲站在门口。在朗布兰奇这个地方，父亲也算是小有名气，毕竟无论在何时何地医生总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是当时的我，觉得非常羞愧，如果这个时候上帝听到我心里的呼唤，我希望地上会出现一道裂缝，好让我钻进去。

其实，我人生中第一次投下的注，就是父亲给我的钱。那是在赛马场，我和父亲正在看马，我告诉他我认为那匹叫作帕沙的马会赢，父亲默默地看了我一会，递给我 2 个美元的银币，只留下一句话——如果你觉得帕沙会赢，就坚持自己的选择判断。结果，我并没有在第一次的赌马中获得多大的成就感，帕沙的表现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

但是，在父亲眼中，给赛马下注和进赌场赌博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走到轮盘桌边，眼睛是平淡的，用极温和、极平静的语气和我说：“孩子，等你收拾好了就出来，我们回家。”

我马上就收拾好了，甚至是在父亲的前面先一步走出赌场。赌场外，哈迪正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一下子就不觉得羞愧了，甚至有一种被背叛的愤怒感油然而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压低声音问哈迪，就怕被父亲听到，“为什么父亲会来这里？”

哈迪解释说这事没他什么事，不是他告的状。是家里人叫我回家，哈迪只好说自己曾经在海边来来回回地叫我，打口哨找我，家里人担心我可能溺水了，父亲才出来找我的。

回到西端宾馆，我和哈迪默默地脱掉衣服准备睡觉。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当我们都已经躺在折叠床上时，父亲才开口，语气依旧平和：“你想想，等你长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把儿子从赌场里叫回来了。”

父亲走后，我迷迷糊糊地就要睡着了，却因为床的下陷突然惊醒。我看见母亲就坐在折叠床边。她把我轻轻地揽在怀里，说了几句安慰我的话。闻着母亲身上的味道，我的心里却不平静。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总是觉得自己给家里带来了莫大的耻辱，那个老赌徒的话总是在我的耳边响起。早上大约5点钟，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没有惊动哈迪。我走到火车站，在站边的一个小酒馆里和一些马车夫和马贩子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坐上最早那趟开往纽约的火车。看着车窗外的太阳冉冉升起，我的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我告诉自己，一个身体健康的19岁男孩是不会垂头丧气消沉很久的。

等我回到城里的时候，我已经忘了我离开朗布兰奇是为了逃避那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或者说是我刻意地遗忘。我去看了正在贝尔维优学院（Bellevue College）学医的表兄弟马科斯·海曼（Marcus Heyman），我发现他和几个年轻人，应该是他的同学，就像平常的星期天一样，准备打一天扑克来度过周末。我提出建议让他们去我家打，我家的房子正好空着。我愉快地加入其中。当我们正在地下室打牌时，马科斯随意地抬头看了一下门口，突然跳起来大叫：“天哪！是贝尔姨妈！”

果然，是母亲缓慢地走下来。当母亲走进房间时，我们都已经穿好外套，收好扑克，不希望她看见我们正在打牌。鉴于前一天晚上发生的那件已经越轨的事情，我想母亲肯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所以不管我了。我甚至不敢抬头看她，我怕从她的眼睛里看见失望和伤心。但是，她似乎没

有看见什么，只是跑到我的身边，伸出双臂把我一把抱住。

“看见你真的很高兴！”她说，眼泪已经流进我的衣领里，“你是个敏感的孩子，我多么担心你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羞愧，羞愧到无地自容，但是这让我更加爱我的母亲。接着，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再来纽约的火车上，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朱利乌斯·科恩（Julius A. Kohn），他是个退休的服装商人，现在在华尔街经营一家公司。他告诉母亲，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愿意从最底层干起，并且愿意接受正规的银行业务的培训。就像在法兰克福接受培训的年轻人一样。他想找的人必须是一个思想严谨认真、工作刻苦努力、为人诚实守信、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着重强调，这个人绝对不能有“不良习惯”。

母亲很高兴地告诉他，她认识一位符合他所有要求的年轻人。

“他是谁？”科恩先生急切地问道。

母亲完全没有想到我赌博的事情，就回答他：“我的儿子，伯纳德。”

第二天，我如期拜访了科恩先生。他向我解释说，在欧洲，是不会向学徒支付报酬的，即使他干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钱。所以，他也不准备支付我任何薪水，但是他会尽全力教导我做事情，做一个商人应该熟悉学会的事情。之后，我决定向惠特爾－泰特姆公司提出辞职。这就是我进入华尔街之前的经历。

///

我的新老板科恩先生是一位对学徒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刻薄，反而他为人非常友善。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这是份随时充满激情的工作，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学习，而在惠特爾－泰特姆公司，只需要一成不变地做同一件事情就好，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

除了一些常规的业务外，科恩先生还特别仔细地教导我套利交易的复杂过程和要注意的细节。打一个比方，同一只证券，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报价就可能有一定的差异，在纽约、布恩斯伯勒、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就可能存在报价的差异。假如是在阿姆斯特丹买入、在波士顿卖出，或者

在布恩斯伯勒买入、转手在纽约卖出，便可以赚到中间的差价，这就是套利收益。

尽管我是这个办公室的最新来的小职员，并且兼职跑腿，但是我仍然受到老板重视而被赋予了机会，我可以自己做以不同外币进行套利交易的计算。这是一项对头脑敏捷度、信息掌握度都有很高要求的工作，因为在对不同国家的货币计算时，哪怕是汇率出现一点点极小的差异，直接决定着这笔交易是否赚钱。通过实践，我已经培养出一种本能，能在接触数据的一瞬间就可以根据需要将一笔钱自由换算成荷兰盾、英镑、法郎、美元和马克等。后来的事情证明，这种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会期间是一种明显的优势，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我不得不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国际经济问题。

当然，我们公司也参与到新的铁路债券的买卖中。在铁路重组时，就会发放一些新的债券来替换老债券。这是一项风险投资，如果重组后的铁路资产收益表现得令人满意，那么新债券的售价就会比老债券高出很多。每当有新债券发行替代老债券时，也可以通过买入老债券卖出新债券来获得中间的利润。当然，如果重组没有正式通过，债券就会砸在手里，成为一堆废纸。所以说这是一项风险投资，算得上是富贵险中求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我也亲眼看到并学习了套利交易、外汇买卖、资产重组以及投机交易。而我现在最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记录这些交易的操作账簿。我发现我似乎对于这些交易有一种天生的学习天赋，可以无师自通。我不断地努力，直到后来我成为大西洋这边积极从事套利交易的主要交易人而享誉华尔街。

在我来到科恩先生身边工作不久之后，科恩先生就给我发工资了，周薪3美元。就在这年夏天，父亲决定去欧洲，他少年时就移居美国，这是35年来的第一次。赫尔曼叔叔、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人都到汉堡船务公司的哥伦比亚号上给父亲送行。赫尔曼叔叔一直都非常喜欢我，他就问父亲：“为什么不带上伯尼^①一起去，可以长长见识。”

父亲想了想，告诉我，只要我能够在船起航之前收拾好行李赶回来，就

① 伯尼：对伯纳德的昵称。

可以带我一起去欧洲。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就连有轨电车也几乎不见踪影。似乎赶回家收拾行李再回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还是及时赶上了船。我被安排在一个极狭小的船舱里，和3个古巴人在一起。恰巧的是，我们四个人都晕船，就一路晕到目的地。

前面已经介绍过在德国的祖父母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和父亲只是到什未森他们家里看望他们之后，就转战到柏林。关于这座城市，除了作为德国首都所带来的贸易繁荣，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勃兰登堡石山和随处可见的德国军官。

父亲一直都对德国的军事精神感到深深的厌恶，而这种感情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看到那些身穿笔挺的制服的军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做派，我就心生恼火。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对拳击特别感兴趣，而且练得也还不错，甚至我觉得我可以和任何一个军官一较高低。我只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了一句话，大概是说如果哪个军官敢对我放肆，我就给他一拳。父亲劝我说：“那样做不值得，太傻了。”

因为我并没有时间向科恩先生请假就出发去了欧洲，母亲就向他解释了一下我的不辞而别。当我回到纽约后，他就把我叫回公司，态度也很温和，但是我在那却没有干多长时间。其实，自从我从欧洲回来后，我的心就像是长了草无法安定下来，总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最后，我和迪克·莱登决定选择去科罗拉多的金矿，打算在那里发笔大财。本来以为母亲可能会阻挠我去，结果她却没有反对。

坐长途汽车坐了很久，久到觉得自己看见了一遍太阳的升起和降落，我们才到了丹佛，然后在驿站换乘马车继续赶路到普尔克里克。普尔克里克是一个比较大的采矿的集镇，算得上是幅员辽阔。这里有小酒馆和舞厅，当然还有我最关心的赌场，这里都是廉价赌场，当地人并不富裕，廉价赌场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暂时就住在镇上最好的宾馆里，叫作皇宫宾馆。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摆满了折叠床的大房间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只好从那些已经熟睡的人身上跨过去，才找到我们预订的位置。

在这个镇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快速发财、一夜致富的故事，这证明我们的眼光独到，并没有选错地方。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说一个含矿量非常丰富的矿就属于一个曾经是木匠的人。当然，流传最广的还是艾弗林·沃尔什·麦克利安的父亲汤姆·沃尔什的发迹经历。后来，我到华盛顿出任公职时认识的一位好友就是拥有“希望之钻”的麦克利安。

经过不断地筛选，我决定把“资本”投资在一只股票上，当时那只股票叫作“旧金山矿”。这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只股票，值得纪念。投资完股票之后，我和迪克剩下的钱就不多了，继续住在皇宫宾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就换住到寄宿屋里。我还把从纽约带来的西装收起来，到一个与旧金山矿毗邻的矿井做挖石工来补贴生活。

挖石工是矿里最累、最不需要技能的纯体力工种。我们只要跟在爆破组身后，把已经炸碎炸松的矿石聚拢成堆就可以，然后再把矿石运上能够直达地面的篮子和矿车里，非常简单。让我觉得丢脸的是，在我干这个活没多久，就有一个高大健壮的矿工戏弄我。当时我就在心里琢磨着：用最男人的方式解决，我们迟早要打一架，打架的时候我就先发制人。可是，我的忍耐力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在他再次惹恼我之前，我就先揍了他，就像是我预想的那样，我跳起来使尽浑身力气给了他一记重拳，把他打翻在地。之后他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当然其他人就更没有了。

莱登就和我一起工作，我们上的是白天的班，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晚上去光顾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机会的地方。我更偏爱与皇宫宾馆联营的那一家赌场，那算得上是镇上最高级、最雅致的场所了。我和莱登每天晚上都会去赌牌、赌轮盘，输赢并不大，反而总是把我们挣的钱也搭进去。

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我就对各种轮盘布局、如何操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我认定轮盘应该是被人做了手脚，可以操控结果。比如说当赌注很大的时候，轮盘总是会在对赌场有利的一面停下。所以我开始下小些的赌注，不管押大注的人是多么的疯狂，我都反其道而行。这样子，一晚上下来，我反而能赢到几美元。

当时，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可以不用再去矿

场卖苦力。这时，赌场的老板却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这里不再需要我的惠顾。

然而，在这段时间，我在矿场的工作却受到提拔，我升职到爆破组。干活的时候，我不用再辛苦地搬运石头，只要握住钻头，另一个人拿着把铁锤敲击钻头就可以了。这份活儿比干挖石工容易，主要是不累。不过，我最大的兴趣却是旁边那个我投资的旧金山矿。

我逮到几次和那些在旧金山矿井干活的工人聊天的机会，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不久之后，我可以确定我买的那只股票并没有我所预期的那么好。当时转卖给我的那个人巧舌如簧，夸张地预测这只股票的发展前景会有多么辉煌，投资它最终会被证明是最正确不过的。因此，这里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关于赚钱方面的教训——试图通过采矿这件事来发家致富的人，扔进地下的钱要远远多于从地下挖上来的钱。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纽约的好，甚至怀念起了我在纽约生活时的安逸，我的伙伴迪克·莱登也有相同的感受。在普尔克里克，我们受到了些许挫折，令我们几乎记不得当初的雄心壮志了。但最后，我们决定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到家庭的怀抱。而我，又重新登上到华尔街这艘载浮载沉的大船——直到我的好朋友伍德鲁·威尔逊把我带出此地。

第7章

在经验教训中成长

股票市场对一个人性格的作用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大，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这种影响有些不可思议。

我年轻的时候，初入华尔街参与投机，对很多事情都一知半解，但即便如此，我也很快就得知，人们到底愿意多么不择手段，藏了多少鬼蜮伎俩，只是为了探求股票市场上一些“内幕消息”。他们总是对你笑意吟吟，盛情约你出去玩乐，告诉你这顿饭他们请，问你这场戏口碑很好，你是否愿意与他们一道前去观看，还邀请你到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和乡间的家中做客。如果你认为他们是真心地想与你交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总有一些精心设置的问题，他们会在漫不经心间问出口。要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打探消息很难，因为那些问题往往插在寒暄间，或者在对某些完全无关的事情的评论之后，交谈的最细微处。他们提问的时候连语气都不会变，你还没反应过来，可能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事情说出口了。

特拉普派修道士^①在潜心修道的过程中恪守沉默，对任何不必要的谈话都三缄其口。我小时候在书本里读到有关他们的事情时，万万想不到等我步入华尔街之后，竟然会将他们视为榜样。因为在对话间能被用到的花招实在太多了，为了防止祸从口出，我宁愿一句都不说。但即便如此，单纯的沉默

① 特拉普派修道士：罗马天主教中缄默无言、苦心修行的修道士。

都很可能被误读为隐藏着某些重要的市场信息。

那些索求投资建议的信件经常雪片般飘来，将我家的信箱淹没，甚至就在我此刻写下这段话时。那些寄件人与我素昧平生，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样貌长相。有一封邮件里甚至夹带了厚厚一沓 15 000 美元的现金，它们来自一位孀妇，她在信中询问我：“这笔钱我究竟应该立刻投资，还是再过一段时间，等我攒下更多的钱再说，以保障我暮年的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现频率非常高的问题，比如：

“现在的年轻人白手起家，是否也像您当年那样在华尔街发一笔横财那么容易？”

“你到底是如何发现 1929 年的时候，股价已经高于正常水平的？”

“我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不再允许我从事体力劳动了。请问有什么投资是绝对安全的，可以让我放心地把毕生的积蓄都投进去吗？”

“您能给我一些投资上的建议吗？我有一笔资金，甚至不担心它们会亏损。”

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对这些人来说，股票市场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无异于中世纪炼金术师的那些点石成金的魔法，好像当他们走进去，再出来时，就会摇身一变，家财万贯，衣冠楚楚。当然，如果魔法石真的存在，我大概也会趋之若鹜——在股市中，华尔街上，这就表现为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内幕消息”之上，指望着一朝一夕就能从贫穷变得富裕，并且不用担心那些使别人倾家荡产的商业风险。而另外那些，像我一样真的发了财的人，并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过人，我们在实践中磕磕碰碰，积累了一套关于投资和投机的行动技巧，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华尔街被许多人视为一个巨大的赌场，然而事实上，股票市场和装有空调的跑马场迥然不同，前者要残酷得多。但不管我怎么劝说，鬼迷心窍的人是不会回头的，因此，在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

股票价格——当然，还有商品、债券等的价格——之变化多端，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可以说世界上的所有人、任何事都与股票息息相关，无论是新的科技发明、货币的价值波动、天气异常或正常、战争的威胁或是维持的和平，

无论它们在多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发生，实际上却都有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在股价上产生作用。说股票市场是反映我们社会文明的一块晴雨表丝毫不夸张。并且，这种影响是绕不开人的因素的。要记录股票场所产生的波动，往往不是通过事件本身如何，而是人们对这些事件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就像地震仪在地震时显示出急速摇摆的波纹那样，只不过在华尔街，这座巨大地震仪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一个个男人和女人构成，它的运行原理，则是人们对这件事将来的走向的理性的感知与预测。

可以说，人才是构成股票市场的最重要部分，在努力阅读未来的正是人类本身。人类根深蒂固的欲望让他们对某件事情孜孜以求，而这种特性又使得股票市场充满了戏剧性和斗争性，男人、女人在这座竞技场里进行较量，手持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作为武器，利用对手内心中的希望与恐惧彼此竞争，学习运用自己的优点，针对他人的弱点，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们对财富的贪婪之心，或者换个说法就是理想抱负。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事情。初到华尔街，我只是个办事员和跑腿的，几乎把该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甚至因为年轻人身上常见的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与眼高于顶，我实际做错的事情还超过了所有错误里那些能够被原谅的范畴。纵观我在华尔街的整个生涯，可以说就是一个在人性上接受教育的漫长过程。那些我慢慢体悟到的知人识人的方法，远比投机技巧要重要。

因为金融知识只适用于特定的领域，而人性却是在所有人类事务上都相通的。随着我的事业逐渐转向公共生活领域，我越来越感激自己还是一个投机者时，在华尔街上所学到的关于人的事情。后来，当我站在股票报价机器边上俯身查看今天的报价行情时，当我在白宫中面对众人视线发表演说时，当我出席战士理事会、当战争结束之后我去参加和平会议、当我在全心投入获得利益时，当我设法控制原子能的运用时……我发现无论在哪儿，人性都如出一辙。

///

1891年的时候，我到位于交易大街52号的豪斯曼经纪公司工作，这才算真正在华尔街有所起步。惭愧的是，我能去这家经纪公司工作主要也是

通过母亲的努力，就和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一样，她在从事慈善事业的工程中结交了德弗雷斯，在为雅各布·西弗创立的蒙特菲欧之家募款时，她协助德福雷斯先生共同打理展会，获得了这位先生的赏识。后来我一从科罗拉多回到纽约，母亲就介绍我专程拜访了这位德弗雷斯先生，他又把我推荐给了阿瑟·豪斯曼（Arthur A. Housman）先生。

豪斯曼的弟弟克莱伦斯是个温和的小胖子，当年我刚刚来纽约时，就是他每天接送我上文法学校。我每天还和他一起工作，当然，他是公司的记账员，而我是个小办事员、跑腿、校对员和办公室勤杂工。这份工作每周能拿到5美元，这在我这个年龄是很好的薪水了。

为了对得起我的一系列头衔和算得上优厚的薪水。每天我要早早地打开办公室。首要工作是确保豪斯曼先生的办公桌整齐，墨水池、墨水笔、吸墨纸都在顺手的位置，否则豪斯曼先生就会说：“今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呢？”然后，我要为亲爱的克莱伦斯把账本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摆在他的桌上。然后我的工作就剩下誊抄信件并编索引，帮着他们编制公司月度报表。最麻烦的是有别的公司的跑腿的过来，我就得追着查问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这可让我很不开心。

股票清算所在当时还没诞生，我们就得跑着到处送股票，一般得在第二天下午2：15以前送到。当时好多经纪人事务所都密集地挤在交易街西北角的百老汇大街上的一栋高楼里，人总是非常多，我们为了赶时间，在楼梯上匆匆忙忙，横冲直撞，衣服之间发出摩擦的声音。股票总是被捆成一大把，我们没多少时间逗留，总是不等回应就把它们递进出纳员的窗口放下，随之才大喊道：“麻烦给豪斯曼开支票。”解决之后，马上就又匆匆赶往下一家。

一天，我在杰维特兄弟公司（Jewett Brothers）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到那儿送完股票之后，因为等不及，先赶到别的地方去送股票，完了之后才回来取杰维特公司开具给豪斯曼公司的支票。

还有许多跑腿的男孩也正巧站在出纳员的窗口等着票据，但我的个子比他们要高，视线可以越过他们的头顶看到窗口里面。我本来努力想插进去，还是被一个男孩子挡住了，我隔着他就朝出纳们大声喊道：“请问豪斯曼的

支票在哪里？我回来取了！”

过了一会儿，没人回应，我就又大声叫起来：“出纳员先生，麻烦快点儿了！把豪斯曼的支票给我吧！”

出纳员听到了，抬头看我。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他冷冷地说：“给我从凳子上下来。”

我觉得好笑，回答道：“可我没站在凳子上啊。”

“礼貌点，孩子，小心我出来给你几个耳光。”出纳员说。

我笑了：“你认真的吗？”

过了一会儿，门真的开了，出纳员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后面甚至还跟着杰维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结果，他们看到了我6英尺3英寸的身高，全都惊呆了，打量了一遍我的全身，然后感叹道：“天哪！”

我们全都放声大笑，出纳员和合伙人又回到了房间里，很快我就拿到支票离开了。后来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后，有时候还会遇到杰维特公司的那两个合伙人，他们看见了我，都会笑着对我说：“从凳子上下来。”

当时我不满足于一直做这些跑腿的活。我想试着爬到记账员的位置上，我以前就为父亲管过一些账目，但为了学到更多东西，还是报了一个教授簿记和合同法课程的夜校。我在里面学会的东西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你要是给我一套复杂的账簿，我根本不用别人帮忙，就能自己查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信息对证券交易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要是你想投资哪家公司，最好对它的情况了然于胸，这是我从科恩公司的事情中得到的经验。

因此，在豪斯曼开始工作后，我隔三岔五地读一读《金融年鉴》(*Financial Chronicle*)，《普尔手册》(*Poor's Manual*)也总是放在手边。一有空，我就会随手翻阅这些介绍各种公司的书籍，强迫自己把它们的具体情况装进脑子里。

只要我闭上眼，整张美国地图就能够浮现到眼前。美国所有重要铁路的运行路线我全都熟悉，甚至包括它们获得的主要收入是靠运输什么种类的货物。我可以推算出一片新的矿藏的开挖，或是新的住宅区的建造具体会影响

到哪些铁路的兴衰；要是某些地方发生了干旱、洪涝之类的自然灾害，我也可以非常迅速地反应，周边究竟哪些地区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答题得大奖的智力竞赛节目，有的答案我甚至不用回忆就能脱口而出。要是早几十年有这种节目的话，我大概都不用做别的什么，只要一直答题，兴许就能轻轻松松地挣到许多钱了。

除此之外，我获得消息的渠道还有“听”。因为我的左耳听力很差，所以我就单靠一只右耳，全神贯注地倾听身边发生的各种谈话。我很早就发现了，比起很多地位同我有天壤之别的杰出人士，我对留心听取一些街道上的谈话，反而要擅长得多。传到我右耳中的各种声音，让我对这条街上发生的大事小事都看得更加清楚了。

在大家的眼中，我渐渐成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家伙，给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不管身份高低，下至负责跑腿的人、小职员，上至一些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一旦有什么事情想打听，都会来找我。也正是因为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小职员来说高攀不起的一些精英人士，都常常来找我问问题，他们似乎也不太热衷于查阅书籍寻找答案。

这就是我与米德尔顿·斯库布雷德·巴里尔结识的契机；对股票投机来说，他实在算不上什么专业人士，但他却能在股票市场里不断盈利，非常难得。青年巴里尔当时在他父亲约翰·巴里尔的律师事务所里从事法律工作。范德比尔特家族是他父亲的法律业务客户，而他是豪斯曼公司的客户。有时候他会来我的办公室闲聊，他对我桌面上的《金融年鉴》和《普尔手册》不太感兴趣，但是经常问我一些问题。

这些大人物向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我咨询，让我颇为得意，不是每个华尔街的新人都能有这种境遇的。当然，成为大家的询问对象并不仅仅能让人面子上有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对市场参与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更加热情积极地向更多我不知道的领域求知。

在大多数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我独自吃饭，一般只点得起一份三明治加上一杯啤酒。但有时候，巴里尔先生会邀请我出去吃午饭。在这些时候，我兴高采烈，不必再为少得可怜的工资考虑，在午餐吧点上一份烤牛肉和土豆

泥，大快朵颐。老联合交易所位于交易街西北角的新街上，那座楼的地下室就是我们常去的午餐吧了。

我不常对别人感到羡慕，只有在午饭时间，看到其他跑腿儿的人坐在餐厅里，面前摆着一份丰厚的午餐，我才会从心底涌出一丝酸涩的妒意。他们大部分都毕业于哈佛或者耶鲁，还有一些是知名金融家的儿子，而我没有漂亮的学历，也没有富裕的家境，哪怕我想要的只是一份美味的午餐。

在我的朋友里，詹姆斯·基恩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投机家之一，他的水平比几乎所有的其他投机者都要高出许多。正是通过巴里尔先生，我才与他相识。基恩对赛马非常着迷，而且自己也拥有一匹高大威猛的马，他给它起名叫作“多米诺”。他非常看好这匹马，准备把它送到科尼艾兰去参加比赛，并对它下注，借机大捞一笔。然而詹姆斯·基恩担心这笔巨款赌注会泄露出来源，从而影响原本的赔率。巴里尔就向基恩提到了我，觉得我是替他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

我忐忑不安地到基恩先生在百老汇大街 30 号的办公室里去见他。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查了一些关于赛马的知识，对整件事有了一定的了解。基恩先生也确实问了我几个问题，幸运的是都没有超出我的准备范围，于是他认为我有能力胜任这次赛马押注的工作，就将几千美元的现金装进袋子里交给了我。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以前我也参加过赛马，但在一匹马身上下的赌注往往只有几美元，聊以消遣而已。第二天我就坐上火车，赶到科尼艾兰，非常利落地给基恩先生的马投了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不会有人能猜到这笔钱的来源。

那匹马确实没有辜负基恩先生的期望和这一大笔赌资，在比赛中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赛马。回去时，我在三十四大街乘坐渡船前往城区，一路上提心吊胆。当时我身上全都是钱，纸钞塞满了我的所有口袋，把它们撑得鼓鼓的，非常明显，在这种时候，大概没有人不担心会遭遇某些突发事件，比如头顶突然挨了一下之后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身上已经什么都没了。

那天风还挺大，波涛拍打船头，发出阵阵响声，我在颠簸之中抱紧身上的口袋，脑子里不断设想着要是船翻了自己该怎么保护好这些钱逃生。要是

真的落水了，我要远远地游开，绝不靠近沉船和那些落水的人。我扣好了每一颗扣子，又一再地检查，然后抱紧双臂。这些都反映了我当时完璧归赵的决心，如果弄丢了这笔钱，我没法子跟基恩先生交代，也赔不出来，但向来我的性格都不允许自己到处搜寻借口，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开脱。

///

在我年轻的时候，股票市场还没发展得像现在这样成熟，你要是想买股票，只要付给经纪人公司买入股价的 1/10 到 1/5 作为“保证金”就行了，剩下的那些钱都由经纪人来出。当然并不仅此而已，如果那只股票不幸跌价跌到连保证金都拿不回来，你也没法子攒到钱作为追加的保证金再投进去，经纪人就会把它们全都卖掉，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血本无归。而如今这个时代，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的门槛变得高得多，你需要投入的实有资金高达买入价的 70%，是以前的好多倍。

等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攒够一笔小钱，就到百老汇大街上的豪尼格曼－普林斯公司（Honigman and Prince）开通了一个保证金账户。账户里没什么钱，所以我买卖的股票数目也很小，一般在联合股票交易所一次只买卖 10 股。

我青睐的股票范围非常集中，大部分是一些铁路公司的股票，处于破产管理人的监管之下，此外还有一些散的工业股。它们偶尔也会让我赚到一些钱，不过，在这行里，任何刚上路的新手都有机会赚到钱的，与其说是依靠丰富的经验与精确的判断，倒不如说这么得来的财富就像早上出门时阳光灿烂一样，全凭好运气。而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幸运之神真的时常前来敲门。于是一些人产生了错觉——天气永远会这么晴朗下去——他们变得更胆大，以及更鲁莽，被贪欲和泡影般的短暂成功冲昏了头脑。然而要是遇到了亏损，他们就更睁不开双眼了，只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曾经我也是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手里几百元的利润沾沾自喜，不知缩手，最后反而赔光了所有的钱，甚至包括最开始积攒了许久的本金。

我赔掉的钱里面甚至还有一部分属于我父亲，这才是最让我懊悔不已的事情。当时，我看中了一只高价有轨电车线路的股票；而且这并不是无端的信任，我确实调查过了，结果显示这条线路将伊利湖中普特因贝上的一家宾

馆和陆地连接了起来，所以我才会认为它能够盈利。但我会茫茫的股票之海中注意到它却是因为约翰·凯洛瑟尔斯（John P. Carrothers）。我和父亲 1890 年去欧洲探访祖父祖母，在回美国的轮船上与他结识。当时他就在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为人正派，谈吐不凡，极富人格魅力。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来在华尔街重逢。他给我推荐了这只股票，并向我介绍它未来的非凡前景，说实话，他说得有些夸张。但之前在股市里的几次小得意让我错觉自己会一直这么一帆风顺下去，再加上值得信赖的约翰·凯洛瑟尔斯，我觉得发财致富近在眼前，就说服父亲也往里面投资。我父亲非常信任我，出了 8 000 美元，这笔钱在他一生的积蓄里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一段时间之后，股价跌至谷底，我变得几乎身无分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陷在自责与痛苦当中，我自己倒是不介意重新一无所有，但让父亲也遭到了一样沉重的打击才是最令我内疚的。我父亲对我是如此宽厚，竟然丝毫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一次的失败算不了什么。他对人的道德、价值等品质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金钱的在意。

后来，我又重新看中了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可惜手上凑不出 500 美元，我告诉母亲，要是有的话我一定能赚到些钱。

我母亲极力劝说我向父亲求援。

但当时离我买卖有轨电车股票受挫没过去多长时间，我告诉母亲，出于一个青年的自尊心，我是不会向他开口要一分钱的。

然而母亲回过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一天，我在公司，突然被通知有人来找我，我打开门一看，那人正是我的父亲。他掏出藏在上衣口袋里焐热了的 500 美元的支票递给我，我呆住了，如遭雷击。记忆总是那么脆弱，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有没有接受那笔钱。然而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拿没拿钱的细节，而是我的疏忽大意让父亲的半辈子辛劳的积蓄打了水漂，他却仍然选择相信我、支持我、帮助我。我暗自下定决心，发誓永不再让他失望，我父亲对我的厚望与爱意，激发了我身上所有的冲劲。

刚出事时，我甚至想过离开华尔街，放弃金融，我过去的雄心壮志失去了自信作为支点，整个人似乎变成了一架天平，不管谁轻轻用手一碰，甚至

一阵微风，都会使我突然偏离原来的事业路径。而我父亲是个温柔敏锐的人，对他人心情的体察细致入微，他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并安抚了这些情绪。

有的人跟我遭遇了一样的困境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将一切抛诸脑后，寻找风险最大、回报也最丰厚的道路，而我正相反，变得小心翼翼，若非反复权衡，不敢再妄下决定。但我也因此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之后，我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失败，都会在事后仔细地寻找原因，分析清楚到底哪些地方与我的预想不符。哪怕我真的成了富人，不再需要死抠每一笔金钱，也没有摒弃这个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跟随我的习惯。而且正相反，当我在股票市场操作的金额越来越大，这个习惯也随之越来越深入，什么样的成功带来的得意都无法动摇它。

我每次做完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是结束了一笔重大的交易，都会暂时地离开华尔街，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让自己能够拥有清晰的思路回顾之前的一切，尤其是当股票市场的形势露出了经济萧条的端倪，我就加倍小心缜密，不放过每一个可能藏着纰漏的细节。而一旦真的有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任何借口都没办法让我原谅自己，哪里思虑不周将会使我铭记许久，始终警惕着相同的错误再度发生。

其实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不管是在私人事务当中，还是从事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对谁而言，这种不停地回头进行自我反省的习惯都能带来相当大的助益。错误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可能甚至比正确还要多，比如避免重复地犯错，比如我们越是了解自己身上的缺陷和弱点，也就越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与行为。反思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一些突然发生的陌生状况，这种时候，闭上眼睛问清楚到底是该像之前那样盲目地照着既定路线飞速前进，还是对行动的方式、速度、目的进行调整或改变，毫无疑问是明智的，能够避免许多岔道与碰壁。人们似乎很容易就把充沛的力量和精力徒劳地耗费在一些对问题本身没什么作用的细枝末节上，却无暇剖析其本质与核心。

其实要思考清楚我做事情的时候究竟有哪些常犯的问题也并不算太复杂，因为我年轻时候所有的错误，都可以被归为两种。几乎没有一个投资者

能够绕开这两个错误，至少我见过的里面没有。

第一个错误是，我对自己手里头正在交易的证券知之甚少；甚至有时候，我对一只股票仅有的了解就是它的名字，而事实上，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经营模式、行业前景，甚至管理层的人选，对股价的涨落都有重大影响，都是我应该去探知的。

第二个错误，也是我犯下的主要错误：好高骛远，手上没有多少资金，却妄想迅速挣到大笔财富，高于自己财力进行证券买卖。最初我踏入证券市场时，真是可以说把全部的钱都带在了身上。我能够交给经纪公司的保证金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一旦股价波动稍大，我的股权就会泡汤。那是真正的投机，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只股票上涨，那一只股票下跌，对一个没什么的信息来源年轻人来说全凭上帝的旨意。当然，有时我也会下对赌注，然而那些看起来没在上涨的股票对我来说仍然摇摇欲坠，因为我随时有可能血本无归。

1893年，美国经历了一次金融恐慌，经济形势很糟，很多工厂和矿山都破产了，留下一片空寂无人的废墟，就连全国铁路里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破产管理人接手了。直到两年过去，1895年，人们才从恐慌中脱身，看见了未来迷雾中的一丝希望。这是美国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金融气氛又温和下来的时候，我在豪斯曼公司已经成为一名债券销售员了。

我一边继续着小额的投资交易，一边在公司兼职做客户管理的事务。此前，我从没亲眼见过经济萧条的景象，不知道这种颓势大概还会持续多久，之后又有什么会发生。

大多数人都被不断走下坡路的生活消耗得筋疲力尽，认为好日子可能永远都不会重新降临了。但我隐隐地察觉到，就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有许多挣钱的机会纷纷涌现，填补上这段时间的空缺。事实终将证明我是对的，他们确实被灰蒙的现实遮蔽了视线，如果能透过那曾悲观的雾霭，未来的光芒将会使你忍不住眯起双眼。

我之前就从书本、传闻以及亲眼所见之事里，知道了那些金融巨头和产业巨人发迹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萧条时期私下收购一些资产的廉价股份，然

后只需要坚持到经济繁荣时期再度回归。那些资产虽然暂时失去了偿债能力，让持股人也随之暴露在亏损的风险里。然而你永远可以期待，有一天，正常的经济秩序恢复了，美国又回到了原来飞速发展的状态，在能力很强的经理层专业人士的管理下，公司会恢复活力，那些你低价购买的股票也终究会回到正常的价格上，让你几倍甚至几十倍地赢利。

而且，我也相信国家是不会对这种经济形势放任自流的，我的成功指日可待。

我对铁路的热爱从孩提时代起就根植在了心里，当时我在温斯伯勒的外祖父家里住过一阵子，门外就是铁轨，货运火车每天都铿锵铿锵地开过，然后消失在地平线上。车上的司机也许真的记熟了我，又或许只是出于对陌生人的热情，经常远远地朝我挥手。铁路将遥远的城市与你连接起来，无论建设和运营都那么浪漫。

根据我的判断，现在这个时期，全国铁路毫无疑问被过度建设了，那些不必要存在的线路就会被整合改造，被更高效、优质的资产所吞并。所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那些能够挺过重组的证券；而这件事的棘手之处在于，最终存活下来的证券固然会带来巨大的财富，然而，万一它们的公司不幸破产，那所有有价证券都会变成废纸，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扔进垃圾桶。可以说，我站在人生道路的抉择点上，天堂和地狱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之前我犯过的那些在证券选择上的失误，让我这一次更加细致而谨慎地开始研究起各家铁路公司的经营情况。我拿了一个黑色封皮的小本子，把那些处于重组过程当中的铁路公司列了一个清单。里面有一些公司发行的证券有很大可能值得投资，说不定上面的哪一个名字就将使我成为富翁呢。我还在它们的名称后面巨细无靡地写下了自己对未来的预测，以及操作步骤，既为了方便查阅，也算某种对自己的考验。

我先是卖出了纽黑文铁路公司的股票，然后买入了理查蒙德西点铁路公司的股票。后者在重组之后，并入了现在的南方铁路系统公司。这一切我都记录了下来，后面还有一些我对艾托桑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Santa Fe）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分析。但我所记载的最有

用的信息，是这一条：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很有潜力，如果它以当时通行市价被收购的话，一旦走出破产托管程序，规模不会比原来小，而投资它的人就会得到一倍的投资回报。事实证明，我确实有一些目光独到的地方，这个判断后来应验了。

但不管我把这些铁路证券研究得多透彻，都必须考虑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我身为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说服别人去购买这些证券呢？这比一切技术问题都要难。当时，经济依然很不景气，豪斯曼又是个没有足够说服力的小经纪公司，最重要的是，我看好的所有铁路公司损失都非常惨重，处于无力偿债的胶着状态，什么人敢在这样的情况下冒险往里投钱呢？就算是在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些投资人就已经十分谨小慎微了，碰到现在这个时期，当然更提心吊胆，生怕因为一点点风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我也没办法从信任我的人里找到机会，我身边根本没什么还有余力进行投资的富人朋友。于是，我只好借了一沓工商企业名录，一页一页地搜索，像大海捞针一样，找里面可能投资的人。我翻看得眼睛都花了，最后挑出了几十个名字，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我先打好草稿，然后用最标准的字体一笔一画地把信誊抄完毕。信寄出去后，我零零星星地得到了部分人的回信，然而答复却全是负面的。

但我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每天在证券交易所闭市之后，我都会到百老汇大街，挨家挨户地叩门，走进每一家公司，试图向他们推荐我看中的股票。日复一日，我无数次想过放弃，特别是被人赶出来之后，我走在每个人都神色漠然的街头，觉得自己像一只丧家之犬。但第二天，我仍会踏上那条路，继续尴尬又坚持地在那些陌生公司的门口驻足。我都数不清自己在百老汇大街上到底走了多少英里的路程，鞋底被磨得多薄，然而谢天谢地，我最终还是做成了第一笔交易。

詹姆斯·泰尔考特 (James Talcott) 是第一个接受了我推销的证券的人。他生得高大结实，看起来强壮有力，凹陷的脸上长满的修剪得当的灰白胡须，又为他增添了睿智和精明。他的外形就是那种最典型的苏格兰商人形象，与他的干货商代表人物的身份不能更相符了。那天的推销情形我依然历历在目。

我本来没抱太大见到他的希望，但还是不太想放过每一个机会，所以虽然他的秘书早就不耐烦地多次拒绝了我，我仍然站在外面，想等他离开办公室，至少要亲眼见他一面。他终于出现在了门口，我急忙上前拦住他，向他介绍了自己。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走开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厚着脸皮跟在他身后，不停地说明着我想卖给他的股票和我推荐它们的原因。我回忆着过去学会的所有演讲、说服的技巧，并努力将它们运用得毫无痕迹。我自认舌灿莲花，泰尔考特却显然越来越烦躁和恼火了，皱起眉头，不断摇着头，说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毫无兴趣。但可能是被我纠缠得烦了，他最终还是答应买下一只俄勒冈大陆运输公司发行的一只债券，年息 6%，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价格应该是每份 78 美元。

我每卖出一份债券，豪斯曼公司就会给我 1.25 美元的佣金。但盯着这些小钱也未免太过短视了，我真正在乎的东西是未来。如果那些股票真的如我预想的一样升值，那些人可能就会开始信任我，采纳我的建议，从出于厌烦而掏钱的买家变成稳定的长期客户，这比短期内赚到佣金显然要重要得多了。

果不其然，俄勒冈大陆运输公司发行的债券成功地逃过了当时公司进行的重组的影响，存活了下来，价格也水涨船高。借此我还让泰尔考特先生记住了我的名字。正是这件事为后来他把一笔规模相当大的业务交给我们经纪行负责埋下了伏笔。

我为客户操作的时候小心又小心，盯紧他们已经买入的那些证券，要是预料到会有很大的波动，马上建议他们变更投资策略，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有时甚至能给效益带来可观的增长。然而矛盾的是，我却始终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疯狂投机的欲望。

傍晚，证券交易所收盘之后，白天西服笔挺的年轻人就舒缓了紧绷的神经，到大街上去找五花八门的乐子。就连别的城区的年轻人都会被吸引过来，我自然也抵挡不了这种诱惑。有一家酒馆里经常会举行一些斗鸡比赛（当时被称为“mains”^①），酒馆位于一七五大街附近的哈得孙河沿岸，从窗口可以俯瞰一到夜间就波光粼粼的河面。带我去的人叫桑迪·哈齐（Sandy

① 指两个斗鸡所有人所安排的系列斗鸡赛。

Hatch)，跟我一样是证券交易所的一名会员。他对各种运动都十分在行，而且拥有许多斗鸡，热衷于观赏它们缠斗。

一个非常热闹的夜晚，在不大的斗鸡坑里，我和一群人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看着两只公鸡捉对厮杀。场面非常激烈，看得人热血沸腾，在关键时刻，我也跟着鼓掌和喝彩。突然，身边的人开始陷入慌乱，朝四周散开，匆匆忙忙地朝门外跑去。有人大喊：“警察来了！快跑！”

我也是“要鬼捉不到，抢在人前跑”，只愣了短短一会儿，就跟着一部分人直接跳出了窗外，又一直跑了好长一段路。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想必有人误传了情报。看客们放下了悬着的心，三三两两地回了斗鸡坑，可我却陷入一种失落当中，不想再跟着回去了。

这件事我每次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要发笑，要是我真的因为有一天在看鸡打架，就会被押到法庭上，在治安法官面前为自己辩驳，就真的太荒诞了。这绝对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要是传了出去，甚至会影响我长期以来在客户们眼中塑造的思而后动又保守审慎的良好形象。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去看过斗鸡赛。随之我想到，对客户的稳健和自身的冒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态度，很可能不知何时就会因为疏忽大意相混淆，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

这种冲突在我身上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正视它，并在内心深处正极力斗争着，试图彻底解决它。可能每个年轻气盛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挣扎：到底是继续这么横冲直撞，不放过任何一丝微末的机会，但同时也极有可能一事无成，多少努力都付之东流；还是小心谨慎地落下每一步，走得无比、无比缓慢，为自己的将来逐渐积累财富，安稳，但也可能是长久的贫穷。对我来说，后者才是正确的道路，可它虽然要平坦许多，依然伴随着许多崎岖的苦熬与挫败。

第8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过了在华尔街四年的摸爬滚打，我得到的物质回报依然少得可怜，显然跟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这期间，我的薪资变化如同无规律的递增函数，但也只是由一周 5 美元涨到 25 美元。虽然足够我用来做点投机小买卖，但想借此大发一笔却没有一点希望。此刻，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求加薪，于是便向阿瑟·豪斯曼提出周薪 50 美元。

如同猜想的一样，他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表示可以给我公司 1/8 的股份。这让我有点意外。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得到了更高的薪水。因为按前一年利润来计算，我的周薪相当于达到了 30 美元，以后业务量如果增多，我每周得到的可能还不止 50 美元。当时，我觉得自己赚了。

这个提议让我窃喜，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于是，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合伙人。那年，我 25 岁。

为了符合一所经纪行合伙人的身份和形象，我认为有必要提高个人佩戴层次。从阿尔伯特王子牌外套开始，随后又置办了一顶丝质帽子和一些饰品来搭配这身装扮。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我会在第五大道散散步，享受那惬意的时光。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会精心打扮一番，衣着考究，鞋子锃亮，拿上手杖，派头十足地出门去。

在公共场合散步，也不总是满心愉悦，因为会经常碰到一些其他学徒，

他们大多是经纪人、银行家的儿子，手头富裕，能够随意地做一些我无法享受的乐事。我沿着第五大道欣赏沿途景色，却迎来他们一驰而过的豪华马车，常常燃起我的妒忌之火。

我必须抑制自己这种年轻气盛的想法，压制内心的怒火让自己变得理智，不去莽撞行事。如果不这样，我怕因为我对成功人士的妒火会让自己压抑，心灵受到伤害。

其实，在我要求加薪的时候，豪斯曼先生问过我缘由，我说我想结婚了。

我的恋爱对象是安妮·格里芬（Annie Griffen）。第一次遇到她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戴弗·申克（Dave Schenck）走在马路上，碰巧经过他继父开的一家旅馆的时候，碰到两位美丽的姑娘。他们打过招呼后，戴弗告诉我，那是他的表妹格里芬小姐和路易斯·格温登小姐（Lousie Guindon）。

格里芬小姐身材高挑，我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开始四处打听她家的情况。我了解到格里芬小姐住在西五十八大街41号，跟她父母住在一起。我每天去第六大道上班，路过她家褐石砌的房子时，都会十分激动。她的父亲杰明·格里芬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的孙辈，同时是纽约市立学院PBK联谊会的会员。他儿子跟我弟弟赫尔曼都在纽约市立学院读书，还是同班同学。

格里芬先生有个公司，主要从事玻璃进口生意。公司以表亲霍恩的姓氏结合自己的姓氏命名为霍恩·格里芬。格里芬夫人的父亲是个猪油商人。我依稀记得几年前她父亲威尔考克斯（W.J.Wilcox）的工厂被烧毁了。格里芬家境富裕，有辆体面的马车和马匹。

我从得到的各种关于格里芬的消息中寻找结识她的突破口。然而，这些消息看起来对我帮助并不大，即使我们的弟弟是同班同学，但要和她发生接触还是丝毫没有进展。我做的一切，显得苍白无力。

有一天，我经过她家门前，格里芬小姐离我越来越近。我一鼓作气地走到她的面前，绅士地举了举帽子问：“请问你是安妮·格里芬小姐吗？”

“不是。”她冰冷的回答让我措手不及，呆呆地望着她回家的背影。

这件事情过后，我很长时间无法接触到她。后来，戴弗安排我认识她熟

悉的朋友格温登小姐，通过她，我们才逐渐接触起来。

熟悉之后，我便经常去她家登门造访。但她的父亲反对我追求安妮，我们之间存在着宗教差异，在他看来这是无法逾越的婚姻障碍，最终在一起也不能幸福。所幸格里芬夫人没有持反对态度，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安妮和她的母亲夏天通常在马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度过，格里芬先生则继续待在城里。每逢周末，我就到匹兹菲尔德去，有时会跟安妮的朋友们一起跳舞玩耍，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骑自行车去远足。

上班的时候，每当我经过她家门前，安妮总在窗前守着向我挥挥手。我们私下里还制定了联络暗号。如果她把遮阳窗帘拉上去，代表她父亲不在，我可以跟她待一会儿；要是放下来，我就继续前行上班去。

有时，我们会偷偷约在中央公园碰面，相依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向她许诺，当我赚够可以养活我们的钱时，我们就结婚。但结婚的希望就跟我的投机小生意一样飘摇不定，行情好了希望就大了，但行情一直在变。

1951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中央公园选了块地方想要建个凉亭供人们下棋，向我寻求投资，我毫不犹豫的态度让摩西颇为吃惊。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我跟安妮常去的地方，所以才会答应得如此爽快。

///

我成为合伙人的第一年，公司净收入 48 000 美元，我拿到了 6 000 美元。这笔钱超过了我的预期，如果放着不动的话可能就可以结婚了，但当时我还在过度交易。当我看准某一行情时，就会把钱全用来买入股票或证券。一旦行情波动，我就被湮没在股市里。这种状况接连发生，让我得到了教训。从此以后，我都会预留部分资产备用。之前一次次蒙受的挫折让我痛心疾首，心想要是要早一点认识到这点就好了。

1897 年的春天，我成为豪斯曼合伙人快要两年的光景，我四处凑齐了几百美元，如愿买入了美国炼糖公司（American Sugar Refining）100 股股票。这次交易成了我投机交易中的一次质的变化。在那之前，我精心并彻底地研究了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它不再是你们所认为的赌博，而是基于众多事实数据后得出的判断和结论。

那个时候，美国 3/4 的食糖由美国炼糖公司提供，税后盈利达 2 500 万美元，给股东派发的福利一直很丰厚，但是公司也有未来能不能明朗发展的不确定性。

通称为“糖业托拉斯”的美国炼糖公司当时卷入了一场商战，与咖啡商爱阿巴柯尔兄弟公司（Arbuckle Brothers）互侵对方领域。

另一个让公司发展形势严峻的消息是公司可能遭受国会调查。当时粗糖根据从价关税进口，有传言说，这家糖业公司粗糖的进口价格被人为降低了，国会调查发现证据表明似乎确有其事，糖业公司为此要支付 200 万~300 万美元的税款。

换言之，我买入炼糖公司股票的时候，关税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农民中对“托拉斯”的敌对心理尤为明显。人民党的鼓动宣传加大了群众情绪的爆发。为此，众议院讨论通过了降低食糖进口关税的法案。法案的通过必然对国内的炼糖企业造成打击，外来的竞争使得这家糖业公司股票大幅下跌。

参议院对关税征收进行多方讨论，如同我预想的一样，通过的法案实质上使关税税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觉得关税有利于国内甜菜种植者。随之，美国炼糖公司股票一直飙升，9 月初到了 159 美元的高位。

我通过各种方法利用这只股票上涨的钱去买进更多的股票，让自己一直处于随时盈利状态。当我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时，我用先前的几百美元获得了约为 60 000 美元的利润。此时，我感到无比自豪，感觉自己就是心目中的克罗伊萨斯（Croesus）^①。

赚到钱的喜悦让我迫不及待地给安妮打电话，欣喜地告诉她，我们可以结婚了。显然，我忽然大赚一笔对她而言有点难以接受，她担心突然飞来的钱也会稍瞬即逝。我向她保证，这钱只用来结婚不会用在投资上。于是，我约她晚上见她父亲，告诉他我们结婚的事。

格里芬先生对我的接待礼貌而周全，但对结婚的事还是拒绝得很决绝。

^① 克罗伊萨斯，古希腊财神。

他说，在来过他家的年轻人中，他最喜欢我，但我跟安妮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觉得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将来破坏我们婚姻的利刃，我们以后不可能过得幸福。

这番话我如实告诉了安妮，但丝毫没有扭转她要嫁给我的决心。于是，我们把 1897 年 10 月 20 日定为我们的婚期。

///

我把炼糖公司的股票套现后，立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了个交易席位，花去了我 19 000 美元。把这告诉母亲的时候，她很开心，骄傲地称赞我：“你会越来越棒，前途将一片光明。”

那晚，我跟母亲玩了单人纸牌游戏。按老式打法，我玩牌，母亲洗牌、发牌。午夜过后，哈迪来了，为了跟奈瑟索尔小姐谈续签合作的事情，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气鼓鼓地走掉了。

为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提议他如果愿意安心做交易，我的交易所的席位可以送给他，当时席位的一些手续还没有办完，还没有归到我的名下。他欣然接受了，结束了无望的演艺生涯，开始了稳定的生活。

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才为自己做的事后悔莫及。如果当时认真考虑，考虑自己失去这个席位会怎么样，就不会这么草率了。此时的内心表明了失去这个席位很痛苦，漫漫长夜却无法成眠。良久之后，我决定再买一个席位来消除我的内心的挣扎痛苦。

我跟安妮如期结婚了，婚礼由格里芬先生的一个亲戚理查德·范·霍恩主持。霍恩博士有着典型的牧师形象，并不高大的身材，络腮胡子贴在他慈祥的脸上。他为人善良，做事考虑周全，婚礼开始前，他告诉我打算去一些地方，满足我作为新教圣公会教徒所憧憬的婚礼仪式。对婚礼仪式这件事，我不是很在意，于是告诉他随意一些，按平时主持的那样就好，并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跟安妮蜜月旅行到了华盛顿，由于总是晕船，坐船去切萨皮克湾边的老波因特康福特海峡时，都不能好好享受旅途风光。随后，我还带安妮看了我的出生地卡姆登镇。

旅行结束，我们回到纽约，与我的父母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过得幸福快乐，小家安置在西七十大街 51 号。我跟安妮的住所也稳定了下来，在西端大道 345 号租的房子，很小却很温馨。1899 年 8 月，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小宝贝，父亲给接的生，取名贝尔。

后来，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很宽大，交通便利，在西八十六大街 351 号。有轨电车每天穿梭在这里，小伯纳德在这里呱呱落地。一个彼得·米纳弗的电车司机跟我们很聊得来，经常来家里做客。寒冷的冬天，我常常泡一杯热咖啡让他暖暖身子。我们在一起相谈甚欢，其乐融融。小伯纳德很喜欢他，3 月 17 日每逢小宝贝生日，彼得总是穿着正式，给儿子一枚金币贺生。

我们后来相继搬了两次家，最后定在第五大道，离八十六大街拐角很近。

到我们最后尘埃落定，顺利结婚，安妮无怨无悔地等了我很多年。我内心一直感到愧对她，于是总是买各种礼物补偿她。她真的是值得我一生去疼爱的好妻子。有一次，她责怪我，让我不要一直给她买昂贵的东西了，她说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妻子的深明大义让我很感动。

格里芬先生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同意我们结婚，但是结婚一段时间后，看到我跟安妮生活幸福，他也从内心接纳了我们的婚事，并为他之前的错误想法而感到抱歉，很后悔没去参加我们的婚礼。

跟安妮婚后的时光总是幸福美满的，我们尊重彼此的信仰，互相陪伴，我去教堂参加周五晚上的礼拜仪式时，妻子总是陪同我。这么多年，她也坚持自己去教堂。我们每天遵循着自己的宗教习俗，互不干涉。

私下，我跟安妮在孩子宗教信仰上达成一致。两个女儿贝尔和蕾妮按照她们母亲的宗旨信仰接受洗礼。儿子小伯纳德，我们采取由他自主选择的方式，等他长大了有了自我判断选择能力的时候，遵循他选择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认为别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我有着自己的准则，任何人都有信仰自由权，我不会去强求他们，去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我在内心认为，在对上帝的感知上，男人与女人存在差异，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倾向，我们能做的是无论别人怎么选择，我们都要去尊重他人的信仰。



第9章

第一次重大交易

“投机者”（speculator）这个词现在似乎变成了“不管不顾的冒险者”和“赌博”的代名词。人们大多忘记了它的词源——拉丁文中的speculari，自然也不记得这个词本来的含义——悄悄调查状况，然后给出恰当的判断。

我真正开始学习做一名成功的投机者，源自我操作糖业股票的成功经验。这是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梳理经历得出的结论。

总结经验，我认为能够预见未来、在毫无端倪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的人才算是投机者。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之难。所以，这样的洞察力和行动能力才显得弥足珍贵，十分有价值。小到商铺决定下一季要采买什么货品，大到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都需要这种能力。

如何获得这样的能力呢？有三个步骤必不可少。

第一，获取信息，即获知一些问题的现状以及趋势、形势。

第二，做出预判，根据现状的一些发展规律，要由自己对未来的状况做出估计。

第三，付诸行动，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免得错过机会，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徒劳无功。

行动非常之重要。撇开行动，一切都无法实现。我见过很多聪明人，他们对某些事情很有自己的看法，能够深入剖析发展规律，也能看到未来的趋

势。他们能够自信地侃侃而谈，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却执行力不够，尽管他们的理念很不错，不乏真知灼见。

同样，时机也非常之重要。在苗头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机会才叫作时机。当大多数人看出机会的时候，时机已晚，蓝海往往变成了红海，机遇变成了危机。如果跳进去，往往就是陷阱。我们身边很多人没有自己的见地，他们看到的机会，别人也看到了，大家都是在公平民主的条件下开展竞争，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象。所以，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已经不是最好的时候了。

对时机的把握有快有慢。有时候，要有守株待兔的耐心，欲速则不达，但是其他时候，一定要狠、准、猛，否则只能收获后悔。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一般说来，战争发生时，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有暴力交易，会发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必须在初露端倪的时候牢牢控制住物价、利润、租金及薪资的上限。这是“一战”期间，我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学会的规律。但是，“二战”开始的时候，美国两年内都没有对这些要素进行上限的控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老是抱着观望态度，再等等，再看看，一直等到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时候才有所动作。这种拖延症带来的后果，在朝鲜战争中，国家也尝到了苦头。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防患于未然，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实行有效措施，那么很多隐患都会杜绝，而不会遗留那么多的历史问题来搅扰我们的神经了，比如国家背负的债务，大概都会减少大半。

不仅仅是战争，这样的规律对其他的事务也是如此，拖延不做，负担加倍，成本陡升，甚至完全做不到、完不成了。1919年，美国入大部分不能接受伍德鲁·威尔逊总统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提议，纷纷表示太出乎意料了。可是现在来看，当时那点小事又算什么，不仅我们要努力维护和平，我们的孩子也被裹挟其中，当年的代价真是微不足道。可惜，总统的远见没能实施，这样巨大的代价只能硬生生承担下来，真是悔不当初。

很多人只知道要争取时间，却不了解争取时间的目的何在，时机跟时间的关系如何，事件的发展是不是越来越有利、越来越好。我们需要把握的到底是时间本身，还是事情变化最适合的那个时间点？

下面我来说说我的一段经历，让你了解在股票市场中什么是合适的时间点，了解快速动作是多么至关重要。这次如同表演般精彩的行动，让我们公司获得了机敏果断的声誉。

故事要从7月3日晚说起。当时，我和父母正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度假，第二天就是国庆节。这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周末。深夜，我接到阿瑟·豪斯曼的电话，说接到报社的可靠消息，西班牙舰队在圣迭戈遭遇海军准将施莱（Schley），已经全军覆没，而此前杜威（Dewey）在马尼拉海湾战役中也大败敌军。捷报连连，这说明美西战争将以美军胜利而落下帷幕。

如果此时买入美国股票，不用脑袋想也知道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然而，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各个交易所都会休市欢度国庆。然而，伦敦交易所会正常营业。所以，我们只要在天亮前发出越洋电报，在那里大量买入，就可万事大吉了。朗布兰奇发不了电报，我们必须火速赶往大都市纽约。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首先，半夜赶往纽约需要交通工具。当时是礼拜天晚上，火车早就停运了。我们四处打点，联络铁路员工，终于租到了一辆火车机车，挂了一节旅客车厢。伴随着升腾的蒸汽和突突的声响，我们向哈得孙河渡口前进，此时是凌晨两点的样子。

我、克莱伦斯·豪斯曼和我的弟弟赛林，披着夜色，带着一身疲惫，向着金钱飞驰而去，前方是纽约。我仿佛看到金色的光在闪耀，我打了个哈欠，困倦而又兴奋。

这是为我们而开的“专列”，第一次享受着“特殊待遇”，我心中飘飘然，感觉良好。此刻，我想到纳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在滑铁卢大战中创造的传奇。列车的轰鸣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城镇、村庄交替出现，离纽约越来越近。我感到完成壮举时的那种恢宏的历史使命感扑面而来。

罗斯柴尔德的故事让我豪情满怀。风声猎猎，仿佛回到了过去。那时，他押拿破仑战败，惠灵顿获胜。他承兑惠灵顿的汇票，而惠灵顿在比利时展开的攻势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英国证券一片惨淡。这需要多么大的魄力！他冒着生命危险，渡过英吉利海峡，亲赴前线，只为获取最新的战况。滑铁卢大战对拿破仑势态不利之时，他就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了大量股票，等

待着股市反弹，比官方信使送到伦敦的情报要早好几个小时。

火车穿过未知的黑暗，而未知令人兴奋，让人产生莫名的期待。黑暗的尽头，历史的画卷仿佛在交相浮现，螺旋的历史再一次转到了相同的角度。年轻人的想象带来巨大的兴奋与欢悦，连着脚下的土地，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美利坚帝国”是如此的伟大，军队是如此的雄壮，人民是如此的美丽。我急切地想要拥抱胜利，为美国军队从古巴到菲律宾的胜利欢呼，想去体会风暴从海洋席卷到大陆的浩瀚，去体验利刃在半个地球上劈砍出的痕迹。

豪气干云，豪情满胸，此刻我还不能想象在未来的日子，一个巨大帝国除了那八面威风的外在形象，还要背负需要威名带来的负担和包袱。我当时还是太幼稚了。

脚步比思绪更快，驱使着我们赶到曼哈顿下城的公司。我太激动了，居然忘带了钥匙。不过年轻就是好，我托着 150 磅的赛林进了开着的门顶窗，我发着电报，等待着太阳的升起。

过了一会儿，阿瑟·豪斯曼也赶到公司，他生下来就适合干这份工作，豁达开朗，当然此刻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摇通电话，握着曲柄，他将好消息传达给一个个睡梦中的客户，让他们确信真有比梦更美好的事情。我在电报机旁忙碌，“新市场……新财富……美利坚打了打胜仗……感谢上帝……史无前例的股市飘红……可以抗衡英吉利的伟大帝国……世界强国”，听着豪斯曼激动的话语，我的手按得更快更有力。

豪斯曼打完电话，满载而归，几乎所有人都要吃进，我们的收单颇丰。带着客户的期待和我们的梦想，我们在伦敦疯狂买入美国股票。第二天，果不其然，纽约交易所开票，意料之中的全线飘红。巨大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腰包。我们是纽约证券经纪行无可争议的冠军，胜得干净彻底，一丝一毫都不拖泥带水。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金融嗅觉灵敏、行动更加迅捷的豪斯曼公司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

可能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阿瑟·豪斯曼听取了一个人的建议。

自此，我在运作股市的时候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方法。这具有重大意义，而运作的交易也十分重大。同时，十分重要的是，我因此与时代的金融巨头托马斯·福特恩·莱恩（Thomas Fortune Ryan）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情谊是如此的珍贵，而又历久弥坚。

按现在的话来说，莱恩可以算是标准的高富帅，身材高大，一米八五的个子，相貌英俊，富有多金。他十分注重礼仪，风度翩翩，说话带有南方口音，却是如此的舒缓、温柔、优雅。人们总会记得他压下嗓音柔声细语的样子，这是他想让人印象深刻时的惯常做法。由此，他如风的行动、超强的执行力在对比中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是个未雨绸缪的人，任何意外都逃不出他的谋划，一切尽在掌握。他是我在华尔街朋友圈中最具智商谋略之人。

莱恩出身贫寒，来自弗吉尼亚州，父亲是个标准的农民，他的成功和地位完全靠自己打拼得来，其中的辛酸血泪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他在交易中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的印象很深，极大地影响了我。不过，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冷血残酷的代名词，完全不可信赖。基于突然倒闭的都市街区铁路公司的调查显示，他的很多行为都是不道德、不仗义的，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按照律法，他没有犯罪。

莱恩正在谋划打入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的烟草帝国，他野心勃勃，蠢蠢欲动，打算大干一场。当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见他眼中闪烁的光芒。此刻，他已经控制了纽约城市运输公司，在塔曼尼协会^①中也算是坐上交椅的人物，说话极有分量，可谓位高权重。

杜克可是个狠角色。有一次，他的几位合作伙伴买入了美洲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的控股权，是走的詹姆斯·基恩的门路。杜克知道后立马知会他们：别以为拥有了公司的控股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杜克绝不会任人摆布的；我要再办一家公司，尽管放马过来较量。他的对手无可奈何，机智精明如他们，只能选择认输，从而留住杜克，继续为美洲烟草公司的发

^① 塔曼尼协会（Tammany Hall），于1805年作为一个慈善组织成立，1817年后开始转变为纽约市的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因贿赂不同政治派系的领导人而成了政治腐败的同义词。

展出谋划策。所以，他的个性十分强硬，跟他斗，想想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更别提要动他的奶酪了。

此后，杜克撒下连环铜，一家又一家竞争对手被击败，纳入他的“托纳斯”囊中，可谓风光无限。到1898年时，只有布莱克威尔烟草公司、全美卷烟公司、利杰特－迈尔斯烟草公司尚能匹敌，在市场中保留了自己的一块版图。

杜克每每递出橄榄枝，期望对方能够投怀送抱，可是三家公司都没有给他好脸色，让他吃了闭门羹。杜克数次展开攻势，想将三家对手逼入破产倒闭的境地——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疯狂的降价。当时有报道称，他一年花费了100万美元来促销他的战斧牌咀嚼烟。然而，这三家公司攻守有度，每次都能化解危机。

19世纪末，喜欢自己动手卷烟的烟民青睐布莱克威尔烟草公司著名的达勒姆公牛牌烟草。我也喜欢自己动手卷达勒姆公牛牌烟草。全美卷烟公司的海军上将牌卷烟与杜克的香卡勃拉牌卷烟打了个平手，不分上下，抽卷烟的人总离不了这两个牌子，要么选彼，要么选此。不过，当时卷烟还没有占据烟草销量的半壁江山，美国的一众烟民主要还是咀嚼烟草、把烟草捻入圆头烟斗中抽吸、抽雪茄、吸鼻烟。那个年代，乡村农妇是女性消费烟草的主力军，主要分布在南方，她们喜欢把烟草放在嘴里咀嚼，或者用烟斗抽，要么直接吸鼻烟。不过，我觉得咀嚼烟草有点恶心，已经放弃了这种形式。而杰特－迈尔斯烟草公司的咀嚼烟比起杜克的战斧牌香烟确实有着绝对优势，销量也远超后者。

当时，咀嚼烟草和雪茄的利益集团暗中资助、操控反对吸卷烟的运动，教堂和主日学校也都如火如荼地开展宣传，这些利益集团以公谋私，利用人们的无知与热情铲除异己，以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

当然，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需要保持善良、坚守信念，只是需要多一点点辨别能力罢了。

对抗者联盟中的主角之一全美卷烟公司在1898年秋天被以莱恩为首的财团收购，然后又并入新组建的联合烟草公司。公司的总裁是谁？先前的美洲烟草公司的副总裁威廉·巴特勒（William H. Butler），与杜克翻脸

后离开公司。暗中的操控人则是莱恩·威廉·惠特尼、怀登纳尔（P. A. B. Widener）、安东尼·布拉迪（Anthony N. Brady）、威廉·艾尔金斯（William L. Elkins）以及一些实力相当的同行。表面上，公司的注册则做得云淡风轻，不惹人注目。

这时，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①，常在军人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转变。从海军退役后，他开始追逐财富；美西战争的时候，他又回到海军；现在，战争结束，他重返商人的角色。他就是哈兹尔廷（C. W. Hazeltine），我们也称他哈兹尔廷上尉。

此刻，烟草商场硝烟四起，如火如荼。哈兹尔廷来到我们公司，约见阿瑟·豪斯曼。他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一条有价值的情报，联合烟草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这步棋是为了跟杜克公司在竞争中更占优势，如果它的计划成功的话。他们俩交换意见后，就来到我的桌前，郑重其事地将情况告诉我。哈兹尔廷强调他可以为我和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牵线搭桥，他跟他们的人关系很好。

我首先做的事情是去拜访两个陌生人，他们十分关键。一位是联合烟草现任总裁、美洲烟草前任高管威廉·巴特勒的兄弟乔治·巴特勒，一位则是联合烟草的幕后推手莱恩先生。我将以他们作为突破口，先从聊天开始。通过聊天，我向他们暗示，我有一些潜在价值，可能能帮到他们一点小忙。

信息总是很难轻易获取的。他们措辞严谨，口风很紧，几乎无懈可击，可越是这样，我越是确定了哈兹尔廷的情报无误。威廉·巴特勒志在联合三大独立的烟草公司，置于联合烟草公司麾下，由自己统帅，一定不给杜克好日子过。所以，他一定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对杜克发动各种攻势。我已经闻到硝烟味渐浓了，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1898年12月初，利杰特迈尔斯公司成了唯一一家独立的大型烟草公司，不在杜克和莱恩的掌控中。这是因为此时布莱克威尔和其著名的达勒姆公牛品牌被联合烟草公司收购了。

^① 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首府，有“美国的雅典”之称。这里有创办于1845年的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杜克自然意识到危机，他的目光落在唯一一家“孤军奋战”的公司身上，他派出代理人赶赴圣路易斯，因为圣路易斯人手握大部分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股票。杜克许以巨利，想要得到这些股票，好在未来的对抗中握有更大的胜算。

杜克想到的，莱恩自然也能想到，他就是不想让杜克好过，于是叫我和威廉·佩吉（William H. Page）律师前去抢占先机，好让股票落到他的手里。

佩吉和我都是第一次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一方面，想在莱恩先生面前好好表现一番，获得他的青睐，以便争取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些惴惴然，生怕因为经验浅薄而把事情办砸，那就不好交代了。我们在圣路易斯的南方宾馆落脚，而乔治·巴特勒早就等在那儿。

我们的行动从拜访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总裁摩西·威特莫（Moses Wetmore）上校开始。和主要人物打交道，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主要人物不只是总裁，还有一个绰号叫作“侦探比尔”的律师——威廉·斯通（William J. Stone），我忘记他是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还是威特莫上校的私人律师了，反正非此即彼。他的经历丰富，曾经当过密苏里州州长，也是美国国会参议员，这些人在“一战”之前阻挠总统威尔逊武装美国商船的计划，发言故意烦冗拖沓。这是个有心机的角色，不得不防。

和这样的人会面，表面上看起来谈笑风生，相处很愉快，因为他们懂得人的心思。他在自有的种植园主宾馆开了套间招待我们。那是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摩西上校风趣幽默、和蔼可亲，但骨子里又透着精明狡猾。

保留有一半南方做派的圣路易斯，气氛闲适，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慵懒。佩吉说，要想消磨掉摩西上校的意志，就要徐图缓进，要亲亲切切、和和气气地行事。巴特勒和摩西上校是老相识了，他的纸牌技艺高超，讲故事的本领也是第一流，佩吉对这些也是相当在行。于是，他们每晚缠住上校，在种植园主宾馆玩上一会纸牌，再喝点小酒。那是相当的惬意。

我和哈兹尔廷则去暗中接触持有大量股票的利杰特的继承人。这就是我们整个收购行动的大致计划。

不久，坊间就在流传着关于交易谈判的报道，报纸上也写着令当地群众

激愤的消息。圣路易斯人希望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能够一直独立，那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特别不喜欢“托拉斯”。曾经，人们到利杰特迈尔斯公司工厂游行，100 名当地杂货店主协会的会员高举“反对托拉斯”字样的标语，挥舞着佩戴袖章的手臂。摩西上校亲自接见了他们，巧施妙计将游行队伍打散。人们高兴而归，但是上校也没给出任何承诺，以皆大欢喜收尾。

上校的手段让他赢得了购买利杰特继承人和公司其他股东股票的期权。这个期权和上校自己持有的大量股票，是左右并购事件走向的关键。他选择跟我们走。

尽管头一天报纸上都说杜克“托拉斯”的代表成功取得了公司的股票，而第二天，谈判局势出现变化，些许不明朗模糊了人们的判断，这样的说法也见诸报端，到了第三天，传言又说局势完全反转，威特莫上校已经把公司全卖给联合烟草了。

就这样，我们达成买价 600 万美元多一点的协议，所以我们拥有了一半以上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股本的期权。这里还有个插曲，文件起草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笔 20 万美元的法律费用该由谁来支付。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这样的确定权应该交给上帝，于是佩吉和斯通州长抛硬币以求结果。我们输了 20 万美元，赢得了圣路易斯烟民的友谊，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情了。

///

这时，杜克已新设了大陆烟草公司，作为自己的子公司，在场外交易所（Curb Exchange）^①交易公司的股票。这时杜克又出招了。很明显，杜克和莱恩一群人间商战已经升级，波及更大的范围了。

莱恩也不甘示弱，他想通过操盘来攻击大陆烟草的股票，好叫杜克知道联合公司的厉害，炫耀自己的财力和强势，扰乱杜克脚步。我则被选为这次操盘的负责人，只听命于莱恩，全权操控这里所有事务，完成所有过程。和圣路易斯的行动不同，这次，我是唯一的主导人，而不是主导人之一。可

^① 场外交易所：1921 年之前的场外交易所是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的前身，后者现在是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见莱恩对我的信赖。

大陆烟草公司的股票，在场外交易所交易。那时候，无论晴雨冷暖、暴风雨雪，抑或是热浪熏蒸，所有场外交易经纪人都汇集在露天进行交易，没有例外。因为场外交易所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面的露天大街上。他们怎么了解情况呢？通过各种信号，他们通过各公司办公窗口附近的该公司职员的信息接收买卖证券的保单，同时发信号反馈单子成交情况回返给这些职员。

说回来，每天我都会在去市中心的途中去西七十二大街莱恩家逗留一会，他家离我家不远，就隔着几条街。一般我去的时候会被引入卧室，有时他起得早点，我到的时候已经开始刮胡子了。多数时候，我去了，他还在睡觉。

莱恩和他的妻子当年在我看来恩爱有加。莱恩一个主外，一门心思地投入生意中，挣钱养家；一个主内，心无旁骛地关照家庭，将柴米油盐管理得井井有条，对那几个成长中的孩子更是无微不至。他们的孩子都是男孩，年纪不大，精力充沛。我去他家的时候，他们总在屋子里到处乱跑，大笑着嬉戏打闹，非常闹腾。莱恩的妻子很再想要一个小女儿，但并没有实践，只好把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友人们的女儿身上。有一年冬天，她就送了我的宝贝女儿贝尔一件亲手织的羊毛夹克，非常精致小巧。

当时，我距离一流的场上交易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我从未成为过一流的场上交易员。我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缺乏某种必要的天赋，反而很庆幸很早就发现了这点。我在场外交易所进行的第一次大单操作，就是在大陆烟草股票上的交易了，从此之后，我做的操作寥寥无几。这是正确的决定，我不想成为为了省下几美元交易佣金做自己的经纪人，但却造成上万美元损失的那种人。

1899年年初，我正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还特地雇请了两名经纪人。莱恩先生给了我20万美元的亏损额度，因此我并不是很紧张。

大陆烟草原本的交易价是45美元，六周后，在我的操盘下，这只股票被打压到30美元。当时，一场烟草大战一触即发，所有人都担心大陆烟草会因此受到致命打击，不然也不至于跌落到这么低的价格。

大部分从事卖空投机的经纪人，都会选择在股票价格下跌时卖空，将股

价压得更低。但我的做法却有所不同，我在股票显露疲态的时候买进它，等它回升的时候再卖出去。不得不说，这种操盘方式非常讨巧，我一边压低价格，一边还可以赚取利润。

我一天比一天熟悉具体流程，效果也日渐鲜明。这时候，莱恩先生却突然造访。他疾言厉色地警告我：“我记得，我最初是让你惹恼他们，不是让你毁掉他们。”他让我停手，又问我赔了多少钱才得到这样的结果。我自豪地汇报给他，一分也没有亏损，反而还盈利了。莱恩先生离开的时候表情依然很严肃，但我能感觉到，其实他在偷着乐。

我照着他的吩咐停了手，华尔街上就开始传出杜克与莱恩“军团”之间已经和解的传言。

莱恩在打击大陆烟草公司股票的过程中，展示了可以撼动杜克烟草托拉斯的力量。

1899年3月1日，美洲烟草公司召开董事会，宣布正式同意收购联合烟草。联合烟草旗下有布莱克威尔的达勒姆公牛品牌、全美卷烟公司，以及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莱恩、怀登纳尔和布拉迪被选为美洲烟草公司的董事。整个交易堪称一石二鸟，莱恩和以他为首的一群人打破边界，闯进了社会组织的核心。同时，美洲烟草公司对市场的垄断也更加密不透风，赚到了更加丰厚的利润。

巴特勒兄弟二人一开始创建联合烟草公司，是为了建立一个让杜克托拉斯自惭形秽的托拉斯企业，但是莱恩的想法与他们恰恰相反，他用另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思路解决了问题。虽然事后他受到指责，说从头到尾都与杜克暗中勾结好了，联手组织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就我知道的部分推测，这种指控是莫须有的罪名。

在众人预料之中的是，争夺烟草市场份额的战争落幕之后，美洲烟草及其各个子公司的股票价格就青云直上。先前杜克和莱恩在斗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果然只是暂时的损失，现在一下子全都被弥补了。

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没过多久，政府就强行责令解散烟草托拉斯。当时我听说杜克正在动用一切关系试图挽救托拉斯企业，然而最终也没能成

功。一年之后，我有幸又碰上杜克，他有些好笑地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为了阻止政府解散烟草托拉斯，我到底费了多大力气。我当时甚至还想过把它们重组起来，哪怕得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我也没想到，托拉斯解散之后，我们互相竞争，赚的钱居然更多了。”

垄断经营总是看似光鲜雄伟，以至于那些实施垄断经营的人都无法看清它的劣势。

///

参与烟草大战，使莱恩变成了我的亲密伙伴——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事业上的。我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 1928 年他去世为止。莱尔有些反复无常，他的性格藏得很深，让人难以看穿。就连对同一些人，他也表现得变化多端——时而慷慨无私，时而又薄情寡义。

在工作上，我总是坚守原则，拒绝听凭他或者任何其他人把对规则的理解当成游戏，我的看法与立场才是最重要的。除非要进行某个特定交易，我一般不情愿和他绑在一起，有好几次他都因为我的固执大发雷霆。

在交往初期，这种保持自我独立的态度让我们的关系一度摇摇欲坠。因为利益冲突，莱恩和威廉·惠特尼在当时千方百计想让詹姆斯·基恩遭受牢狱之灾。他们私底下搜罗了一些他的罪名，夸大其词，控告他挖墙脚，损害他们持股的一家银行的利益。为了取信于人，他们请我出庭做证，被我坚决地拒绝了。

过去的经济斗争几乎都是你死我活的决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非常残忍，敌我双方也没有人会心慈手软、半途收手，或是乞求怜悯。

我本来以为我的拒绝会让自己与莱恩的关系出现裂痕，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我比以前更加信任了。莱恩和基恩都很信赖我，即使他们双方交恶，也相信我不会倾向于另外一方，这难免使我有些骄傲。

我们相识不算太久的時候，莱恩先生有次邀请我到新成立的莫顿托拉斯公司（Morton Trust Company）。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的位置，我们到里面坐下。出于好奇，我问他对于因为都市街区铁路公司的事情受到攻击作何感想——一定程度上，这也算咎由自取。莱恩先生沉思了一会儿，用他一贯

的淡然、缓慢、深沉的嗓音回答道：“哦，所以你现在并没看到有砖头扔进那个窗子吗？”

然后他起身走到一个大保险柜旁，拍了拍它的外壳，说：“里面有挺多东西的，你能都拿下去卖了吗？”

里面装着的是佐治亚太平洋铁路公司第一、二、三期债券。它们像是一堆一堆的废纸，就那么随意地扔在柜子里，唯一的命运像是被扔掉。在我的回忆里，它们当时的均价大概是 9 美元。

于是，我上街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过来，车夫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债券全都搬到了上面。马车的整个底部都被淹没了，我甚至都没有地方摆放我的双脚。我坐车直奔经纪行，然后开始研究佐治亚州的那条铁路，想找出什么理由让人对这些债券产生兴趣。

这些债券的市场交易价在某一天达到了 30 美元。这大概达到了莱恩先生的心理价位，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把这些债券处理掉。我告诉他，我正是在按照他的指示行事，我看好行情，觉得债券价格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继续走高，那时候再卖，他将获得更多的利润。但他心急，老是催促我趁早脱手，最后的成交价是 50 美元左右。最后这几只债券的价格真的一路上升，如果再等一会儿，甚至可以平价^①卖出。

在利杰特迈尔斯交易后不久，莱恩先生又吩咐我购买诺福克－韦斯特公司（Norfolk & Western）的控股权。我一次性购买了大批股票，而且没有把价格抬高多少，虽然买入量尚不足以达到控股。

另一次，莱恩先生又嘱托我收购沃巴什（Wabash）铁路的控股权，只不过当时我已经今非昔比，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大交易员了。执行别人的交易指令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购入。有趣的是，正是那些给我买入指令的人在放出烟幕弹，到处打听消息：“不知道巴鲁克都在给谁吃进那只股票？”大家都被混淆了视听，背后的买家彻底成了谜题。

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买入沃巴什控股权的交易，某个方面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经纪人之间到底是怎么合作的。那天我走向沃巴什股票的交易席位时，

① 一份公司债券的平价即面值一般为 100 美元。

戴弗·巴尼斯（Dave Barnes）就坐在那儿。他是我的昔日好友，我们在朗布兰奇认识的。他热爱游泳，总是和一群朋友游到海里，每次脖子上还会挂着一个小小的威士忌扁酒瓶，觉得冷了就打开瓶盖啜一口。

我很高兴能碰到他。巧的是，戴弗这一天正出价卖出沃巴什股票，普通股每股售价三四美元，优先股则 17 美元左右。但我是不会从他手上买股票的，出于我对他的了解，我只要这么提了，他转身就会开始购入沃巴什股票，然后抬高价钱卖给我。

我走过去坐到他身边，开始诚恳地规劝他：“戴弗，我认真跟你说，这只股票你还是别卖了，今天就卖到这里吧，离开对你比较好。”

“好吧，巴里。”他耸耸肩，然后起身离开了。巴尼斯总是叫我巴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真的就这么走了，再也没过来干扰我，好让我可以继续购入沃巴什的股票，无论是普通股还是优先股。这就是那个时代经纪人的相处模式。当然，前提是他们互相认识而且互相信赖。我为什么要去设法与他斗智斗勇，显得自己智慧过人？跟客户的几百万收入或损失相比，我的聪明才智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我就直接请他收手离开，好完成自己的任务。他确实照我的话去做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这样要求我，我也会听从的。

利杰特迈尔斯那笔交易让我给公司赚了 15 万美元佣金，当年公司利润总额也就 50.1 万美元，这笔佣金占了不小的比例。说实话，这笔钱算不上多，但对当时仍然年轻的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笔非常难得的盈利。总利润的 1/3 都分给了我，我在公司占的股份也由阿瑟·豪斯曼先生从 1/8 提高了许多。接下来，公司的办公场所也搬到了百老汇大街的几个大办公室里，我们的业绩越来越好，必然慢慢成为金融区内一家大型证券经纪公司。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10章

犯下的一个错误

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第一个席位时，花了 19 000 美元。之后的两年里，公司业绩蒸蒸日上，我拿到了一笔可观的分红。权衡之后，我又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了一个席位，之前的那个送给了哈迪。新的席位花了我 39 000 美元，代价显然大了许多，价格比上次两倍还要多，可是我并不在乎这些。

我不断地四处寻找其他新的金融冒险机会，并且深明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之理。我对投机一直充满了自信。每当在交易所会员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姓名，我就像喝了一杯醇厚美妙的烈性甜酒，精神振奋，无比满足。但接下来的惨痛教训给了迷醉中的我当头一棒——使我终于明白，赚到钱是一回事，留住钱又是另一回事。在资本市场上赌红了眼的人，想要留住赚到的钱实属不易。

我承认我犯了股票市场上最为致命的错误，即使是最业余的人犯了这种错，也没什么值得原谅的地方。一个所谓的“内部消息”告诉我说，美国烈酒酿造公司前程大好，值得买入。况且这消息来自一个与托马斯·莱恩先生关系密切的人，他说即使是莱恩先生本人也相当认同这一点。而我向来对他十分信赖，便把这只股票买了下来。

在我兴致勃勃地买进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时，这家公司还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烈性酒制造商和销售商。以前的烧酒养牛^①联合公司，即“威士忌托拉斯”在 1893 年的金融恐慌中毁于一旦，但托拉斯将美国酿酒公司遗留

^① 烧酒养牛：酿酒的下脚料酒糟可用来养牛。

了下来，就像醉汉在彻夜狂欢之后衣衫不整地醒来。我听说他们正在筹划，将美国烈酒酿造公司与其他三家大型烈性酒企业合并，这一举措必然将美国的威士忌业务几乎一网打尽，在利益的诱惑和对消息来源的信任之下，我几乎毫不怀疑地将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次让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是怪我不够谨慎。合并的消息公之于众之后，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却与我预期的正相反，忽然一改往日的暴涨，一下子就变得无人问津起来。在此过程中，保证金不足，我却没有一分钱的现金储备，无奈中只好卖掉了持有的其他股票。

我此前一直志得意满，为了利杰特米尔斯那桩非常成功的交易，也因为我的前途持续平步青云。谁能料到在不到几个星期后，我又从云端跌落，到了“刮桶底找酒喝”^①的地步。

我一心想给妻子幸福美满的生活，之前为她买了一辆漆黑的豪华折篷马车，车上有几盏吊灯，用厚玻璃制成，晶莹剔透，华美非凡。我甚至雇了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仆专门照顾她乘车出行，让她可以体面地生活，受人尊敬。而现在，我一下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失利。虽然我羞愧难当，却只能鼓起勇气告诉妻子，她可能短时间里都没办法“在戏院包厢里包下那两个座位”了，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奢侈梦想也都暂且付诸东流。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哪怕是相对于我全部的财力而言。

我非常失意懊丧，见到莱恩先生时，老实实在地说了自己落魄的缘由。

他问我：“我有没有授意过你去买那只威士忌？”

“没有。”我回答。我只是从一个和他关系密切并且喜欢我的人口中听说这只股票非常好，但却并没有亲口问他关于这只股票的事。

莱恩听了我的讲述，依然很平静：“关于我向其他任何人讲了什么话之类的说辞，千万不要理会。”他说，“只有你有权利在问我问题时知道清晰的答案。”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的挫败让我学会了一点，那就是人们不

① 刮桶底找酒喝：代指手上资金亏得所剩无几。

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语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表达某些意思，甚至有时候只是蓄意想把小米诺鱼^①引进网中，好来喂大鱼。而在这次失误中，我也无意间穿过了渔网，被渔船捞起来，成了这些无助的小米诺鱼中的一分子。

华尔街总有形形色色的小道消息和所谓的“内部”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空穴来风越来越不信任。

内幕信息有时很可能是个定时炸弹，时间一长，甚至连英格兰银行或者美国财政部也可能被它们蒙蔽而犯错。

关于内幕信息，一方面会有居心叵测之人用它来误导轻易相信它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内部的人真的了解公司的运作，他们也可能因为对内情过于自信而疏忽大意，犯下想当然的错误。

人们都有这样的共性：对于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总是极其重视，即使这件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当一个人没有特别的信息来源，会热衷于研究某个形势下的经济事实，并且冷静地以此为据付诸行动。若是让这样的人得到了内幕信息，他就会因为自命不凡而对最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这时候的内幕信息就会让人麻痹大意，让人冲昏了头脑，无法利用理性来思考问题。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内部人员，他们总是拼命护住手中的股票不放，即使其他人都认为应该卖出去，这些股票毫无前途，他们依然无动于衷。

有一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投异常活跃。著名的库恩－洛布银行的奥托·卡恩（Otto Kahn）一向热衷于讲解市场上的情况。当他打算开始告诉我一些什么，不管是他真的相信的有理有据的事实，还是些经验之下的判断分离，我都打断了他：“我不想受你说的话的影响，我想保持自己纯粹的判断，所以就别跟我说联太现在怎么样了，我会自己找寻线索的。”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长期以来，人们依靠自己对经济事实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判断的做法显然更为可取，而流言就像风。

詹姆斯·基恩告诉我，一些与美国烈酒酿造公司有关联的人在商业上已经不择手段了，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不可能更糟糕了。这家公司一路

① 小米诺鱼：米诺鱼是多种小型淡水鱼类的总称，喜群游，可做鱼食和活饵。

走来，遍历血雨腥风，有人一夕发了财，但更多人的财富也随之化为乌有。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上几乎尸横遍野。我并非想用基恩的真知灼见为自己的失利寻找借口或解释，我只是想表达，在你的错误当中，其他人都是没有责任的，你永远只能责怪自己的判断。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的调查流于表面，被一些浮光掠影的蜃景所吸引，之后我又根据未经核实的“内部消息”采取了致命的错误行动。每一步我都违背了一个合理明智的投机者应该遵循的行事准则，因此到头来只能怪自己像前人和源源不绝的后来者一样，无非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

经历了这次的惨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又找回了勇气，幸运的是这勇气来得也非常及时。在我四处寻找能令我摆脱困境的良机时，我注意到前州长罗斯维尔·弗劳尔（Roswell P. Flower）在从事的一些事业。

弗劳尔早年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自幼丧父，家中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他一生都为养活自己和家人不断奔波劳碌，很少有能够消停的时候。困苦的人生经历历练了他，使他变得像钢铁一样顽强、值得信赖，也让他拥有了很高威望，以及国会议员和纽约州州长的崇高地位。亨利·卢克斯^①（Henry Clews）也认识他，这位金融家善于识人，他一看到弗劳尔，就觉得他像一个知书达理、身着节日盛装的农场主。

弗劳尔州长声望很高，据说他有神奇的魔力，能够让公告板上任何一只股票涨起来，只要他在“街上”反复对朋友们说某只股票不久必然溢价，很快就会奏效。弗劳尔先生也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即便是破败不堪的公司，在他引进优质的行政管理方法后，盈利总能得到提升。在芝加哥煤气公司和芝加哥洛克岛太平洋公司的时候，他都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突出的经营才干。

弗劳尔州长刚在布鲁克林捷运（BRT）公司上任的时候，该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 20 美元。我开始关注弗劳尔州长时，他已经接手了

^① 亨利·卢克斯（1836—1923），美国金融家，著有《华尔街 50 年》。

管理不善、经营不当的 BRT 公司。上任后的他向众人宣告，在胜任其责的管理层领导下，公司有能力实现盈利，提高后的盈利可以让股价名正言顺地达到 75 美元。这也无形之中让公司职员有了信心。他拨乱反正，针对公司的问题进行有力的整顿，终于使得公司营业收入上升，股价也随之提高。

在弗劳尔州长的领导下，BRT 公司的股票在 1899 年春季成为股市上的一只领涨股。看到它蒸蒸日上，我也买了几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怀疑却越来越深。直觉告诉我这只股票肯定有什么问题，因为公司的财务报表没有之前那么清晰明了了，内行人一看就会觉得隐藏了什么事情。

在股价 20 美元时，弗劳尔州长踌躇满志地宣称会涨到 75 美元；待股价涨到 50 美元时，他又预测会涨到 125 美元。弗劳尔州长直到现在所做的每一次预测都一定会实现，没有一次落空。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当头一棒，4 月，股价上升至 137 美元，随后突然开始不断萎靡。这时市场上渐渐有了一些和我相同的看法，都认为这只股票飙升太快，涨幅太大，任何合理稳健的盈利预测都难以支撑。

1899 年 5 月 12 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吃完早餐，读到《晨报》上的一份声明，里面写道，BRT 公司的盈利毫无疑问是稳步增长的，公司前景一片光明，署名正是：弗劳尔州长。

这份声明让市场大振，BRT 公司的股价又有短暂的回暖。然而，不过当天下午，证券市场就风云突变，不知何处来的利空消息突然传至证券交易所，导致这只股票大跳水。有消息称弗劳尔州长突然患病，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天傍晚，交易所收盘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安抚股民，称州长只是突发消化不良症，并用了大字标题“前州长弗劳尔安然无恙”吸引众人眼球。然而弗劳尔先生却没能真的像上面所写的那样恢复健康，待报纸发售到街上时，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整个人都昏迷不醒。

后来我才了解到了事发原因。弗劳尔州长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长岛一家乡村俱乐部，他原本的计划是在和煦怡人的春风中钓一天的鱼。那天州长的心情十分不错，收竿后，他像往常一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问题在于他在饭后竟然又喝下了一壶冰水。也许是冰水让他的食物堵住了咽喉，也许是他

经年累月的旧疾被这阵冰凉激发，总之，不当的饮食让他陷入一阵急病。在挣扎许久之后，他终于支撑不住，晚上十点左右，死神悄然前来，带走了他。

恐慌随即蔓延开来。幸好，有 J·P·摩根、范德比尔特家族、达里尔斯·米尔斯（Darius Mills）、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亨利·罗杰斯（Henry H. Rogers）以及詹姆斯·基恩等人联合参与护盘，缓冲这一消息对股市带来的冲击，否则它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毕竟，经济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有传言称，有些市场上的大腕儿在股价跌至 100 美元后维护股价，股票出现了反弹，慢慢地回升至 115 美元。他们害怕引起市场的恐慌，悄悄开始撤出 BRT 公司的股票。在其他股票上涨的时候，BRT 公司股票却逐渐滑向 100 美元。终于，股价在 9 月的某一天跌破 100 美元。为了让股价维持在 100 美元的位置，L·S·沃姆瑟尔公司一位合伙人的儿子艾里·沃姆瑟尔（Allie Wormser），想以 100 美元的价格买入两三千股。我几乎毫不犹豫就卖给了他。

可想而知，那些股票后来再也没有涨到这个价位。在年底的时候，BRT 公司的股票下跌到了 60 多美元。这次股票操作，我重新把握了机遇，赚了约 60 000 美元。我终于从上一次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重拾了一个华尔街人士该有的信心。

///

然而，事事总有起伏跌宕。重新找回自信不久之后，我又遇到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我开始看重联合铜业公司，并在 1901 年春天（我 31 岁之时）和发起人准备联手抬高公司股价。这家公司在 1899 年成立，作为一家联合企业，它致力于实现铜业垄断，如同洛克菲勒运用美孚石油控制炼油业一样。托马斯·罗森（Thomas Lawson）1905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疯狂金融》（*Frenzied Finance*）的书中讲述了这次联手操作的全班人马是如何奇怪地聚拢到一起的。

一开始，马科斯·戴里（Marcus Daly）手中的森蚺铜矿（Anaconda Copper）及其他公司被联合铜业的发起人收购，总收购价为 3 900 万美元。

根据罗森书中的描述，为了得到这笔钱，戴里和他的一些朋友收到一张由国民城市银行^①签发的全额支票。银行与他们私下约定，今后可以据此提出现金。

这张支票很快就能够兑换成现金。联合铜业以 7 500 万美元的核定股本开始了股票认购。几个人有着明确的分工，罗森负责吸引公众的认购兴趣，亨利·罗杰斯、威廉·洛克菲勒和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这三位美国金融界的耀眼人物被宣传为铜业公司的保荐人。结果，公司的发行价为每股 100 美元，却还得到了超额认购。

戴里先生将支票兑换了现金，且余下的 3 600 万美元被打到了联合铜业公司的账户上，公司的发起人巧妙地没让自己冒一点风险。

这些细节在 1901 年春季无人知晓，然而此时的联合铜业公司发起人已经开始着手控制世界铜的供应量。到了 6 月，股价已经从发行价抬高到了 130 美元。人们纷纷预测着股价会涨到何种程度，一时间华尔街风声四起。

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赫尔曼·西尔肯（Herman Sielcken）先生。他是一位颇具盛名的咖啡商，在商业事务中，人们都十分重视他的惊人判断力。我遇到他时他刚过中年，眼神犀利，身高超过 6 英尺的他健康强壮、精力旺盛，有着非凡的魄力。他的咖啡生意非常成功，但为了检验自己的判断力，喜欢在股市上进行相对小规模的投资操作。

这天下午，我在他居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他促膝长谈。他认为，当下铜价普遍较高，在全世界范围内限制了铜的使用，因此市场上的铜正在过剩。美国的铜出口量在下降。人们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未遂的法国铜价操纵事件，并为此感到担忧。他不知不觉间就对铜业形势进行了细致清晰的阐述，并预测说，联合铜业公司试图大幅度提高铜价，这一举措最终会重蹈覆辙，归于失败。

与西尔肯先生谈话后，我认真思考，并亲自做了一番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7—8 月间，联合铜业的股价下跌。后来，1901 年 9 月 6 日发生的威廉·麦金利总统在水牛城遇刺事件又让全国发生了恐慌，幸好有 J·P·摩根的威望和能力，才将股民安抚下来，股价暴跌后重新反弹。

① 国民城市银行：国民城市银行是花旗银行的前身之一。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做出了卖空联合铜业股票的决定。

我认为，不管为了让这只股票价格上涨，发起人会做多少事，但依据我的判断，这只股票还是要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坚定不移地卖空了该股票，否则我将会损失惨重。

听说我卖空了联合铜业的股票，托马斯·莱恩便来找我。他说：“伯尼，听说你在卖空联合铜业。那些大腕儿会让你好看的，你要知道。”

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除了莱恩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和联合铜业的大腕儿一同拉升股价的，还有詹姆斯·基恩。在重新考量后，我依然坚信，联合铜业发起人的做法违背了供求法则。铜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其需求量，它的股价必定下跌。这是纽科姆教授在市立学院对我的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卖空股票。

J·P·摩根安抚民心、让股价反弹后不久，联合铜业的股价还是掉回了106美元左右。此时，我赚到了钱。很快，它又涨了回去。

后来，又有一个消息对市场产生了打击。先前有可靠消息称，麦金利总统遇刺后已经恢复了健康，然而在9月14日，总统却与世长辞。此时华尔街有个传言，联合铜业的一些内部人员正设法卖出股票。得知这一消息，我又小心谨慎地增加了一些空头仓位。

我的卖空让操纵联合铜业的重要内部人员气得咬牙切齿，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有人提醒我，如果我继续卖空他们的股票，只会得罪那些大腕，引来他们的联合对抗。我自恃年轻，对这样的威胁狂傲不惧，引用鲍勃·菲茨西蒙斯的话说：“他们体重越大，摔得越重。”还有人告诉我，联合铜业是一家有益于社会的企业，做空他们的股票会让他们崩溃垮掉，这无疑是伤天害理。

这样的妄言对我不会有什么作用。我知道，联合铜业的股价能够涨到这么高，又忽然跌得如此惨重，一是他们过度募集资本，二是操纵股票吹胀股价。正是因为经济引力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寻找它的平衡点，才让联合股票下跌。

但是，经营者总是幻想建设商业帝国，他们为了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动机不纯。然而，联合铜业的合伙

人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用合理的经济因素给出恰当解释，人为地抬高股价是不明智的，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所以我用自己的钱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至于外界对我的质疑和攻击，我坚持己见，并且保持沉默。输赢是我自己的事，而我究竟是对是错，到最后自然会给出最准确的鉴定。

我在华尔街的一贯策略是保持沉默，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独自进行投机交易，也不希望有其他人听从我。但现在我发现，这样的态度可能是错的。也许，我应该用那些想要对付我的人使用的武器来与他们较量，揭露他们犯下的愚蠢错误，甚至以牙还牙，进行同样的人身攻击。

联合铜业即将召开董事会议，备受瞩目。人们都猜测着，他们是否会继续发放 8% 的股利，还是削减股利，或者不做任何决定。

这个星期注定让人心绪不宁。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发放 8% 的股利，那么像我这样购买空头股票的人可能会遭受重创。到了 9 月 19 日，星期四，证券市场因麦金利总统的葬礼而休市。纽约的财经记者们一致认为，股利会持续稳定。

190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董事会议终于召开。股市收盘后，联合铜业的股利从 8 美元降至 6 美元的消息迅速传开。在星期六的短暂交易时段中，联合铜业又下跌了 7 个点^①，收盘价险些低于 100 美元。我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整个操作的紧要关头即将到来，就在下周一。箭已在弦，一触即发。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赚到了一大笔钱。母亲忽然打电话来问我：“儿子，你知道赎罪日就要到了吗？”我知道赎罪日是星期一。也就是说，它赶上了下一个交易日。

得知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一大截。赎罪日是犹太教圣日中最为神圣的日子，虔诚的母亲一直期盼着我过这个节。如此，我便不得不杜绝所有俗事。

我让我的经纪人艾迪·诺顿 (Eddie Norton) 继续操作。随后，为了止损，我又告诉另一个经纪人哈里·康登特 (Harry Content)，一旦联合铜业的股票涨到某个价位，就开始买入。我担心那些利益相关者会从中做出一些应

^① 点：在英文中，说股票涨跌几个点是指涨跌几美元。

变，推翻我认为的股票下跌的想法，所以用尽办法布置妥当，自我保护，以防不测。如此，我才可以安心地和母亲过赎罪日。

我告诉他们，无论星期一有什么交易上的事，无论事情是否严重，都不用找我。即使如此，星期一还是有人心急火燎地找我。此时，我还在新泽西州南埃尔北仑的房子里。朗布兰奇的那些经纪人在纽约找我找得焦头烂额，但我不就是不愿意知道任何消息。下午，我和妻子到约 1 英里外的母亲家看望她，电话也仍然不依不饶地跟到了那儿。

夕阳西下，圣日过完，我才终于有闲心从人们那里了解情况。原来联合铜业以 100 美元开盘，开盘后一小时内股价下跌了 2 个点。后来股价反弹，直到正午还维持在 97 美元之上，之后股价再次下跌。如果我当时在交易大厅，很可能采取清仓的行动，那么我就得不到现在的收益。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这只股票在下午持续下滑，最后于 93.75 美元收盘。这让我大赚了一笔，并且有了充足的应付反弹的保证金。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从此，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联合铜业股票注定会跌得更加厉害。于是，我根据自己的想法放手大胆地操作。12 月，股价跌至 60 美元，我赚了个痛快。

我记得，在这次操作中，我赚了 70 万美元左右。至于在哪个价位平掉仓位结束交易，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这是我那些年挣得最多的一次。一方面，我同意母亲的要求，恪守习俗，和她过了一个宗教圣日；另一方面，联合铜业的那些大腕儿们的的确确犯了经济上供求法则的错误。这两点促使我成功地赚了这么多。

我在威士忌托拉斯股票上损失惨重，又在联合铜业股票上大获成功，这两件事都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认识：小道消息、内部消息或者他人思考的结果都不是真正的事实，在决定时不要被这些所左右。在股市上，一个人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和客观，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那样，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一旦事实得到确认，就要保持自信，即便发生再多的事情都不要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对抗那些所谓的了解内情之人的意愿。

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政府交付给我任务后，我会先毫不动摇

地寻求任务所面临的形势的所有事实，查明真相后再开始行动，一旦行动便不会受他人意见的左右。威尔逊总统开始称呼我为“事实博士”。我习惯了遵从事实胜于雄辩，当事实众人面前显而易见的时候，政务建议便自然而然地得到支持。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在“一战”期间及之后，我用这样的方式与通货膨胀做了不懈斗争，一开始朋友们总是过来向我抱怨：“伯尼，你应该明白你的提议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为什么你就不能现实一点？”

但即便是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针对事实摆出措施，这样就足够了。没有人能让二加二等于任何其他的结果，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不管别人如何质疑我，或者现实如何坚不可摧，我也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我认定了某个事实，并思考出了我认为的解决措施，就不会轻易地被别人撼动。于我而言，这样虽然辛苦一些，但是足够了。毕竟二加二，永远只等于四。

第11章

当恐慌降临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尔街内有一些金融巨头，他们对经济发展处于支配的地位。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当代社会就没有再出现过那种跟他们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美国人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个新的软弱物种了？

当然，部分的原因是，如今的股票市场跟当初摩根、洛克菲勒、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等巨头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一样。1929年的很多习惯性的做法，要是放在当下，根据法律法规，肯定都是违法违规行为。有些交易搁在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比如，在托马斯·莱恩跟詹姆斯·杜克的烟草战争中，我为莱恩操作的那些交易，还有在联合铜业股票我故意做空的交易，如今若要再现，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现在的税收制度下，不管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要落入政府的口袋里。

华尔街之所以失去了我年轻时代的那种鲜明的金融冒险活动的特征——命运、掌控、浮沉，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拓展，包括市场活动涉及的经济利益的范围和领域多方面的拓展，这种拓展令人称奇。

这样的变化如果反向来观察的话，有一个令人感到极妙的转变。美国从当初一个不断开疆拓土，把注意力都放在思考如何征服广袤的北美大陆的民族，转变成了一种维护整个西方文明保持稳定的第一力量。

说得简单些，你可以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我

们从一个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时代，变为承担起全球重要责任的时代。我想在这本书的后面再来探讨这种转变的意义，原因是这种转变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演变历程中相当重要，占据很大分量。而且，我们理解未来时，这种转变也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开未来之锁。

从我的职业生涯来看，我既从事过金融交易，也从事过政治。这并不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先见之明的异禀，主要原因还是我不由自主地被推进将要产生巨变的时代大环境里，不自知地为这种巨大转变贡献出了一份力量。在我进入商业和金融业的时间段里，我正好碰上那些金融大亨处在可以使天地变色的巅峰位置，并目睹了这一切。他们可以呼风唤雨，成为个人主义时代里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其实也在这里面苦苦地拼搏挣扎，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在这样的金融氛围中，我突然被推向了另外一种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被任命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这也意味着美国在承担全球责任时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需要我来面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其他人都想要努力回归到战争以前的“正常状态”，但是我却连续在几个不同的职位中跟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继续纠缠不清，从在巴黎和会中担任伍德鲁·威尔逊的顾问，一直到代表美国出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我一直都在绞尽脑汁地处理各种问题。

在实际中，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发现我自己一直都努力地把早年间从金融投资交易中和在商业上学到的一切东西和一个在不断收缩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新需求放在一起调和。

就算不直接说出五十年前的华尔街易于受到少数人控制的这个事实，换种方式也能说容易受到他们这些人的影响。今天的华尔街跟那时的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所以现在的人大概是很难认识到那种控制或者影响能够带来的后果。在那个时代里，光芒万丈的人多半都会是金融家，这群金融家当时正在进行的活动都会在所有的报纸和星期日的特刊里被大量报道，占据大幅版面，在普通民众中制造出了神秘感，从而唤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所谓的这群人就是指以摩根、哈里曼、莱恩、洛克菲勒等为首的“大鳄”。

那时候的股票市场似乎是可以被某个做事既果敢也没有畏惧心的人物控

制的，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丹·雷德（Dan Reid）的，也正好可以作为
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对这一点进行说明。他的身份不光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
偶尔还在股市中扮演着“超级大熊”。

雷德在一次股市的深幅下挫时期袭击了多只股票，他收手时，股票市场
一副看起来已经被他全部控制的样子。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做到像这样袭击
市场，实际上还是因为他能在恰当的时机善于利用某个动荡的市场形势，这
种动荡的市场形势恰好给雷德这样浑身是胆的人的袭击提供了有利条件，不
过根据市场自我调整的规律，这种有利条件也只能存在很短暂的时间。雷德
深谙此道，怕是没什么人能比得过他。但是，即使是最强有力的银行家也还
是会惧怕着雷德可能进行的动作。

碰巧，雷德很喜欢亨利·戴维森（Henry P.Davison），他总是喜欢亲
切地叫他哈里^①，而戴维森当时还是J·P·摩根最重要的初级合伙人。有一天，
雷德给戴维森打电话，他说：“哈里，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

戴维森不知道敢于冒险、不循常规的雷德要做什么，便据实回答。

“你想知道我准备干什么吗？”雷德吊起了戴维森的胃口。

“想知道。”戴维森十分急切地回答。

“你真的想知道吗？”

“真的想知道。”戴维森一边嘴上说着，一边心里想着：这个雷德，说
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都是存在可能性的。

“那就告诉你吧，”雷德说，“我不打算接着再干这份该死的差事了。”

当雷德真的放弃不插手以后，股市几乎是瞬时就恢复了常态。当然，如
今没有谁可以操纵市场，哪怕仅仅是操纵几天也是异想天开，某个人打个电
话就能让市场从动荡变为稳定，更是天方夜谭了。

在以前的股票市场里，市场参与者都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许，更能
够展现出这种内幕情况的是人们在老华尔道夫酒店里的所见所闻。之前，酒
店位于现在的帝国大厦的位置。在那个时代，当在证券交易所里响起收市的
铃声之后，多数的交易员就会在华尔道夫聚集。如果你属于“华尔道夫里的

^① 哈里是对亨利·戴维森的昵称。

那群人”的话，也就代表着你已经获得了成功。我凭借着在收购杰特·米尔斯烟草公司的过程中所建立起的巨大声誉，在这个圈子里获得了接纳。

你若是在华尔道夫花上一两个下午的时间，就可能会和许多知名人物近距离接触，他们很可能是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马克·吐温、莉莲·鲁塞尔（Lillian Russell）、“绅士吉姆”科贝特（Gentleman Jim Corbett）、海军上将杜威、马克·汉纳（Mark Hanna）、昌希·戴普（Chauncey Depew）、“钻石吉姆”布拉迪（Diamond Jim Brady）、艾德文·霍利（Edwin Hawley）；也很有可能是无数的银行和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之类的人物。和查理·施瓦布（Charley Schwab）与詹姆斯·基恩一样，艾尔伯特·盖瑞（Elbert Gary），也就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老大，他也在华尔道夫住着。我亲眼看到约翰·盖茨（John W. Gates）^①在玩百家乐时下了100万美元的注，就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一次私人晚宴上。

你几乎能在华尔道夫里看到华尔街每个重要人物的身影。华尔道夫也是研究人性最好不过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得到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有一次，我利用这个事实对人类的心理进行了一次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一家公司仅仅出示了一张银行的保付支票^②就轻松地得到了融资。这件事我会在后面再进行叙述。在华尔道夫酒店中有着形形色色的“房间”——比如就有帝国间、空缺巷，也会有台球室、男人咖啡屋，在咖啡屋里摆设有著名的桃花心木质吧台，四个面都可以走人。这么多的房间就像是美术馆里的众多展览室。不同的是，这里挂着的不是精美的绘画，陈列其中展示着的是各不相同的人类性格。

你坐在这些房间里面，努力甄别赝品和正品。从那些正在坐着高谈阔论的人中间辨别出实干家，把装腔作势跟推心置腹进行区分。努力尝试做这种辨别，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痴迷的事情。在一个寻常日子的晚上，恐慌是如

① 约翰·盖茨，企业家，以好赌著称。

② 保付支票，一种支票形式，签发票的银行向收款人保证出票人账户中有足够资金可供划转或提现，并保证支票上出票人签字真实可信。

何突然袭击了整个华尔道夫，如何把华尔道夫由一个展示一切流行时尚的炫耀场所，变成惊惧的动物逃命藏身的洞穴。这件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也是我第一次切身实地地目击一场恐慌，虽然这场恐慌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而且它的影响力也远不如我后面经历过的其他金融恐慌，比如说1907年和1929年的股市崩盘事件。要知道，股市崩盘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打击。不过，在1901年5月8日突然来袭的这场恐慌貌似更加能够清楚地揭示人类的秉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这场恐慌来得过于迅速，消失得也过于迅速；又或者是因为在这场恐慌中事不关己，我的身份碰巧不过是一个看客，而非倒了大霉的受害者，所以我能够镇定沉着地目睹整个事件。

///

就像是以前多数金融恐慌发生的那个样子，人们对于时代脱离实际的奢望要求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种样子，已经过早地给这场恐慌搭建好了表演舞台。千奇百怪的原因造就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就像是涨潮时的潮水一样波涛汹涌。我们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激发了群众建设帝国主义的狂热梦想。这次向外侵略，也令人们对海外尚未踏足的新市场产生了足以致人头晕眼花的期待。在过去，大众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对于投身股市有着这么高的热情。

我想，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到股市投资中来也正是这个时候。在华尔道夫四周镶嵌着玻璃的套间内，她们一边手捧着茶杯品味香茗，一边摆出一副知道所有内情的样子，谈论着美国钢铁、联合太平洋或者联合铜业接下来的动作。不光是她们，杂役、服务生、理发师——每一个人——肯定都会有自己的“内幕消息”可以传递给其他人。既然股市整体的部分在上涨，那每个看涨的内部消息也就会变成事实，每一个提供内部消息的人也自然而然地似乎成了市场的先知。

有好几次这样的例子，看起来股市已经步入了正常的轨道，一个健康合理的市场正慢慢地显现在我们眼前，紧接着的话，就会有一只新的股票提前被推向股票市场，于是市场就会又像热气球升空一样出现一波飙升。市场创

下至此为止在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成交额是在 1901 年 4 月的最后一天里，那天的成交量可以达到 3 270 884 股；这也就表明了，在证券交易所内的 5 个小时的交易时间段中，价值 100 万美元的股票易手的事不算罕见，平均每分钟就能发生一次。单单是股票经纪行一天里收到的交易佣金就能达到 80 万美元的惊人数目。

股票在 5 月 3 日开始突然纷纷下跌，少的话就跌去 7 个点，多的话能跌去 10 个点，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这次下跌预示着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预期会降临的股市下调的时机来到了。但是，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也就是 5 月 6 日那天，进入股市的是一个奇怪的新因素——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中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上涨势头。

我在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想不起来还有哪一次能跟这只股票有着类似的开盘情况。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第一笔售出价格是 114 美元，比上一个星期六的收盘价跳空高开了 4 个点；第二笔的售出价格又跳到了 117 美元。在此后的全天交易过程中，这只股票断断续续地突然飙升，让华尔街－诺顿经纪公司（Street & Norton）的艾迪·诺顿先生出现了只要在市场上见到这只股票就会立刻买入的情况。

这只股票能够出现如此疯狂飙升行情的真实情况似乎谁也没弄明白，不仅是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董事解释不了，就连银行家也无法解释。而艾迪·诺顿这个时候为买进股票的事情正忙得不亦乐乎，于是对这件事也保持缄默。

但是我因为难得一遇的绝妙运气，于是就成为在全世界为数不多的知晓内情者。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星期一上午，我们就明白了北方太平洋公司令人困惑不解的大幅度上涨行情背后隐藏着的关键真相——这种市场表现并非只是简单的有人为了投机获利而在背后操纵着股价，而应该看作是分别以库恩－洛布和 J·P·摩根两大家银行为代表的爱德华·哈里曼和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之间，为了争夺这条铁路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一场在股票市场中的对决。

在这里我暂时对我是怎么有着这么好的运气，无意中得知这一信息的事情按下不表，我先简略地说说关于两大巨头之间展开控制权竞争的关键问题。

在爱德华·哈里曼刚来到华尔街的时候，他不过只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小

职员。多年以来，他的崛起一直是 J·P·摩根先生的眼中钉、肉中刺，让他如鲠在喉。在哈里曼往上爬的早期，就不止一次针锋相对了。他与摩根有两三次狭路相逢，最后彻底地击败了摩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恶劣，彼此的敌意也不断加深。摩根先生从未放松过对哈里曼的仇视态度，一直都习惯性地用“那个只拿 2 美元佣金的掮客”称呼哈里曼。

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时候，似乎已经成了全国最不可救药的铁路之一。在摩根拒绝对这家公司进行重组之后，哈里曼收购了这家公司的控股权，使得这条铁路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且让运输的里程大大增加。他不仅让这条铁路开始产生大量的盈利，还让大北方铁路（Great Northern）和北太平洋铁路对这条铁路产生了不可轻视的态度，被摆在了竞争对手的地位上，而大北方铁路和北太平洋铁路都是在希尔－摩根集团的控制之中的。

哈里曼接下来又以超级迅速敏捷的收购动作，悄悄地避开所有人的目光，收购了南方太平洋铁路。当对手如梦初醒的时候，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就这样，摩根口中的“那个只拿 2 美元佣金的掮客”摇身一变，加入了世界上最杰出的铁路大王的行列。

在这里顺便提一句，哈里曼曾经在我们的经纪公司做过一次大买卖，由阿瑟·豪斯曼经手那次交易，后来又由克莱伦斯·豪斯曼来进行处理。查尔斯·修斯（Charles Hughes）和威廉·赫敏特（William Hearst）都在 1906 年竞选纽约州州长一职，哈里曼让豪斯曼两兄弟下大注去赌修斯赢得本次竞选。当好几十万美元的钱押出去以后，豪斯曼兄弟就停止了下注。当哈里曼听到这件事时就给他们打去了电话。

“我不是让你们下注吗？”他质问道，“不要停，接着下注。”

后来的事是克莱伦斯·豪斯曼讲给我听的，他说在他获得批准进入哈里曼的办公室报告已经投注的金额时，他看到民主党委员会老板，也就是水牛城的康纳斯了。康纳斯在那里可能是来对如何解决水牛城码头运输的生意合同进行商谈，但是我们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那里时言语中都带有冷嘲热讽的态度，我们都认为这个家伙没安什么好心。

就连哈里曼收购南方太平洋的操作也是主要通过豪斯曼公司来进行的，由艾德文·霍利亲自对大部分交易进行指挥。但是我个人并没有参与这次交易的过程，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哈里曼其人。

有一天，我记得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看见一个小个子男人，腿有点弯，戴着一副大大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有些神经质。“那个想要吃进全部的联太优先股的小个子家伙是谁啊？”我转过身去问一个交易员。

交易员回答我，那个人就是爱德华·哈里曼，之后我再也没看到他在那里出现过，而且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他会亲自跑来交易大厅。

因为联合太平洋和南方太平洋都被哈里曼所控制，所以希尔－摩根利益集团就需要得到能够进入芝加哥的铁路线。他们便买下了伯灵顿铁路。恰好哈里曼也看中了这条铁路。哈里曼向摩根提出想要收购伯灵顿铁路 1/3 股份的意愿，但是摩根拒绝了他。哈里曼对摩根的拒绝也做出了回应，他立刻采取了华尔街历史上最铤而走险的一次行动——在公开市场秘密买入北方太平洋铁路总计 1.55 亿股的普通股票和在优先股中所占的多数股票。

摩根在拒绝给哈里曼伯灵顿铁路的股份之后，于 1901 年 4 月初乘船前往欧洲。哈里曼抓住这个时机，与库恩－洛布银行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西弗开始行动，对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大量吃进。

由于有着这种大量买入行动的刺激，北方太平洋铁路的股价大约上涨了 25 个点。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整个股市都在急剧上涨，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对北方太平洋铁路的大幅度攀升进行深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众普遍认为大众预期中的收购伯灵顿铁路会让北方太平洋铁路重新回到优势地位而纷纷买进股票，这样一来，即使是摩根银行和北方太平洋铁路的一些内部人员对于股价节节攀升的诱惑也无法抵挡，纷纷卖出自己手中所持有北方太平洋铁路股票。

大北方铁路公司深谋远虑的董事长詹姆斯·希尔即使远在西雅图，也在 4 月下旬感觉这件事情有点不大对劲儿。于是他立刻预订了一辆专列和一条铁路线，飞速奔驰到达纽约，这趟列车的速度之快把现有的列车运行纪录也打破了。在 5 月 3 日，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他赶到纽约，跟往常一样，

入住荷兰宾馆，也就是在這一天的晚上，西弗先生将哈里曼已经控制了北方太平洋的事情告诉了他。

詹姆斯·希尔是一个头发又长又乱的西部人，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一消息，但因为西弗先生一直是一个最会装作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他用文绉绉的语气说话，让希尔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不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西弗的这番话并不完全正确，哈里曼的确已经持有明显多数的优先股，将普通股和优先股加在一起的总股本他也确实占有多数，但就以普通股来说，他还没有持占多数。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了，哈里曼打电话给库恩－洛布银行，让他们再买进4万股的北方太平洋铁路普通股，如果要是能够成功买进，就能让他占有多数的普通股了。这个消息是一位合伙人接到的，他需要征求西弗先生的意见，西弗先生的意思是今天就别买了，那个时候西弗先生正在一个犹太教堂中，可能与这个有关。

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想要买进为时已晚。原来在希尔与西弗谈话之后，他设法找到了摩根银行的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给当时还远在欧洲的摩根发去了电报。摩根先生在5月5日回复了电报，授权在股票市场中吃进15万股北方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西弗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北方太平洋的董事是有收回优先股的权利的，因为他的粗心大意，使得摩根他们然可以保有这条铁路的控制权，因为他们还可以控制普通股。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得到了一条信息，才知道了正在发生的控股权大战这件事，接下来我就会讲这个消息我是如何得到的。

///

当我还在科恩公司做办公室的小职员时，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我每天总是会早于证券交易所开盘之前一两个小时赶到市中心，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想看看能否从伦敦股市的报价中找到机会，来赚取套利的差价。尤其是每逢星期一的时候，我就会更早地赶到市中心去，利用周末无法交易而导致可能会出现的新情况来进行我的套利交易。

北方太平洋在这个星期一的上午开始了一天大幅度的上涨行情令人疑惑不解，此时我就站在证券交易所具有首发伦敦股市交易电报的套利交易台

旁。我旁边站着的是一位比较出色的经纪人——泰尔伯特·泰勒（Talbot Taylor），同时他也是詹姆斯·基恩的女婿。恰好摩根他们通常要是需要进行什么棘手的股市操作时，都会请基恩来给他们帮忙处理。

我就让泰勒注意一下当前北方太平洋可以在伦敦以低于纽约当前价格好几个点的价钱买到的事情。

泰勒面无表情，用他的一双棕色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伯尼，”他一边叫我的名字，一边拿着铅笔粗大的那端不停地轻敲着自己的嘴唇，“你是不是想要在北方太平洋的股票上弄点什么动作？”

“对啊，”我回答他说，“让我来告诉你怎么从中赚点钱吧。在伦敦买进股票，在这里卖出，就可以赚到一些利润。”

泰勒继续用铅笔敲着他的嘴唇，接着又开始敲他的额头，等了好长时间，他才开口：“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做套利这种行为。”

我并没有直接问他这样说的原因，我知道，如果泰勒想让我知道，他就会告诉我的。所以我主动跟他提出，我之前在伦敦买进了股票，可以转卖给他一些，如果他认为这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好吧，”泰勒点点头同意了，“你可以在伦敦那边买进北方太平洋，但是如果我需要这只股票的话，我希望你能让你以我设定的价格卖给我，当然这中间会给你些赚头。”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泰勒又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拉起我的胳膊领我到了一个谁也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地方去。

“伯尼，”即使这个地方已经足够安全，他还是用低得几乎让我无法听清的声音对我说，“我之所以愿意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来干扰我执行买进。基恩先生正在替 J·P·摩根先生操作买进这件事，现在对北方太平洋的控股权争夺十分激烈。”

“你要注意点，”泰勒在结尾的时候说道，“千万不要卖空这只股票，而我买的股票必须立即交割，伦敦买的股票不起作用。”

艾迪·诺顿在那天疯狂地不停吃进北方太平洋的举动让所有人不解，但是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神秘感，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泰勒告诉我的这条极其

重要的信息。我本来也可以告诉其他人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但如果我真的说了，就绝不可能发生后面的事情。而且，我要是真的告诉了别人，泰勒一定会不相信我，他就失去了执行买入操作的信心。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泰勒执行给自己公司买入的指令将会更加困难。

一些经纪人知道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会打乱他们的操作，所以他们经常满怀信任地对我讲着他们手上的买卖指令。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会尽量躲着，不让人有跟我说这种知心话的机会，因为有时候很尴尬的事情可能会出现。举个例子，有好几次我都被迫放弃了已经打定主意要进行下去的交易，因为这样看起来我好像就不是在利用机密信息，反而是跟告诉我秘密的人对抗了。但是这次跟以前的不一样，一个非同一般的秘密被一个跟我关系还不错的经纪人告诉了我。

我一边从套利交易台前走开，一边仔细地思考泰尔伯特·泰勒告诉我的事情。摩根和哈里曼都急切地想吃进每一股可能买到手的股票，在这种情形下，北方太平洋股票可能会很快就出现“被轧空”（cornered）^①的情况。预计股票下跌的一些交易员会进行卖空交易，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回补股票，他们会被迫报出非常高的价格来竞购北方太平洋。他们将不得不卖出自己手中其他的股票筹集资金来防止这种损失，但是这样一来其他股票就一定会出现压价抛售的情况。换个方式来说，股市的全面崩溃会发生在北方太平洋股票被轧空之后。

我于是做出决定，在北方太平洋股票上不做任何交易，沽空几只市场上的其他重要的股票，当这几只股票受到抛压时，我就能赚到钱。后来的结果也向我说明，站在场外做一个旁观者的话，纽约证券交易所迄今为止最为疯狂的风云变幻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是一个星期二。北方太平洋被轧空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在市场上几乎谁也不想把北方太平洋股票卖出。在交易的过程中，股价上涨到149美元，最后以143美元的价格收盘。不过在下午3点锣声响起之后，对这只股票的疯狂抢夺还在继续。

① 原始意思是“陷入绝境”，在这里是指“囤积、垄断股票等来源而形成市场挤压”。

根据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来看，所有买进或卖出的股票都必须在第二天交割完毕。如果某人想要卖空某只股票，按照通行的做法是此人必须向某个经纪人借得该股票的股权凭证，如果这样做有必要的话，因为光是使用股权凭证就得支付一笔使用费。如果一个交易员没有办法借到他所需要的股权凭证，那已经从他手上买入股票的人就可以进入市场为股票支付任何价格。被轧空的卖空交易员便不得不承认这一价格，并按照这个价格支付款项。

但是在北方太平洋的这个情形之下，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股权凭证来供已经做空的所有交易员来弥补这个空缺。当代表着收市的锣声响起的时候，交易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惊慌不已地在北方太平洋席位周围打转，他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借入任何可以借到手的北太平洋股票竞相报出高价。

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清晰地回想起那天发生的情景，我还专门查看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过往报道。如果评判标准可以用我的记忆来衡量的话，那份报纸所描述的疯狂争抢股票的画面，绝对没有半点夸张的成分。

当一个交易员走进人群，其他的交易员以为他可能会有点北方太平洋股票，所以大家都朝他冲了过去，人群的冲力足够将他撞压在栏杆上。

“能不能放开我？”他向人群高声吼道，“这只股票我手里一股也没有，你们这样是觉得我把它揣在了我的衣服里面吗？”

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经纪人，赫茨菲尔德－斯特恩公司（Herzfeld & Stern）的艾尔·斯特恩（Al Stern）在这时大步走过这群绝望的人，他到这里来是受库恩－洛布银行的嘱托来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正在代理哈里曼买入北方太平洋股票的就是这家库恩－洛布银行。

斯特恩看着他们，用漫不经心的语调问道：“你们谁要借北方太平洋？我这里可以借出来一批。”

一听到有股票可借，那些交易员立即扯破了喉咙般地嘶吼着需要股票，呼声震耳欲聋。人群只凝固了极短的瞬间，然后就看见那些绝望的经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了斯特恩。他们拼了命般地接近斯特恩，期盼着他能听得到自己高声喊出来的价格。他们甚至不惜把一台台股票自动收报机撞倒，把交易

所弄得满地狼藉，一双双手都在空中挥舞、颤抖。身强力壮的经纪人猛力把身体瘦弱的交易员推向一边。

斯特恩被挤在一把椅子上坐着，紧挨着脸的便是一本便笺，他开始在便笺上记下借出股票的交易。一会，他对这个人嘴里嘟囔：“好的好的，借给你了。”一会儿，他又抱怨起另外一个人：“注意你的手指，天呐，要戳到我眼睛了。”

还有个搞笑的经纪人突然转过身，把斯特恩戴着的帽子一把扯下，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就像击鼓一样连续快速地敲打着他的脑袋。

“喂，把帽子还给我。”斯特恩尖叫道，“你别太激动，可能对你才算有利，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还有些人几乎已经爬到其他人的背上，奋力地想要接近斯特恩。他们在不停地推推搡搡和争夺呐喊。他们的样子让人想起沙漠中渴得发疯的人群在抢水，最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往往是身高最高的人、体格最壮的人或者嗓门最亮的人。

很快，斯特恩就把股票全部借出去了，但他的脸色变得惨白起来，来时好端端的衣服也被扯得乱七八糟，穿过重重人群，整个人好不容易才挣脱开。

5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每个人都知道了北方太平洋股票已经受到轧空的消息，恐慌在市场上蔓延开来，这些空头们清楚自己必须在当天交易结束前借入股票以此来填补卖空的数量，为了弄到股票，他们疯狂地开出高价。股票比前一天最后一笔的报价高出了12个点，以155美元开盘，时间不长就飙升到了180美元的价格。

西弗先生在这一天公开宣布哈里曼已经掌握了北方太平洋的控股权，但是希尔－摩根“军团”却拒绝向哈里曼认输，他们依赖着当代最伟大的股市运作人——“战地元帅”詹姆斯·基恩，对于他的判断和决断表示绝对的信任。

在此次操作中，基恩始终没有在证券交易大厅里露过面，他做其他的交易时也不会出现的交易大厅。没错，他并不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在这次整个争夺北方太平洋控制权的过程中，泰尔伯特·泰勒的办公室他也没有待过，外人都无法找到他。所以，为了能够把行情报告送达到基恩那里，艾迪·诺

顿总是会将话传给哈里·康登特，康登特在接到消息以后都会在房间里面徘徊一会儿，然后才走到泰勒身边去，告诉泰勒要带给基恩的信息。

在证券交易所里，人们的恐惧完全取代了他们的理性，股票纷纷被抛售，股价也在疯狂下滑。因为事先我已经制订好了计划，所以在这次的恐慌性暴跌之中，我能够站在一边，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冷眼旁观着这一切。股票遭到压价抛售的时候，我买进股票，平掉了我的空头仓位。那天，我赚到的净利无比丰厚。

当时的我还认定，其他的任何股票都不会出现遭到轧空的情况，受够了的不光是大众，估计那些联手行动的铁路巨头和银行家差不多也已经受够了，他们会在不久的时间里使出全力去终结股市的这种恐慌的行情。整个局势在我的眼中看来正掌握在两大对立的“军团”手里，他们迟早都要互相让步——从我的感觉上来说会更早一些。

不过，在那天下午和收市的锣声敲响后，从表面看市场上的情形并没有迹象能够表明两大敌对派系之间有任何讲和的征兆。

下午3点到3点半这段时间内，一种混乱的场面在借入股票的交易员人群中涌动着，当交易大厅再次出现艾尔·斯特恩的身影时，惊恐的交易员就像是潮水一般向他冲了过去，把他抵在一根柱子上，要他将前一天借出的股票续借给自己。好不容易爬上一把椅子的斯特恩，大叫着让交易员都让开，宣称自己有话要说。

听到这句话交易员人群终于安静了下来，斯特恩宣布了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毁灭性消息再次打破了平静，那就是他不能再续借股票了，从他手上借过股票的人必须把股票交还回来。

在这里值得解释的是，斯特恩这样的做法并非是要像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在1872年逼空芝加哥西北公司股票时那样将空头挤压掉，要逼迫着他们把最后的家底都掏出来，榨干别人的每一分钱。斯特恩之所以要收回已经借出的股票，是因为对于争夺北方太平洋控制权的这场对垒，哈里曼和摩根两个大集团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即将摊牌，必须把股权凭证实实在在地拿到手上，否则双方谁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持有多少拥有股票权的股票。

当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里，人群把所有的公共房间都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走廊也被他们塞满，但这时候的人群跟几天前有很大的差别。几天以前，他们还在富丽堂皇的华尔道夫酒店里营造着欢乐和恬淡的氛围，但现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到女士的踪影，在这种消遣娱乐场所应该有的体面着装也被男人抛之脑后，情势顾不上这些了。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没有危险威胁的时候，你注意过动物都是什么表现吗？它们有的会用舌头或者喙舔舐整理自己的皮毛，精心装扮自己。它们会昂首挺胸，耀武扬威般阔步而行；它们会放声歌唱，咿咿呀呀，婉转而清脆。每只动物都想要表现得比自己的同伴更加出色，发挥得比同伴更为精彩，总之就是越出众越好。人类也是这样，而且，人类也跟飞禽走兽一样，每当有恐慌侵袭他们的心时，一切优雅的做法都会被他们忘记，甚至有时候就连最基本的举止礼貌也都被他们一概不顾，抛诸脑后了。

那天晚上的华尔道夫酒店，只要你随便扫视一眼，便已经足够让你领悟到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这个事实。华尔道夫酒店由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变成了惊恐的已经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的人们藏身想要躲避危险的洞窟了。一群群惊慌不已的人在这里漫无目的地胡乱兜着圈子，脸上都是藏也藏不住的焦灼，急切万分地想要抓住有关于形势变化的任何消息。有些人被吓得要死，一点东西也喝不下；有些人害怕得要命，只能不停地饮水灌酒来缓解这种紧张。总而言之，这里的人已经变成了一群暴民，一群被所有不合乎常理的恐惧、冲动和激情占据了全部头脑的暴民，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这个时候还能保持外表镇定的都是那些最为勇敢坚定的人。我看见了享有“赌 100 万美元”盛名的约翰·盖茨和阿瑟·豪斯曼在一起。约翰·盖茨是一位爽朗粗率的芝加哥人，他的脸上神态轻松，还故意保持着过去勇敢自信的风采。关于所有他在北方太平洋股票上持有空头仓位的传闻，他全部都给予否认，说自己没有赔一分钱，就算是真做空了，他也不会发出刺耳的长啸来表达自己的恐慌。

盖茨前半部分讲的话如果要是说不真实，那后半部分一定是实情了。实

际上，以前盖茨赚到的那一笔笔百万美元全部都岌岌可危。他和其他大亨在这个时候脑子里都只存在着一个疑问，那就是，摩根和哈里曼两大集团在这个漫漫无期的夜晚能否达成妥协？

///

第二天上午的北方太平洋交易席位旁围着一帮面色惨白、紧张不安、几乎死寂无声的人。交战双方的“将军”和他们这次行动的现场指挥官命令人把守的一道道门后，并没有任何妥协的消息传来，也看不出有任何双方暂时休战的希冀。

开盘小木槌在空中清荡的回声被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淹没。北方太平洋在还没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卖到每股 400 美元的价格。到了中午的时候，股价已经涨到了 700 美元。就在过了下午 2 点不久，有 300 股北方太平洋卖出了 30 万美元的高价，而且是用现金支付的，合每股 1 000 美元。

碰巧，我知道艾迪·诺顿本人倒是也把这只股票做空，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赌博，他觉得股价维持在那么高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是真的一直保持在那么高的位置，那估计整个股票市场都会垮掉。

只有北方太平洋在不断飙升，其他的所有股票价格都一落千丈，被投资者不计成本地疯狂抛售，有的股票下跌的价格竟然超过了 60 个点。银行给经纪人借贷的利率从一开始就涨到了 40%，曾经一度达到了 60%。人们的心智已经完全丧失，那些所有的价值感也都消失了。

站在那里的艾迪·诺顿想到很多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的朋友们，不免泪盈满眶。谣言被恣肆随意传播，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报告传到了伦敦，还用的是电报。报告说，阿瑟·豪斯曼因为股市的崩溃而突然倒地，在我们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猝死。后来，为了辟谣，阿瑟·豪斯曼不得不亲自来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让大家看到阿瑟·豪斯曼依然健在。

在每个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面的情景就像是交易大厅一样令人不忍直视。H·B·豪林斯经纪公司的弗雷德·艾迪（Fred Edey），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冲到摩根银行内部的一个个办公室里对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立刻筹到借款，那么就会有 20 家经纪公司在傍晚的时候破产倒闭。艾迪不厌

其烦地一家接着一家银行奔走，费尽口舌恳求和劝服他们。正是有了艾迪的此番努力，为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周转资金，帮着大家抵挡住了这场足以毁灭众人生活的灾难。

空头必须拿出股权凭证来回补前一天卖空仓位的截止时间是到下午的 2 点 15 分为止。就在这之前的几分钟时间里，艾尔·斯特恩作为库恩－洛布银行的特使走上了交易大厅。他的脚踩上一把椅子，为了让人听清他说话而亮开了自己的嗓门。他向众人宣布：“我的公司昨天买入的北方太平洋股票现在不会让交易员来强行交割。”

就在斯特恩说完这句话之后，紧跟着艾迪·诺顿就宣布称，那应该给的 8 万股股票他自己的公司也不会执意要求交易员来交割。

北方太平洋的股价回落到 300 美元的位置，整个市场也慢慢稳定下来，这场危机最终算是结束了。

华尔道夫酒店里的人在这天下午 5 点钟的时候，终于感觉到了轻松，股票自动报价机传来的一则公告让他们如释重负。公告称：摩根银行和库恩－洛布银行将会以每股 150 美元的价格来向卖空者提供股票。这个交易条件可是比多数空头心里所期待的价位大方多了。恐慌正式宣告结束。

能比奇人盖茨再心宽的人怕是很难找出来了，做空的事实他也难以掩饰。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里的男人咖啡屋里，他发表了一通风趣幽默的讲话。他的律师马科斯·潘姆（Max Pam）和阿瑟·豪斯曼就站在他的两侧，人们都要挤到他们身边来，而他本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还是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询问他：“盖茨先生，请问你对这场突然刮起的阵风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把这称为阵风吗？”盖茨反驳道，“如果这样是算作阵风的话，那龙卷风我可是一辈子也不想遇到。”

也有人冒失无礼地顶撞他：“你是不是破产了？”

“不过是像成熟的小麦那样被压弯了腰，仅此而已。”他反驳的措辞就像是那些爱对付刁难的问题的政治家一样老练，“你知道吗？我过去在伊利

诺伊州养过一条狗，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它一样。那条狗在四处都遭到人们的踢打，就在被人踢多了以后，它就只敢侧着身子行走。到了最后，对于人们的踢打它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放在心上，就又开始直起自己的身子，端端正正地往前走。在此刻之前，我就像我的狗一样，不敢面对他人，侧着身子走，所以我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完全没了人样儿。但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傍晚，走到了今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的身子终于又正过来了。我现在可以像旁边的人一样，往前走的时候目不斜视，那些无数条通往星期天的路我都可以面对。”

大概就在这之后的一两天，盖茨先生漂洋过海前往欧洲，整个这次事件已经在他的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说，仅从外表上，谁也看不出盖茨先生还有在想着这件事的痕迹。

这次双方争夺战的硝烟过去之后，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还在心头思考着：北方太平洋究竟被谁控制了？哈里曼就像是一头随时准备继续搏斗的年轻雄狮那样，但是摩根和希尔都觉得已经受够了这种拉锯的感觉，他们为了避免将来激烈对抗的场面再次重演，后来愿意做出让步。双方达成共识，根据他们所签订的协议，在伯灵顿铁路公司和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里，哈里曼都获得了代表席位，跟他当初提出的要求比起来，这个协议的内容可是超出了太多。

第12章

华尔道夫的名人

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将一些现象归纳总结为一个固定的结论，北方太平洋股票在股市被轧空一事就被他们升华到金融巨头时代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虽然在之后的几年里，也陆续地发生过一些所谓的“巨人”之间的权势争夺战，但是就对阵的强度、时间和影响力来说，无论哪一次的斗争都无法与哈里曼和摩根的这场大战相提并论。

时至今日，这场控股权争夺战也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尽管在表面上看来，它仅仅是强力人物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但从它的深远意义来说，它只是一场为成就同样事情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之间的斗争——双方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能将全国的铁路系统整合得更有效、更快速。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哈里曼还是摩根，他们只能算是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个大浪潮中影响颇深的人物。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一现象，他们所采取的形态、形式都有一定的促进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演变的大舞台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论如何也会继续下去。这是时代的浪潮，并不是一个或两个人物所能决定的。

回顾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它可能完美地解释了当时我在华尔道夫酒店亲眼看见的那一幕幕场景的核心意义。当时的华尔道夫酒店，充满了各式各样自以为是经济发展舞台上的主角人物的人。但是，在国家历史发展这个规

模如此宏大的戏剧中，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敢于冒险的表面人物而已，昙花一现就匆匆而逝。

在华尔道夫，总是会出现许多趾高气扬的人，他们总是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但是在我看来，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地受到欺骗和愚弄。打个比方来说，出了名的老好人艾迪·沃瑟曼（Eddie Wasserman），有一个公认的缺点——喜欢吹嘘自己交易操作的规模。有一次，他走到雅各布·菲尔德（Jacob Field）身边——雅各布算得上是华尔街最精明的交易员之一，问道：“雅各布，你猜我今天做了多少交易？”

雅各布马上回复他：“先打个对折。”

雅各布的个头矮小，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说话还带着一股德国口音，但是整个人却给人短小精悍的感觉。可是在证券交易大厅里，却总能见到他的经纪人跟在他屁股后面四处走动，因为他总是记不对自己的交易记录，似乎在他看来，那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一回，几个朋友为了答谢雅各布对他们的帮助，就邀请他参加一个宴会。因为他是主宾，就安排他坐在两位非常迷人的女士之间。席间，几人并没有什么交谈，因为这两位女士并不知道应该和他聊什么样的话题。最后，其中一位女士打破了沉默，询问雅各布是否喜欢巴尔扎克。平时，雅各布总是喜欢拽着自己的小胡子，带着一种茫然失神的状态说话。这回也是，他照例拉着胡子回答女士的问题：“我从来不做外面那些股票，也不关心。”

这并不是说雅各布不懂得正常的社交礼仪，而是试图说明，那些知名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并不在雅各布的知识库里，他却对华尔街的事情如数家珍。在晚宴进行当中，雅各布还制造了一个小高潮，他给在座的每一位女士 100 股里丁公司的半股（half shares）。每份半股在市场上价值大约 4.5 美元。他告诉每一位女士，不要急着卖出这些半股，不久它们就一定会涨到 100 美元。事实证明，即使对华尔街了如指掌的雅各布，也有没说对的时候。这些股票最终涨到了 200 美元。

在华尔道夫，各色人物轮番登台表演，而且表演者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但是有三个特别的人物引起了强烈的好奇，他们就是——“钻石吉姆”布

拉迪、詹姆斯·基恩和约翰·盖茨。他们三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关于人性的谜——每个人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外表之下，真实的个性又是什么样子的？

///

在平常，当我看见那些衣着华丽精美的人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他们和“钻石吉姆”布拉迪站在一起时，他们的外表该显得多么的苍白乏味，似乎只能用徒有其表来形容。吉姆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吃惊，最好是能够吓人一跳那种的，也特别喜欢别人评价自己。在吉姆的钱夹里，你永远找不到一张旧钞票。如果有人把皱巴巴的或者是弄脏了的钱给他，他就会到银行，把钱换成那种崭新的、能发出清脆声音的新钞票。只要是会在公众场合露面，他总是身穿一身笔挺的正式服装，而且通常会挽着一名美丽的女士。

不过，尽管是一位如此嗜好炫耀自己的人，却没有被别人厌恶排挤，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本身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与朋友相处也只是会让对方觉得非常的愉悦，而没有炫耀自己。在他的个性之中，与人交往贵在真心，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害人之心。

大多数人都以为吉姆深深地爱着莉莲·鲁塞尔。实际上，在这么多年里，他都在伊达娜·迈考雷（Edna McCauley）的身后鞍前马后地献殷勤，讨她的欢心，吉姆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知道这个不算是秘密的秘密。而身材高大又英俊潇洒的杰斯·卢维森（Jesse Lewisohn），也就是卢维森铜业公司巨额财富的继承人，他才是莉莲·鲁塞尔的追求者，他总是不离她的左右，就像是随传随到的侍从一样。四个人经常结伴外出，形影不离，一起露面的时候很多，看起来亲密无间。直到有一天，吉姆突然跑来找我，他说：“伯尼，太糟糕了，杰斯跑了，和伊达娜结婚了。”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我受到了多么大的惊吓。几年后，莉莲·鲁塞尔也嫁人了，到西班牙定居，她的丈夫是亚历山大·摩尔（Alexander P. Moore），这个人是驻西班牙大使。

吉姆是做推销铁路设备的销售员起家的，可以说他是这一行里最为出色的。他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断努力逐渐积累了广阔的人脉和大笔的财富。詹姆斯·布拉迪，一个多彩时代里极具复杂人性的人物。作为一名商人时，他极

富判断力又行事沉稳慎重谨慎，而在百老汇大街，他就成为一名像是突变画风艺术家一样偏爱炫耀作秀的“钻石吉姆”；至于他是如何把这两种性格迥异的表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件事，还是留给那些对心理研究感兴趣的人来研究探讨好了，我只能做一个浅显的解释。

吉姆和别人说话时，总有自己的一套说话习惯，他总是轻言细语地吐出一个一个词汇，又总是毫不在乎地自我嘲讽。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个家伙非要和我打赌，看谁的食量更大，他总是说一定能赢我，我就在下注前问他能吃几个火腿。”

吉姆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自律的，他从不饮酒，也不抽烟，更不喝茶，甚至是美国人的精神食粮咖啡他也不沾分毫。或许是因为他都寄托于吃的东西上面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三个人在一起时有他吃得这么多。单单是大家坐在那里聊一会天的工夫，他吃掉的冰激凌就可以按夸脱^①计算，吃掉的橘子可以按打计算。如果是外出旅行，你是不会设想到他会带多少吃的。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他用板条箱装了几箱橘子带走。我还见过有一次他在餐前就吃了三四打牡蛎，当作开胃小吃。

他还是佩吉萧糖果公司（Page and Shaw）的最大客户，佩吉萧公司甚至曾经专门组织研发小组为吉姆专门设计制作了一种什锦糖果，这些糖有10~12个品种，每个品种大约有1/4磅重，而吉姆一次能吃掉四颗左右，这些糖果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个小花絮。

吉姆大约有6英尺高，因为饮食习惯，体态肥胖无比，可是他对跳舞却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相同的爱好，吉姆和我最小的弟弟赛林是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俩喜欢一起去参加舞蹈比赛，当然最后获胜的总是赛林。有一次，在吉姆西八十六大街单身家里举行的舞会上，我竟然非常荣幸地获得了舞姿最佳优美奖，奖品是一只特别符合女士眼光的手表，除了表盘的大小适合男士。表盒的外壳竟然还镶嵌了薄薄的一层珍珠。

吉姆参加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公开的。不过，有一次我和他说，我和妻子会去他家看珠宝，可能会带一些朋友。他欣然同意，他说会安排好时间，并

① 美制1夸脱等于0.946升。

且提前为我们 12 个人准备好了晚餐。那是我吃过的最用心的晚餐，受到的招待也是最周到的。甚至每上一道菜，在座的每一位女士都能收到一份精心准备的新奇珠宝礼物。

在这种场合，吉姆是非常注重礼节的，他绝对不会吃得比客人多。其实，他会提前享用晚餐。他到朋友家赴宴的话，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吉姆从保险柜里搬出他个人收藏使用的各种珠宝，让我们欣赏。总共有 25~30 套，每套饰品都是全套的，包括领口扣、饰钉、袖口扣、西服背心扣、长围巾别针、手表链、怀表带、眼镜盒、名片盒、背带扣环、腰带搭扣、戒指和手杖上使用的活动把手。这些都是吉姆经常会用到的。这些物件通常都与钻石、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月光石等搭配在一起使用。吉姆还介绍，他甚至准备了一套炮铜制的全套首饰，是专门为参加葬礼用的。

之后，我们还参观了吉姆的大衣柜——请让我用参观这个词来形容。里面的架子挂满了礼服套装和参加宴会用的大衣，主要有四种颜色，除了基本的黑色，还有珍珠灰、海军蓝和李子深红。说实话，除了商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衣服和鞋子。壁橱里还挂满了配有佩斯利图案的披肩。客房套间里的浴室装有一个纯银的浴缸，梳妆室里的梳妆用品全是纯金制作的。

吉姆还养了一匹马，叫作“金蹄”，他会让金蹄在郊区或者布鲁特林的障碍赛中大展拳脚。“小意思，”吉姆总是信誓旦旦地和朋友们保证，“金蹄不但会赢得比赛，还会领先其他的马一条街。”吉姆的自信也让其他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金蹄是一个大热门，它的赔率甚至达到了 16 : 5。比赛的那天，吉姆就坐在看台的包厢里，周围坐满了既兴奋又紧张的朋友们，显然吉姆是所有人的中心，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金蹄会以领先其他马一条街的距离赢得比赛，语气中充满了对金蹄的骄傲和自豪。

结果，这场赛马是那么的惊险刺激，是我迄今为止在现场观看赛马比赛中成绩最为接近的一次。当赛马都跑到临近终点的跑道上时，还有两三匹马并驾齐驱，几乎鼻子挨着鼻子，奋力争夺冠军。吉姆紧张地站了起来，挥舞着双臂给金蹄加油，似乎是要张嘴喊什么，可是最终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

来。杰斯·卢维森在金蹄身上下了大把大把的赌注，这会儿正在不停地揩着头上的汗水。

最终结果是，金蹄险胜，只以一个鼻子的距离优势赢了比赛。吉姆的朋友们都围在他的周围向他祝贺道喜。卢维森的脸色依然惨白，还向吉姆埋怨着：“我以为你的金蹄要赢一条街呢。”

吉姆霎时满脸通红，我不知道那是羞愧还是愤怒。他指着张贴获胜马匹的公告板，嘴唇上下哆嗦着，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蹦出几个字，带着咬牙切齿的声音：“谁的号码在上面？”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辛辛苦苦地引导一些人走向了成功，到头来他们不会感激你的努力，反而还会因为过程中的艰辛而不停地埋怨你。我常常就想以同样的回答回应他们。

///

如果说还有谁能够荣幸地冠以“华尔街巫师”这个称号，那么无疑会是詹姆斯·基恩。在股市操盘这方面，我至今还没有见过有谁是像他这样的奇才。他曾经应摩根先生的要求操作美国钢铁公司的做市交易（market making）。这算得上是他做市的一大重要杰作。

这家钢铁托拉斯组建的时候，大概需要5亿美元的普通股和5亿美元的优先股来确立一个交易市场。很少有人愿意相信或者愿意投资一个只有10亿美元的股票，更遑论它还想将这些股票放出来向大众出售，而且不会压低这只钢铁股的市场价格或者让整个钢铁市场乃至整个交易市场受到冲击。说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这种事情可以办到，除非是上帝之手。但是，基恩就拥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能够将所有的买单和卖单撮合在一起，这样整个市场就会完全地在他的掌控之下。他这次的做市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摩根银行只需要投放到市场上2500万美元的资金，其余的资金全部都是公众筹得。

在这里不妨补充一句，由于基恩在做市交易中的精彩表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规定，那些手段再也不允许使用。毕竟这虽然没有道义上的不认同，但是会给更多的人造成一夜致富的妄想。

基恩对证券有着极高的敏锐度，或者说他是自学成才，也可以说他

是白手起家的，这也就证实了一句话，人人都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基恩出生在英国，却在美国西海岸长大。他做过牛仔、骡夫、矿工和报社编辑，后来决定在旧金山的证券交易所买一个交易席位，正是这个决定，他发现了自己对于证券交易与生俱来的操控力和掌控力。

基恩身材中等，穿着并不是特别正式，但是总是洁净整齐。他虽然留着短短的灰色的络腮胡子，但是胡子总是打理得整洁、清新利落，也因此博得了一个“银狐”的绰号。至于他在年轻时候养成的粗糙个性，唯一的外在表现应该就是在激动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带着加州人说脏话时的坚定语气，但是这种性格反而在我们眼中不失为一种可爱。每当此时，他尖细刺耳的声音就会让他说出的脏话达到一种穿透力极佳的效果。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基恩来到纽约，开始自己的追名逐利的华尔街生活，而在这个时候，在股市操控中正是杰伊·古尔德的鼎盛时期。等我认识基恩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股市的大起大落、浮浮沉沉，赚过不少钱，也赔了不少钱。但是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在赔钱的时候，总是面不改色、坦然接受所有的损失。有一次，他不得不变卖家当来偿还债务，也没见他向自己的朋友寻求同情，甚至是朋友伸出的援手也被他婉言谢绝了。有人说他倔强，在我看来这不失为一种坚韧，这也是我更敬佩他的地方。

发起一场金融交易的前期准备总是全面而冗杂的，基恩比起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小心谨慎，执行计划的时候也更加迅速、更加坚定。似乎在他的身上总是能看见一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品质。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他会非常有耐心地行动，耐心到你以为他要放弃了，而他却在伺机而动。但是当他相信自己出了差错时，他会瞬间改变行动的方向。

基恩的一次做市操作教会了我很多道理，让我在华尔街这个浮沉万变的地方找到了人生拼搏的方向，让我更加透彻地了解了“人”这个字的根本意义。那时，科恩正在给美国的科达奇公司（Cordage）的股票进行做市交易，当基恩突然得知这家公司目前的盈利达不到应有预期，甚至是未来也无法达到，不能够合理支持目前的股价时，基恩立刻停止买入科达奇的股票，并且迅速卖出他为自己所代表的合资操作者已买入的股票。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

象，并不是他迅速改变行动方向抛售出股票，而是首先卖掉其他集资操作人的交易股票，之后才卖出自己手里的股票。这种为他人着想的精神震撼到我，毕竟在华尔街这个地方，情谊不如金钱更被人所看重。

还有一次，股所交易人都在疯狂投机于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有一份报告却在这时被送到交易所，是说一艘船上感染的黄热病随一批粗糖进入港口，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瞬时下跌，其他交易人纷纷抛售股票。但是，基恩并没有因为逃避困局而抛售股票，因为他坚信股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他还继续买入，以表示对这只股票的支持。

这时，米德尔顿·巴里尔——正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基恩——问基恩这份关于黄热病的报告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嗯，”他以英国人常用的说话方式回答，“我恐怕是不会说这份报告正好可以说明股市正在看涨。”

基恩在股市操作中总是那种多看多做或者是持乐观态度的那一方。有一句话很多人都认为是我创作的，其实是我从他那里听到的：“你并没有看到在第五大道上有哪一座豪宅名邸是由熊建造完成的。”

当然还有人曾经问过基恩，既然你已经在华尔街赚到大钱，甚至是一个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为什么还要在华尔街继续做投机交易，劳心劳力？基恩并没有正面回答，反而说道：“一只狗已经追逐了 999 只兔子，为什么他还在追逐第 1 000 只兔子呢？所有的生命都在投机。投机的精神是人类生来就具备的。”

基恩很喜欢赌博，他人生的乐趣在于博弈，还拥有几匹赛马。其中有一匹叫作福克斯霍尔的就是以基恩的独生子的名字命名的。福克斯霍尔在 1881 年赢得了巴黎 Grand Prix^①大赛的冠军，但却不是基恩最钟爱的马，他最爱的那匹叫作赛森比。

赛森比死后，基恩将它的全副骨骼捐给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匹马被安放在一个底座上展示，让所有的人自由参观。有一次，基恩和几个朋友参加赛马展览会，在参观的过程中，基恩突然间想起了赛森比，心里难以压抑思念之情，想要立刻看一看老朋友，就和朋友一道提前退出展览会，去了博物馆。

① Grand Prix 大赛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马赛。

他在博物馆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一直在缅怀赛森比的英雄业绩。

有一天，股市行情很是糟糕，收市之后，我遇见了基恩。或许他已经喝了两三杯，两颊微微泛起酡红，但是外表依然像云杉一样挺拔，神情也一如既往的安然。有一次，我向他报告今天的行情无比糟糕，或者是向他倒苦水，他却回答说：“有时我会山穷水尽、一贫如洗，但是我总会强势回归的。”

这句话成了华尔街的一句名言，尤其是当形势对人们不利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一再地重复这句话来勉励自己。而我也是如此，当我处于问题丛生、苦恼不堪的时候，我也总会想起基恩说的这句话，并且默默地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就像他一样，我也决心要“强势回归”。

///

基恩安静而不张扬的行事作风在华尔街里独树一帜，不但与“钻石吉姆”布拉迪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约翰·盖茨迥然不同。盖茨衣着华丽，用的东西大多也很华丽，但是大多华而不实。说话声音很大，叽里呱啦吵死人。另外他还自高自大，喜欢自吹自擂，总给人虚浮的感觉。不过，无论是在股市上还是在股市外生活中，他都是我所认识的那些赌徒中最了不起的人。

盖茨拥有成功赌徒所具备的一切品质，可以说即使是在这一方面他也是万里挑一的。其实，能够成功的赌徒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盖茨是一个浑身是胆的人物，面对险情镇定自若——你不会在他的身上找到任何的胆怯或者不安。在他粗糙犷放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冷静、果敢、能瞬间洞察事物本质的心。

盖茨起步的时候就是一个推销员——穿着打扮是典型的中西部鼓手的形象，穿着花哨扎眼的马甲，佩戴的怀表的表链气势不凡，圆顶的黑礼帽高昂着，并没有竖直地戴着，而是歪向头的一侧。直到最后一刻，盖茨仍然是一个推销员。如果说盖茨在推销的时候所作的说明并非滴水不漏，会让人找到漏洞，那么无论是成就非凡的金牌促销员，还是默默无闻的菜鸟促销员，他们在推销商品时也并非始终经得起推敲。盖茨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在一开始会让很多人感到诧异，不知道他从何处得来的信心，因为盖茨始终坚信国家的发展会超出任何人的预期。他散发出的乐观的气息也会像是传染

病一样传染给其他人。

我很喜欢盖茨，也很看重和他的交往。不论是在股市上，还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和他的相处他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和乐趣。不过，我早早就知道，当他甩开膀子抱住你的时候，“伯尼，我要帮你个忙”，这时最好的办法是躲开他。如果盖茨意识到我会采取一些明智的措施来抵制免受他那种如剧毒般乐观情绪的影响——当然我敢肯定，以盖茨那敏锐的洞察力，一定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不过，当然这并不会伤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在华尔道夫，盖茨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就是有桃花心木吧台的酒吧和台球室。通常情况下，他喜欢在手上端着一杯酒，这也让盖茨给人留下一个总是饮酒过量的印象，其实这是错误的，他总是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但是总是省着点儿喝。

有一回，盖茨坐镇指挥，狠狠地教训了一家著名的连锁投机商号。之所以他会如此做，究竟是因为以道义为动机的道德规范驱使，还是出于赚钱的目的，抑或是心痒难耐想要找点刺激儿，在这里就不好深究下去了。

在那个时代，一家投机商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赌场，来此光顾的赌徒们会多一项赌博的乐趣，可以光明正大地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告板上股票价格的涨落。这并不会影响股票所有权的转移，只是赌股票的波动幅度。有些经营规模较大的投机商号的人，要是发现本商号的某只股票的“买卖报单”数量很大，就会进入证券交易所实际买卖这只股票，迫使这只股票有或涨或跌的浮动，以便将押注的顾客扫荡出局，这算是另一场投机交易。

盖茨和其他几个人决定如法炮制，拿一些野鸡商号经营人在别人身上榨取金钱的方法来强迫他们也这么做。盖茨一帮人在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号里给一些股票下了很重的“买单”，这些股票大多数是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波动横盘在那里的。当他们派出自己的人去清理账户拿回赚到的钱时，却发现这家投机商号已经易主，玻璃门上的牌子已经换上一家新的名字。盖茨很聪明地威胁那些经营人要打官司，或者是让报纸来揭露其中的猫腻儿，就让那些经营这家商号的人吐出了他们的部分损失。

盖茨是一个能量消耗很大的人，甚至是大得惊人，而参与赌博会让他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对于他来说赌博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在芝加哥和纽约往返的火车上，他会玩扑克牌或者惠斯特牌，他能够从一上车一直玩到下车，要么是赢了很多的钱，要么就是输掉很多的钱。^①无论是输是赢，只要是下了火车到了城里，他又变得精神焕发，甚至是红光满面。

我记得我曾经在伦敦偶然间碰到盖茨和伊克·艾尔伍德上校，后来我们三人相约在皇家阿斯科特赛马场相聚。那天的天气特别不好，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我们要进入皇家观赛区观看比赛，就不得不盛装出行，还得带着高高的礼帽，穿着阿尔伯特牌的王子礼服。我在皇家观赛区的外面来回溜达着，顺便找找投注站，而盖茨已经在投注站里了，他带着的高礼帽已经被推到了脑后，穿着的阿尔伯特牌的礼服和马甲也已经都敞开了。

“约翰，这场赛马有什么好的消息吗？”我问他。

“目前没有什么好消息，伯尼，”他回答我，“我准备投注小点。”

他说的投点小注，结果却投入 7 000 英镑。

一般情况下爱滔滔不绝的赌徒都会在空中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的钱都说没了。可是这个理论在盖茨身上却行不通。他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在他絮絮叨叨的说话中，往往会把其他赌徒的钱说输了——甚至是在跟别人玩泥鸽游戏^②射击比赛也是如此。虽然盖茨在泥鸽游戏比赛中算是一个公认的好手，但是他的技术也没有好到天下无敌。不过，盖茨还是会押自己赢，他总是能从那些比他射击技术更高的人手中赢得赌注，我想这除了投机取巧之外还有很大的运气。当然他取得胜利的手段就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甚至是会把赌注说得越来越大，制造紧张的气氛，让他的对手紧张不安，最后发挥失常。后来，盖茨把他的光荣事迹不停地向每一个朋友诉说，他会生动地讲述他如何把泥鸽射击大赛变成说话聊天大赛并且取得了胜利，每次说到关键时刻还会仰头大笑不止。

① 盖茨有一次在这条铁路线上旅行时，打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扑克牌，在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不停地赌，结束时，输赢大概是 50 万美元。

② 泥鸽射击是当时流行的一项运动，泥鸽是用黏土制成的盘形飞靶。

在1900年，有一场非同寻常的赛马比赛，同花大顺赢得了 Goodwood 杯赛马大赛，而关于这场比赛，一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我曾经亲耳听过盖茨讲起那场赛事的经过，但是时间有点久远，我已经记不清楚细节，不过我会尽可能地回忆。

好像是开始时约翰·德拉克（John A. Drake）正计划着带一批马去英国参赛，而盖茨想要小试身手，插脚玩玩，就买下了一半的权益。约翰·德拉克是一名政要之子，他的父亲是艾奥瓦州州长，曾经是一名运动员。除了盖茨之外，他是唯一一个我认识的人当中敢不计后果就下大注的一位。难怪他会和盖茨成为朋友，真是人以群分。

他们在英国雇了一名顶级的驯马师，也赢得了几场比赛。后来他们共同看中了一条跑道上名叫同花大顺的马。虽然同花大顺从没赢得过比赛，一直默默无闻，他们还是买下了它，随后便转交给驯马师进行训练。

盖茨后来得知这匹没有一点名气的马竟然能够越跑越快，越来越神奇，他就针对这匹马进行了数次秘密的测试，甚至还邀请了著名的驯马师约翰·哈金斯来参加秘密测试。哈金斯走路的时候有点跛，我还依稀记得当盖茨和我讲述这段的时候，他瘸着脚模仿哈金斯走路的样子。盖茨不停地打着手势，做着各种表情，只为了能够更形象地向我演示出那场秘密测试的经过——同花大顺是如何前后摆头地跑过小山坡，而哈金斯是如何兴奋地双手向空中抛，大喊大叫：

“天哪！再也没有哪匹马能够像它跑得那么快！”

当然，这些都是秘而不宣的，只为了能够让同花大顺一举成名，赢得更多的赌注。当同花大顺参加 Goodwood 杯大赛时，那些投注站的赌注登记人刚开始算出同花大顺的赔率是 50 : 1。当时夺冠的热门是阿美利加斯，这匹马的主人就是塔曼尼协会的老板理查德·柯罗克尔（Richard Croker）。

然后，盖茨和德拉克开始按照计划实施一系列的投注行动，从英国到南非，再从阿姆斯特丹到澳大利亚，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下注押了同花大顺。盖茨的一系列举动让赛马界的同人听到了风声，也深感诧异和不解，这一切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一匹默默无闻的赛马怎么会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对

此，谁也无法解释到底是谁在背后赞助，不过赔率倒是降下来了。

比赛当天，人们兴奋不已，相互奔走交流着彼此的“小道消息”。就在比赛即将开始时，盖茨就到投注站里问一名赌注登记人，问他是否可以按照 4 : 5 的赔率接受对同花大顺押的“小注”，赌注登记人欣然同意。现在我知道每当盖茨说到“小注”时，其实并不小。盖茨接着说：“我押 5 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5 万英镑相当于 25 万美元。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人知道盖茨和德拉克在那场赛马中到底赢得了多少钱。但是，对于同花大顺赢得 Goodwood 杯大赛这件事，人们纷纷表示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怀疑之声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赛后比赛的赞助方和相关的部门对此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这匹马——同花大顺以及和它相关的某些永远不得再出现在英国的赛马场上。

不过，不管约翰·盖茨在赌博上是多么的疯傻，他在构筑目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美国工业结构中还是取得了极高的地位。他一直对国家的未来怀有极高的展望，甚至这种展望会影响到他周围的朋友，而且我相信他是第一个构想出要建立一个 10 亿美元的公司。因为有一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我们在玩台球时，他就以他独特的说话腔调和自我标榜的态度宣布了这一构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都称之为天方夜谭，因为当时的 10 亿美元可不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投资动辄几十亿美元。

有些人说盖茨是痴人说梦，是喝醉后的胡话，甚至有人说他是垂垂老矣，看不清形势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年长的 J·P·摩根喜欢追求虚无缥缈的如彩虹般绚烂的美景，他竟然对盖茨的想法非常感兴趣，甚至认为这个设想切实可行。最后的结果是，美国钢铁公司便成立了。

盖茨曾经在伊克·艾尔伍德上校的手下工作，是第一家制造带刺铁丝的公司的明星销售员。很快，盖茨开办了一家生产带刺铁丝的工厂，成了原来老板的竞争对手，后来逼得伊克·艾尔伍德上校不得不收购了他的工厂。随后，盖茨也开展了一系列并购行动，在铁丝行业建成具有垄断性优势的美国钢铁铁丝公司。盖茨后来将这家公司转手卖给摩根，让这家公司成为美国钢铁公

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也经过更替，让公司快速成长。首先，摩根先生从卡内基钢铁公司请来 37 岁的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担任公司的管理者，几年后，又让艾尔伯特·盖瑞接替施瓦布掌控公司。盖瑞本来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律师，是盖茨将他引荐给摩根先生的。在盖瑞的身上，摩根先生睿智地发现了他是一个和施瓦布或者盖茨有着天壤之别的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盖茨与摩根也有着云泥之别。如果说盖茨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什么乐趣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或者说他是怎么得到乐趣的。

关于摩根是怎么组建美国钢铁公司这件事，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议论，直到现在，这项壮举也被经济学学者所津津乐道。但是据我回忆，促使摩根建立钢铁公司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钢铁行业里存在着巨大的价格战威胁。但是，这次的整合整个钢铁行业的行动，摩根是否受到了弗里克（Frick）、盖茨、施瓦布或者别的什么人的说服影响，我就不得而知了，至今这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谜题。当然，从中演变出无数种说法，每种说法总是有一部分人支持。

不管怎么说，盖茨都觉得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有他的努力在其中，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在董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摩根很是排挤盖茨，也直接导致了双方长期不和，甚至是双方结下的仇怨在盖茨去世之前都未曾消弭。当然他们也曾经为了财产开展了一系列的争夺，有一次甚至连我也被牵扯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13章

耿耿于怀的憾事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命中总有些憾事让你耿耿于怀。于我而言，从未拥有或者经营一条铁路，至今仍让我无法释怀。

记得小时候，当隆隆声在远方想起，我就会跑到外祖父位于温斯伯勒的庭院外面，等着夏洛特－哥伦比亚－奥古斯塔铁路线上的货运火车从远方驶来，我会使劲向司机挥手。遗憾的是他从未停下过，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孩的想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曾与詹姆斯·杜克和托马斯·莱恩有过一次长谈。那是我最接近梦想的时刻。席间我侃侃而谈，从发展前景以及对南方经济发展的促进，将从纽约延伸至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沿岸铁路描绘成一条诱人的金光大道。

莱恩对杜克说：“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伯尼呢，买下这条铁路交给伯尼经营它。”

时隔不久，在杜克位于七十八大街与第五大道交界处的房子里的一次家庭晚宴后，我无意中与亨利·沃尔特斯坐在一张桥牌桌上，大西洋沿岸铁路公司就是他的。杜克没有打牌，他看了几局后，来到沃尔特斯身边，突然说道：“我现在想买下大西洋沿岸铁路交给伯尼，出价吧？”

“你是认真的？”沃尔特斯显得很惊讶，“每股 65 美元。”

“成交。”杜克毫不犹豫地说。

但是第二天上午，这项交易被 J·P·摩根否决了。事后有人说，摩根他们担心我撇下他们，将铁路融资业务转给库恩－罗布银行。但是很显然，谁给的交易条件最好，融资业务就该交给谁。而摩根是做得最好的。

巧合的是，摩根“众议院”就像一座大山，总是横亘在我实现经营铁路梦想的征途上。在 1902 年，摩根支付了 750 万美元的赚头的代价，向约翰·盖茨交换路易斯维尔至纳什维尔铁路的控股权。现在普遍认为摩根被蒙骗了。而我当时正在尽力争取这一铁路的控股权。因此，我将公开一些当时的交易细节，让事件的经过更加详细全面。

在 1901 年的夏季，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自己的大部分流动资金投资路纳铁路，当时它的股价在 100 美元以下。而当时华尔街由于北方太平洋铁路股票产生的市场恐慌仍未平复。但我做了一项研究，确信路纳铁路有着成为一条金光大道潜质的，于是我开始大量购进股票——这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不仅仅希望通过买卖股票获利，我希望得到铁路的控股权。但由于资金有限，因此我邀请一些朋友参与其中。艾德文·霍利，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铁路和艾奥瓦中央铁路的董事长，曾为爱德华·哈里曼买下过亨廷顿持有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他具有丰富的铁路事务经验和技能，是我非常看重一个人。

我首先向霍利强调，路纳铁路股票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铁路股票中最便宜的。之后，我着重描绘了这条铁路无限的发展前景：与芝加哥东伊利诺伊铁路连接就能进入芝加哥；更重要的是，与大西洋沿岸铁路、南方铁路或者滨海铁路这三条任何一条连接，就可以借力于南方经济发展潜力而获利。

重要的是，国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持有路纳铁路的控股权，而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不善经营，管理松散，使得路纳铁路发展缓慢。因此一旦我们掌握了所有权，一个全新进取的管理层会带给路纳铁路巨大的发展。

尽管在这次谈话中，我描绘得天花乱坠、激情四射，但霍利那张苍白浮雕一样的脸，始终不动声色。他的这张天生的扑克牌脸让我感觉到巨大的挫

折感，我想我没有打动他。

雅克·菲尔德也是个行家，他在北方太平洋铁路被轧空的行情中赚了大钱。他跟其他几个人加入进来。这一次他买进了1万股。一天，他发现我在买进路纳股票时逐批减少买进量时，他说：“这样太傻了。我总是逐批加大买进的量，这样才能赚钱。”

换句话说，雅克会在操作中逐批加大购入量，来支持自己的判断。不过，这需要强大的自信支持。通常，雅克的判断总是对的。

当我和朋友们开始买进的时候，其他买家开始跟风购进了，股价开始被推高。由于目的不同，多数人决定将股票卖出获利。我劝说雅克·菲尔德，持有股票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但他还是卖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外最大的股东之一。当然，我要的可不止这些。于是我再次开始寻找同盟者，同时继续买进股票。

///

时间进入1902年2月，路纳股票的交易开始升温，不再是1月那种不温不火的样子。

一天，我坐在路纳股票交易席位上，看到另一个买家报了一些买单，这个苗头开始初露端倪。当时我很吃惊，朦胧地感觉到有其他人开始感兴趣了。因此每次他买进，我都报出更高的价格跟进。终于，他背后的庄家浮出水面，原来是芝加哥东伊利诺伊铁路公司那帮人。

紧接着，约翰·盖茨也加入进来。他先后通过华盛顿的经纪人西布斯和自己儿子设立的经纪行哈里斯·盖茨公司买入股票。由于盖茨的以往记录，人们对此心生疑惑，认为路纳股票行情的上涨是短期的投机获利行为而已。

交易在有条不紊进行中，3月的一天下午，刚过3点，艾德文·霍利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伯尼，我需要你为我买进路纳铁路的控股权。”他还是那副扑克脸似的表情。

根据后来公开的持股人姓名和股份数的记录，我们的合作者包括乔治·克罗克尔、H·E·亨廷顿、克里斯·亨廷顿夫人、威尔（亚当斯捷运公司总裁）、

托马斯·汉姆林·哈伯德将军（路纳铁路公司律师）以及我和合伙人阿瑟·豪斯曼。这些名字让我意识到，我当初为霍利描绘的路纳铁路发展前景，早已打动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打响控股权的争夺战役之前，我开诚布公地告诉霍利及其集团我已持有的路纳铁路股票数量，并提出把这些股票与我将为他购进的股票合并，按照成交的平均价格给他。他拒绝了，因为这会削弱我拥有的股票的利润，这对我不公平。不过，他拜托我继续持有这些股票，在他需要时出售给他。以便他实现控股，我当然表示赞同。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难以入睡，收购计划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成形，一些担忧也浮出水面。霍利和他的合伙人的实力很强，他们的支持可能会帮助我实现梦想——经营一条铁路。但也有可能推动事情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但管他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大量吃进路纳股票，多多益善。天色蒙蒙亮的时候，我实在无法继续躺在床上，我跑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电报，购进了价值 7 万美元的 2 万股期权。我认为自己用最好的方式打响了第一枪。

之后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交易大厅，那是我战斗的位置。下午我才有时间致电霍利，告诉他我是如何开局的，然而他不喜欢我采取的方式。

在这里，我要做个解释。所谓期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权利：我们有权在 90 天内按照期权交易达成前一天的股票市场平均成交价加上利息买进股票。这意味着要想获利，股票在期权执行时，必须上涨足够的幅度。例如，如果市场价是 107 美元，那么股价至少涨到 111 美元，我们在执行期权时才能开始获利。

后来的事实是股票涨到了 130 美元以上，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霍利还是有些迟疑的。我告诉他，期权还有很大的好处，即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购入大量股票，避过市场的眼睛，不至于直接从市场购进从而推高股价，增加我们的购入成本。

霍利最后拿下了 1 万股期权。当然，与其说是我说服了他，不如说是他为了表示信任我的判断而买单——当然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当时我还跟他说，如果他不愿意拿下，那么我会拿下一半，另一半转给别人接手。

最后我拿下了另外的 1 万股。

这时危险出现了，由于我们以及跟风者的购入刺激，路纳股票的交易量迅速攀升，4 月 1 日到 4 月 5 日，成交量从几千股升至 6 万股以上，之后在 10 日达到了顶峰，60 多万股份易手。路纳股票出现了“被轧空”的危险，就像当年的北方太平洋股票一样。

当年北方太平洋股票的被轧空危机是由于雅各布·西弗的一次疏忽，他周一才发现自己周六未按照哈里曼的指令买入普通股，却为时已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路纳股票重演了这一幕，只是主演换成了奥古斯特·贝尔蒙。前文提到过，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是路纳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当贝尔蒙发现路纳股票在市场上不断上扬时，他把目光放在了路纳铁路公司持有的 5 万股库存股上，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这些库存股可以为公司干净利落地赚一大笔，这简直是意外之财。我觉得当时这丰厚的利润鼓动了 he 骨子里冒险的因子，蒙蔽了他的双眼，使得他完全无视一场收购路纳铁路控股权的战斗即将打响。4 月 7 日，他要求路纳铁路公司董事会授权发行这 5 万股股票。

按照既定的策略，霍利和他的集团以及盖茨的团队，我们吃进了贝尔蒙发出的所有股票。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发行上市规则，贝尔蒙不是现在，而是在 30 天之后才可以交割这些股票。从某方面来说，他们“缺乏头寸的行为已经被发现了”，他们必须借到股权凭证来完成交易，而这样主动权就落在了我们手里。

当然我没有想过挤压贝尔蒙他们，而盖茨起初的确想这么干。但是我坚决不同意把自己卷入一场轧空行情，如果我们逼迫贝尔蒙的话，这种事情必然会发生。11 个月前北方太平洋股票的轧空行情所带来的恐慌场景仍历历在目，我可不想重历那一切。如果霍利他们坚持，我会坚决退出。幸好霍利与我达成了一致，我们按照合理的价格将股票借给了贝尔蒙他们。盖茨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也不喜欢卷入一场轧空行情。

形势很明确，虽然盖茨那帮人和我们一直在对抗、较劲，但我们将不得不与盖茨达成一些共识。因为一些迹象表明，盖茨正在阻止我们按照合理的价格借给贝尔蒙股票，而这是我们正极力促成的。

///

因此，在华尔道夫酒店的男人咖啡屋一看到盖茨，我就建议霍利过去，我们需要跟他聊聊。沟通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几乎已经掌握了控股权。顺理成章地，我们达成了默契。盖茨和我们将资金和股票合并，共同合作拿到控股权。成功之后，铁路的经营管理会交给我们，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现在，距离梦想成真似乎只差一步。

根据计算，我们只差4万股股票就能实现控股。第二天，我就拜托经纪人普罗佛斯特购进这些股票。

股票交易的过度活跃以及被轧空的危机，刺激了它的大老板——摩根银行，他们因此感到了焦虑不安，这将影响到他们在南方的那部分铁路权益。摩根先生拜托他的一位合伙人乔治·铂金斯来找盖茨商谈，因为他本人当时正在法国。他们的对话很简单：我们接受什么样的价格，才会转手路纳铁路的控股权。

谈判开始了，我每天患得患失地等待谈判出现一个结果，或者一个转机，谁知道呢！一天清晨，泰尔波特·泰勒来找我，原来昨晚根据摩根的意见，铂金斯与詹姆斯·基恩进行了沟通。基恩的建议是当断则断，避免纠缠导致事情出现变化。有舍才有得，不惜代价也要拿回控股权。我立刻赶去与霍利商谈，当我站在他公司电梯里的时候，感觉这部电梯实在是太慢了，就像停住了一样。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霍利已经穿戴好衣帽，准备出发了。我向霍利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是绝不会放手哪怕一股股票的；如果他们想卖，那就卖个好价钱。霍利表示尊重我的意见，他让我留在办公室。他与盖茨和铂金斯先生谈好后会立刻回来告诉我结果。

下午，霍利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办公室。盖茨在霍利之前与摩根银行已经达成了一份协议，霍利思考后也没表示太大异议。协议内容如下：我们会将

1/3 的股份以每股 130 美元转手给摩根。摩根对于剩下的 2/3 股份拥有一份 6 个月期限每股 150 美元的买入期权。真是一份利润丰厚的协议啊，可惜的是我拥有一条铁路的梦想又夭折了。

霍利对这份协议带来的利润很满意，因此当我告诉他，我不喜欢这笔交易时，他很惊讶。我认为他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就是一旦经济形势不妙，摩根先生不执行期权——这就是游戏规则，他有这个权利——那么会发生什么？我们这些投机者会把股票砸在手里，还丧失了控股权。恐慌会让我们竞相抛售股票，只求更快脱手，就像在森林里遇到了熊，你会抛下一切只求比别人跑得快。整个市场都会尾随抛售，那将会是一场灾难。但霍利的态度表明，他认为我的看法显然是杞人忧天了。

“朋友，你可以在市场上卖出你手里的股票，随你的意，”他说，“如果你认为这笔交易还不够好的话。”

“这是个玩笑吧？”我很惊讶。

“真的不能再真了，”霍利说道，“既然这笔交易达成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那么你当然就拥有自由处置的权力，我的朋友。当然我希望你保留 1 万股，表示下你的诚意，也算与我们保持一致。省得盖茨和其他人认为你总是不合群。”

结果就是这样，我在市场抛售了所有路纳铁路股票——留下 1 万股作为对霍利的交代。摩根收购了 1/3 后，我还剩下 6 666 股了。

///

好吧，虽然失去了一次实现梦想的好机会让我很沮丧，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的财务状况让我的心情瞬间好转了起来。当然，我还没有从这件事脱身。我的老板阿瑟·豪斯曼还持有路纳铁路的股票，同时我们经纪公司还要为霍利的一些合作者处理他们手中的大量路纳铁路股票。

我试图让豪斯曼先生意识到，如果摩根单方面拒绝执行期权，我之前预测的风险就会出现，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但一贯乐天派的豪斯曼先生显然不这么看，他对摩根的协议充满信心。

虽然无论霍利还是豪斯曼，都认为我是在杞人忧天，我还是将自己的仓

位变动情况告诉了他们两个人。我认为尽了自己的义务，其他的只能看天意了。但是过了不久，盖茨的儿子查到我的仓位情况——我几乎卖光了路纳铁路股票。我当然没必要向他解释，但我想盖茨会感到很不舒服。

5月底，也就是期权到期日前，我们收到消息，摩根银行将收购茂农铁路，即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路易斯维尔铁路。路纳铁路公司与南方铁路公司将共同拥有它。

针对这个消息，我们马上致函摩根银行，内容如下：“尊敬的摩根银行，鉴于在未征求我们许可的情况下，动用路纳铁路公司的资产为收购茂农铁路提供了担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承诺，我们持有的剩余 2/3 股票的期权必将得到摩根银行的执行。”

事实上，宣布收购茂农铁路，使得摩根银行对待这份期权合同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执行。自从开始收购路纳铁路以来，我从未如此放松过。函件一发出，我就美美地睡了一个安稳觉。

到了 1902 年 8 月下旬，总体的金融形势越来越不明朗，就像大海的航道上起了薄雾，大家都变得谨慎起来。这时，摩根先生从欧洲回到了美国。他邀请霍利和查理·盖茨见面。为了这次见面，我跟他们事先有一次交谈。

“我们现在占据了主动，因为茂农铁路的那笔交易，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立场。就是说，除了执行期权，我们要婉拒他的任何提议。”我最后做了总结。

如我所料，一连串的磋商开始了，摩根先生要求 6 个月的期权展期。他告诉盖茨，只需要短暂的等待，就能从股价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他将会成立一家南方证券公司，而这会帮助提升那些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当然前提是北方证券公司要在那场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著名诉讼中胜出。

但是盖茨的立场很强硬，他要求摩根以每股 150 美元的价格执行期权合同，即收购他们手中持有的剩下的 2/3 股份，共计 20.4 万股。我认为，当时霍利其实是倾向于同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期权展期的。交易完成后的 6 个月里，金融风暴席卷全国。如果霍利没有交易，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笔交易就此告一段落，整个交易我净赚了 100 万美元，与其他人相比不算多，也不算少。虽然在摩根的一揽子期权股票中，我由于只剩下 6 666 股，

获利较少。但是我入场最早，因此我的持股成本要比其他人低 15 个百分点。

这场交易也成了盖茨的经典之作被人们屡屡提及，被称作盖茨式的花活——通过威胁要控制某条铁路，并让摩根相信，为了铁路保持在绅士的手中，就必须出手买下铁路。盖茨显然扮演了一个跃跃欲试的恶棍，他的鲸鱼叉插在摩根这条鲸鱼的背上，而摩根也相信自己被逮住了。当然，当时人们议论的重点，还是盖茨及其合作者净赚到的 750 万美元。

实际上，收购路纳铁路股票最初的动机，是我想设法拥有或经营一条铁路。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这一希望越来越小。我就开始希望从这愈演愈烈的股权争夺战中抽身，说实话我从未预见到这一幕。我开始设法摆脱束缚。而盖茨就是在时机成熟时看到了利润，因此参与进来。摩根收购的股权中，我们只持有 1/3，而剩下的 2/3 都在盖茨那伙人手里，因此如果说，盖茨是为了让摩根难堪而加入，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们是逐利而来。

不管怎么说，这次交易让我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同时我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金融圈中一些思维缜密而稳重的人的目光。安东尼·布拉迪主动邀请我到中央信托公司执行委员会任职，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作为一个专注于交易的人，能收到这样的邀请是很不寻常的。如果我答应这个诱人的邀请，那么以下这些人都会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战友，他们是：佛莱德里克·奥尔考特、小亚德里安·伊塞林、詹姆斯·斯贝耶、布利斯、奥古斯塔·茱莉亚德和詹姆斯·沃利斯。

时隔不久，我又收到担任凤凰人寿保险公司董事的邀请。经过慎重的思考，我婉言拒绝了这些邀请。我对布拉迪先生的解释是：我认为作为一家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的董事，是不应该再进行投机操作的。而我目前恰恰喜欢留在证券市场从事投机交易。

其实，我已经开始强烈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意愿继续留在华尔街。当然，这些我没有告诉尊敬的布拉迪先生。

第14章

转折点

有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告诉他自己已是百万身家了。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亲切和蔼的脸上显出询问的神情，似乎对我说的百万美元不大理解。我以为父亲不太相信我的话，就说让他看看真凭实据。

“不必了，”他说，“你说的话我是信的。”接着便聊起别的事情。

也许我不该期待父亲有什么别的想法。父亲一直认为，与道德价值和社会贡献相比，赚钱多少是次要的。记得那还是在南卡罗莱纳州时，父亲就是这样的态度。当时母亲对父亲总有抱怨，认为他把治病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农场”上了。我在普特因贝铁路的投机中把他的储蓄金赔了进去，他的态度也没变，因为他对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便拿出更多的储蓄金，支持我去冒险。

但从父亲的态度中，我也开始对困扰我的问题做认真的思考。如果一个人有了钱，却不拿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即使拥有了亿万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市面上出售的东西，我现在都有能力买到，但我也认识到，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我不由得将自己的职业和父亲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做比较，从中我发现，钱我是赚到了，而父亲却在他的医学和卫生领域还有帮助自己的同胞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从内心来讲，我真的认为自己最初学医的愿望不该放弃。弟弟赫尔曼已

经是一名医生了，我很羡慕他。

我决定了，从最低限度讲，我也要以某种方式在情感上与父亲保持一致。当时，纽约的莱文顿大街建成了第一批公共浴室，这是父亲努力争取来的。父亲还撰写了有关水疗法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两本被译成德文和法文，但父亲依然像一般开业医生那样辛苦单调地工作着。他像往常一样乘坐自己的轻型马车去出诊，在休息时间不被打扰是什么滋味，对他来说几乎是不知道的。当他和母亲以及朋友共进晚餐时，很可能中间就被叫去出诊。大家去戏院看戏时，总要在售票处留下父亲的名字。

我从未听到父亲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抱怨，但他的工作显然在消磨着他的健康。1900年7月的一天，是父亲60岁的生日，当天我劝父亲放弃职业，领受一份收入，用这份收入去进行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能够得到新的自由，父亲自然非常高兴。做儿子的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更高兴。在此之前，他对我已经是个有钱的人还没有什么兴趣。

但父亲还是犹豫着，他无法放下他的病人，他了解他们的病情，觉得不能将他们移交给别人。他继续给这些病人诊治，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都随时在听候召唤。

我乐观地认为，我会用钱给父亲买来时间，让他集中精力在水疗方面做开创性的工作。到1906年，父亲在美国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权威。从1907年至1913年，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水疗系主任。

当时，很多医生对水疗法还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一种江湖骗子的把戏。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推广水疗法，父亲克服了多少障碍。我给一些大学和医疗机构捐了很多钱，希望他们加强物理医学的研究。我还帮助贝勒福医院（Bellevue）建立了物理医学与康复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模范机构。

在我努力进行这些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要和美国医疗协会的某个部门抗争，才能在医学领域为物理医学获得一席之地。1957年春天，是令我欣喜的季节。美国医疗协会准备为小亨利·维斯卡迪（Henry Viscardi, Jr）颁奖，表彰他在理疗康复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维斯卡迪天生丧失双腿，他

为许多残疾患者提供康复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维斯卡迪长期以来的工作正是我父亲首先倡导的，这种工作现在终于在医学界得到了承认和支持。

回过头来说 1900 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帮助父亲拓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但通过帮助他人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这是很难做到的。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不会满足于单纯地赚钱。我还认识到，把钱投入有价值的事业中，这是一种进步，但还远不像为某种事业做出贡献那样具有成就感。

///

不满意的心绪侵扰着我，但我并没有因此就付诸行动。一年多以后，在华尔道夫的一次晚宴又唤醒了我的烦恼。这次晚宴是专门为戴梦蒙德火柴公司董事长巴布尔（Barber）举行的。

就在自助冷餐会后，有人安排好桌子，准备玩百家乐。曾在 Goodwood 杯马赛中与盖茨合伙支持同花大顺夺冠的约翰·德拉克和房地产商人老伊尔·史密斯（Loyal Smith）联席坐庄。大家落座，买了筹码。白色代表金额最少的赌资，每枚价值 1 000 美元。

盖茨在押了几轮 2 000、3 000、5 000 美元的赌注后，就开始骂我们是派克佬^①，接着就提高赌注。哈里·布莱克（Harry Black）和人称哈蒂的哈德森也随之提高赌注，押到 2.5 万美元，但紧接着哈德森又拒绝提高赌注。我发现盖茨是准备大赌，就将赌注限定在每局 5 000 美元以内。客人们看到了我有防范，有两人也学我的样子采取预防措施，这两个人后来成了驻法大使，他们是休伍·沃利斯（Hugh Wallace）和威里斯·麦考米克（Willis McCormick）。

劳伊尔·史密斯看了非常不快，他正在帮助将各家赚到的筹码收进，取出坐庄输掉的筹码。“真讨厌这帮派克佬，”他说，“你们自己动手拿筹码。”

① 19 世纪中期，密苏里州派克县人来到西部淘金，以节俭、不赌博、不饮酒、不乱花钱而出名，便有了派克佬的外号。后来，派克佬开始用来指赌博时押注很少的人，或者在股市不敢大手笔投资的人。现在一般指没有野心或者缺乏胆量的人。

赌注又升高了，一局升到了5万美元、7.8万美元。

本来是平常的押注，现在却变成不计后果的赌博，这是怎么回事呢？除了输得惨的人孤注一掷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手风很顺，一直在赢钱，他就会头脑发热，认为提高赌注还能再赢钱。但这场赌局到了这种地步，没有谁输得很惨，也没有谁赢得很多。奇怪的是，一晚上下来，基本上都是平手，不管押大押小都难分输赢，没有谁只赢不输或只输不赢。

也许因为输赢没有最终的结果，盖茨感到很恼火。他随手往桌子上抛出两枚黄色筹码，每枚的价值在5万美元。庄家接受他押的注，别的玩家也随之提高赌注，但我没有随大流，依然坚持用不超过5枚1 000美元的筹码下注。

拿10万美元凭翻看一张牌来冒险，这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此情此景让我看呆了。我在想，这钱是真的吗？德拉克和史密斯脸上的表情让我相信，那是真的。

盖茨还是不满意。他往桌子上又抛出4枚黄色筹码。两个庄家一商量，接受了他的挑战。谁也没有把赌注翻倍。现在每局20万美元，我们都成了派克佬。盖茨虽然几次押了同样的注，还是既不输也不赢。

接着，他将自己的筹码收起，攥在手里晃了晃，发出声响，又用他那短粗的手指灵巧地摆出两叠同样多的筹码，在自己一边放一叠，把另一叠放在我正在玩的那一边。每一叠都有10枚黄色筹码，两叠一共是100万美元。

“这就是个小赌注。”盖茨边说边望着两个庄家。他稍微喘了口粗气，好像在压力之下的激动，讲话时的声调有点不同寻常。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两个庄家那里。史密斯表示反对，他觉得押得太多了，他不愿意冒险。

经过一番说服，史密斯终于同意接受赌注。德拉克开始发牌。只见他脸色苍白，但手的动作还是稳健的。史密斯站在他的身后，史密斯的脸色就像死人一样惨白，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水。

我看看自己的两张牌，那是一个天然9点，很快我就亮了牌。盖茨把我和他的牌都押上了，在我这一边，他就赢了50万美元。

接着，盖茨把自己的两张牌翻起来看，牌点不合意，就又要了牌，希望

点数能好些，但他还是输了。盖茨和庄家打了个平手。

德拉克是我认识的人中胆量最大、信心也最强的，他对这样的结果也表示满意。但盖茨不这样认为，他押注时，目的就是赢。

在晚上剩余的时间里，赌局的高潮落下了，因为庄家宣布，如果桌面上的赌注超过 50 万美元，他们就不能接受。但我们玩的时间还是很长，赌注的大小对我来说是适合的。说实话，赌注依然很高，我只不过拿着白色筹码跟在后面应付一下，每次押注都超过 5 000 美元。

说来很奇怪，牌局继续以平衡的方式发展。多押的人差不多都是输赢相当。有一位输得最惨的，却是原本最输不起的。我离开时留下了 1 万美元。

///

第二天上午，和平时一样，我在埃德文·霍利位于五十七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单身公寓短暂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就和他乘车到市中心去。他把盖茨和德拉克来纽约的原因告诉了我。他们准备和基恩、丹·雷德、霍利以及其他几人联手抬高股市。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接着，霍利又解释说他们计划怎样吃进 30 万股不同的股票。一路上，他都在和我谈论联手操作的细节，这是有意让我开心，并邀请我参加。

我继续沉默着。我在想，这样一帮抱着投机目的的人联手炒作股票，说明股市已显露脆弱的迹象。来到百老汇大街 20 号我们公司驻地，霍利站在楼梯上问我：“伯尼，你打算占多少份额？”

“也许是 25 % 吧。”我回答道。

霍利扬了扬眉毛：“我看可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霍利，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想买。”我说，“我想的是卖出。”

我向他解释，在一路的交谈中，我一直在想着前一天晚上华尔道夫的赌局，那是一场让人不安又有教育意义的赌局。我从中看到，钱如果是轻而易举地到了人们手中，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得来的钱好像不是真的。

在打牌和赛马时，人们将很大的赌注押来押去，这说明他们所有的价值观都已经丧失了。我对霍利说，市场在这些人的手里不会稳定的，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市场股价已经很高了，”我接着对霍利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就是股价实际上过高了。”

我的话可能触动了霍利，他到底是个有判断力、有见解的人。但在那一刹那，他还是反对我的观点。分手时，他没有说看淡股市的话。

我上楼到了公司，立刻要下单，准备卖出股票。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反对我的做法，他的态度是乐观的。华尔道夫那群看多股市的人在当天下午让我很恼火，他们要么拿我开玩笑，要么纠缠着让我加入。但我从他们身上到了事态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有一种不安稳的感觉。他们之所以出言强势，似乎就是在掩饰自己的虚弱面。

我通过电话告诉霍利：“和这群家伙在一起，那就是太傻了。”

“是啊，”他回答得有点勉强，“可能你说得对。”

就在他们合伙重仓买入的刺激下，股市开始上涨了，但很快又萎靡不振。

“就是让你看空的，造成了市场走弱，”这是聪明人在说，“下跌不会持续下去。”

但下跌还在继续，有一次的跌幅相当大。收盘后，我来到华尔道夫酒吧，在一张桌旁坐下，我听到一些交易员在讲着自我安慰的话。雅克·菲尔德也是站在看空股市的一边，他代表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与他们交谈。对于目下的行情，我不会以此和人争辩，我只想让结果来做证明。没多大工夫，詹姆斯·基恩来了。

“先生，你对豪斯曼这家优秀的公司印象如何？”他的声音很尖厉，“一边是公牛在咆哮，一边是大熊舞动着爪子，在龇牙咧嘴地低声怒吼！”

也许将自己的损失归于看空市场的人，能让自己的伤口得到缓解。但真正让市场跌落的肯定不是我在将股票卖出，而是股票价格抬升得太高，已经超过了经济意义上能做出合理解释的高度。至于说到区别，看空者的批评意见和卖出操作，既拯救了那些赌徒，也拯救了大众。不然的话，假如看空者对本来无法支撑的行情继续走高不加以阻止，也就不能阻止算总账时本会出现的更具灾难性的下跌。那样的话，赌徒和大众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对于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股市操作手来说，也很难认识到操纵只能在市

场上产生有限的暂时性的效果。说到底，一直都是经济事实和价值决定着一切。做空股市的人只能在做多的人把股票推升到价格过高而站不稳脚跟时才有可能赚钱。

一直以来，看多比看空更为普遍，这是因为乐观精神是长期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强烈的传统。但过分的乐观也会造成损失，这种损失甚至比悲观情绪更大，因为过分乐观时就会丧失谨慎和小心。

要想享有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要买家和卖家都兼有，看多做多的人要有，看空做空的人也要有。市场上没有看空做空，就像缺少了言论自由，失去了批评，对错误虚幻的乐观情绪没有人去抑制。这样，灾难就要降临。

///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开始厌恶起来。我是一个经纪人，我的职责要为别人管理投机账户。对于拒绝加入中央信托的董事会一事，我向安东尼·布拉迪做了解释，我认为一个投机者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在我看来，一个投机者应该独自踏上征途。在以后的经历中，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十拿九稳的事情”在市场上是没有的。况且，我也不希望别人依据我的判断行事，为此而承担责任。哪怕是最优秀的投机者也难免会犯错误，操作中会出现一些失误。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就要迅速地悄然撤出。

假如他的行为对很多人形成误导而犯错，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他承担了责任，就要给予他人和自己一样的逃脱的机会，这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就处于这样的困境中，这时，我或者替所有的人行动，或者马上告诉他们我的行动计划。但承担这样的责任总让人提心吊胆。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投机者为什么要独自上路，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我这时已经感觉有些不对头。一方面我在做着自己的投机交易，同时我还在帮助别人打理账户。但要想和别人的账户彻底隔绝开，就意味着我要退出豪斯曼经纪公司，这是很难做到的。还有，如果我离开了公司，后面会发生

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我 32 岁时，曾经想象过自己一生所需的金钱，这时都有了。说实话，我每年都要花上 10 万美元，而且还是现金。这些钱都是在 5 年内赚的。

在我们家族，除了外祖父沃尔夫外，还没有谁发财致富过，这主要是指独立战争以来。而且，外祖父去世时还是个穷人。父亲和母亲家的人们生活很好，都很满足。我自己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华尔街去学习法律，做那些穷困和不幸的人的守护者。

就在那个夏天，也就是 1902 年的夏天，我做出决定，去欧洲，我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股价已经普遍高企，基于这一点，我将持有的多数股票换成了现金。我在起程前，为了把自己的资本重新配置一下，就从公司提出些钱来，存放到国民城市银行。因为忘记带介绍信，我要求见一下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当时的银行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副总裁，他们就让我去见出纳霍利斯·吉尔伯恩。

吉尔伯恩问能帮我做些什么，我说开个账户，他问我是谁。这一问对年轻的我是个打击，我以为银行应该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斯蒂尔曼先生感兴趣的联合铜业和其他交易，我都积极参与过。

我感觉有些尴尬，就主动提到了咖啡商赫尔曼·西尔肯。这可能起了点作用，吉尔伯恩先生问开多大规模的账户。我掏出一张 100 万美元的保付支票。这张支票足以让任何一个狂妄的人看了羡慕。

妻子和我的父亲随我一起赴欧洲，同行的还有亨利·戴维斯（Henry C.Davis）。阿瑟·豪斯曼认为公司正是用人之际，就引进了戴维斯，他可以告诉我们霍博肯^①以西的美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戴维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在豪斯曼公司表现出色，使我们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要在这次旅行中报答他，让他对欧洲更熟悉，但我的努力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戴维斯随我们去了伦敦，但之后就不愿再继续走下去。他认为“我不会

^① 霍博肯市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哈得孙河边，隔河便是曼哈顿，19 世纪末是重要的工业商业中心。

讲当地的语言”的地方，他都不喜欢。戴维斯对欧洲没有好感，他不了解欧洲，也不准备去了解。

戴维斯曾做过探路工，那是在铺设北方太平洋铁路的时候。对股票市场的运作他很熟悉，但又不十分热心。如果他想知道股票的跌涨，他就要把视线越过我们这些盯盘者，目光移向广阔的田野，那里就有想要的答案。我还记得有一次和他一道驾车从一片广阔的田野穿过。

“我们每年把地里长出来的连鬓胡子剃掉就可以了，”他说，“我们成功的途径就在这里。”

我和妻子和父亲从伦敦出发，悠闲舒适的旅行开始了。我们向东穿过欧洲大陆，直到君士坦丁堡。接着，父亲就一个人去了维也纳、柏林和巴黎，到那里的专业圈里访问，在这些地方他非常有名望。我和妻子又回到了巴黎。

从我个人的前途来说，在旅行后，我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但我过去想成为穷人的法律守护者的想法，至此就放弃了。这是因为重回学校读书，再开始从事一个新的职业，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我还是没有理出头绪。

在巴黎，我们住在里兹酒店（Ritz）。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是我的小弟弟发来的电报，他说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遭受了灭顶之灾，公司处在危难之中。看了电报，我震惊得几乎瘫倒在地。

我马上从账户上划出部分资金给公司，坐上最早的船回美国。阿瑟·豪斯曼在码头接我。他告诉我，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科罗拉多南方这两条铁路的股价巨幅下挫，他和艾德文·霍利投资了这两只股票。我接手合伙人的账户，将大量资金注入，这样他就继续持有那些股票。在我的箱子里一直存放着这些股票，过了一段时间后，铁路的情况有了改善，我才将它们交给豪斯曼，这时他就可以卖出获利了。

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用自己的信用和资金帮助豪斯曼先生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保住了他一生的积蓄。我很感激他，是他给了我在华尔街起步的机会。我在最初的几年挣扎时，也是他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给予我的或许远多于我回报他的。

我的内心正遭受着煎熬，我反复想着自己的事业该有一个怎样的转变，我终于做出决定，逐渐从豪斯曼公司退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的，因为我和豪斯曼兄弟交情很深，但决定一经做出，我还是感觉轻松了很多，因为一仆服侍二主是很难做好的。现在我可以获得自由了。

我对托马斯·莱恩讲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支持。他后来还多次表示让我与他合作，但我也多次提到他当初对我的忠告，表示我要走独立自主的路。

1903年8月，我已经从豪斯曼公司完全撤出，搬到了百老汇大街111号，直到后来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我一直住在这里。这时我虽然已经33岁，但搬到属于自己的公司，那种兴奋的感觉一点也不比玩棒球时自己打出本垒打差，也不次于菲茨西蒙对我说我具有拳击冠军的潜质，同样不次于我千辛万苦谋得的第一份工作、推销出的第一份债券和将自己持有的一份债券的息票剪下来——那是佐治亚州太平洋公司年息5%的一周抵押债券。

新公司开业时，母亲发来了贺电，我把电文装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她还把一只绿色瓷猫送给我，上面有些红色的斑点，现在它还在我的写字台上。父亲把他的一张相片送给我，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让始终不渝的诚信作为你永久的座右铭。”

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第一条就是“不为任何人代理证券账户”。我严格执行这一准则，只有几个例外。一个是代理罗德岛参议员纳尔森·艾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账户，我们在一家橡胶勘察和开发公司结成了生意伙伴。有一次在橡胶公司开完会，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把一些钱投资出去用来获利。我对他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我认为国家经济将会复苏，这家公司将得到很多钢铁订单。他请我替他买下这些股票，我没有答应。

艾尔德里奇参议员的年岁和我父亲相仿，他曾在北方联盟军队中服役，他宽容地看着我说：“你听着，孩子，你买下那只钢铁股，把他放在我的名下。我的计划是赶上有资格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就告诉他我正在买入美国钢铁，卖单交给你了。”

我把股票买下交给他。很快，他就把自己买股票的消息告诉给一些在美国钢铁公司的朋友。朋友们都为他担心，生怕他出错。参议员说这是年轻朋

友巴鲁克建议买的。

“哦。”美国钢铁的人说。我是后来听说的，他们就回答了一个字。

对于艾尔德里奇参议员的政治观点我虽然并不赞同，但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发现在他的遗产中就有我替他买的股票，我为此感到高兴。

但除了几次私人的帮助外，我是不会替别人管理证券账户的。我之所以自己开公司，就是为了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如果出现错误，也就不会连累别人。

这些步骤一经采用，我就开始自主地从事投机交易，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不仅不能做更多的投机交易，相反，却越做越少了。1903年秋季过后，我用在股票上的时间逐渐减少，对股市行情的关注也逐渐减少。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了，转向了一些新的领域，我的时间被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和投资逐渐占去了。

第15章

与古根海姆家族合作

1889年，由于母亲阻止我去墨西哥为古根海姆家族服务，我的人生轨迹在这里发生了转折。否则，今天的我可能已经是一个矿石采购方面的专家了。但历史总是具有强大的惯性，16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收到了一个来自古根海姆家族的邀请。现在的古根海姆家族兴旺发达，已经是矿石采掘业中举足轻重的巨头，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仅仅在科罗拉多州拥有一个矿山一半股份的小矿主了。

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当年那个又高又瘦的毛头小伙子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当时，我窘迫地站在丹尼尔·古根海姆面前，干巴巴地推荐着自己，寻求第一份工作。16年是段漫长的时间，我也逐渐成为金融交易领域受人尊重的人——一些知名公司提出让我加入它们的董事会。我在金融领域常常逆市而动，并每每有所斩获。这让其他人越来越尊重我在谈判和证券市场运作方面的技能和技巧。

1893年金融危机过后，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经济萧条导致证券股票价格暴跌，如果在这时大量购入，那么经济复苏的时候，必然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可是我没有钱，无法抓住这个机会。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此我开始不懈地努力，以获得财务资本。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到了1903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的处境已是今非昔比。早在1902年，我就对过高的金融市场价格产生了疑虑，我不

会是最后接棒的傻子。我将自己手中持有的证券大部分套现，以便于更灵活地采取策略。一旦市场下跌，我就拥有先机买入证券，等待下一次的经济复苏，我可不会让昔日的遗憾再次重演。实际上，随着我对经济领域兴趣的拓展，对于新领域，我也率先采取行动，开展了风险投资，在当时可谓是开一时风气之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里，我致力于投资开发矿业，诸如铜、橡胶、铁矿、黄金、硫黄等各种原材料，成为矿物的供应来源。我喜欢这些风险企业，因为它们从地球深处夺取新资源，置于人类的掌控之下。它们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财富不是金钱，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我是个求新求变的人，每当这些公司发展到了有一定阶段，可以分配股利、坐享其成的时候，我就会撤出公司，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我享受的是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如果说1893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是对全国铁路的调和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复兴，那么1903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正是原材料基础的巨大扩展，满足了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

而我在采掘业领域的投资，不仅带来了财富，其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更是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被伍德鲁·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下属咨询委员会委员，我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负责确保充足的原材料供应，提供给备战计划。出色的表现进一步为我赢得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古根海姆家族，这是一个具有优秀品质、让人尊重的、非比寻常的家族。家族的领导人老梅耶尔·古根海姆（Meyer Guggenheim）曾是我父亲的一位病人。我在小时候经常能见到他，他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抽着雪茄，丝毫不在意落在自己外套上的烟灰。当我第一次进入原材料世界，就能成为这样一个家族的代理人，我觉得很荣幸。

人不同于野兽的地方，是他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会追求精神世界的财富和心灵的慰藉。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老梅耶尔的经营理念。一天，有人带着一个赚钱的机会拜访梅耶尔·古根海姆，他激动得不能自己：“古根海姆先生，请您看下我的计划，我相信不需要我多说，利润和权势就是最美丽的

语言、最强大的说客！”

老人不置可否，轻抚着连鬓胡子，雪茄的烟雾中轻轻飘出几个字：“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

这是所有古根海姆族人的一大特点，金钱不是经营项目的最主要目的，必须还有别的追求。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兴趣甚至比对商业更广泛，大量的家族财富用于艺术、音乐、航空技术和学术研究。这真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家族。

老梅耶尔在年近花甲的时候，决定改变家族的财富来源，他觉得经营精致的网眼、花边织物和刺绣织物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前途。在一位客户店主的力劝下，他对采掘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买下了一家铅银矿的一半股权，这个矿山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莱德威尔。

1881年，老梅耶尔巡视矿山的时候，发现矿洞里灌满了水，他决定购买排水设备。结果，浮出水面的，是古根海姆家族的财富之源。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最高统帅老梅耶尔的指挥下，整个家族就像纪律严明的军队一样，开始协同发展事业。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古根海姆家族做强做大的首要动力。老梅耶尔带着7个儿子开始着手学习采矿业务。全家人齐心协力，在新的领域努力开拓业务。黄金、白银、铅、铜、锌以及其他金属常常伴生于同一矿石中，因此他们的开采和提炼密切相关。如果矿石中的金属构成比例适当，会更加容易提炼。因此，古根海姆家族人人分工合作，潜下心来分别学习采掘提炼业的某一部分业务。

举个例子，老六西蒙(Simon)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墨西哥为家族利益服务，在欧洲待了2年，学习西班牙语和法语。后来，他背着行囊来到科罗拉多州的比尤布罗，做了一个提炼厂的计时员。

初生牛犊不怕虎。丹尼尔很快崭露头角，接过老梅耶尔手中的权杖，成为家族团队新的领军人物。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去世，其在采掘业的统治地位从未有人撼动过。至今，业内都有很多他全盛时期的故事流传。在这里，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为今天的各位读者揭示他的真实品行，看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如何为其他企业家诠释爱国主义的。

当时，战争的阴影已经接近了美国，政府开始加强国防力量。我作为国

防委员会负责原材料供应的负责人，必须确保原材料供应的稳定和充足。当时军方估计他们将需要近 4 500 万磅铜，我要做的就是，什么样的价格对于政府来说才是公平合理的。

这时我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小尤金·梅耶尔 (Eugene Meyer, Jr.)^①，他在铜业领域浸淫多年，有着良好的人脉和信誉，同时热切希望能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建议我们按照战前 10 年的平均价格来定价。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是每磅 36 美分，而我们计算出来的价格仅仅每磅 16.67 美分。

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矿业界是否愿意做出牺牲？我和梅耶尔去了圣雷吉斯宾馆 (St. Regis)，拜访下榻在那里的丹尼尔·古根海姆。每个星期天下午 5 点他都会在那里，接待任何希望短暂来访的朋友。我们希望能和丹尼尔先生单独谈谈。

我们告诉丹尼尔先生，战争的威胁正在临近，我们也将被卷进这场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很多美国家庭会送自己的儿子走上前线参战。我们不希望让这些家庭觉得，自己的孩子为了国家流血牺牲，而富人和大公司在趁机上下其手，大发国难财。铜价如果大幅度下调，支持备战采购，那么足以成为一个明确的信号，产业界已经为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而做好了准备。这就需要树立一个榜样，激励和引导全国其他企业家支持战争。

整个过程都是我和梅耶尔在侃侃而谈，丹尼尔先生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道：“我需要跟我的兄弟们谈谈，还去要和其他铜业公司谈谈。”当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给我们明确的答复时，他说：“明天到市中心的路上来接我吧。”

第二天，丹尼尔先生一上车，就告诉我们：“我想，铜的问题解决了。”

这件事让我真正认识了古根海姆家族的这种优秀品质。我认为也正是这种品质，使得他们在采掘领域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古根海姆家族经营采掘业一年左右后，他们发现，如果开采和提炼成为

① 小尤金·梅耶尔，美国金融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接受任命，指导美国战时工业生产和战时金融。

配套产业，才是采掘业最好的利润模式。于是，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比尤布罗——正是前文提到老六西蒙去过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价值 125 万美元的提炼厂。他们的矿石主要依靠从墨西哥进口。因此，当国会通过了对墨西哥矿石的禁运令后，古根海姆家族很快在墨西哥重新建了一家提炼厂。

19 世纪 90 年代，银矿和铅矿采掘业面临极大困境。这时亨利·罗杰斯、洛克菲勒家族和卢伟森家族控制的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开始大肆扩张，仅 1899 年就有 18 年企业被收购。这个托拉斯企业也邀请古根海姆家族加入，但是遭到了婉言拒绝。古根海姆家族要求得到控股权，显然就这一点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开始了。古根海姆家族与这家托拉斯企业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而古根海姆家族几乎每次都会赢得胜利。1901 年，托拉斯企业被迫重新坐到了谈判桌前，按照古根海姆家族的条件达成了和解协议。丹尼尔进入了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的执行委员会，而他的四个兄弟成为公司董事，控股权落到了古根海姆家族的手中。

///

这看不见的战争硝烟散尽时，我对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的股票产生了兴趣。在对这家公司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所罗门·古根海姆的邀请和协助下，我开始买入股票，并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将其作为合适的投资对象。很快，这只普通股出现了交投活跃的情形，而这更是吸引了市场上游资的注入。在 1905 年的全面投机性浪潮推高整个市场的股价之前，仅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股票就从 36 美元涨到了 80 美元。

古根海姆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竞争方兴未艾，商业竞争无处不在。1904 年，古根海姆家族的采掘业已经在太平洋沿岸和刚进入开发阶段的阿拉斯加拓展。这是重要的一步，当时的阿拉斯加的发展潜力给了市场无限遐想——甚至到目前为止，那里的发展都没有达到当时的预期。太平洋沿岸共有三家大型熔炼公司，即华盛顿塔科马铅矿熔炼公司、加利福尼亚塞尔比铅矿熔炼公司和加利福尼亚联邦铅矿采掘熔炼公司。洛克菲勒家族通过收购加利福尼亚联邦铅矿采掘熔炼公司进入了这一区域，如果能够再收购另外两家

公司中的任何一家，美孚石油集团旗下的公司就会成为古根海姆家族在这一区域旗鼓相当的对手。

古根海姆家族开始尝试收购塞尔比和塔科马，在几次尝试都败下阵来之后。我向丹尼尔·古根海姆建议，我愿意尝试一下，尽力扭转目前的局面。

威廉·拉斯特（William R. Rust），塔科马冶炼公司的掌门人，与我的朋友亨利·戴维斯私交甚笃。戴维斯建议我向拉斯特摊牌说明情况，拉斯特本人对于古根海姆家族没有任何偏见，他会尽其所能地帮助我，戴维斯也愿意从中帮忙。

这当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我需要赢得他的支持。他就是极其富有的达利阿斯·米尔斯（Darius Mills），经历了1849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老手。80高龄的他仍然极富精力，对自己公司所涉及的广泛业务保持着积极控制。他的经营极富商业效率，以他设立的多家帮助穷人的米尔斯旅馆为例，这些旅馆所提供的房间过夜只收费20美分，一日三餐仅需支付15美分，但仍能通过有效的管理，获得一些微薄的利润。他目前恰好在纽约，距离我的公司仅有5分钟步行距离。

达利阿斯·米尔斯既是塔科马最大的股东，同时还持有很多塞尔比股份。在他位于百老汇大街米尔斯大厦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他。不失尊严、老派守旧的礼仪，连鬓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还有那言谈举止，这一切都让我想起在南卡罗莱纳州做种植园主的外祖父沃尔夫。

当天我们进行了一番长谈。首先我陪米尔斯先生追忆了他在淘金热期间如何经常睡在马车下面，感觉时机成熟时，我转入了今天谈话的正题，我请他将持有的塞尔比和塔科马股票以期权的方式转让给我。他拒绝了我，却留有余地，我可以继续进行交易谈判。另外，他承诺不会同时和洛克菲勒家族进行谈判和交易。

1905年1月初，我和亨利·戴维斯前往西海岸，一同乘坐火车的还有来自佩吉律师事务所的卓普林（A. C. Jopling）律师。读者还记得的话，在我为莱恩收购莉杰特·迈尔斯烟草公司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完成公司并购使命——与佩吉律师事务所所有过合作。谈判在拉斯特位于华盛顿州艾佛利

特市塔科马公司的办公室里开始了。我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交易条件，以每股 800 美元的价格收购普通股，这个条件让人难以拒绝。很快，我们就拿到了签好的期限 45 天的买入期权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塔科马所有董事退出董事会、交付 90% 的普通股和转让现有的 4 个开采金矿合同（其中 3 座金矿位于阿拉斯加）。

塔科马公司的收购告一段落。我们南下旧金山，开始向塞尔比人攻坚。塞尔比公司的股东非常分散，而且有些人非常迷恋自己在公司的话语权，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外界开始猜测我并非是在为自己进行交易，旧金山的所有报纸都在关注和猜测我与古根海姆家族的牵连，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他们的猜测与事实其实基本一致，但这些却使得我们的谈判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像是灵敏的猎犬一样，嗅到了我们收购股权的气息，家族的触角开始发威。一天，纽约方面打来电话，让我立即搞定收购交易，说得就像是我在旧金山无所事事一样。

显然，收购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邀请威廉·拉斯特帮我解决塞尔比公司的股东问题——在收购塔科马公司股权的过程中，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可敬的达利阿斯·米尔斯先生也愿意运用他重大的影响力，帮我促进收购进程。最后，交易的一切条件都敲定了，当然我又让了几个点。现在就等着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合同。卓普林自己就可以处理这些收尾工作。3 月的头一周，我就跳上了开往纽约的 Overland 特快客运列车。

塞尔比股票的期权交易在我返回纽约后几天，就被卓普林推动完成。然而好事多磨，正当我松了一口气，准备执行塔科马期权时，另一个麻烦开始了。旧金山一个叫弗雷德·布拉德利（Fred Bradley）的矿业工程师，纠集了一帮人，威胁要推翻塔科马交易协议。3 月剩下的 3 周里，他们打爆了电报，搞得我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威廉·拉斯特和亨利·戴维斯两人施以援手，争取了布拉德利的和解，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两笔期权交易之后，洛克菲勒家族在太平洋沿岸和阿拉斯加可谓是大势已去，古根海姆家族赢得了胜利。现在到了论

功行赏的时候了。在交易开始之前，我们就达成了协议，如果交易成功，太平洋沿岸的这两家熔炼公司将会合并成一家新公司，而我可以得到一大批新公司的股票作为中介费用。但后来丹尼尔改变了主意，塞尔比和塔科马被吸收合并进了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

原定的并购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我的应得报酬也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丹尼尔他们让我和萨缪尔·安特梅耶（Samuel Untermyer）律师坐到了一起商量此事。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生意上和他打交道，安特梅耶先生表现出了他精明老练的一面，竭尽全力与我讨价还价，尽力为自己的客户争取利益，谋求最好的结果。而我——好吧，我就像一只毛发竖立的猫，情绪激烈，奋力对抗。

按照原来的支付计划，我在新公司的股份大概可以赚到 100 万美元，这是我为交易辛苦付出所应得的。我告诉安特梅耶先生，我厌倦了像这样继续讨价还价，我就要这么多。好吧，安特梅耶先生反问我，是否打算“打劫”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

这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就像发怒的狮子，双手支在桌上，身体前倾，盯着他：“你错了，安特梅耶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从未想过这个词。”

接着我离开了房间。

问题上交给了丹尼尔·古根海姆，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拍了板：“如果伯尼说他应该得到 100 万美元，那么就给他 100 万美元，他总是对的。”

在拿到支票后，我付清了法律费用和一些杂费，还剩下大概 90 万美元。之后，我开了两张各 30 万美元的支票，邮寄给了亨利·戴维斯和威廉·拉斯特。

戴维斯和拉斯特对于这张支票极为惊讶，我想全美国都找不到比跟他们更感到意外的人了。他们坚决退回这张支票。我对他们说，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必须收下。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鼎力相助，我怎么会完成交易呢？对此，我充满了感激。

///

这场期权谈判占据了我 2 个月的时间——从 1 月初到 3 月初。在这段时间，美国矿石熔炼精炼公司的股票不断攀升，从 80 美元涨到了 100 美元以上。

而在我了结塞尔比和塔科马公司的期权执行事宜的短短一周里，熔炼公司的股价已经超过了 120 美元。这种大幅的上涨让我深感不安。我匆匆从加利福尼亚赶回了纽约。各位读者应该记得，本章的开头提到，我给很多朋友推荐了这只股票；如果这种不正常的上涨持续下去，我担心会有很多朋友受到损失。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虑，我觉得自己应该建议朋友们抛出股票。当然我去见了古根海姆家族的人，把我的担忧和决定都告诉了他们。

当局者迷。人真的很难对自己的公司保持一个客观的判断。古根海姆家族不认同我的看法，他们不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虚高，并表示我的决定是他们不乐于看到的。古根海姆家族的人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矿业经营。但很遗憾，他们在股票市场不过是个初学者。这样的工商企业家比比皆是。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股票市场每每折戟沉沙。

生活告诉我，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那些据说是多才多艺的能人，我认为他们只会出现在传奇故事里，就像亚瑟王。转回我们的话题，爱德华·哈里曼，一个成就非凡的铁路建筑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詹姆斯·希尔建设了大北方铁路，但他在股票市场，就像个幼稚的孩子一样，运作技巧只能用拙劣来形容。

我卖出了自己的股票，一些朋友也接受了我的建议，抛空了自己持有的熔炼公司股票——我说到做到。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与古根海姆家族很接近的人，他们对我的建议置若罔闻。

1905-1906 年的牛市，正在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狂热，我发出的警告声音是如此的微弱。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调整之后，熔炼公司的股票开始继续攀升，就像开动的特快列车，攀升开始加速，越来越快。1905 年 8 月，股价越过 130 美元，11 月初达到 140 美元，月底前已经飙到了 157.5 美元。

说实话，这种疯狂的表现让我厌恶。

我对股票看淡的态度让古根海姆家族很不高兴，但股票走势让我的悲观预期不断落空，似乎又让他们得到了一些满足。这并未影响我们的关系。所罗门·古根海姆依然很信任我。他私下向我透露，公司为了实现对铅矿行业的整合和控制，准备收购全美铅矿公司。

全美铅矿公司在所有独立的铅矿公司中，是实力最强的。由于公司股本很小——只有 15 万股。因此，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通常非常清淡。在 1905 年 10 月至 11 月初，由于公司的盈利报告，以及整个股市的走高，全美铅矿公司的股价也上涨了。

我建议所罗门·古根海姆，尽管股价上涨，但收购全美铅矿的最佳途径依然是在公开市场购入大部分股票。他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我。我答应了，同时要求他为这一行动保密，任何朋友即使是公司成员也不能泄露，即使必要也不要让他们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告诉股市经纪人哈利·康登特——在美国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经纪人了，我要买入全美铅矿的控股权。我让他开场就迅速推高股价，吓退其他可能的竞买者。我觉得此战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迟则生变，时间拖得越长，实现控股权的机会就越小。

早上 10 点钟证券交易所开盘前，我已经坐在了办公室股票自动报价机前。与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直接连通的电话就在手边，随时等待发布指令。全美铅矿开盘价格在 57 美元左右，随着我们的吃进，大约上涨了 3 个点。这时我接到康登特的电话，竞买者出现了。

我告诉他立即停止买入。不久，我再次接到康登特的电话，不出所料，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竞买者出现了疑虑，已经停止买入。之后，竞买者开始抛售之前买入的股票。于是，我再次给康登特下达指令，保持原有策略，迅速拉升股价，逼竞买者抛售——他的抛盘，又会阻止其他买家入场。这正是我的目的。

当下午 3 点收市锣声敲响的时候，我已经为古根海姆家族赢得了控股权。仅仅一个交易日便大功告成。多亏康登特机敏灵活的操盘，仅仅比开盘价上涨了不到 8 个点，以 64 美元多一点收市。

这样一个娴熟机智的操盘手是多么难得啊！

收购全美铅矿公司，给熔炼公司的股票带来了新高。1906 年，熔炼公司的股票达到 174 美元的高位，所有的管理层、持有股票而赚钱的人，都在欢欣鼓舞地谈论着股票，并坚信会涨到 200 美元。他们没有看到阴影已

经逼近。

股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整体跳水。熔炼公司的股票迅速跌到 161 美元，古根海姆家族的经纪人全力阻止股票下跌，但一个反弹之后，股价继续掉头向下。螳臂当车，徒劳无功。

倖过于人，是所有人骨子里的劣根性。当不幸降临的时候，如果能够找到可以责怪的人，就能显示自己必然是无辜的，这种荒谬而本能的自我尊严保护机制，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特点之一。在股价位于 120 美元时，我多次提醒，反复警示过一些人上述的风险。正是这些人在打击降临的时候，因失望而将怨恨和怒火倾泻在我的身上。业内开始出现流言，熔炼公司的股价骤跌不是因为股票价格虚高，而是巴鲁克对股票进行了“空头”操作。在这些入迁怒的心理下，有关我做空的流言一时间甚嚣尘上。

对于古根海姆家族这样给予我机会的人所拥有的公司的股票，基于我做人的原则和行事准则，我绝不会通过买空卖空这些股市技巧来袭击他们。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也是最无耻的谎言。

古根海姆家族很快也听到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流言蜚语。三人成虎，他们好几位兄弟开始疏远我，对此我感到非常郁闷。但是清者自清，我下定决心，除非古根海姆家族的人再次提起此事，否则我坚决不出面否认对我的指责。我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所罗门·古根海姆说我参与了做空熔炼公司的股票。

我马上见了面，我努力保持平静客观，将熔炼公司股票上涨和下跌的整个过程，简明扼要地向他做了阐述。我离开的时候，他依然很气愤，但我感觉不再是因为他相信我袭击了他们的股票而感觉受到了欺骗，而是因为他在后悔忽视了我曾经的提醒和警告。

第二天，事情发生了惊人的转折。令人痛苦的会面还记忆犹新，所罗门·古根海姆赶过来向我道歉了。因为一位证券经纪人，同时也是古根海姆家族的亲戚，他告诉所罗门·古根海姆，自己和其他人此前声称我在股市做空完全是无中生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股票的暴跌导致华尔街开始流传质疑古根海姆家族财

务稳定性的谣言。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流言除了让人们的心失去平静，还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一天下午，我来到古根海姆家族位于百老汇大街 71 号的办公室，询问是否愿意接受我存放 50 万美元，以表示对古根海姆家族的财务状况的信心。丹尼尔先生和他的几个兄弟热泪盈眶，再三对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询问还能对此提供哪些帮助。他说道：“足够了，只要让人们相信，公司在正常经营就足够了。”

还有比购入公司股票更能增强人们对熔炼公司信心的办法吗？我正是这么做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事也使得我和古根海姆家族的关系更加亲密。丹尼尔向我咨询，古根海姆矿石勘探公司打算处理大批的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有人建议将股票抛售给另一个古根海姆家族持股的辛迪加财团，这样有很大的利润。他希望我能够直抒胸臆。“你知道，你来到这里，就意味着你是我们的兄弟，也希望你把我们的兄弟当作兄弟一样。”

“作为兄弟，”我回答说，“那么我就坦言相告。”

我告诉他，如果古根海姆家族将股票卖给另一个自己持股的公司，就像是把股票从左手交给了右手。那会让人以为，古根海姆家族损害了勘探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来牟取私利，这对古根海姆家族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丹尼尔先生举手示意：“感谢你的坦言相告，我的兄弟，你总是对的。”

丹尼尔先生激动地握着我的手，感谢我让他避免了如此重大的疏忽。后来，他在好几个场合都重提此事。

第16章

寻找橡胶

我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 8 或 12 马力^①的潘哈德^②。有一次在巴黎至波尔多^③的车赛中，我的车参赛获得第二名。1901 年，伯斯维克（A.C.Bostwick）建议我买下那辆车。他投资美孚石油公司继承了一大笔财富。

潘哈德在那个时代跑起来就像个怪物，它的速度很快。买下它我非常自豪，当我能够自己驾驶后就更得意了。买车时我还特意请了一位专职司机，他叫海因里希·希尔根巴赫，对驾驶技术非常熟悉。海因里希没有喝醉时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嗜酒如命，这样再驾车就增添了很多刺激。

潘哈德的点火系统是由一些电子线圈组成的，点燃时就有爆响，就像一门小型的加农炮在开火。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人不敢乘坐。北泽西沿岸是我们度假的地方，在那里谁都清楚我们的潘哈德什么时候会开过来。每当这时，大家就会从自己的小马车上跳下来，牵好马笼头，不让马被惊吓。

我的一位邻居，小尤金·梅耶尔的父亲，他认为我的潘哈德“在公共场所扰民”，可是我要过许多年才能领会到。

梅赛德斯，黄色车身，40 马力，花费了我 22 000 美元，这是我买的第

① 1 马力 = 735.499 瓦特。

② 潘哈德，创建于 1887 年的法国汽车制造公司。

③ 波尔多，世界葡萄酒之都，法国第四大城市。

二辆车。W·K·范德比尔特有一辆车，和我这辆一样。也可以说，我的车和他的一样，他那辆车在美国的同类车型中是第一辆。

我这辆车装有电子管，第一天我开上它跑了很远，一直到了格兰特将军墓，直到出了故障才停下来。后来，我还开着它和伯斯维克在朗布兰奇的小路上做了一次表演赛。他开的是国产车，车速是每分钟1英里多一点。对于这次表演赛，大家反映很精彩，但没有谁会比我感触更深。

汽车诞生早期时的交通规则有这样一条规定，当一辆马车上的人举手示意时，汽车驾驶员就要立即停车，等待马车主下车把马勒住。在纽约，规定汽车行驶速度的上限是时速10英里，禁止汽车进入中央公园。因为有这些限制，所以我多数时间飙车是选择在新泽西州。那时，欧洲的道路等级比我国要高，所以到了夏季我就会把车运出国，就是为了玩个痛快。

早期的汽车价格很高，而性能又不稳定，一个车胎经过几百英里行驶不爆胎就算好事了。

我不敢说大话显示自己预见到汽车发展的前景，但我当时确实认为，开车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深受人们的喜爱，对橡胶产业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

在1903年的金融恐慌期间，在我买进的工业股中就包含了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股票。生产橡胶的企业当时还不多，而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持有这家企业的股票，也促使我对橡胶消费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激发了我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来整合橡胶产业的念头。洛克菲勒家族就曾这样涉足石油行业。

从我个人的财力看，我还无力做成此事。于是，我在1903年金融恐慌的第一波冲击还未结束时，就开始到处寻找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一方面要有雄厚的资本，同时在业内要具有领先的地位。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感到古根海姆家族最适合。为了实现建立橡胶帝国的梦想，我找到了丹尼尔·古根海姆。

我请丹尼尔先生和我一道去收购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控股权。当这只股票因为金融恐慌而处于低位时，我就买进了一批，这时已经上涨了一些。我主动提出一个建议，将为已经买入股票所付出的价格与为获得控股权需要另

行买入的更高价格进行平均处理。只要能 and 古根海姆家族合作，这个代价我愿意付出。

丹尼尔先生表示他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他要和几个兄弟商量一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消息。

我买的橡胶制品股票已经涨至利润可观的价位时，我的心理却很不踏实，我的愿望不知能否实现，于是只好让橡胶联合企业的设想放在次要的位置，将股票全部抛出。

几个月过去了，丹尼尔先生向我打听那些橡胶股。我说因为等待时间太长，我已经失去耐心，所以已经把股票抛空。他对我的举动表示惋惜，接着就提出了另一个和橡胶有关的提议，希望我能做出调查。

这个提议的目标就是，设法寻找到一个有足够大的供应量而且可靠的橡胶来源。这个目的达到了，橡胶的工业用途就会得到扩展。这时，种植园才开始种植橡胶。橡胶的全部来源都是野生的，它们大部分来自亚马孙河下游流域的巴西 Para 地区。野生橡胶的品质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由土著人来采集，要想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仅仅依靠他们提供是不行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10 万吨橡胶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需求量也是相当大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担任国防部橡胶委员会主席时，美国对于橡胶的需求一年就达到了 67.2 万吨。

有位发明家名叫威廉·劳伦斯（William A. Lawrence），他发明了一种新工艺，可以从银胶菊中提取橡胶。银胶菊是一种银灰色灌木，属于菊科紫苑族植物，产于墨西哥北部。劳伦斯向托马斯·莱恩和纳尔森·埃尔德里奇参议员做游说，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两位又把古根海姆家族竭力拉进来，就像我们把他们拉来入伙一样。丹尼尔·古根海姆能来找我，都是莱恩和埃尔德里奇的功劳。

我来到墨西哥收集第一手材料，要把银胶菊的发展前景搞清楚。这种灌木生长在数百万英亩的半沙漠地带，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做人工培植，三年左右就能成熟。随着考察的深入，我的兴趣也更大了。在我家门口，在气候条件有利于健康时，存在着一种能和热症肆虐的南美洲和非洲丛林所产橡胶

形成竞争可能的橡胶供应来源。

这次实地考察促成了大陆橡胶公司于 1904 年成立，后来又变更为洲际橡胶公司。埃尔德里奇参议员、莱恩先生、丹尼尔还有我，在公司里都持有相同的股份。另有一些股份被约翰·洛克菲勒、H·P·惠特尼、列维·莫顿(Levi P.Morton)、毕林斯(C.K.G.Billings)还有他们的一些亲属和朋友拿走。

///

我们寻找橡胶并不只在墨西哥，事实上，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公司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进行勘察。我们派出的人员曾深入亚马孙河上游，他们翻越了安第斯山脉，沿着山脉西面山脊向下寻找。在非洲，他们沿着刚果河逆流而上，把刚果河支流都找遍了。还有几支队伍在波罗洲半岛和海峡殖民地^①勘察。

在非洲，我们有两个人失踪了，一个在加勒比海遭遇暴风雨落水而亡。威廉·斯戴顿(William Stayton)曾在委内瑞拉的热带丛林中被困，后来他因为坚决要废除禁酒修正案而出名。斯戴顿在经过艰难跋涉后，终于到了海边。他看到远处海面上有一只双桅小帆船，就大声呼救，他游过去上了船。他们的相遇对于船上的人和斯戴顿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船上的人都染上了黄热病。斯戴顿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受过训练，他接管了这只帆船，把它带进港口。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②邀请我们到非洲探险。他是个非凡的人。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发现，对于自己奢华的生活，小王国的收入是无法满足的，自己对国家所抱的远大理想也难以实现，于是他就想改变这种现状，办法就是让比利时成为一个殖民强国。

经过一系列的灵活处理，利奥波德将物产丰富的刚果河盆地建设成为貌似独立的刚果自由国。接着，他将其纳入比利时的势力范围。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从经济的角度讲，所有这些成功

① 婆罗洲半岛位于东南亚，归属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原英属殖民地，包括马来半岛南部和西部及附近岛屿，也包括新加坡。

② 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时国王，1865 年继承王位，因在中非残暴的殖民政策而闻名。

的举措，都应该是像摩根、哈里曼、洛克菲勒或莱恩这样有才干的人才能做出的。

比利时王室对刚果河流域最富饶的地区拥有经营特许权，他们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非常野蛮的开发，特别是在早期的开发中表现得更为残酷。刚果橡胶有着“红色橡胶”的美名，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橡胶的颜色，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据说是当地居民为生产橡胶付出了血的代价。一些强国对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做了刻意的渲染，利奥波德耍弄狡诈的政治手腕，这让一些强国大为恼火。当然，比利时也做出了反向宣传，声称这一切都说明一些国家的忌妒，但在我看来，所谓“红色橡胶”的说法还是有来头的。

到了1906年的夏天，利奥波德已经71岁了，他觉得对刚果政府该进行重组了。他对当地居民的残暴行径，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他对此再也不敢漠然视之。利奥波德打听美国对天主教最为信奉的资本家是谁。有人提到了托马斯·莱恩，他在自家建了一座私人天主教堂。

利奥波德听说此事时，莱恩正在瑞士，他当时正热衷于购买艺术收藏品。来到布鲁塞尔后，莱恩见到了利奥波德。利奥波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样，就诞生了美国刚果公司和刚果森林矿业合作公司，后者一般被称作森矿公司。美国刚果公司享有特许权可以寻找和开发橡胶新来源，森矿公司作为经营更为全面的企业将立足矿业和林业的开发。

利奥波德有着商人的精明，他用特许权做交换，从两家公司中都得到了一半的股权。另外，森矿公司1/4的股权留给了比利时资本，莱恩的股份只占25%。我真是想象不到，如果不是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又精于商道，还有谁能把托马斯·莱恩诱骗到这项交易中来，接受这样的结果。

比利时王室所给予的支持感动了莱恩，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家。他将古根海姆家族、H·P·惠特尼、艾尔德里奇参议员，还有我本人以及其他两人都拉进了项目。丹尼尔·古根海姆开始没有兴致，他一向与劳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为自豪。他不喜欢利奥波德作为雇主的恶名。他认为，如果参与项目，就要公正地对待当地工人，以此作为先决条件。

我参与这些风险投资拖延了一些时间，因为我怀疑利奥波德的行为旨

在消除美国对他的批评，但是莱恩的热情很高，他坚信那些特许权提供了实行人道主义的好机会，我们每个人也有机会成为塞西尔·洛兹（Cecil Rhodes）^①。于是，当古根海姆参与进去时，我也决定加入了。莱恩期待着对刚果劳工状况的改善，这个愿望后来还是实现了。

经过两年的勘察，期间充满了危险和艰辛，美国刚果公司的特许权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在森矿公司的地产上却找到了钻石，森矿公司的股票成了很好的投资对象。对这两家公司，莱恩一直充满热情。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家公司是一个国王请他帮忙开的。第一次发现钻石后，莱恩就经常在口袋里揣上几颗，到处炫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像是一个小男孩在炫耀自己收集的玻璃弹球。

///

但对我们来说，寻找橡胶的重点还是在墨西哥。1904年初，我在墨西哥期间决定购买几百万英亩土地来种植银菊胶，还要建一家工厂，利用劳伦斯的新工艺专利从银菊胶植物中提取橡胶。

我们乘坐自己的私人专列奔向墨西哥，同行的有我的妻子、弟弟赛林、在北方太平洋股票轧空行情中有突出表现的艾迪·诺顿，另外还有一些人，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从得克萨斯州拉雷多过河进入墨西哥。当列车经过海拔最高处的阿瓜连特时，我的腹部和胸口突然感到疼痛，但列车翻过最高的地方后，症状就消失了。

我们的住地在墨西哥城的伊图尔维德（Iturbide）宾馆，当地人称为Ity Bitty。在这里，我们平生第一次看到斗牛。大多数运动我都是喜欢的，特别是赛马，总让我感到紧张刺激，直到现在，我还在南卡罗莱纳州寻找那种令人激动刺激的感觉。但在墨西哥，我却不希望看到斗牛。好几匹马被公牛顶伤，鲜血从伤口流出凝成了块。对这样的场面，我感到恶心和愤慨。

我的妻子和赛林把多数时间都花在购物上，买的东西可谓花样繁多，其

^① 塞西尔·洛兹，生于英国，曾参与南非淘钻热。他是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一名狂热的殖民主义者。

中就有半宝石和墨西哥珠宝。当他们出门旅游时，我就埋头于生意，和墨西哥官员谈判。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被法律、技术、农业甚至社会问题给埋没了，通过这些问题，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

逗留时间是短暂的，在这期间，墨西哥在我面前渐渐呈现出对比鲜明的画面。在波菲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iaz）^①周围聚集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有才华，讲礼节，有相同的趣味；他们这个社交圈优雅，比得上任何欧洲国家首都的社交圈。但就在他们枝繁叶茂鲜花璀璨的庭院外，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抵债奴却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人们才发现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但当时的我还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对这种社会问题，我没有予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而我理应如此。

去墨西哥之前，我就听说在那里和官员打交道有些特别的做法。以我的经验，我只能说自己还没有发现墨西哥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我认识一些墨西哥人，他们很诚实，但也有些人不诚实；有些人私心很重，有些人却很爱国。总之，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你又期望遇到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位墨西哥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名叫帕布罗·马丁内兹·戴尔·里奥。他能讲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的形象像西班牙大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放在世界上任何一群人中，都是很出众的。

戴尔·里奥对美国人有所担忧，担心美国人对墨西哥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他对我说过，他很担心给予美国人的特许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美国人攫取墨西哥北部的借口。

几年后，戴尔说的话应验了，我们石油界就有人提议要做戴尔所担忧的事情，幸亏伍德鲁·威尔逊出面阻止，不然的话那些人真的就要行动了。

此事就发生在我们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威尔逊总统邀请我到白宫，那里有一场关于石油短缺问题的讨论。当时的形势是，石油短缺使我们的各项军事计划面临危险。这时就有官员提出占领位于 Tampico 的几座墨西哥油田，几支海军分遣队已经得到预警。

① 墨西哥总统，于 1870—1880 年、1884—1911 年两度在任。

威尔逊总统情绪非常激动，他几乎不能等到争论结束，就以坚定而慎重的语气说：“你们现在希望我做的，正是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他的口气非常严厉。“你们说墨西哥的石油对于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德国在入侵比利时时也这么说过。入侵法国时也说是‘必不可少的’，先生们，”最后他这样说道，“你们有多少石油，就用这些去打仗。”

为了开发墨西哥的橡胶，我们置办了 300 多万英亩地，这是通过常规渠道购买的，价格合理，没有附带条件。虽然听说有捷径可选择，但我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在向墨西哥人介绍自己时，我们向他们表示，我们希望给墨西哥引进一种产业，这样既能把数百万英亩的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又能让墨西哥人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些好像就是迪亚兹的真心实意。我们和墨西哥人签订了很多合同，后来在执行程度上与其他地方都基本一致。

事实上，执行合同时有些麻烦，但并非出现在墨西哥，而是出在美国国内。在墨西哥的托雷翁（Torreon），我们建了一家工厂，从银菊胶中提取橡胶。开工前，我们签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美国的橡胶制品公司在两年里按照实际产量接受托雷翁工厂所生产的橡胶。托雷翁工厂刚开工，橡胶公司居然拒绝履行协议，理由是产品不合格，但这不是事实。

生意上的分歧，一般我都会想办法在法庭外解决，但这次我对美国橡胶公司提起了诉讼，美国橡胶公司已经获得了橡胶制品公司的控股权。但摩根和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George F.Baker）硬要拉住我们阻止我们控告。于是，我就建议由我们收购美国橡胶公司，把它作为我们所产原材料的制造业的出路。此事没有做成。我又找戴蒙德公司，计划和该公司建立生意往来，但因为对方想得到更有利的交易条件而作罢。

我无法和美国橡胶公司抗争，为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将所持有的洲际橡胶公司的股份处理掉，从公司退出。但洲际橡胶公司和其他买家采购自己的产品，在 1910 年墨西哥爆发马德罗革命推翻迪亚兹的统治时，公司的红利也正开始支付。反对派的军队对我们的种植园肆意骚扰，托雷翁被迫关门歇业。但在此时，这一风险项目已经形成了稳健的经营管理模式。

尽管我认为年事已高的迪亚兹为国家也做了很大贡献，但从他被推翻后

新生的墨西哥看，还是有了进步。我当时就感到，美国人忽略了在墨西哥的大好机遇。墨西哥的局面有了改观，但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

困扰墨西哥的问题，一部分来自过去遗留下的对帝国主义的疑虑，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出生时，美国处于南北内战后的重建时期，清楚过去的噩梦给人们带来的深刻印记。但这些欠发达国家要想处理好经济难题，就要将过去埋葬，不能让过去的幽灵在身边游荡，它只能给现在带来挫折。

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过去的不平遭遇总是耿耿于怀，这就使他们对自身的利益缺乏清醒的认识。

有一件事没能引起这些国家的注意，就是对人们的利润动机缺乏理解。人们经过辛勤的付出应该有所得，也就是收入要大于投入，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如果投入大于产出，能够给予分配的必然减少。赢利企业对于国家独立和自由的贡献，肯定要大于亏本的企业。

当然，在利润的分配上可能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在利润条件不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徇私舞弊的行为能够得到惩处。

利润动机作为一种工具，能帮助人们获得自由。人们的工作动机是什么？通常有三方面的原因：喜欢工作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服务、对利润和收益的渴求、在某个权威的高压下而工作。

在一个社会中，吸引人们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因素一旦活跃，所需要的推动力就大于缺乏这种激励因素的社会。

欠发达国家在利润的观念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卡尔·马克思的理念，也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特有的产物。在这些欠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扮演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但从古代罗马、古代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历史看，在资本主义兴盛前，帝国主义就已经先期出现了。

我们从苏联更能发现，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倾向，即使没有利润的趋势，也一样存在。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就在不断地摒弃过去的

帝国，而苏联却在竭力建立一个新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它们说明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国家是优是劣，不能单凭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标签。我觉得，衡量标准应该是它们能否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有所作为。

我对这个标准的强调，是源于国家对外政策的水平极少会高出其国内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在海外的运作与国内相比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异。一个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多，那么在对外政策上也会倾向于帮助别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一个政府如果蓄意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有可能推低每个与之有交往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引入外资，确实能为国家带来自身所缺乏的资源，引进资本的同时，还会引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这些正是那些欠发达国家所缺少的。只要为引进资本和管理技能所付出的代价不算很大，那些欠发达国家就能从外资的投资中获益。经过这样的交往，欠发达国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如果他们增加了外资的风险，就等于增加了自身对一切外资必须付出的代价。

简单地说，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当前所要争取的，就是在使私人投资互惠双赢的条件下达成一致。在公平的原则下达成谅解是不难做到的。当然，外资的投入应当有益于改善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在技术培训方面也要为欠发达国家做出贡献，让受训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得到稳步的提高。在可以获得本地资本的地方，外资应该尽量给予本地资本更多的股份。

从欠发达国家的角度讲，对于国家的有序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应该防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歌功颂德：承诺能够带来一切，但结果却是束缚和制约。学会自我管理的方法和艺术，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自身在对外政策上，不要比其他国家做出更多的承诺，重要的是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让它们学会自我管理。

我们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都期望这些国家保持自由。

第17章

为美国寻找铜

当时间的脚步走到世纪之交时，我逐渐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件在你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在证券市场或者商品市场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当时在伦敦时所做的套利交易，以及后来我们在圣迭戈海战后几乎战胜所有纽约经纪行一类的交易，带给我最大的利益并不是银行里的存款不断上升，而是让我充分地意识到空间上的相互关联性，认识到世界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会如何迅速地在华尔街广为人知。当我在从事铜、糖、橡胶及其他原材料的交易中，也逐渐领会到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可以自动达到平衡。

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才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和各种力量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变得是多么的全面和紧密。面对着突然间数倍甚至是数百倍超过现有供给的一切需求，我都不得不做到一种权衡，让同样的东西在众多竞争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达到最大化。这种权衡经常会体现在一个紧急情况 and 另一个更紧急的情况之间的对比选择上。打个比方说，就像潘兴（Pershing）将军需要大量的骡子将他的枪炮拉到前线一样，而我们却不得不和西班牙进行交易，将我们自己短缺的硫铵售出。同样，我还需要在同样吨位的钢材在何处能够生产出更大的贡献做出一个决策——是用来建造一艘驱逐舰还是用来建造一艘商船，是留在国内备用还是运往法国的一

家军工厂，等等。

当然，所有这些权衡都是我在激烈的战争中被迫学会处理的。不过，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由于我从事金融交易的种种经验，我也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将经济因素和国家防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联系。

在 20 世纪初，出现了两种新的情况。在嗅觉灵敏的人眼中，这或多或少地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走向。首先，是德国和美国作为新兴的海军强国出现在世界的版图之上；其次，是“电气时代”作为一种后起之秀进入人们的视野。

新生的电气技术鼓励着人们在全世界搜寻每一种能源，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迫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寻找原材料新能源的行动，恰恰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之一就是赚取利润的动机。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仍有不少的支持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信条却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追逐利润的动机虽然存在，但是并不是人们在全世界开发自然资源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工业文明全面大步发展所驱使的。在后来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新技术新发展，迫使人们利用更多的物质能源。同样的这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家对于国防安全和其他方面的需求发生了“质”的改变。例如，随着旧式武器逐渐被淘汰废弃，所有海军舰队必须重新组建。

搜寻新材料这项行动并不是单纯地只在国外发生，在 1880—1890 年这 10 年之间，世界的铜产量增长了 10 倍。从外太空看，整个地球就像是被梳子梳理过了一遍一样，人们四处寻找新能源新矿体。当然，这种急速增长的需求促使很多目光远大嗅觉敏锐的人投身到铜业领域。其中的先驱者就有显赫的古根海姆家族。但是这种需求也让美国西部各州的人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使用低品位的矿石。不能说这个思路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只能说这基本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铜的供应上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我自始至终都在提倡对国内矿石加大集约式开发的力度，并且很荣幸地为国家的首次试验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作为一名融资人，长达 9 年的辛苦努力试验、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得这一实验项目大功告成。

///

在犹他州宾厄姆附近，恰巧发现有一个大而且幽深的矿化斑岩峡谷。经过岩体测试发现这里的岩石在生长的过程中蕴含有铜，但是这里的矿石品位太低，似乎是谁也不觉得这里的矿石有进行开采的商业价值。一位住在宾厄姆地区的老者——恩诺斯·华尔（Enos A. Wall）上校，在这个含铜的峡谷买下 200 英亩土地，花费了 2 万美元，试图从中提取到铜——显然他并没有成功。

华尔的钱似乎是白白扔进了谷底，这时来了一名高大健壮但是爱虚张声势的矿业工程师，他叫作丹尼尔·杰克林（Daniel C. Jackling），来自密苏里州。虽然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矿工，曾经还是一名大学的教授。在来到宾厄姆州之前，杰克林一直在科罗拉多州卡农城经营一家锌矿，他一直在进行试验，要从这种低品位的铜矿石中提炼出铜来获得利润。

有一个生于国外的大资本家名叫戴勒马（Delamar），他的手里持有一份宾厄姆州地产的期权，为了不让他手里的期权变成一张废纸，他让他的工程师去开采峡谷铜矿，但是他的工程师告诉他峡谷的铜矿根本不能赚到任何金钱，他只好让他手里的期权慢慢过期作废。杰克林就建议查尔斯·麦克内尔（Charles MacNeill）买下这个峡谷。

在 1903 年 6 月，犹他铜业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董事长是麦克内尔，副董事长是华尔，总经理是杰克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往往是聪明人不断地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实际上事情往往只用几个简单的字就可以概括，有人说这叫作透过表象看本质。杰克林的想法也符合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通过实验发现，用传统的开采方式通过常规的隧道和竖井开采矿石并不能获得什么利益，就提出用蒸汽掘土机来开采——也就是现今仍在沿用的露天开采。然后，将挖掘出来的所有矿石和岩石都投入研磨机之中，再通过一种浮选工艺分离出铜，最后进一步精加工提炼出精铜。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使之成为经济化产物，杰克林建议建造一家研磨厂，这个厂子每天的工作量极其巨大，需要处理 3 000~5 000 吨的矿石，远远超

过同类的工厂每天只需处理 300~500 吨矿石的工作量。如果能够提高研磨机的处理能力，而又不额外增加工厂的常规性支出，那么从这些低品位矿石里提炼出铜并取得丰厚的利润这件事就是可行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

从一开始，大家听完杰克林的设想就明白一件事，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试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会花费大量的金钱。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现价是每股 10 美元，公司组织者认购大量的股票，但是仍然让公众无法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且投资而获得足够的运营资本。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麦克内尔找到了我，和我深刻探讨了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所能取得的利润。

于是，我答应见一面杰克林，刚一见面就觉得他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人。他的那套设想在我看来在理论上还是挺合理的，就是将刚刚出现的大规模生产理念投入采铜技术中去，如果真能投入实际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和成就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决定买入很多股份。

因为拿到手的资金实在是有限，杰克林只好建造一个装有一套研磨机和选矿机设备的工厂，通过对它的实验来计划未来更大规模生产时所能采取的最经济合理的方案。不到一年的时间，工厂就顺利运作起来，在这期间，我们每一个人都焦急而又期盼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表明，这个实验是完全可行的，能够产生足够的运营利润。

杰克林想要进一步推进，建造一个大型的工厂。可是，要是建造一个大型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的资金，可能数量会达到数百万美元。那年是 1906 年，就在犹他铜业公司正在多方面寻求资金帮助的时候，古根海姆家族决定正式进军铜业市场开疆扩土。

原来，在宾厄姆州开采铜矿一事引起了古根海姆家族的兴趣，他们邀请约翰·海兹·哈蒙德（John Hays Hammond）先生对此事进行详细的调查。哈蒙德是一名名噪一时的矿业工程师，他的成就不仅仅是超强的工程技术能力，更在圆滑地处理公共关系的技巧方面。

早在南非期间，哈蒙德曾经被布尔人逮捕过，并被处以死刑。最后在美国参议院的请求下，哈蒙德才能在被处以绞刑之前躲过一劫。至此之后，古

根海姆家族和威廉·惠特尼聘请哈蒙德管理古根海姆家族的矿石勘探公司。公司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哈蒙德一边在工程技术方面展开深入的工作探讨，一边还要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波菲里奥·迪亚兹不停地周旋，协助古根海姆家族在墨西哥开拓市场赚取商业利益。

哈蒙德派出席雷·穆德（Seeley W. Mudd）和切斯特·比蒂（A. Chester Beatty）两个经验十足的工程师去宾厄姆州峡谷进行地质勘测。他们的考察结果让宾厄姆州峡谷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犹他铜业公司得到了急需投入的资本，而古根海姆家族投资进驻铜业市场。这个风险投资项目也奠定了古根海姆家族在铜业市场上的地位，对后期其他的同行业公司包括联合铜业公司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联合铜业公司是当时业界大型的托拉斯企业，他们也像古根海姆家族那样派出了优秀的精英工程师对杰克林的宾厄姆峡谷计划进行调查，但是，联合铜业公司的工程师却觉得杰克林的计划不够切合实际，项目很难发展下去。而现如今，我们国家提炼铜的方法主要就是杰克林的方法或者是根据其工作原理所改良的方法。

古根海姆家族投资进驻犹他铜业公司时，正好是一波投机性浪潮开始的时刻，所聚集的能量和资金流动要比从1903年以来金融恐慌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实际上，犹他铜业公司的发展前景是非常诱人的，支持投资的人可以按每股20美元的价钱从古根海姆家族那里买到股票，而这些股票最初是被古根海姆家族按每股10美元购入的。

杰克林得到新的投资资金后，非常兴奋，他将这笔资金全部投到工厂中。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提高注入的资金。为了满足他的需求，有人甚至是提议发行一笔300万美元的债券。

杰克林的资金支出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甚至震惊了公司的大部分人，其中就包括副董事长华尔上校。他可是第一个敢于投资宾厄姆州计划的投资人，他也对杰克林的资金需求感到惊讶。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华尔上校强烈反对发行债券融资。在董事会上的抗争失利之后，他毅然决然地辞去董事职务，将斗争方向转向法庭。他最终得到了法庭下达的债券发行禁令。但是事实证明，这个禁令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作用，它只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拦

路的障碍而已，在禁令解除之后，债券得以发行。

在双方围绕禁令的争斗快要出结果的时候，丹尼尔·古根海姆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商讨关于发行 300 万债券的事情。我就顺势提出按照 5% 的费率承销债券。

本来我已经很确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券能够得到认购，就在这时，海登斯通公司的查尔斯·海登 (Charles Hayden) 突然上门拜访古根海姆家族，并且承诺愿意按照不足 1% 的费率承销债券。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低的承销费率，根本就不赚钱了。但是，面对如此低的承销费率报价，我觉得古根海姆家族难免不会心动，就不能让他们付出原先说定的费用了。最后的结果是，这笔债券获得超额的认购，杰克林得到了足够的资金建构那些超大的研磨机。

与此同时，我还承销着内华达联合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这一个有风险的发行项目，也有海登斯通公司的参与。查尔斯·海登展现出了非常精明的一面，两个发行项目都紧紧地掌握在海登自己的手上。事实证明，内华达联合公司非常优秀，后来它被犹他铜业公司合并。

///

最开始人们设想杰克林的工厂在 1906 年年底之前就能够生产运营，但是由于一些建设方面的障碍问题，直到 1907 年春季，机器才运转起来。截止到齿轮刚转动之际，杰克林已经花费了 800 万美元。

1907 年的春季注定是一个多事之春，纽约证券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出现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精明的人已经通过前期的海风闻到了风雨欲来而收帆减速。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真的会有一场金融恐慌风暴来临，哪怕算得上是金融巨鳄的摩根先生也没有料到。

时间走至夏季，杰克林的工厂开始紧锣密鼓地加快生产节奏，但是整个金融形势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0 月份的时候，尼克尔伯克尔信托公司 (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突然宣布破产倒闭，公司的董事长自杀身亡。这一突然事件，震惊整个金融界，并且引发储户挤兑纽约的多家银行，在我的记忆里，挤兑纽约市这件事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恐慌甚至是蔓延

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整个国家的信用结构也随之崩溃，似乎大家都觉得只有把钱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算安全。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处在自南北内战以来最为严重最为危机的金融风暴之中。

摩根先生当时已经是 71 岁的高龄了，至于他是如何运用沙皇般的手段力挽狂澜遏制住这场危机的，在此就不再叙述了，毕竟有很多知名学者已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并且付之于纸上。但是，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叙述一件关于我和摩根先生合作的一件事。

为了拯救整个市场，摩根先生决定创建一个特别的基金，当时各种金融机构也在给这个基金捐钱。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在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决定为这只基金做出一个令人深刻的表态。

我决定要去摩根先生的办公室，走到那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的办公桌前，告诉他希望能为他牵头建立的基金捐款。当摩根先生问我打算捐助多少钱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准备注入 150 万美元，而且全部是现款。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除非是摩根先生自己捐款，否则不会有任何一个个人捐款的金额能够超过我的。

然而，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在前往市中心的路上时，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希望按照原来计划好的事情办下去。于是，我直接去了曼哈顿银行，告诉行长斯蒂芬·贝克尔（Stephen Baker），不管曼哈顿银行会捐出多少钱，都从我的个人户头上划出 150 万美元作为捐款捐出去。就这样，这 150 万美元的捐款就以曼哈顿银行的名义而非我个人的名义转捐到了摩根的基金。

至于为什么突然决定不直接去面见摩根先生，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过于谦逊或者其他原因。当时我也非常想给摩根先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他知道我十分信任他的领导能力，也相信自己很清楚国家经济基本上是健全无忧的，但是我就是不能按照计划好的办下去，无法走到摩根先生的办公桌前。

话又说回来，倘若我按照最初计划好的行事，那么后来我与摩根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比如说在我收购大西洋沿岸铁路公司和投资得克萨斯湾硫黄公司时，情况会是大不相同，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可是，

另一方面，倘若我在金融事务方面成了与摩根他们关系紧密的人，伍德鲁·威尔逊可能就不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达到现在的成就。一个王国可能会因为缺少了一颗马掌钉而输掉一场战役，最终导致灭亡。但是有的时候同样是因为这颗马掌钉，会给骑马的将军带来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的经历^①。这应该就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正当 1907 年金融恐慌达到最为严重的时候，谁也不清楚摩根先生的这一系列的举措能否成功拯救整个市场，我突然收到了一份紧急求救，向我借 50 万美元的现金来支付犹他铜业公司的员工工资。这个时候，铜价早已经从每磅的 22 美分跌落到 12 美分，犹他铜业公司的股价也从原先的 39 美元跌落到 13 美元；但是，杰克林为了不让公司分崩离析，即使是现在铜已经在铁轨边堆积成山了，也不得不咬着牙继续生产下去。

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一家由古根海姆家族和海登斯通公司联合支持的大型公司，竟然不得不向一个和银行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且还是证券市场独立运作者的人借入 50 万美元这笔不小的款项。更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竟然会在这样一个恐慌迅速蔓延的氛围下还能用现款交付这样一笔高额的资金。其实，这个解释起来也是很容易的。

在此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已经做好准备，来面对一个银根收紧的金融局面，而不是对付一场金融恐慌。所以，我在曼哈顿银行提前增加了我在户头上的现金余额，并且告诉贝克尔行长我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动用这笔现金。

“您一定会拿到的，”他向我保证道，“我们银行向来会照顾到每一位客户的。”

当我接到犹他铜业公司董事长麦克内尔先生的电报时，我已经认定了现今这样摇摆不定的经济形势迟早会摆回到它应该在的轨道上。另外，在另一

① 出自英文谚语：少了一颗掌钉，丢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只马掌，倒下一匹战马；倒下一匹战马，失去一个将军；失去一个将军，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王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少了一颗马掌钉。

个更好的替代品被发现之前，经济发展还是需要铜的存在。于是，我去找贝克尔行长，告诉他我要用 50 万美元现金。这笔钱正是麦克内尔现在急需的东西——能够塞进工资信封的现钞。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麦克内尔能够获得信贷，也不如现金的作用更实际。

贝克尔行长派人去保险库取钱，清点完现钞之后装进一个箱子里，然后通过特殊的特快专递运往盐城。

这一天，市场资金的贷款利率已经高达 150%，我告诉麦克内尔，只要付给我 6% 就足够了，而且什么时候还给我都可以。在他寄回的他们公司的借据上面明确地标明 20% 的借贷利率。在这次交易之后，我就进入股市，买入很多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当然买入价在当时的股价来说已经算得上是普遍偏低的报价了。

犹他铜业公司安然度过金融恐慌，甚至是第一年的经营业绩已经远远超出杰克林的预测。在这之后的 30 年里，犹他铜业公司光是给股东们的红利就高达 2.5 亿美元以上。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工作区，那个杰克林在 1903 年就开始挖掘的宾厄姆州地下的那个大坑，至今仍然是地球表面人工开凿的最大的洞穴之一。

有很多人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成就一项良好的投资项目，对此，犹他铜业公司能够在 1907 年的金融恐慌中安然度过一事，就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项投资的价值就好比一个人所具备的品质。良好的投资价值更能经得住逆境的考验，而且能够更容易、更迅速地战胜阻碍。杰克林在不断完善低品位矿石的开采炼制工艺技术，无疑是为先前价值备受怀疑的工厂增加了一份全新的价值。如果全新的价值是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即使是金融恐慌也能够小心度过。一次金融恐慌可能会引起一场投资的市场价值的暂时暴跌，但是只要是这个公司能够真正满足经济需求，并且具备优良的经营管理，那么其股票必然会收复失地。金融恐慌也成为犹他铜业公司的试金石。

犹他铜业公司的成功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的品质有多么的重要。杰克林在年仅 35 岁时就提出一个能够让世界铜产量翻一

番的宏大设想。他费时 5 年才找到投资人，又花费了 4 年的时间不断地试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让那些出资人白白信任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人们还在极度怀疑可以建造无烟火药厂时，杰克林就已经为政府建起一家工厂了，他也因此被授予一枚杰出贡献勋章。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家族就是杜邦家族，本来杜邦家族已经设定好建造这家工厂的条件，但是军方觉得那些条件过于苛刻，不易实现。有一次，在就这一问题而专门举行的一上午的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能做好这个工作，并且我推荐了杰克林。战争部长贝克尔说他会和总统详细商议一下这个提议。

当天下午，我就给住在旧金山宾馆的杰克林打电话，并且告诉他：“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你，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先过来。”几天之后，结果出来了。贝克尔部长请我找到杰克林，我说：“他已经在这了，我请他进来。”

在杰克林进去之前，我给他支了一招。“千万不要让他们给你穿上军装，”我诚恳地告诉他，“记着，军令如山，哪怕是官阶就高你一级的人都能够完全地命令你，叫你向左就得向左、叫你向右就得向右，不能反驳。”最终，杰克林一直都没有穿上军装。他就像跳吉格舞一样风风火火地按时建成了工厂，也像跳吉格舞一样自由。

1933 年，美国的矿业、机械、电气和民用工程协会联合会授予杰克林约翰·福瑞兹奖章，这就是一个美国工程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当然，除了获得极高的成就之外，杰克林也遭遇过无数的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建造了一台导向磨铣器。这种机器的用途主要是显示钢铁公司在高品位的 Mesabi 铁矿石挖掘枯竭之后，可以对 Mesabi 矿脉的低品位角岩铁矿石加以利用加工。然后，他又第三次进行尝试，这回是开采阿拉斯加的低品位金矿，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不仅他受到了损失，我也有损失。

///

阿拉斯加朱诺黄金公司的这一项风险项目，可以说算得上是我所有参与

的投资项目中，还没有挣到一分钱，就已经在前期扔进去最多的钱的一个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一处露天的矿山，正好位于朱诺城^①以南加斯蒂诺海峡对面的一座山的旁边。弗雷德·布拉德利、麦肯兹(J. H. Mackenzie)、赫伯特·胡佛的好友马克·雷夸(Mark Requa)可以算得上是采掘业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他们让我注意到了这座矿山。实际上，胡佛曾经一度也对这座矿山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是抢先一步——当然后来我们也为此深感懊悔。

杰克林在此之前已经北上前往阿拉斯加，并且提交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大概意思是说毗邻阿拉斯加朱诺黄金矿的阿拉斯加黄金矿石公司(Alaska Gold Mine Company)拥有十分令人看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对杰克林的判断力十分有信心，我也就没有多做调查就决定加入阿拉斯加朱诺项目。在1915年春季，矿石的报告显示，黄金的含量令人欣喜，于是阿拉斯加朱诺决定发行40万股股票，每股售价10美元，发行的文件中有如下文字的记载：“所有未被公众认购的股份均将由小尤金·梅耶尔和B·M·巴鲁克认购。”

无论是在这次股票发行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我的名字从未因任何一次股票发行而被公开使用过。股票的发行异常顺利，并且得到了5倍的超额认购。在股票发行后没几天，股价就已经涨至15美元。

可是，没过多久，人们就得知杰克林在阿拉斯加黄金矿公司的矿石中发现的黄金含量实际上低得出乎人的意料，这一发现也为阿拉斯加朱诺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公司的股票也随之一路下跌。

最后，杰克林只好选择放弃，阿拉斯加黄金矿公司也被迫决定关门歇业，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布拉德利却拒绝放弃阿拉斯加朱诺。既然我的名字已经被股东们公认为阿拉斯加朱诺的保荐人，我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至少在布拉德利选择放弃之前我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他几个人也是同样看待此事的。募集到的股本很快就用光了，公众也逐渐地失去了对阿拉斯加朱

^① 朱诺1959年成为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曾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黄金开采区之一，20世纪40年代黄金开采成本高于所采黄金价值，随着1944年阿拉斯加朱诺黄金公司倒闭，黄金采掘业趋于没落。

诺的信心，最后威廉·柯罗克尔 (W. H. Croker)、达利阿斯·米尔斯 (他的儿子在赫伯特·胡佛总统内阁担任财政部长)、布拉德利、尤金·梅耶尔和我自己决定共同出资筹集 300 万美元继续开展工作。

在 1916 年，阿拉斯加朱诺的年终收盘价为 7.75 美元，在我看来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算得上是中等偏下的价位。但是到 1917 年却暴跌到 2 美元，1920 年到 1.125 美元，而转到 1921 年正好赶上经济大萧条时期，股价已经跌到 0.625 美元。公司的债券持有人已经因为债券本息无法偿付而准备取消债券抵押品的赎回权。就在这个时候，一线希望之光突然闯入人们的眼帘。在 1921 年 9 月，公司竟然实现了 24 000 美元的营运利润。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钱肯定是不足以支付固定费用的，但是却为扩大经营规模奠定了基础，而经营规模的扩大将会逐渐覆盖固定的费用。

布拉德利决定逐步改进生产方法，进一步增加产出量，甚至在公司每吨矿石只能生产出价值 80 美分的黄金时，也能够增加加工矿石的工艺来增加所能获得的利润。这要是在 10 年之前，谁要是还能够想到通过加工这种低品位的矿石来获得利润，绝对会被人骂作疯子的。但是到 1930 年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全部偿还完毕，1931 年更是第一次宣布可以发放红利。在我看来，公司能够发放红利，完全归功于布拉德利那颗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务求成功的心。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决定让美元贬值，并且提高黄金价格时，阿拉斯加朱诺首先从中受益。即便如此，我和当时任《华盛顿邮报》出版人的尤金·梅耶尔虽然都持有大量的金矿股份，我们两个人却都反对罗斯福政府的做法。

在后来的数年发展中，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和矿石中黄金含量的下降，阿拉斯加朱诺再次陷入经营困境。身处这个尴尬的境地，阿拉斯加朱诺最终被迫将矿山关闭，但是电力工厂现今仍然在工作着。

///

从这些对低品位矿石开采的试验中学到的经验和成果，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国家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一直持续面临

着一个冲突问题：我们应该从何处才能够不断地获得所需求的原材料——如果成本较高，是继续从我们国家内部获取，还是从相对成本较低的外国获取。

在这一冲突之中，我的立场并未完全确立。可能会根据当时所需站在所谓的“自由贸易者”一边，有时会选择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者。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国家防务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使用国内自产的矿物。

杰克林开发研究了矿石的采炼工艺，后来的工程师逐渐对其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假设如果没有杰克林的这些工艺，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所使用的大量的铜大多数都将会是从国外进口的；而这样的话将会消耗相当多的海运能力，而这些海运能力是需要从其他的战争用途中转移出来的——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势必会造成生产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使战斗力下降。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能够更经济合理地使用品位更低的矿石的改进方法的试验。不过，从我在阿拉斯加朱诺这件事中所获得的经验来说，这个想法虽然很值得发展，但是要明智地做到这一点，还是存在很多的限制因素。

而我们目前所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两种选择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边是继续从最廉价的国外来源进口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这也就相当于一半的资源命脉间接地掌握在别国的手里，从而发展到另一边持续发展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不断地改善和利用国内的现有资源。

作为一名证券投资人，我更清楚所谓的“中庸”之道。我非常不赞成像希特勒那样极端的做法，在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从各个方面不择手段试图实现自身的自给自足。但是同样地，我也不赞成我们要牺牲较高度度的自给自足的供应体系，仅仅是为了增加对外贸易量，北美大陆也必须保持这种体系。

对待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好像不是只有通过宣称某一个信条或者是运作某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案的真实可信度便能够轻易解决的，这明显是非常不明智的。技术的发展可以给几年前可能还毫无价值和毫无发展的企业、领域带来新的拓展用途和发展。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我们国防所需的至关重要的所有原材料，我们都应该制定一个动态的记录，能够记录我们所有的需求和可能的供应来源，能够明确地表明国内的生产量和国外进口的材料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之能够达到一个动态平衡。这样既能反映出国家的经济成本，也能反映出每一个确定的供应来源对于我们国家安全稳定的相对贡献。

第18章

J·P·摩根从来不赌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古人说得确实没错。仅仅是一时的用词不当，老 J·P·摩根先生便拒绝了与我的合作开发项目。就差一步，我们就能成为合伙人。虽然，后来这个项目成就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盈利企业，还让美国稳稳站在世界硫黄市场领导者的位置上。但我依然对摩根先生的退出深表遗憾。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与美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金融天才合作的机会，而摩根先生只是放弃了那些应该属于他的巨额利润。

但是对于摩根先生来说，占有金钱，他并不太放在心上。摩根先生的银行本来应该赚到那些利润，但没有这些钱，摩根先生依然是摩根先生。摩根先生所重视追求的，是整体国家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尽管从经济产业和社会观点来说，我所支持的西奥多·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与摩根先生有着巨大的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把摩根视作经济大师和自己的导师。追随他，对于我来说本应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

年轻的时候，我在华尔街做跑腿的小职员，晚上便在西六十九大街小伙子俱乐部上健身课。有一阵，我去本市其他地方的小伙子俱乐部转转，看看他们平时都在玩些什么。结果，我遇到了摩根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司以外遇到他。在工作中，我送过好几次证券和市场报告给他，因此我记得很清楚。摩根先生站在一个男孩边上，俯着身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这个男孩当时正从一只雪茄盒子上剪下一个智力拼图。

在阿瑟·豪斯曼公司跑腿的时候，他曾让我送份报告给摩根先生，那是一份关于密尔沃基电气公司的债券报价。摩根先生突然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我以为他问的是整体的金融形势，于是回答说：“我觉得一场恐慌即将到来。”

他马上质问我：“孩子，你知道恐慌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说话时，他那双著名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我想我当时的表现糟糕透了。我极其窘迫，张口结舌。

这是我与摩根先生在此之前的唯一一次谈话，如此的简短。直到1909年，我惊讶地收到了一份摩根银行的委托，调查一处硫矿，地点位于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西南40公里处，一个叫作布拉佐利亚的县城。他们竟然找到了我，我很高兴地与其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如下：如果硫矿开采前景看好，那么摩根投资，我负责具体运营操作，按照六四比例划分利润。

我首先找到西雷·穆德，一位资深的矿业工程师，我们是老相识了。他也曾受雇于古根海姆矿石勘探公司为哈蒙德效力。穆德又找了一个助手，名叫斯宾塞·布朗的小伙子。

我们南下来到得克萨斯，在一片荒野上，带着一帮钻井工人开始试探着打孔。

每天太阳升起，在那个被称作布莱恩山冈的地方，我和钻井工人一起晒着日头吹着山风，看着一个个竖井被他们安置下去，然后一块块需要检测硫含量的结实土块运上来。夜幕降临，月明星稀。我在布拉佐利亚县城的那个小旅馆里，研究着世界硫贸易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如果此处开发前景光明，我们在这个大舞台将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周围静悄悄的，陪着我的只有月光，还有恼人的蚊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穆德得出结论，这里的硫含量有50%的可能实现盈利开采。

我迫不及待地返回纽约，向摩根先生汇报——我们可以直接买下那块地，包括缴纳矿产资源使用费，只需要50万美元而已。为了表示信心，我说自己也愿意出一半资金来“赌手气”。

我当时太兴奋了，言多必失，“赌手气”，这个措辞实在是太像赌徒了。

我本来应该用“投资”的。

“我从来不是一个赌徒。先生，到此为止了。”摩根先生一边回答，一边用力地做了个手势，这表示面谈结束了，一切到此为止，这个风险项目于他再没有任何意义。

天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的激动，又是多么的沮丧。我有满肚子的高明等着在他面前宣讲，我在布拉佐利亚的旅馆里研究世界硫贸易所得出的结论表明，当时美国工业的增长增加了对纯硫的需求——硫酸是当时所有化学品中最为重要的产品，而纯硫是生产硫酸的原材料。当时正是美国硫的生产需求急剧扩张的黄金时代，美好的画卷已经在我面前展开。可是壮志满怀的我，就在几分钟之内被打发了。如此的粗鲁，连一个阐述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需要备注的是，当时的硫矿开采技术进入了特定时间，已经足以支持美国生产商摆脱对进口硫的依赖。

1900 年之前，意大利垄断了世界纯硫生产，西西里岛占据了世界产量的 95%。1891 年，石油工程师弗拉施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完善了一套开采硫矿的新工艺，弗拉施法由此得名。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硫矿开采的背景。早在 1870 年前后，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人们发现了一处含量丰富的硫矿。但是开采的难度极大，流沙覆盖了整个硫矿，而且硫矿本身还存在有毒气体。开采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停滞不前。困难会让人低头，但天才反而视其为挑战。弗拉施曾在路易斯安那州勘探石油。硫矿的开采技术激发了他的斗志，直至 1891 年弗拉施法闻名世界。

弗拉施的新工艺是这样的：首先从地表钻孔至硫矿表面，将一根直径大约为 10 英寸的金属圆管插入孔中，这就是所谓的采硫井。在采硫井中，再放入 3 根同心套管。其中一根灌入热水，压入地下熔融地下硫矿。然后，将压缩空气通过另一根管子压入地下，迫使已经熔融为液态的硫矿从第三根管子上升。当硫矿升至地表，液态的硫直接导入大型储藏箱冷却，最终形成固态硫。

弗拉施法的诞生使得路易斯安那州硫矿的开采变成可能，联合硫矿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一家获利丰厚的企业。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美国工业的发

展导致硫的需求量快速增长，联合硫矿公司的产能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缺口，国内需求者都在寻找或者说期待着其他新的供给来源。

弗拉施法的基本专利权利到 1908 年到期终止，技术上的限制打开了，其他遇到类似路易斯安那州的开采问题，或者我眼前的得克萨斯州拉佐利亚县，都可以无条件地使用这一开采工艺了，这真是天遂人愿啊。这本来也在我准备的阐述资料里，用以说服摩根先生。但是很遗憾，他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退出了这一项目。

我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和尴尬。我决定寻找其他合作伙伴，继续推进自己的硫矿开采事业。

///

当初我们为摩根先生调查硫矿的时候，很多人聚集在我们周围，包括探矿人、发起人以及其他期望成功的家伙。他们向我们描述各种关于含硫地区的故事，或者是作为主人和掮客，报价出让含硫地块。当时我们只是匆匆看了一部分地方。现在摩根先生退出了布拉佐利亚县的项目，我和穆德继续进行相关的调查。

在此之前，爱因斯坦曾为我们推荐一处叫大穹顶的地方，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玛塔戈达县，他和圣路易斯市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保持着业务联系。穆德非常看好这个地方的开发潜力，随后的矿体测试证实了穆德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于是我组建了海湾硫矿公司，开始在玛塔戈达县大肆收购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市场对硫的需求急速提升。联合硫矿公司的产量不足以满足新增市场。同时由于摩根先生放弃了投资，于是一些前期参与了我们布赖恩山冈调查的人，开始以自由港硫矿公司的名义开发布赖恩山冈的硫矿。开采很快就获得了收益。同时，市场需求的缺口促使自由港硫矿公司开始迅速提高产能，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似乎不再需要第三家公司了，联合硫矿公司和自由港硫矿公司已经满足了市场的全部需求。

发展陷入停滞，我们等待市场出现新的转机。这时，我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建议，继续在玛塔戈达收购土地。我授权他处理这方面的事，同时允许他邀请土地的产权人也参与我们的开发。不过最终所有地块的收购都是我独资

完成，没有一个业主参与进来。

到了 1916 年的时候，我们等待的转机似乎出现了。战争导致硫的需求猛增，自由港硫矿公司的股东投资获益达到了惊人的 200%。机不可失，穆德认为可以启动我们自己的硫矿开发了，但是为了更好地开采，我们还需要更多资本的支持。考虑到几年前摩根银行对硫矿开采曾有很大兴趣，而当时拒绝的 J·P·摩根先生已经在 3 年前去世了。我认为是重新联系摩根银行的时候了。

这时候，威廉·鲍埃斯·汤普森出场了，他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发起人，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矿产和石油投资公司之一。这位先生是我几经辗转联系到的。我与亨利·戴维森商量，他委托给了摩根的另一位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而拉蒙特恰好与汤普森关系很好，事情很顺利，汤普森乐于在这件事上出力促成。

汤普森经过调查研究我们的开采计划，将其推荐给摩根银行作为优质资产，参股共同开采。摩根银行大约占据了 60% 的股份。可能是命运的惯性吧，我与摩根银行的合作似乎很难长时间持续。我们的开采刚刚开始，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摩根银行就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便将持有的股份转手给了汤普森，仅仅获得了一些蝇头小利。我找到摩根银行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转让行为有失公允。

如果他们一直持有这些股票，他们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当时是以每股 10 美元的价钱获得了这些股票。而截至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初期的 360 万美元投资已是价值 4 500 万美元，同时还产生了至少 2 500 万美元的现金红利。摩根银行在违背商业惯例的同时还损失了上述金钱。按照商业惯例，涉及股份转让，我这个合作人具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充分的知情权，而不是汤普森。异位而处，相信摩根银行绝对无法接受这种行为。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最终将我们也卷了进去。我受威尔逊总统邀请，参与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又成了委员会主席。这些可见前文，在这就不一一赘述。鉴于自身所担任的公职和责任，我本人认为不应再与任何可能从政府合同和政府采购中得益的企业有利益牵扯，因此我放弃了纽约证券

交易所的会员席位，同时抛空了上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应该在精神领域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种满足感，是金钱无法取代的。说实话，我从未因卖出这些股票而后悔。哪怕像飞雪汽车车身制造公司这样的一些股票，抛空它们让我在未来几年丧失了一大笔唾手可得的财富。

由于有几只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无法交易，所以我不得不留在手上继续持有。这其中包括我自己开办的硫矿公司和加利福尼亚州一处钨矿的股权。对于这些股份的处置，我是如此处置并向威尔逊总统报告的：由我的秘书玛丽·鲍埃尔负责，将这些股票今后所有发放的红利全部转给红十字会或者其他爱国机构。这个做法也获得了威尔逊总统的赞赏。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此期间，那一笔笔数量可观的、捐赠给慈善事业的红利都来自那座钨矿。我开办的海湾硫矿公司（后来改名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直到战争结束才正式投入生产。

我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联邦矿业局要求稀缺战争物资的生产厂家开足马力并增加到最大产能，提高绝对产量。那时我还没有成为委员会主席。我开办的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也在此列，矿业局承诺公司，作为回报可以优先得到建筑材料和设备。

某天，我在华盛顿战时工业委员会办公楼的走廊上，遇到沃尔特·艾尔德里奇，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现任总裁。我问他来这干什么，他说是来询问优先订单的进展。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政府正在考虑给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优先权，以提供用于开发马塔戈达硫矿的设备。前文提到过，当时我已经完全退出公司的管理层很长时间了。我马上联系战争部长牛顿·贝克尔，告诉他我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同时，我联系当时担任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董事的老同学迪克·莱登，请他务必坚持一点：硫的销售价格必须是公司的成本价，如果成本价依然高于竞争厂商的最低报价，那么便亏本供应。

实际上，战争结束四个月，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才投入生产，我当时的举动显然有些多余。

巴黎和会的召开，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战事的突然中止，给另外两家硫矿公司——联合硫矿和自由港硫矿带来了大麻烦。市场需求迅速缩小，而战时过剩的产能无法立即降低，数百万吨硫只能在露天存放。参加完巴黎和会后，由于硫矿开采业千头万绪，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事情需要处理，我便又回到了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开始积极参与公司管理。

过剩的产能，缩小的市场，三大硫生产公司拼得你死我活，彼此之间充满敌意。早在战争结束前，联合硫矿公司就以弗拉施工艺的专利权受到侵犯为由，起诉自由港硫矿公司。当然，由于专利权的保护已经到期失效，联合硫矿输了官司。这让同样在使用弗拉施工艺的我们松了一口气，躲开了一场麻烦。

但是，有些麻烦是躲不过去的。联合硫矿又找了一个理由，对我们发动了攻击。由于我们之间有部分矿区相连，他们居然以我们的矿井抽取了他们矿床的硫为借口，发起了诉讼。双发争执不休，尽管双方在庭外达成和解，但已经撕破脸皮了。

在法庭上，一位弗拉施家族成员，作为联合硫矿股东，指控我在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期间，以政府采购合同为条件，向联合硫矿公司勒索一大笔佣金。同时，他为了增强说服力，声称赫尔曼·弗拉施先生生前就曾向政府提出过此项指控。但天可怜见，赫尔曼·弗拉施先生于1914年去世，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打响。我当庭提出要求——这种提出荒谬无理指控的人，应该好好回去学习下历史。

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工业的萎靡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矿物和金属需求量锐减。美国迫切地需要打开世界市场，以消化每天都在转动的流水线下的产品。同时，国外的卡塔尔垄断组织也有同样的需求和想法。这推动了Web-Pomerene法案的诞生。该法案从各方面为美国厂商进行联合出口提供了便利和支持。对于嗷嗷待哺的硫矿公司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

很快，联合硫矿、自由港硫矿和得克萨斯海湾硫矿三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硫品出口股份公司。随后，与意大利西西里岛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分配国际市场需求。

在随后的5年里，美国硫产业内部的形势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先是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发展突飞猛进，很快销量就与联合硫矿公司并列第一，而自由港硫矿公司下滑至第三位。紧接着，联合硫矿公司由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硫矿储量枯竭，关闭了工厂。不久，自由港硫矿公司发现，那些本来寄予厚望的新收购矿区，盈利能力远远低于之前的预期。最终，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有如神助一般，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硫生产商。

此后，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股价也随之扶摇直上，从成立伊始的每股10美元，涨到1929年的320美元。不过在我看来，股价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值，攀升得太快太高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抛空了自己持有的121 000股，同时向朋友发出预警，建议他们也照此处理。

当时，公司的股票依然在大幅上升，很多朋友对我的警告和建议充耳不闻。一些朋友甚至反过来暗示我是个过气落伍的人，他们认为我抛售股票是因为我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对自己和未来信心不足。好吧，让时间来证明一切。1929年股市大崩盘来临前，我已经抛空了硫矿公司的股票。

在多年的股市生涯中，我之所以能无数次躲过灭顶之灾，守住自己的财富，是因为我能克制自己贪婪的欲望——一次又一次地在股票上升的途中便抛出。虽然继续持有，可能会挣到更多的钱，但适时抛出，也让我避免因股票崩盘而落入深渊。许多人正是因为不明白这点，过分地追高，导致一败涂地，不名一文。这种略显保守的做法保证了我财富的稳定增长。我虽然会错过一些赚钱的机会，但同样也避免落入破产的陷阱。我就这样谨慎地行走在欲望和陷阱之间的小路上。

有些人自诩英明睿智，总是能够在峰顶脱手而在谷底接盘——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这种幸运儿只会出现在传奇故事或者白日梦里，就像曼丘森^①一样。我深知极端的狂热和极端的悲观氛围都会招致灾难。集体狂热一旦在市场波动中出现，那么众人就会被冲昏头脑，在颠簸的浪潮中沉入海底，尸

^① 曼丘森（Munchausen）：原是18世纪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德国人，他讲的自己作为士兵和猎手的历险故事均荒唐透顶。现在有曼丘森综合征一说，指假性心理疾病或欺诈性心理疾病。

骨无存。正因如此，我从不破坏自己的原则：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买进，在价格有利可图时就卖出，不从众而动。股市的真理，从不站在多数人那边。

///

1929年，股市狂热的、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发展到了顶峰，加速了股市的崩盘。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成为这种疯狂行为的牺牲品呢？我相信，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复出现的群体盲目心理，其表现出来就是这种类似的疯狂行为。

20世纪初，我在从欧洲旅行返回美国的轮船上，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老刊的一名财经记者约翰·戴特尔的采访。正是与他的交谈，引发了我对这种奇特的群体行为的思考。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谈到金融恐慌的时候，戴特尔极力向我推荐他偶然间读过的一本书，书名叫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体性癫狂》，作者查尔斯·麦基。随后，我和戴特尔开始四处寻觅，逛了很多图书馆和二手书店，终于找到了一本。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41年，于1932年被L. C. Page公司重印出版。书中记载了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投机狂潮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让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陷入癫狂状态而不能自拔。可笑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国家对这些癫狂浪潮产生一点免疫力。冷静的荷兰人热情地追捧郁金香球茎而忘乎所以，冲动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密西西比经济泡沫，而自诩绅士保守老派的英国人也无法幸免，迎来了他们的南海泡沫。

作为一名读者和旁观者，我难以相信自己所读到的疯狂行径。我忍不住大叫：“这太荒谬了，这不可能！”然而，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不止一次目睹和经历了类似的疯狂运动。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佛罗里达地产泡沫和1929年我全身而退的股市投机所导致的崩盘。同样，正是这种集体狂热让希特勒在德国政坛强势崛起。

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智行为是如此频繁地在人类历史上重演，说明其根植于人类的血液骨骼之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某种特质的外在表现，所以才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也许，鸟类的长途迁徙、沙丁鱼的回溯或者各种海鳗

的群体活动，也是基于同样的特质。这种特质似乎存在着周期性交替变化的特征。举个例子，一次牛市行情在不断的推波助澜下快速攀升，之后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或大或小，或如灰尘落地，或如洪钟大吕，总之，会有一些人突然卖出股票，紧接着其他人会接二连三地抛出，似乎整个市场里的人都被叫醒了，脑海中股价继续走高的思维惯性被突然打断。

“思维惯性”——这个词真是恰到好处，妙不可言。这个词汇来自米德尔顿·巴里尔，并非我的首创。当时，我正在操作一只钢铁股票，J·P·摩根的收购导致整个市场都在上涨。就在这只大手继续托着整个股市攀升的时候，洛克岛的股票突然开始暴跌。当时米德尔顿·巴里尔跟我说：“这只股票的崩盘将终结牛市思维的惯性。”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但很快我就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并深深认同。这就像先知的预言。因此，我快速抛空了手中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即使当时摩根银行已经出手为他们护盘，我还是选择全身而退。

在麦基的书中，通篇记载着国王、贵族、商人和教授都无法抵挡诱惑而投身这种狂热风潮不可自拔。在这种集体性狂热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传染下，我们受过的教育、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社会地位，完全无法使我们对这种狂热病毒产生免疫力。1927—1929年的股市投机浪潮，上至贵族、教授下至贩夫走卒，社会各个阶层纷纷被席卷其中，无法幸免。

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切，以及自己在这场浪潮中是如何应对的。早在1927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实行放松银根政策时，对于它带给市场的后续反应，我便心存疑虑。到了1928年，急速攀升的股票价格更是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股市的繁荣必然以经济繁荣为依托，而当时战败国赔款和战时债务问题纠缠不清，国际贸易就像海老人骑着的水手辛巴达一样，步履蹒跚地行走，这又如何会迎来新一轮经济繁荣呢？

事实上，在1928年我便多次卖出股票。当时，我觉得牛市行情不可能持久，很快就会一泻千里。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市场行情继续看涨。

到了1929年的8月，我接到国内的消息——当时我正在苏格兰享受自己的狩猎松鸡之旅——市场上有人准备通过几家老铁路公司与新组建的控股

公司进行股权置换，使得相关公司的股票飙升至高价位。可见当时的市场是多么的狂热。

我马上发电报给三个身在纽约的密友，询问他们对当下市场行情的看法。其中两位的答复比较含糊，没有给出确切的判断。但是最后一个人，某位在当时美国金融界身居高位的朋友，他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整体的工商业形势“就像股市的风向标，这表示股市很快就会出现狂飙猛进的发展”。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这是他深信不疑的判断。事实是，他在这次股市大崩盘中倾家荡产。

股市的动荡让我心神不宁，我决定当即取消苏格兰之旅，乘船返回国内。我在伦敦等待上船的短短时间里，就数次给纽约的经纪人拍电报，下单买入股票。但是，第二天，我又通知他马上卖出，可见利润面前，我也不能免俗。在这条船上，凑巧碰到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经纪人，他经营着一家证券经纪事务所。他向我招揽生意，希望能够成为我的经纪人。我让他帮我报了几次卖单。当船航行在海上，时间和行程都不再由你做主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身体和灵魂，考虑方向。也正是在船上，我想清楚了一切。船到纽约，我就安排抛空所有的股票。

在今后的岁月里，每当生活被黑暗笼罩，我多次重读麦基的书。在他的这本阐述绝望故事的书中，我慢慢读出了鼓舞人心的一面。在故事中，人类因过高的期望或欲望，而毫无根据地陷入了各种狂热的盲目乐观情绪之中。同时，麦基也说明，放弃任何希望的悲观情绪一样不可取。俗话说，否极泰来。无论前方的光明多么微弱，后来我们总会等到温暖的日出。

过犹不及，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力量促使我们去画蛇添足，当然也有些人把这叫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每当事物的前途看起来很美妙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二加二总是等于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也不会不劳而获。”而当前途一片渺茫、意志消沉的时候，我又会告诉自己：“二加二依然得四，守得云开见月明，总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候。”

第19章

我的投资哲学

爱德华国王二世的私人银行家阿尼斯·卡塞尔说过一段话，被我奉为座右铭，真像是从我心底说出来的。

“当我刚开始参与交易崭露头角时，人们说我是个赌徒，”阿尼斯爵士说道，“随着交易范围和交易量不断扩大，我投机者的名声也因此被广泛传播。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我就成了受人尊敬的银行家。其实，从赌徒到银行家，我所做的事情始终没有变过，风险与我同在。”

俗话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这并不意味着付出就会有回报，投资就肯定能够成功。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上面的话。当年，我说“赌一把”的时候，年长的 J·P·摩根先生粗暴地打断了我，厌恶的表情我现在都记忆犹新。但是，世界上不存在 100% 有把握的投资，所以投资总会有赌博的成分。风险与我同在。

正是冒险开拓，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不断改善，我们由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现在又到了机器替代人力的时代。如果没有人愿意承担未知的风险，迈出第一步，那么我们可能依然居住在山洞中。正如哥伦布冒着迷失在海上、冒着坠入海洋的无底深渊的风险，力排众议，开始了寻觅印度新航路的征程。而正是亨利·福特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投机行为，诞生了第一辆 T 型车，才开启了人类汽车时代。

就像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搏斗，或者堂·吉珂德面对风车的冲锋，人

类即使处于毫无希望的绝境，也会在内心鼓起争斗的勇气。所谓人定胜天，事在人为。或许有些人愚蠢地认为，我们可以尝试借助于理智断绝这些意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有限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知识和经验，来推测如何减少其中蕴含的风险。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冒险精神和自我愚弄之间保持平衡，一切都要适度。这不仅适用于赚钱，处理公共事务同样适用。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投机者会关注那些预示未来的征兆，并采取措施来应对未来的变化。就像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一样，在那些混乱但却暗含秩序的组织器官和看似无意义却又相互纠缠抵触的事实中间，找到关键的东西。同时，他不但要做出判断，更要像外科医生那样，以自己所看到的和总结到的为依据，冷静、准确地行动，来达到目的。

筛选事实、找出关键点非常困难。因为在股票市场中，所有的信息数据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都包含着人类的情感——某种期待或者预期。在背后控制股价上升或者下降的力量，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或者冰冷的社会事件，而是掺杂着人类情感、人们的种种反应——支持、憎恶、期待、恐惧。投机者和分析师，所有想要在这场游戏中胜出的人，必须具备一个技能：就像分开打翻的围棋子一样，要分清哪些是钢铁般冰冷的事实，哪些是人们对这些事实的反应或情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棘手，是因为我们很难让自己摆脱深陷其中的情感的影响，做出冷静的判断。

在我周围的人中，有些人就像心理专家一样，总能看穿其他人的行为动机。能知人却不能知己，他们对于自己的错误却基本无视。

说实话，我也曾是这样一个人。

下面我来讲两个自己的交易故事，意在说明，当一个人作为旁观者时，是多么的英明睿智，而自己成为当事人的时候，又是如何的愚蠢狂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名言，真是屡试不爽！

///

我喜欢研究哲学来琢磨人性。我认为所谓优秀的投机者，就是在金钱花

出去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能达成何种目标。1902年12月的某天下午，有一件事让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印证。当时威廉·克罗克尔（他的父亲是加州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商之一）突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克罗克尔颇具魅力，十分迷人。他身材健美而注重仪表，头发和短而尖的连鬓胡子就像是大理石雕刻出来的，打理得一丝不乱。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有些略微的磕巴，反倒让人觉得亲和有趣。他是那种视信誉为生命、绝不会主动放弃客户的银行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良好的心态和勇气从未因危机而丧失，可谓是大丈夫。

随同克罗克尔一道来的，还有内华达州参议员乔治·尼克松。克罗克尔以直爽著称，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尼克松需要100万美元，借给他不会有任何问题。”

尼克松最近财务吃紧，三周后，他需要支付购买组合矿业（Combination Mines）股票的第一笔账款100万美元。这里做个补充，尼克松拥有的金菲尔德矿业公司（Goldfield Consolidated Mines）与组合矿业公司的工作区相邻，在不久前他买下了组合矿业公司，同时承诺，价值2 578 216美元的股权收购款分三期付清。现在有人散布消息，尼克松由于财务吃紧，无力支付第一笔款项，导致金菲尔德联合矿业的股票持续走低。

短暂的交流之后，我就同意这笔借款，一年后到期。尼克松签署的借据上备注，以金菲尔德联合矿业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

但这治标不治本，尼克松在随后的四个月里，还需要以现金或者金菲尔德联合矿业股票的形式，分两次等额付清1 578 216美元的尾款。站在尼克松的角度，当然是支付给组合矿业的股东联合矿业的股票更加理想，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接受这种方式。

当然，我现在可以说是胸有成竹。我告诉克罗克尔和尼克松，只要完全按照我的指示做，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结果。我只交给尼克松一张10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至于我是怎么想的，我只能表示，天机不可泄露。

“你去阿尔道夫酒店的咖啡屋，在那里找张台子坐下来，”我让他按照我的指示来做，“很快会有人过来。他们知道你缺钱，所以会问你，还款情

况如何，是否有困难等等。你什么都不要回应，只需要把支票亮给他们看看，然后小心收回口袋。这时，如果有人提出想购买金菲尔德联合矿业的股票，你就说，这事你得去和巴鲁克谈谈。”

果然，当尼克松步入华尔道夫酒店的男人咖啡屋，一切按照设计好的剧情上演。很快，就有人凑上来打听首付款的情况。尼克松的回应好极了，他淡淡地亮了亮那张保付支票。然后，就好像所有的问题和烦恼都不存在了一样。接下来，所有的询问，都只得到一句简单的回应“问巴鲁克去”。

第二天，尼克松就前往芝加哥，会见组合矿业的股东。他对剩下的两次付款只字不提，只是将这张保付支票背书给他们。一切都在按照我的剧本进行。

就像我早先预料到的，随着一位组合矿业的股东暂时离开房间，纽约场外交易所出现大量金菲尔德联合矿业股票的抛单。而我早先下在市场、等待吃进金菲尔德联合矿业股票的买单，这时发挥了作用。股价坚挺地在1个点的范围内波动，丝毫没有被打下去的迹象。这次股票承接力的试探，结果完全出乎组合矿业股东们的预料，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接下来，计划进行得非常完美。这完全得益于那100万美元现金和联合矿业股票面对巨量抛售所表现出的坚挺。这对组合矿业股东的心理产生了震撼的效果，他们纷纷改变主意，要求尼克松用联合矿业股票来支付剩余款项，至于该死的现金就见鬼去吧。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他们甚至等不及另两笔支付到期就提出了这一要求。

尼克松回到纽约时，脸上的喜色几乎要洋溢出来。他给了我10万股股票作为解决筹资难题的奖励，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因为这是我应得的报酬。

如果您现在就认为我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石成金的手指头，那么不急，后面的这个故事或许会告诉您其他一些东西。

在前文中，我曾经描述过那次联合铜业事件。他们试图挑战供求法则的有效性——这堪称荒谬绝伦，即使是最足智多谋的投机者也不得不遵循这一法则。当时，正是因为倾听了赫尔曼·西尔肯为我解释他们试图控制铜价的愚蠢举动，我发了大财。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认为自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但很可惜，下面这个故事正是讲述我后来如何昏了

头——企图战胜供求法则。

1902年，巴西圣保罗州颁布限制令，将在5年内限制咖啡种植规模。这意味着自1907起咖啡收成会遭到严重消减。西尔肯先生是咖啡交易方面的顶尖专家，他认为，由于种植限制令及不利的天气原因，咖啡价格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出于对西尔肯先生判断的信任，1905年初，我开始大量买入咖啡。由于我是通过保证金账户买入，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即使每磅咖啡上涨几美分我也可以赚得盘满钵满。

但是，天不遂人愿，尤其是投机者的意愿。在1902—1906年种植限制令发挥效果前夕，咖啡迎来了大丰收，这就像一个巨浪一样，直接将咖啡价格暴涨的美梦击碎。

1905年最后几个月，咖啡价格维持了一年的8美分价格被击破，市场价格继续探底。西尔肯及其他权威相信，政府大量收购能够有效维持咖啡价格，惊慌失措的巴西政府接受并制订了“稳定价格”计划，准备通过购入数百万袋咖啡限制市场的交易数量。当然，这些专家牵线搭桥，为巴西政府贷到了收购所需的融通资金。那么收到消息的我，最佳的选择当然是继续持有。

但是，咖啡价格在震荡中继续走低，我的银行存款以数千美元的频率不断减少，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我却像着了魔般依然不为所动。

在股票市场，人们总是坚信自己的判断，即使判断失误也不肯改变，继续盲目持有。这个最糟糕的错误任何人都有可能犯，我本来认为自己能够幸免的。如果在1906年咖啡收成超过预期这一形势明朗时，我就抛出手中的股票，虽然会遭受一定损失，但股票市场最初的损失总是最小的。我错过了这个时机，越陷越深。

当时的我就像是业余投资者那样，被市场压迫得失去了理性判断，反而出了一连串昏着。

新手的心理总是希望不发生损失。因此他们通常会卖出已产生利润的好股票，保护发生损失的股票。因为抛出没有损失甚至产生了利润的好股票，在心理上更好过。而坏股票的重大损失，会让你像赌徒一样，希望继续投入

能够翻本。

但是一般来讲，好股票才会价格高甚至不停地上涨，因为人们相信它的价值，而坏股票会让人对它产生怀疑，所以价格才会低并继续走低。事实很明显了，持有好股票，卖出坏股票，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我当时又做了些什么呢，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为了筹集尽可能多的咖啡交易保证金，我卖出了加拿大太平洋股票，自 1903 年买入之后，它让我获益良多，是一只市场行情依然看好的优质股票。

突然有一天我幡然醒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我突然意识到我要卖出咖啡，从这个吃人的旋涡中脱身出来。当时我已经抛空了所有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股票，而咖啡价格依然在让人绝望地下跌，这就像一盆冰水彻底浇醒了我。

这次咖啡交易让我的信心大受打击，在这场交易中我往日的精明敏锐消失得无影无踪。与之相比，损失的七八十万美元所带来的痛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虽然这依然让我好几天因紧张不安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痛下决心，从今后绝不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冒如此大的风险。

善泳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我们会因过于渴望实现某个目标，而忽视了实现这一目标是否可行。当我们了解的规则和内部信息越多，我们的内心就会越膨胀，越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供求法则。正是因为如此，赫尔曼·西尔肯为我讲述完其他人维持铜价的愚蠢举动之后，自己就在咖啡交易中重蹈覆辙。咖啡交易之后，我重新审视当时的自己，发现在各个方面都做错了。

傻瓜看到危险而止步时，那些聪明的头脑正微笑着走过去。

///

我讲述这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包括这次血淋淋的失败，是为了让其他人明白，不受情感影响而甄别事实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困难。希望其他人在其中获得启发，避免重蹈覆辙，当然，至于能起到多大效果，我没抱多大希望。

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每个人心中都燃烧着激情的火花，

随时随地希望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尤其是在别人犯过错误的事情上，我们会急切希望表现得技高一筹而“赢得游戏”，从而带来强烈的满足感。只有当我们自己也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才会在其中吸取教训。

我一直不太愿意讲一些关于如何明智投资或者说投机的潜规则或者成功之路，就是源于此。但是对于能够进行一定自我约束的人来说，我的一些自身经历及认识或许会起到一些作用。在这我将这些认识罗列一下：

(1) 除非你把投机当作自己的工作，否则不要投机。

(2) 谨防那些带给你“内部”信息或者“小道消息”类似好东西的任何人，特别是理发师、美容师或者侍应生。

(3) 必须清楚证券发行的公司、公司的管理及竞争对手、公司现在的盈利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熟悉这些情况再考虑买入股票。

(4) 除了夸夸其谈的骗子，没有人能够在谷底接盘，在峰顶卖出，包括你在内。

(5) 你不是圣人，犯错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尽可能快速地止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要学会快速地接受损失、处理损失。

(6) 不要将资金和精力分散在很多只股票上。最好仅持有几只可以长期关注的股票。

(7) 定期重新评估所有投资现状及前景。因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还赚钱的也许明天就没落了。

(8) 结合自身情况研究税法，争取卖出证券时可以获得最大税收优势。

(9) 要留有余地，现金储备的机动资金必不可少。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不安全。

(10) 不熟不做。我们不是先知，什么投资都敢做。

不打无准备之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获取事实是一件持续性和连续性的工作，因为事实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这就是以上规则的来源，也是我亲身经历并总结的两大教训。

例如，我曾听过一个小故事，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一位堪称那个时代最具才智的金融家。将巨额钱款投资于奥地利和德国政府债券，

同时高价投资于他看好的英国康索尔债券^①及法国朗特公债，以确保这笔属于他亲密爱人的财产保值。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奥地利和德国政府的债券已经成了一堆废纸，而其他债券也大幅度贬值，当初的巨额钱款缩水了4/5。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创新，会改变市场的趋势，改变一家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未开发地区一旦有了新的能源供给，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投资某个项目时，不能盲目地认为它就会增值或者至少是保值。倒是相反的情况时常发生：由于某个新发现导致某种商品贬值，比如石油和电力的发现导致煤炭贬值，而化学方面的技术突破，使得煤炭的新用途又催生了新的经济寿命。

下面我做一些举例：金、银和铜这样一些矿物，还有宝石、艺术品和肥沃的土地，只有有限的这几种东西在几个世纪以来抵制住了时间的侵蚀——当然，并非没有过波动。你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只能说迄今为止。黄金已经包括我们政府在内的一些国家，立法确定拥有黄金为非法行为，而珍珠的旧有价值也几乎在人工养殖的大规模产业化中毁于一旦。

前文提到过，追求但不迷信于既有事实，是一项需要持续性的工作。对一项投资得出精明合理的判断，需要持续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后续的追踪证券的变化因素，同样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因此将资金分布于太多的不同证券很不明智，你需要定期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状况——而你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一项投资的价值随着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而变化，数只股票你还可以确保掌握所有因素变化，但一大批股票只会让你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老话说得好，无知意味着危险。在投资领域尤其如此。

下面三个因素，是考察评估单个公司的重点。

第一，这家公司的真实资产、固定资产及现金负债比例。

第二，公司所经营业务是否有特许权。换句话说，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否是人们生活必需品或者市场需求旺盛。

^① 康索尔债券是英国对永久债券的称谓。所谓永久债券是指永无到期日、永久支付稳定票息的债券。法国朗特公债也具有永久债券的性质。

即使世界坠入最深沉的黑暗之渊，秉持着活下去的信念，我们所有人也必须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这一连串活动就会推动经济之轮重新转动起来。触底的经济形势就会发生反弹，这正是启动经济上行的最强力量。因此只要人们有生存的欲望，那么生活必需品及相关领域，总会出现适合长期保值的投资对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公司是否拥有足够聪明、可依靠的管理层。相对于那些实力雄厚但是内部管理混乱、混吃等死的公司，我宁愿投资那些资金较少但是经营有方的公司。缺乏执行力和管理艺术的人，即使拥有出色的商业建议，他们的执行也会得到糟糕的结果。管理层是否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他们是否积极进取？是否目标明确而远大？是否足智多谋？是否意志坚定地向实现既定目标迈进？正是这一切决定着一家公司的未来前景，而不是其他东西。

在这里要再次强调，追求不同公司的这些基本经济事实，是一件漫长的持续性的工作，就像船航行在海上，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掌舵，而不是设定了目标和航线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样投资即使出现了偏差，我们依然来得及进行补救，从而全身而退，甚至赚到一些利润。

举个例子，1904年初，亨利·戴维斯受我委托，到西部地区调研殊线(Soo Line)铁路公司的发展潜力，从而确定其新开发的由明尼苏达州的锡夫里弗福尔斯通向北达科他州的肯梅尔的支线铁路——主要用于增加小麦运输量，自东向西全长约300英里。通过戴维斯带回的资料，结合地图及其他信息，我们研究得出结论，这条新开辟的线路会拥有充足的小麦货源，足以支撑殊线铁路公司的盈利来个三级跳。

殊线铁路公司拓展线路的工作正式启动不久，华尔街就流言四起，怀疑这条新拓展支线的财务收入及盈利预期。这时殊线铁路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超过6%，其交易价在60至65美元，每股派发红利4美元。这种出色的投资对象一旦被人盯上，市场上就会出现恐慌的烟幕弹，来吓唬阻止其他人买进。我对此早有领悟，因此，我继续吃进殊线铁路公司的股票。

这时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小麦意外地大丰收使得殊线铁路公司营运

收入大涨 50%，从而带动股票价格飙升约 60%，达到了 110 美元的高位，而这时，新拓展的支线甚至尚未开通。市场期待越发浓烈。

这次的市场气氛没有让我昏头，我继续追求变化的事实，以便确定殊线铁路的未来发展前景。我安排另一个人走遍铁路沿线及终点的美国西北部，甚至延伸到加拿大毗邻的地方，以确定谷物所有可能的运输路径。之后我就把自己埋进了厚厚的数据资料堆里。

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我略有失望又有些庆幸。事实与我最初的判断或预期完全是背道而驰，相去甚远，小麦的最佳运输路径是由五大湖区的最西端经水路运往美国东部地区，殊线铁路公司不会获得预期的收入。因此我开始抛空股票，大部分接盘的都是那些有“内部消息”的人。

我在股票暴跌前夕全身而退，还大赚了一笔。这正是翔实细致的调查研究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差错，从而及时修正的结果，而不是人们传扬的那样属于投机家的绚丽魔术。

///

常年在我公司外面行乞的一个老乞丐——我经常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拉住我，神秘地说：“我有个内部消息告诉你。”他的神色很正式。这正处于 1929 年股市飙升的时期，它引发的疯狂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乞丐、擦鞋童、理发师和美容师之类的人也在满世界宣扬发财的小道消息，那你就要告诉自己，天上掉馅饼的时候，地上一般都会有个大坑在等着你。

毫无疑问，证券市场全线飘红的时候，似乎无论谁的小道消息都会让人赚到钱。所以内部消息会随着市场的红火越发泛滥。这真是令人感到悲哀，因为人们会越发迷信这类消息，前仆后继地冲进市场，越陷越深。

更为离奇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会把某些不相关的事情联想为内部消息。某年冬天，我和妻子邀请了很多纽约朋友和亲戚，到我们住的圣雷吉斯宾馆吃晚饭。席间，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其中有几句话听起来是这样的：

“联合煤气公司。是的，对。很好，很好。对，对。非常好。”

几周后，我回到南卡罗莱纳州，在我的种植园里遇到了一位当晚曾去圣

雷吉斯宾馆做客的亲戚，她泪水涟涟地向我哭诉赔掉了很多钱。

“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也在联合煤气股票上亏了大笔钱。”她哽咽着说。

“什么？在联合煤气股票上亏了大笔钱？”我吃惊地重复道。

“当然了，”她答道，“我就是根据你的推荐才买入的。哦，抱歉，我当时无意偷听到了你说话，我对此感到很抱歉。你在电话中亲口说的，‘联合煤气公司，很好，很好’，我忍不住把这当作了你的推荐，就买入了联合煤气股票。”

而实际上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我委托人帮我调查联合煤气公司的运营状况等确切数据，因为我怀疑它的股价会下跌。而这个人调查出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当时把电话打到了圣雷吉斯宾馆，向我汇报相关情况。而我所说的“很好，很好”，是在赞扬他的工作，并庆幸自己采取了调查举措。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我抛空这只股票的时候，我的亲戚却在根据“我的推荐”开始买进股票。

情感与理性的争斗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在投机的过程中，在恰当的时机卖出远远比适时买入困难得多。股票上涨时，有人认为股票涨势良好，还有很大空间，就会继续持有。而如果股票下跌，由于期待股票能够反弹而让自己解套，他也会继续持有。在我们纠结于是赚到钱就知足收手还是赔了钱认同损失时，情感就给理性设下一个个陷阱，让我们左右为难。

如果一个人的理性战胜了情感，那么在股票上涨时就卖出，不追高。而在股票开始形势不妙时就服输，接受目前的损失卖出股票，就是他最自然的选择。

人生的折腾大半都源于不甘心，总是假设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表现得更好。这样的纠结只会让人沉溺于过去，忽视现在，对生活丧失斗志和激情。一个出色的投机者，也不过能在一半的时间里做到正确无误。但是如果他拥有良好的止损意识并能及时发现自己的失误，那么即使十次之中只有三四次正确，也足以赚到很多钱了。

很多时候我们忧心忡忡，是因为内心的理性或者说潜意识，看到了灯火辉煌后的黑暗，在不断向我们发出警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听到过的一段

话：“卖出一些股票，直到我能安心睡觉。”这句话就像宁静的月光，照在了我们焦虑的心头。此时最聪明的做法当然就是按照这句话说的做，卖出股票直到自己安心。

战斗时我们总会留有预备部队作为后备力量，来处理战场上的突发事件。我们也会安排军队轮番上阵保持攻击频率，而不是全体压上战斗不休。证券市场也是如此，定期卖出所有股票抽回资金，重新休整并审视市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在年轻时争强好胜，每每孤注一掷不留余地，在遭受到挫败之后我明白，先求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不能出现一招出错就全盘输掉，凭借自身财力无法承受的危机。同时，持有现金意味着更加灵活机动，当预料之外的机会出现时，就可以迅速抓住。

业精于勤荒于嬉，当一个人专注于某个领域时，长时间的历练就会产生技近乎道的效果，这种道会指引他体会意识到很多东西，甚至某些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无法解释的东西。在专业人士身上你常常能看到类似的效果。而我在投机交易中，如果缺乏这种感觉，比如陌生的咖啡领域，做得就束手束脚。所以我不相信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同时做好几件事。专注才会成功。那些幻想自己在证券市场、房地产领域、企业经营和政治活动各个方面无所不能的人，事实证明不过是白日梦罢了。

就像在法律、医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一样，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积累很多专业知识，投机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常识，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在百货领域与梅西（Macy's）百货或金宝（Gimbel's）百货开战，或者在汽车制造领域和福特汽车或通用公司竞争。但是具备这些基本常识的人，却往往头脑兴奋地冲进证券市场企图有一番作为，而证券市场和百货及汽车行业一样，都是专家在主导一切。

当然，这半个世纪以来，证券市场发生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意义和较为健康的发展，这就是投资分析师这个群体的诞生。作为一个新生的职业群体，他们与各家公司没有太多的利益牵扯，既不效忠也不结盟，他们客观地依据证券自身的表现来谨慎地做出判断。因此那些希望通过自身不多的积蓄来获得一些收益，但对证券又经验不多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顾问，就是他

的最佳选择了。

当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证券市场是什么氛围呢？保守秘密是最重要的法则。“做加法、做除法、保持沉默。”这是某个公司的头儿总结的公司业务原则。根本没什么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要求披露有关证券价值的信息，人们根本没有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只能靠自己来分析。因此当时流传了很多笑话，来形容那些金融巨头是多么惜字如金，想同他们交流甚至套出点信息，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人们常常提起一个詹姆斯·斯蒂尔曼的故事，他在街上偶遇摩根的一个合伙人乔治·伯金斯，当时他刚从欧洲回国，伯金斯说：“我看到你回国了。”

斯蒂尔曼依然保持沉默，见此情景，伯金斯马上补充道：“当然，你没必要回应我的说法。”

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为股民或者股东能够了解更多上市公司经营信息而进行斗争。但是当时交易所首要的工作是说服更多的公司上市，说明上市对公司有哪些好处。在市场繁荣之后，才能继续这种斗争，促使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化。因此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交易所并未取得什么进展。

而如今的问题，早已不是需要到处去挖掘信息，而是面对海量的信息如何筛选，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删除，挑选出核心信息并分析其背后的意义。明智合理的判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但是由于战争的威胁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长期存在，使得股票的价值更加难以判断。

战争和通胀时刻影响着证券市场的波动。它们对股票市场的深刻影响，对于人心的威胁，值得深入研究。有人投资股票是出于对企业前景的信心，而有人是惧怕自己的资本在通货膨胀及战争后会丧失价值。这两种动机在当时都极为活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股票市场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不寻常表现。

随着政府通胀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工商企业的价值得到巨幅增长。同时，其累计效应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至今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

1955年冬季，股市惊人的涨势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心1929年的股灾重现，不健康的股市泡沫散尽就是毁灭性的崩盘。

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下令进行调查，然而股市很快恢复了平静。当这份经历数月听证和研究的报告出笼时，已经丝毫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

将来如果再次出现类似的短期投机浪潮及相关调查，那么最好记住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认识，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过是一个买家和卖家聚合的交易场所，所谓的股市，也不过是这些买家和卖家对工商业等行业现状和未来的一个判断。股市是整体经济的一个映射，但是它决定不了整体经济的运行。人们越来越认为股市是经济繁荣或危机的根源，主要是1929年的股灾带给社会的印象太深了。

简单来说，股市只是体温计，而不是你是否发热的症状。股票市场会及时反映出国家的经济状况，如通胀或者政府信用削弱等等，而不是其根源。

在这需要重申的是，体温计和热症本身必须分开。体温计的不正常如果是失灵导致的，那么当然是个问题。但如果是经济状况出现困难和弊端，而导致股票市场不正常，那么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而当下证券投资界本身发生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结构性变化。例如，由于法律的变化，寿险和储蓄银行等机构，现在已经可以购买股票了。而投资信托和共同基金、免税的养老基金和其他各类基金都在迅猛地发展。

而且，现在很多行业的工厂扩建，不再通过外部资本融资，都是通过自身盈利和税收减免所得进行融资。这主要是避免出卖证券的资本利得税。这些变化以及其他变化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股票市场的运行。

当前的税率如此之高，使得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并愈加广泛，成为商业决策的重要考虑依据。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各种形式的税后豁免的后续影响。

我们要防范风险，但不能本末倒置，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股票市场出现危机，必然是总体经济政策和国家防御出现了问题，导致股票市场出现投机性浪潮。因此我们如果不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信用，那么没有什

么的价值能够持久。

另一个需要警醒的错觉是，人们可以通过监管避免投机性损失来保全资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的我，提倡并身体力行从业者的自律。而在 1929 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我提倡加强股市监管，从而扑灭越发严重的舞弊行为。

保护诚信者免受欺凌、免受损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但是很多人相信，在证券交易所这个神奇的地方，金钱不需要汗水的浇灌就会生长出来。这正是投机之所以损失金钱的根源，不是华尔街不守诚信，而是法律不保护一个人免于承担自己犯错的后果。

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规则从而超越对手，那么他必然会采取行动。这就是人性。我们监管投机行为，其实就是在监管人性。因此当时我支持禁酒令的实施。但不久我就认识到，在这些限制性因素之外，我们无法成功监管人性。

目前，凡曾参与“二战”期间爱国金融交易的公司董事，正面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由于其在战争期间，以爱国为幌子，误导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投资美国储蓄债券。现在随着美元购买力的下降，那些家庭的储蓄遭受重大损失，而没有响应呼吁的反而获得了好处。因此，如果政府下定决心，那么就保护家庭的货币购买力下手吧。

第20章

世外仙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繁杂的时代，所以要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匆忙的世界和繁忙的事务做些审视，看看这一切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慢慢地梳理一下心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经常进行思考，就像给货物做盘点，这是很重要的，我在早期投机活动中就得到了这样教训，这样的教训是很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此事。每次重大交易结束后，我就要让自己放松。

我离开华尔街，找个僻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地回味一下曾经的一切。如果交易赔了，就要想办法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交易是成功的，远离股票自动报价机的嘀嗒声，会使我的头脑保持清醒，精力得到恢复，以便精神饱满地投入新的行动中。

这个习惯已经习以为常。在 1905 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碰上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在老家那卡罗莱纳州买下了一块地，那里就像香格里拉，这是有名的赫伯考男爵领地。这里有沙滩，还有盐沼，是个理想的打野鸭的地方。这里有四条河流和一个海湾，河里的鱼类资源丰富，还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只是没有电话线。

很多年以来，只有从相隔大约 3 英里的乔治城走水路才能来到我这块 17 000 英亩的种植园。1935 年，一条公路将乔治城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尔明顿连接起来，这样去赫伯考就很方便了。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赫伯考还应

当保持独立的状态。来自乔治城的邮件和电报每天两次送到赫伯考，这就是我与外界的所有通信联系。

我在进入公共事务领域以后有个感受，就是拥有一片宁静之地，让心灵安详下来，这和在华尔街一样，都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那些华府官员被纷繁的难题所困扰，看到他们心力交瘁的样子，我就常去开导他们，建议他们暂时离开这些困扰他们的环境。很多官员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辛劳，他们睡觉时身边还放着铅笔和便笺本，早餐后，还没擦去嘴角的蛋渍，就赶忙奔向办公室。他们有很多会议要参加，努力去处理一个个危机，却从没有机会做些思考。

1945年年底，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来赫伯考度周末，我告诉他，政府高官能越过现在的各种压力，看到远处越来越远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重重地点头认同我的话，他还对我说：“还在战争初期，我就命令参谋部的每一位军官，每周要有一两天的时间不在华盛顿。我不愿看到让疲倦的大脑做决策去影响百万士兵的生命。”

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他面对难以承受的战争责任时，也感到压力巨大，也深感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因为忙碌而放弃休息。1944年4月，他到赫伯考旅行，开始计划住上两个星期，结果竟待了整整一个月。

听说在印第安语中，赫伯考的意思是“两水之间”。我的种植园之所以叫赫伯考，原因是这里有一片狭长地带，正好位于沃卡莫河和大西洋之间。就在南卡罗莱纳州附近有座岛，名叫波利斯岛。我在大约8岁时曾去岛上见姨奶奶萨姆松，那时我就被这座岛吸引住了。

我们先从卡姆登镇出发去查尔斯顿市，然后乘艄外明轮船“路易萨”号向北去乔治城。我还是第一次乘海船，当时的天气不好，狂风暴雨不断。我的老保姆米纳娃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立即带她上天堂。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的脑海里就留下了海洋残暴和恐怖的印象。

姨奶奶家住Pawleys岛，我们从乔治城出发去那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她的儿子纳特相识，他也成了我儿时的偶像。他是一艘小船的船长，经常在沿海活动，他的船名叫Banshee，从名字看像艘海盗船。他给我们讲到

在大约 10 英里远的沃卡莫地带^①发现了火鸡、野鹿和野鸭，他的故事生动传神，让人听得着迷。后来我听说沃卡莫地带正在出售，于是心中的这些往事又一次涌上心头。

赫伯考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最初它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授予罗德·卡特雷特（Lord Carteret）男爵的领地。据说在英国人把它变成殖民地前，西班牙人曾来到这里，尝试对这里的开拓。英国殖民时期，从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尔明顿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沿海的道路就从这里经过，当然，这还只是一条小路，它从丛林中穿过，但直到今天，这条小路仍被称为国王驰道（King's Highway）。

罗斯福总统对这些细节感到很有意思，当他听说威廉·埃尔斯顿（William Alstom）曾是赫伯考的主人时非常吃惊；埃尔斯顿的儿子约瑟夫曾担任过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娶了亚伦·布尔的女儿西奥多西亚为妻。一天，我带罗斯福总统来到万崖海湾赫伯考的森林边上，将独立战争时英国人修筑的要塞废墟指给他看。在要塞废墟四周的杂草中有许多英国士兵的坟墓。对这片坟墓，我一直都在阻止对它们的开掘。

听说自己是第二位来赫伯考访问的总统，罗斯福很感吃惊。第一位到访的总统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将一处最好的打猎点命名为“总统猎台”。我很喜欢讲总统猎台得名经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索内·凯因讲给我的，他对打野鸭很在行，当时还给克利夫兰总统做过向导。听索内讲，他先划船把总统带到沼泽地，接着用一棵低矮的棕榈树把小船隐蔽好，再把引诱野鸭的假鸭摆放好。然后把总统护送到猎台。要走到猎台，就要经过一块淤积的泥地，那里靠近小溪岸边。

在这样的淤泥里行走是要有些技巧的，踩下去时脚步要轻，抬脚时要快，这样才能不陷下去。克利夫兰总统的体重平时就达到 250 多磅，行走在淤泥中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索内帮助克利夫兰总统撑住庞大的身躯，但总统的手臂突然从索内的肩膀上滑了下来，身体将要陷入泥泞的沼泽中。总统一旦陷进沼泽，将会弄得

① 沃卡莫地带：指位于西边的沃卡莫河与东边的大西洋之间的狭长地带。

满身泥泞，这时，只见索内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把总统滚圆的身体抱住，用尽气力将他托起。

总统被索内高高举起了，他的长筒靴还陷在泥里，而索内此时也几乎深陷淤泥中，但他设法从淤泥中挣扎出来，他拉着总统的手终于返回到小船边，看看两个人都成了泥人。洗刷一番后，他们换上干衣服，接着用索内老练的话来说又都“服了药”。

几颗坚硬的药粒服下后，克利夫兰总统大笑起来，只见他笑得浑身颤抖。索内看总统身体无恙，心里才放松下来。索内讲述这些时，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在他看来，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所以有关罗斯福总统来赫伯考的消息被封锁得非常严密，这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做的。那是复活节，星期天的正午，总统来到赫伯考，为了预防消息走漏，专列选择乔治城北郊停靠。此行没有选择在乔治城中穿行，而是乘坐特勤局的车辆经一条小路到达赫伯考。当车队从大门开进我的种植园时，种植园里的一个黑人男孩发现了身披斗篷的罗斯福总统，他惊讶地喊叫起来：“哇！乔治·华盛顿！”

在乔治城，我的这位客人的身份没能保密很久，当他的车辆到达前，城里的人们就好像已经猜测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因为他们看到公路上突然来了很多身着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三名白宫通讯员入住当地宾馆。总统的专列也停靠在了城里铁路的旁轨上。我曾不允许在赫伯考架设电话线，于是，因为总统专列上装有一部电话，这便成了与华府联系的通信中心。

60 英里外的查尔斯顿《新闻和信使报》也很快知道了我的客人的身份，它的主编威廉·波尔（William Ball），现已故去。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波尔持反对态度，通过报纸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每天吃早餐时，总统会看很多份报纸，其中就有《新闻和信使报》。就在总统到达赫伯考后不久，这家报纸就开始刊登社论，对总统展开猛烈的抨击。

总统看了非常生气，于是我找到波尔，让他在总统逗留期间不要刊登这样的社论。我对他说，他可以拥有言论自由，我无权干预，但总统来此是客人，我们这样对待客人是否显得不礼貌。

虽说此事让人不快，总统在这里还是挺舒服的，甚至都不想回去了。刚来时他很疲倦，还身患感冒，但离开时已经晒得黝黑，身体非常健康，他的贴身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泰尔（Ross McIntier）对我说，总统的健康状况好多年没这样好了。

赫伯考的4月很美，当时，杜鹃花在房屋周围的路上盛开着，灌木丛的绿荫掩映在一片由红色、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组成的花团中。但4月不适合垂钓，为了帮总统物色一处适合钓鱼的地方，我已经事先派人四处查看，最后，听说经营一家大商店的拉尔夫·福特知道几英里远的大西洋上有一处好地方，很适合钓鱼，于是总统由他领到那里。那里有一只沉船的残骸，总统乘坐的船一从那里经过，鱼就会咬钩。

总统一再劝说，让我也随同一起出海钓鱼，但我清楚他喜欢恶作剧式的玩笑，他的军事助手沃森将军来自宾州，我曾对他说：“总统平常就知道我晕船，但他还让我出海，一旦答应了，他一定会让船长往凶险的海面上开。”

总统在赫伯考处理了大量公务。一天，他叫我看一份空军报告，上面说日本的战机已经被大批击毁。“你能数清吗？”他带着疑虑问道，“如果报告没错，那日本人现在就没有多少战机了。”当然，在日本宣布投降时，他们的战机确实差不多都损失了。

总统在赫伯考暂住期间，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去世了。一天午饭时，我们聊到谁更适合继承诺克斯的位置。这时，有人提议詹姆斯·佛勒斯托（James Forrestal），他后来得到了任命。总统说：“他是纽约州人，我们这里有三位内阁成员来自纽约州。伯尼，你觉得不多吗？”

“这个人来自何方有什么关系？”我回答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此时，人们最希望有最合适的人选，需要最了解情况的人，不能找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

很多重要人物来赫伯考和总统会面，听说某个VIP要来了，我就离开去华盛顿或纽约，几天后再回来。我想让总统把赫伯考当成自己的家，不要把我当成主人陪伴在他左右，这样使他感觉不方便。一天，我刚回来，我的男仆威廉·雷西边激动地对我说：“您知道今天谁来吗？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 将军专程从意大利赶来。”

在赫伯考总统虽然也在处理很多公务，但比起过去还是得到了休息。我在房子的底层为他安排了有两个房间的套房，这里和其他地方完全隔离。总统每天有 10-12 小时的睡眠时间，下午他就乘车到我女儿贝尔的住处喝酒。到了晚上他喜欢玩单人纸牌。有一次，威廉·利希 (William E. Leahy) 海军上将正等待他，因为有些电报需要研究，但总统非要让我看牌形的变化，这一局他有两种打法，这是我没见过的。

别的晚上，我会和沃森将军、麦金泰尔海军上将、我的护士布兰茜·希金斯在起居室玩金罗美纸牌。这时总统就会自己转动轮椅进来，接着他在一旁侧着身体口授信函。只见他一边口授，一边听着牌局的进展，看看输赢情况，他还会不时地随我们一起痛快地大笑起来。

///

罗斯福总统住的不是赫伯考最初的庄园大宅。过去的房子木结构，非常宽敞，在 1929 年我们举行圣诞节聚会时着了一场大火，老宅子被烧毁了。那时，妻子和三个孩子和我在一起，还有迪克·莱登和内华达州参议员盖伊·皮特曼 (Key Pittman)。

我们从大火中抢救出一些珍贵的东西，但火势无法阻止，蔓延到了整个房子。我们站在房前的草坪上，眼看着火光冲天，皮特曼参议员突然高声惊叫道：

“我的天，伯尼！地下室还有一桶上好的玉米酒，如果遇上火，它就成了一颗炸弹。”

不知皮特曼参议员是担心爆炸的危险，还是为失去优质的玉米酒惋惜，但见他和迪克·莱登把湿手帕系在脸上，两人冲进地下室，当他们出来时，酒桶也被滚了出来。

转年，这座房子重建，为了防止火灾再次发生，新房子的材料全部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和红色砖块，但建筑风格还是乔治王殖民时期的。这里能提供十间卧室，每间都有独立浴室，尽管整个建筑有中央供热系统，还是在每个房间设立了独立的壁炉。

房子是在一处斜坡上建的，周围的环境犹如置身于公园，这里有木兰树、长满苔藓的橡树、稀罕的香樟树，还有一丛丛山茶和杜鹃。一天，银行家奥托·卡恩走出房子，他看见西班牙苔藓挂在每棵树上，就像披上了披肩，见此情景，他不禁大声惊呼：“我平生第一次弄明白了，为什么南方人对南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还有一位客人，他就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拉尔夫·普利策（Ralph Pulitzer），有一次突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有关赫伯考的诗。这首诗就在我的文件夹中，但我还是克制自己不去发表它。

房子迎面的门廊上，有六根立柱，它们都有两层楼高，绿草如茵，从门廊一直伸向 Winyah 海湾，有四条河流进海湾，它们是桑皮特河、布莱克河、沃卡莫河和皮迪河。在这几条河的两岸曾种植过水稻，水稻湿地后面的高地上种植棉花。在赫伯考 17 000 英亩的土地上曾有 1/4 的地方专种这两种作物，但现在的种植面积还不足 100 英亩。

从房子到乔治城公路，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沿途都是行驶在种植园的地面上。沿着公路，有一片令人恐怖的大森林沼泽地要穿过，那里的水面上有形状古怪的“膝盖”矗立着。路上，还会看到大片的红松林和天然林，有很多树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砍掉的，那是因为在战时要缓解燃料的紧缺。沿着公路，你还会看到古老的黑人村落的遗存。在我的种植园里，曾经有四个独立的黑人村庄，随着水稻和棉花种植的衰落，村庄也衰落了。罗斯福总统来时，这里只剩下一个村庄，其他的都消失了。

赫伯考一般是在感恩节开放，直到 4 月，有时也推迟到 5 月，但那是很少的时候。全家在圣诞节时团聚。买下赫伯考的最初几年里，来访的客人多数都是我在华尔街结识的工商人士，还有就是家里的朋友。后来，政治人物、报业人士、军队的一些将领、作家、演员、戏剧制作人、教育家等等，也成了这里的客人。

有一次，来自马里兰州的几个政治头面人物来此度周末，其中就有已故的时任州长艾尔伯特·莱齐（Albert C. Ritchie）。记得当时讨论的话题是由谁带队率领马里兰州代表团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弗兰克·肯特（Frank Kent）当时任布恩斯伯勒《太阳报》首席政论家，他站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

用激昂的声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点头微笑着，这就是一种鼓励，使弗兰克更为热情地畅谈自己的观点。突然，只见他跳离壁炉边，猛然回头看了一眼，原来，他谈得太投入，没注意到自己的裤子被壁炉的火烧着了。

还有另一场政治讨论就没这么激烈了，那次讨论的是关于为民主党筹集经费的问题。有位客人引用来自肯塔基州的已故参议员奥里·詹姆斯（Ollie James）的话印证自己的观点：奥里习惯使用赛马术语，以增加趣味性。有人建议奥里尽可能地使用某个人筹集经费，只见他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道：“那样就是白白浪费了时间。那家伙是分组赛比同时到达终点的成績还要接近的一匹马。”

1932年，温斯顿·丘吉尔和女儿戴安娜曾来赫伯考做短暂逗留。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在百慕大度假。在百慕大，戴安娜学会了卡里普索早期唱的一首歌，来到赫伯考后，她还在反复哼唱着。赫伯考的天气不好。我请来很多市民，他们在当地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有南卡罗莱纳州的名人。此后几年中，丘吉尔几次和我说起在这里结识的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但他会问“那个光头的小店主怎么样了”之类的问题。

遗憾的是赫伯考的客人登记簿已经不见了，但我还是能够回忆起一些客人：我哥哈迪的朋友杰克·伦敦、艾德娜·费薄、蒂姆斯·泰勒、富兰克林·亚当斯、著名的赛马训练师迈克斯·赫什、罗伯特·谢伍德、哈里·霍普金斯、鲍勃·卢瓦克、赫达·赫博、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海伍德·布劳恩。我问布劳恩，能否和我们去打野鸭，他开玩笑地说：“我在睡梦中打野鸭。”摩纳哥亲王、现任王子雷尼尔（Rainier）的祖父，曾用几天时间在赫伯考捕捉珍稀蝴蝶和鸟儿。

奥马尔·布拉德雷将军（Omar Bradley）特别擅长射击，空军将军豪埃特·万登伯格（Omar Bradley）和司徒沃特·明斯顿（Stuart Symington）南下来到赫伯考，我们曾多次就有关空中力量的话题展开讨论。1953年年初，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A. Taft）和哈里·拜尔德（Harry F. Byrd）来到这里度周末，他们打猎、谈论政治，他们互相尊重，我有时独自暗想，如果塔夫特没有被癌症突然击倒，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很

有可能会发生转变的。

别的朋友经常来访，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一次，比如《圣路易斯邮报》已故出版人约瑟夫·普利策、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s）的罗伊·霍华德和沃克尔·斯通、阿瑟·克罗克、戴维·斯诺夫、克莱尔·卢斯和亨利·卢斯、赫伯考·斯沃普，还有已故的约翰·汉考克和休武·约翰逊将军。

戏剧界的人士有沃尔特·休斯顿、约翰·高尔登、迈克斯·高登和比利·罗斯等人，每当他们来访，我会带他们到黑人村庄转转。如果是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就在谷仓里举办舞会。如果是星期天，就在刷了石灰的小教堂做礼拜。

每到新年来到那天，一场逐猎野鹿的大赛开始了，南卡罗莱纳州州长会到场主持仪式，体育界的名人们也来了。早在理查德·曼宁任州长期间就常举办这样的赛会，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但对猎杀野鹿这种比赛，我是不喜欢的，我的几个孩子也不喜欢，他们不愿开枪杀害野鹿。现在，赫伯考属于非官方野鹿保护区。从这里乘马车行走不远，就能看到野鹿，它们几乎就从你的马鼻子跟前跳过林间小路。

我曾在苏格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打猎，但在这些地方，我还没有发现哪里能比得上全盛时期的赫伯考。赫伯考的猎物数目繁多，品种也很多。在海湾和河流中还有大量的鳕鱼、鲱鱼、比目鱼、羊头鲷、牙鳕、蓝鱼和西鲱。稻田里水道蜿蜒，有很多鱖鱼；而在沼泽中，又有很多牡蛎、蛤蜊、螃蟹、水龟和大虾。

无论是森林还是田野，到处都能看到丘鹑、滨鹑、鹌鹑和火鸡。火鸡的数量曾经是很多的，我常要将双轮小马车停下，以便让大群的火鸡从小路上跑过去。对火鸡我尽力保护，因为狐袋貂、浣熊和野猪正在不断增多，它们对火鸡的窝穴形成了威胁，但我的努力显然没有多大成效。野猪是将家养的猪放到森林后形成的，一旦受到骚扰，会有很大危险。

在拥有这个地方的开始几年，我们还捕捉过野猫和水獭，也发现过野熊，但后来很长时间就不见踪影了。

///

特别要说的是，赫伯考以前以野鸭出名。野鸭最理想的觅食处就是稻田。就在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南卡罗莱纳州的沿海地带还在种植水稻，对整个美国来说，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赫伯考更适合打野鸭了，我对此是非常相信的。就在南卡罗莱纳州不再种植水稻后，在这里就很难再发现野鸭的踪影了。野鸭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加拿大的孵育地遭到侵袭，人们每年拿走数百万只野鸭蛋卖给面包房。

因为赫伯考的野鸭很多，就导致了大量的偷猎，这种事情差点要了我的命。当初我买下赫伯考时，盐沼土地已经出租给了费城的一家运动员俱乐部。在此之前，这家持枪俱乐部和索内·凯因斯的几个兄弟因为偷猎问题一直都有争执。凯因斯家族几代人都在赫伯考或附近生活，好像听说他们声称拥有这里的一些产权。

一天，波尔·凯因斯和兄弟哈克斯·凯因斯驾着一艘小帆船出发子，他们来到这家俱乐部一个会员正在打猎的地方。兄弟俩坐在船上，在他们膝盖上摆着双筒前装式长枪。他们骂这个北方人，对他说自己对北方佬的印象。

我买下种植园后，凯因斯家的两个兄弟鲍勃和普拉蒂就成了我的打猎向导。波尔和哈克斯还在偷猎。在一天上午我有了发现，哈克斯就在地盘上，距离我不过半英里。我把他捉住了，这时他已经偷猎了 166 只野鸭。我当面对他的偷猎行径做了严厉的指证，但到最后我还是给他留了条出路，问他是愿意为我工作，但不允许在这里偷猎。

但波尔依旧恶习难改，我无法阻止他偷猎。不管是威胁还是劝导，他都软硬不吃。为了让他相信我是认真的，我把所能做的都做了，我做到了仁至义尽，然后我把他和另一个偷猎者拘捕，他们在监狱坐了九个月。在波尔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都由我的律师照看，但他被释放后，却经常来找我的麻烦。

一天，哈克斯和我正从“总统猎台”打野鸭回来，他突然惊恐地对我说：“伯尼先生，波尔就在岸上。你要小心点。”

哈克斯马上掉转船头。我拦住他，让他把船头又掉回来，直接对准岸边划去。到了岸边，我一边上岸，一边就听到波尔朝我破口大骂，他发誓要把

我的灵魂送进地狱，接着就用枪瞄准了我。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枪的那两根长筒。当时我的感觉是，即使我跳进那长筒中，也不会碰到筒壁。我心里很害怕，机械地移动脚步向波尔走过去，我问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就在此时，我的一位雇员，名叫吉姆·鲍威尔的上尉赶忙过来，他手里端着一只很大的六发手枪。我尽量让自己镇静，说道：“吉姆上尉来了。”只见波尔扭了一下身体，我趁机迅速把那两根长筒抓住，将枪口推向天空。

事情过后，偷猎的事情少多了。吉姆做了我的总管，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身体健壮，勇敢无畏。

一个人就因为偷猎野鸭而被关进监狱，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就感觉不安。野鸭本身是不重要的，但我也清楚，如果波尔射杀野鸭，别人也跟着这么做，偷猎者就会很快都到这里来。对我，偷猎者是不会尊重的，别的偷猎者也不会尊重我。我想起了父亲对我讲的曼内斯·鲍姆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如果你被侮辱，你在南卡罗纳州就算完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必用过激的办法对待哈克斯。哈克斯想说什么，只用简单几句话，又很幽默。比如，当我没有射中野鸭，却要为自己寻找借口，这时，他就会这样说：“嗯，找个拙劣的借口吧，这总比没有借口好。”

在禁酒时代的早期，有四位参议员客人来到赫伯考，我接待了他们。他们是阿肯色州的乔·罗宾逊（Joe Robinson）、密苏里州的帕森·哈里森（Pat Harrison）、内华达州的凯伊·皮特曼和肯塔基州的斯坦利（A. O. Stanley）。一上午我们都很开心，当我们乘四轮平板马车准备回家时，我对向导说：“哈克斯，你知道这几位先生吗？法律就是他们在华盛顿制定的。”

哈克斯把身体靠在马车的前轮处，问我：“在华盛顿制定法律的果真就是他们？”

“是的，哈克斯。”我肯定地回答。

“嗯，”哈克斯说，“如果他们对别的事情的了解没有比对威士忌和野鸭了解得多，那么这个国家就完了。”

哈克斯对科尔·布里兹（Cole Blease）是衷心拥护的，布里兹当时正

担任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后来做了参议员。布里兹声称自己是“平头百姓”的斗士。哈克斯一直也无法明白，他所崇拜的人怎么会对我极度不满。布里兹每次来到乔治城，哈克斯总要找他争辩一番。但在哈克斯看来，布里兹对我的谴责是他唯一的缺陷。

“当别人讲话时，”哈克斯有一次对我说，“大家都在鼓掌，但当布里兹讲话时，大家就高呼哈利路亚。一听说他要讲话，人们就都蜂拥而来。上帝是万能的，当他要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时，科尔·布里兹诞生了。”

哈克斯还对我讲过另一个参议员的故事，此人来自南卡罗莱纳州，他是个贪杯的人，却投票赞成禁酒。对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哈克斯非常欣赏，这是因为他在非法私酿、销售酒类，给自己增加了收入，而这个修正案就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位参议员就禁酒令所发表的演讲非常精彩，哈克斯为之欢呼，他起身问道：“参议员，你讲得太好了，但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哈克斯能用嘴巴或口哨呼叫野鸭，他学得太像了，无论是猎手还是野鸭，谁也分辨不出是不是真的野鸭在叫唤。说到这方面的技艺，只有我的儿子伯纳德接近他的水平。我曾向哈克斯请教他学野鸭叫有什么窍门，他回答：“伯尼先生，这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过尝试，就慢慢会了。”

当初打野鸭，早晨四点或四点半就要动身。有时就在黑暗中，有时就在漫天的星月中划船出发。这时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到划桨的声音和水的哗哗声，野鸭不时被惊起，发出嘎嘎的叫声，有的野鸭惊恐地迅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月亮正在隐去，旭日慢慢升起。

红日初升，这时，你可以看到东方的数万只野鸭。它们有时就像一群蜜蜂从一个巨大的瓶子中蜂拥而出，它们数量之多，能让你看着发呆，甚至会觉得眼前的一幕就是一种幻觉。当太阳在地平线上慢慢升起，野鸭从稻田里一群一群地飞起，它们排成人字形向盐沼飞去。当飞近盐沼或听到猎人的叫唤时，它们会盘旋在诱鸟^①上空，接着飞落下来。我见过许多小野鸭从小溪飞起，在空中它们会形成小溪的图案。

看到野鸭这样多，我就定了一条规矩，从上午十一点后，任何人不许猎

^① 诱鸟此处是指诱鸭。

杀野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那时打野鸭可以延至十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九点钟时就已经结束打猎了，十点半动身回家。

我们一整天都在打野鸭，打中的野鸭就躺在我们四周 120 码左右的范围内。在赫伯考的盐沼中是不能使用猎犬的，因为它们的脚会被牡蛎壳割伤。我们也曾尝试过各种办法，比如给猎犬的脚套上靴子，但还是没用。

但只要你能记得射中的数量，向导就能如数捡回。一个优秀的向导，他会记住每只野鸭落下的位置。我记得哈克斯有一次几乎将所有打下的野鸭都找了回来，最后只剩两三只没了下落，记得当时的数量是 200 只。

在赫伯考有时一次打下的野鸭多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从赫伯考回纽约或华盛顿后，常跟人说起这些故事，有的人说什么也不相信。威尔逊总统在位时的总检察长托马斯·格雷格瑞（Thomas W. Gregory）就认为我是在撒谎，他对罗斯福时期的商务部长和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Jesse Jones）说：“杰西，安静一下，我们都坐好了，听伯尼说瞎话，听他怎么讲野鸭的事情。”

我们再说说 1912 年或 1913 年的事，那时，惠特尼兄弟——哈里（Harry）和佩尼（Payne），他们驾着自家的游艇来到 Winyah 海湾打野鸭，用这种方式度过周末。第一天打猎过后午餐时，哈里说：“伯尼，你要想把这个地方卖掉的话，我出 100 万美元。”听他的话是认真的，但是我不打算卖，于是就聊起别的话题。

我在赫伯考见过的最出色的猎手要数罗伊·雷尼（Roy Rainey），他是纽约的商人。哈克斯曾对我说过，有一次雷尼因为穿的大衣太厚重，影响了射击的精准，连着有 2 只野鸭都没射中。雷尼便将大衣脱掉，一边甩着膀子让血液循环起来，一边高声吼叫：“让所有的野鸭都来吧。”说着就端起猎枪射击，真是弹无虚发，有 96 只野鸭被他射中。

在赫伯考还有一项受人喜爱的户外项目，那就是打鹌鹑。但树木枝繁叶茂时，要发现鹌鹑就很困难了。当你发现一只鹌鹑时，下层的灌木丛一般都很浓密，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根本没法射击的。我打鹌鹑一般会选择在大约 45 英里外南卡罗莱纳州内陆靠近金斯特里的出租土地上进行。我现在在南卡罗

莱纳州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还继续在这里打鹌鹑。

为了保护鹌鹑，在我的土地上，每一群鹌鹑（一般一群有 12~20 只）不能被射杀到不足 5 只。这个数量能够保证下一季鹌鹑的产出量的最佳效果。

和别的猎物一样，鹌鹑会选择条件好的地方，那里适于觅食和栖息。在几年间，我都做出安排，派人认真检查捕获的鹌鹑胃中的食物。我发现，鹌鹑喜欢吃鹌鹑豆或叫化虱^①，它们一般都是野生的。我们学会了如何采摘和种植这些植物。为了保有鹌鹑，我还采用了另一个办法，让手下人用捕鸟夹捕捉“湿地”鸟儿。要想射中它们是很难的，一旦捕捉到，就把它放在小山上。

///

阿肯色州参议员乔·罗宾逊是我曾经认识的最为热情的猎手，不管做什么，他都格外认真，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让他丢掉了性命。

罗宾逊时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不得人心的重组最高法院的计划，身负重任的罗宾逊竭力想让国会通过这个计划。许多年了，为防心绞痛，罗宾逊一直都在服药。给他看过病的医生都告诫他要将工作节奏放慢，但他不听。1937 年正忙于为罗斯福在最高法院安插亲信的计划而努力运作时，在一天清晨，人们发现罗宾逊已经死在他的床边，身边是一本摊开的《国会记录》。

人们都能感到与他相处时的愉快，他对饮食不加节制，精力旺盛，浑身都充满了勇气。我总试图把他从华盛顿拉出来好好休息几天。有时到了周末，想到他的辛苦，我就在纽约给他打电话：“乔，我准备明天到赫伯考去，火车晚上 7 点 45 从华盛顿路过，我给你预留座位了。”

他总是这样回答我：“实在抱歉，我没有时间，一天也走不开。”

聊了一会儿，罗宾逊会问我：“你过去说在那打猎，是怎么说的？”我回答说：“很好。”

他接着对我说：“你刚才说火车几时从这里经过？”其实他很清楚是晚上 7 点 45 分。最后他说：“我尽量来，但现在还不敢肯定。”一般来说我

① 叫化虱：一种植物，果实很小，且布满细刺，容易沾到衣服或动物皮毛上。

会在第二天晚上在车上看到他。

在打猎时，罗宾逊的敬业精神也会表现出来，他目标专一。清晨的太阳还没升起，他已经去寻找野鸭了。到了下午他就去打鹌鹑。晚上他会到湿地边缘，在那等一只火鸡飞到一棵高大的树上栖息，这一等就要花上很长时间。

一天，罗宾逊正想着什么，这时，一只大鸟轻轻飞来，落在大约 100 码远的一棵大树枝上。从鸟儿的长须看，罗宾逊判断那是一只雄火鸡。我不许任何人射猎雌火鸡。罗宾逊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他举着枪大声咕哝道：“我就是这样把休斯部长先生从台上打下来。”

回到屋里时，他的手里已经提着那只重达 24.75 磅的大鸟了。我们很快就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那是几个黑人，其中一个说，罗宾逊先生真有意思，他把火鸡当成休斯部长。

我们打算将这只火鸡送给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总统。罗宾逊回到纽约后好几天，还没有收到总统的任何回执。后来，在偶然间他遇到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吉姆·沃森（Jim Watson）。沃森对他说：“你送给总统的那只鸟太好了。”

听了这句话，罗宾逊像平时一样直言不讳地说：“是挺好，我还觉得，总统也不写张条子把我们民主党人请来帮他吃掉这只鸡，真不够意思。”

此后不久，我们所有的人就收到了来自白宫的致歉信，信中措辞温文有礼。虽然这样，罗宾逊还是发誓说，如果还能打到 24 磅重的火鸡，一定不送给共和党人。

海军上将凯瑞·格雷森（Ary Grayson）过去给威尔逊总统做过医生，他和乔·罗宾逊一样喜欢打猎，但成功的机会不多。凯瑞是个善良的人，他彬彬有礼，这让我非常喜欢他。他能一整天都待在树林里，但我的一位向导曾说，他可能就“带回家一只羽毛”。但凯瑞心眼宽，从不为此感到沮丧。

我想让凯瑞在回家时不至于空手而归，就如此这般做出安排。一天，当他正在树林中穿行，他的向导突然示意他，在一棵大树下面有一只大火鸡。凯瑞端起枪来射击，然后跑到树下—看，原来是一只火鸡被拴在树上。火鸡的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线，上面挂着一张卡片，只见上面这样写着：“伯纳德·巴

鲁克向您致意。”

对这个玩笑，凯瑞和我们都很喜欢。他还把这个玩笑对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讲了，总统又让它传遍华府。如果凯瑞不说的话，这个事情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在赫伯考有个规矩，不允许透露客人的打猎成绩。

凯瑞对这个玩笑的反应，是对我的一个信念的支持，也就是没有什么运动能像打猎一样显示出男人的个性。有什么运动项目能将一个男人潜在的野性激发出来，对此我还真不晓得。也不了解还有什么运动会对一个男人产生这样的压力，使他说出实话。

有一次，沃森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夫·厄利（Steve Early）在一起开玩笑，要比试一下看谁能打到最多的鸟儿。斯蒂夫首先回来，他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沃森回来时，斯蒂夫踌躇满志地问道：“你打了多少只？”

赫伯考还有一个“习俗”考验人性，就是用袋子和灯笼打沙锥^①。经受住考验的客人多数都成为赫伯考捕猎沙锥俱乐部的成员，但有一位先生没能通过测试。

他就是乘坐莫泰默·西弗（Mortimer Schiff）的私人专列南下赫伯考一行人中的一员。同行的人还有中央联合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沃利斯（Jamea Wallace）、从前美孚石油而现在为洲际橡胶公司总裁的霍华德·佩吉、金融家奥克雷·索恩（Oakleigh Thome）、来自华尔街的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我的哥哥哈迪，还有我自己。

这位先生过去没来过赫伯考，对赫伯考打猎的各种神奇之处自然持怀疑的态度，在车上有人给他讲述在这里打猎的奇妙。在我们看来，猎捕俱乐部已经有了新的候选人。

一天晚上，索恩的表情像个庄严的主教，他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拽着小胡子对我说：“伯尼，你为什么让我们打沙锥？”他接着解释道，他清楚我是不喜欢打沙锥的，因为这不用什么高超的打猎技巧，但他又说这是很神奇的活动，还觉得我们都会从中找到乐趣。

① 沙锥：一种嘴细长的鸟，居于水田、溪边、湖畔等湿地，习惯在早晨、黄昏或夜间活动。

我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野外运动非常愚蠢，眼看着一个男人手里提着袋子和灯笼、吹着口哨吸引沙锥进入光线跳进袋子，这是很愚蠢的。最后我被说服了，同意就用一个晚上打沙锥，多了我不奉陪。

接着，客人们就谁捕捉到的沙锥最多赌开了。没多大工夫，我们的俱乐部会员候选人就上钩了。他觉得打沙锥很容易，于是就主动下注。我在纸上将所赌注的数目写在上面，传给桌边每个人过目，看看是否有误。

第二天，我们还是有些不踏实。鸟儿听到口哨声或看到灯笼就飞进袋子，在这一点上，沙锥当然不会比别的鸟儿更容易飞进袋子，那位候选人是否会发现这一点，我们对此十分担心。整个白天，我们都会听说他在与一些仆人和向导讨论打沙锥的事，好在没有人泄露玩笑的内容。他又向黑人管家询问对打沙锥的想法，管家这样回答他：“对喜欢打沙锥的人是很容易的。”

鲍勃·凯因斯领受任务，带着候选人出发，他要教候选人怎样使用袋子和灯笼，怎样吹口哨把沙锥吸引过来。鲍勃回来后说：“伯尼先生，我不想出去带他回来，事情会被他弄糟的。”

那些猎人助手在紧张地忙碌着，听说只要有响动就会把沙锥惊起。那位优秀的银行家候选人按照原先教他的方法吹着口哨，他要把沙锥引到他的灯笼边来，他的声响我们都能听到。他吹的口哨声越响，我们就越要笑起来。我们中的有些人直笑得在地上打滚，有的还把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生怕声音太大了。

不用去叫候选人，他自己会回来的。看看他的表情，我们都忍住没有笑出来。

“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只听他喊叫着。他说的是一家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竞争对手，和他一样优秀。

在赫伯考猎捕沙锥俱乐部的勤务表上，像金融、工业、法律、文学和政治等各个行业的著名人物都编了号，但候选人没有资格上榜。

第21章

黑人的进步

在南方，我安下第二个家，这是因为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与祖先生活过的土地失去联系。她还劝我，让我为南方的复兴多做事，特别是“为黑人做事”。

我牢记母亲的叮咛。在南方的工作中，为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我始终都在努力，同时为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而尽心竭力。

卡姆登镇准备在当地建一家医院，他们请我捐款，我明确提出条件，就是支持建院，但必须为黑人患者预留一定数量的病床。

当时，人们都在议论建院的费用需要 2 万美元。我对他们讲这些钱是不够的，如果大家都能出些钱来建设医院，我愿意承担全部的建设成本。他们同意了。医院发生火灾后，我又出资建了一座更好的医院，还有一个护理院。

我在给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捐款时，黑人教育机构也得到了捐助。在我提供的奖学金中，白人黑人都有份。

当你想做成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并不是你预想的结果。有一次我在乔治城购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为黑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场，但遭到附近居民的抗议，但我仍然坚持做下去。这时乔治城黑人学校的校长贝克博士找到我。每次来访，贝克总要穿过厨房进来，但离开时又总是走前门。

“伯尼先生，”他诚恳地对我劝说道，“我希望你不要建运动场了，我们和这里的居民一直相处得不错，我们不想惹什么麻烦。”

无奈，我只好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修建运动场。

看来，对于这件事情，贝克博士比我明智。在与黑人和白人的一切交往中，我始终都在尽力做得更好，让一切比社会习俗所要求的更宽容和慷慨，我的这种做法但愿能给人们提供借鉴。我也深深感受到，榜样要想影响广泛，还不能在你所施加影响的人中间太冒尖，这个原则在人类一切事物中都是适用的。

当然，也有人不满这样做，那就是梦想一夜之间让世界改变模样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想保持世界模样的人，他们对此都不会满意的。我坚信生活是要变化的，但我也反对那种把事情弄得更糟的变化。

每当回想起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在世纪之交的生存状况，看到他们已经取得的进步，我就非常感慨。我最初结识的黑人都是黑奴的子女，这些人非常淳朴且待人友善，但做事又不负责任。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那里多数黑人依然靠做佃农生活。而现在住在我附近的黑人，他们有经商的，有做专业工作的，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农场，已经跻身这个地区最被人信赖的农场主的行列。

近来在和一位白人交往中，我向他了解在农作物价格不断下降的形势下，黑人农场主怎样坚守土地的问题。“他们自己会承担下来的。”听着这位白人的回答明显带有一种钦佩之情，他说，“他们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土地，就会不惜一些代价守住它。”

我有一位白人邻居，他曾想从黑人农场主那里购买 1 英亩湿地，但被对方婉言谢绝。我的邻居还想再试试，他提出用 500 美元做交换，这个数字堪称天文数字了，但黑人农场主回答说：“抱歉，上尉，我帮不上你。不管发生什么，我也不会和我的土地分离的，哪怕只是一寸。”

我个人的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常对我说，黑人经营土地的收获和最有效率的白人农场主一样多，他们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掌握也同样迅速。

///

这些变化让我又想起当初买下赫伯考时黑人的生存条件，抚今追昔，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时，谁在南方买下一个种植园，就会有相当数量的黑人随

土地留下来。那些黑人 and 他们的祖先一样就出生在种植园，他们没有离开过这里，在他们看来，土地的所有者对他们负有责任，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

有一天，我对这种情形有了更充分的认识。那天，我的管家哈里·到纳尔森对我说，因为有个黑人很懒惰，他打算让那人离开。在平时我喜欢委托一个人全权处理事务，把责任都担当起来，但也有例外，就是如果要是让哪个黑人离开，必须得到我的允许，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

我想听听这个黑人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妻子、她的继母和我一起来到谷仓，我派人把莫里斯叫来。很快这个黑人就来了，只见他上了年纪，身穿灰色毛衣。他手拿帽子，先向两位女士鞠躬，接着向我鞠躬。

“莫里斯，”我说，“哈里上尉说你懒惰，不愿意干活，他打算让你离开。”

“伯尼先生，”莫里斯回答道，“我在这里生，我不想离开。”他说这句最简单的话时，没有一丝羞愧感。

莫里斯边讲边在我们面前来回走动。“伯尼先生，在自由之前我就出生在这里。我母亲和父亲过去就在稻田里干活，他们去世后就埋在这里。在我印象中，最远的地方就是种植水稻的河岸。我从这么高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说着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小时候的身量。

“你看这双臂的力气，这双腿的力气，还有我这老后背的力气，伯尼先生，这些都是在你的稻田边长出来的。不用多久，老莫里斯余下的这点气力，就会被仁慈的上帝带走的。我也要留下来，和那些埋在种水稻的河岸边的手臂、腿脚和后背待在一起，伯尼先生，你不能把我从这个地方赶走啊。”

“我有很大的麻烦……”他转过身对两位女士说了起来，他的妻子去世了，现在有个女儿需要他来抚养，他的生活很艰难，白天要整天在稻田里干活，同时要看管活蹦乱跳的女儿。年轻人到了求偶的年龄总有不负责任的现象，说到这里他声调低沉，就像在喃喃自语，他虽然没有说出什么，但比说出来更能让人理解他的内心感受。

“这位女士能理解我。”他低声对我妻子说。

有件让莫里斯难言的事，就是他的女儿没有结婚，却生了一个孩子。这

件事他没有明说。莫里斯辛苦地喂养这个外孙女，给她一个家，给她爱。

“这位女士能理解我。”他一再重复着这句话，好像我理解不了这件事的微妙。

“伯尼先生，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黑人，”他最后说，“假如我没有做好，那是因为上帝就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上帝让你是个什么样，你就得是个什么样。”

为了某件事替自己找借口或者为自己辩解，这些我都听到过，但和这位老黑人相比，谁也没有他的申诉令人动情，让人期盼社会的公正。于是，他受到我们一家的特别关爱，老人深谙人情世故，对此非常明了。

莫里斯还为我养鸡，但因为那些鸡感染了流感病毒，我就决定放弃养鸡试验。我尽力动员莫里斯向其他黑人学习，以便掌握更科学的耕作方法，但在最初的日子里，进展并不明显。

但现在不同了，我认识的黑人农场主和白人一样，在耕作方法上很善于学习。比如埃利·威尔逊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在 200 英亩的农场上自己选种，使用多种类型的肥料，并将蔬菜、棉花、烟草和玉米等进行轮作。在农业科技的应用上，他堪称行家，不比别人差。他还在我们这个地方获得最佳捕鸟能手的称号。

再比如特洛伊·琼斯，除了在他 100 英亩的农场耕作外，他还为我工作。当初他买下农场时，很多土地还没有经过清理。他就和妻子一起把树根一棵棵拔出来。到现在，农场的债务他们已经还清。

特洛伊 35 岁，当初耕作时，他使用的是一头牛，后来又有了一头骡子，过了几年买了一辆拖拉机。过去他用火烧来清除杂草，现在改用锄头翻土了。

黑人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进步。比如赫伯考的大型海滨种植园，对于黑人来说，它所构成的社会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赫伯考的黑人几乎都在这里出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有的黑人甚至没有去过几英里外的乔治城。据我所知，我刚来赫伯考时，只有两个黑人到过查尔斯顿。

那时黑人虽然表示效忠共和党，但实际上他们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

亚伯拉罕·肯尼迪品行端正，无论木工还是瓦工，他都干得得心应手。有一次我问他投票了没有。

“不，先生，”他说，“那事我不参与。”

“你会给民主党投上一票吗？”我问他。

“不，先生，”亚伯拉罕回答说，“在我小的时候，妈妈每到晚上就拿着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让我跪下向着他祷告，承诺除了他，我们不给任何人投票。”

我来赫伯考时，种植园已经是一片荒凉。在恢复种植园的整体规划中，要将小木屋全部修缮，黑人参与修葺是有报酬的，每一个想参加工作的黑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按当时的工资水平付给他们劳动报酬，他们还得到了燃料和房子周围的小块土地，那里可以作为园子使用。从物质生活上看，他们后来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对于上了年纪和有残障的黑人，我在乔治城的福特杂货店设立赊账购物制度，账单定期转给我，这样安排或许能算作一种养老制度吧。

我买下赫伯考时，那里的黑人几乎没人识字。我就建了一所学校。我女儿后来对这所学校感到特别自豪。每天她都要把四个村庄的孩子召集在这里。有一天，有两个17岁的男孩没来。贝尔和一个朋友骑马去找他们，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在湿地中藏着。贝尔不能骑马进入湿地，就下马蹚水进去，在朋友的惊恐中，他揪着那两人的耳朵出来了。

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对于黑人来说很难，但在这里，新一代黑人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的种植园里，有个人几乎没上过学，但他却想法让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如今他们都成了教师。

刚开始，我结识的黑人和我的保姆一样，满脑子都是迷信观念。他们认为森林、溪水、空气和天空都充满了“幽灵”。晚上新月升起的时候，在森林里行走很危险，黑人总要提着灯笼，为了壮胆，他们会边走路边唱歌，这些你都会听到的。

有一个可变幽灵，大家叫它“盘子眼”。这个幽灵出现时其形象是个巫婆，进屋殴打老人，但一般都长得像动物，它可能像头牛那样大，也会像猫那样小。

很多时候，他的额头中间会有一只大眼睛。

你要始终保持在盘子眼的一侧。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让盘子眼紧跟着你跑。有的黑人胆子比较大，总说自己曾经踢过盘子眼，但也没什么结果。“你的两脚和平时一样走，不必担心碰到什么东西。”

悟性比较强的黑人很少遇到幽灵，而遇到幽灵的都是些比较愚昧的。但我猜测，在黑人中，也会有人不相信幽灵存在的。

一天晚餐时，我的客人边吃边聊起鬼的故事，一旁侍立的黑人听了竟睁大了眼睛。饭后，客人埃德·史密斯让男孩去捎个口信，这要经过一条小路。男孩不肯去，但最后还是去了。只听他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就这样一直到目的地的小木屋。返回时，他还是唱着歌吹着口哨。就在这时，埃德加从屋里走出去，他悄悄地站到一棵树的后面。

当男孩走近时，埃德加便发出一声鬼叫。“呜——呜——呜！”

男孩的脚步停下了，他伸长了脖子。

“你是埃德加吧？”

“呜——呜——呜！”

“埃德加先生，”男孩声音颤抖地说，“就是你，但我还是先跑吧。”

想想我们，有时难道不也和这个男孩一样吗？

还有个新的做法被我引进，那就是定期为黑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赫伯考的一个村里，我建了一个诊所。我的私人医生佩尔每周去那里一次，为黑人诊病是免费的，但许多黑人却愿意找“土医”看些小病，他们觉得土医拥有超自然的神力。土医盯住人时的目光让很多黑人恐惧，我甚至听到一些传说，讲有私奔的妻子或丈夫因为担心土医给自己施加魔法而选择回家。

现在，乔治城附近还有一两个土医，但找他们看病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们的主顾只有几个对他们的药剂和咒语仍然信服的黑人。

///

信仰和宗教对这些黑人的影响很可能是最大的。在种植园中，最重要的人物往往是布道者。他们负责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人们称他们为“大斧子”，这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经过正式的任命。老辈的大斧子没有几人识字，

但他们却是信众的领袖。

对黑人来说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感被宗教替代了。美国的黑人不了解他们的过去。生活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渊源都有一种认同和自豪感，但在黑人这里却始终也没有。

几年前，这个想法偶然在我脑海里出现。当时我正在读加尔布雷斯·韦尔奇（Calbraith Welch）所著《北美历史序幕》（*North African Prelude*）这本书中讲到古老非洲黑人国王和武士的英雄故事。我认为，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故事会成为各地黑人自豪和力量的源泉。于是我给韦尔奇小姐写信，希望她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利比里亚的威廉·塔布曼总统（William Tubman）来美国，我对他说，希望他能邀请韦尔奇小姐去利比里亚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答应了。

我曾有个想法，就是请人对南卡罗莱纳州偏僻乡间的黑人民俗做系列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一直也没做成。现在再做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古老的民风已经渐行渐远，特别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消失的。

但在赫伯考，黑人的生活既温情也丰富多彩，所有的节日都不是随便度过的。从出生、受洗到婚嫁，人们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喜庆气氛非常浓郁。到了星期六的晚上，还要在谷仓里举行舞会，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跳得最好和服装最好的人，会得到奖品。

后来风行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现代舞蹈，我最初在赫伯考几乎都见过。这些舞蹈中的“音乐”，有一部分是由一只口琴发出的，但大部分就是拍手和跺脚。有人对我讲，拍手和跺脚所产生的节奏，很像非洲土著鼓手的节奏。

拍手和跺脚的节奏也在教堂做礼拜时使用。赫伯考一个村子里原有一个木屋小教堂，后来我们建了一座新教堂，赫伯考的黑人长者请我给教堂命名，我一再向他们解释由我来命名是不合适的。大家最后决定，请一位由教会任命的黑人牧师命名。

这座小教堂刷了石灰，在超过 1/4 世纪的时间里，黑人都是在这里敬神礼拜。对各种信条我是不信的，但对所有宗教我是尊敬的，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真正信奉某个宗教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拥有信仰而更有幸福感。

我有时也会到赫伯考的小教堂来，在粗陋的长凳上坐下，和大家一起参加礼拜。这些礼拜的仪式都很原始，但却是美好的事情。仪式的行动环节非常和谐地衔接着，整个仪式就像一首赞美诗一样神圣。

每次仪式开始，都由一位平日在地里干活的长者和着拍手和踏脚的节拍领唱一首歌。这类歌曲有些是历经几代传唱下来的，而且是赫伯考这个地方所独有的。领唱者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就这样一唱就是很多节。

歌曲结束时，另一位长者就屈膝跪在圣台前，开始大声地祷告，这时拍手踏脚的节奏再次响起，伴随着祷告。祷告的内容是祈祷作物丰收、牲畜肥壮、渔猎满载而归，祈祷所有幸福生活所需都降临大家身上。在祷告过程中，大家不时地齐声插入“是的，主啊”“阿门”。

祈祷之后又是歌唱。敬神的情感体验荡漾在人们的心间，领唱者随之舞蹈起来，其他人也翩翩起舞，拍手声也随之更加响亮。很快，有1/3的人起身，他们站满过道和圣台前的地方。仍坐在原位的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左右扭动着身体，一盏盏煤油灯在托架上摇曳着。

接着就是布道。我最喜爱的布道者是摩西·詹金斯，他的儿子普林斯还在为我工作。他很着迷于以色列人逃脱奴役获得解放的故事，他的布道典范之作就是他对《出埃及记》的描述。

他将金边眼镜扶正（对大家来说，这副眼镜就是学问和知识的象征），接着捧起我妻子送给教堂的那本大部头的《圣经》，翻开《出埃及记》，高声朗读其中精彩的段落：

“上帝的使者在一片燃烧的荆棘丛中向他呈现：他看着，他看到，荆棘丛中火光冲天，但是，荆棘并没有被烧毁。”

朗读到这里，大家会跟着发出低沉的声音：“荆——棘——并——没——有——被——烧——毁。”

摩西·詹金斯继续朗读。

“上帝看到他转身向别的地方看去，就从荆棘丛中召唤他：摩西、摩西。”

“摩西、摩西。”大家也跟着重复着。

“他说，”布道者继续朗读，“我在这里。”

大家附和着：“我——在——这——里。”

摩西·詹金斯接着讲述另一段，就是摩西觐见法老以及法老拒绝让希伯来人和平离开埃及的经过。接下来又讲述希伯来人在瘟疫流行时的惨景，直到讲到法老允许犹太人离开，但结果却是为自己的离开而忏悔，还要遭到追杀。摩西·詹金斯把犹太人受到追杀与现实结合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给自己的描述加上了一些现代色彩，他有时会这样讲“步枪和机枪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一般情况下，在结束布道时，摩西·詹金斯会描述法老及其军队在红海死亡时的情景，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惊心动魄。有时要是状态好，他还会突然将以色列人出逃埃及一段跳过，直接描述他们40年在荒野流浪的情形，那是他们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希望之乡前的故事。对这一叙述，他做了大幅度的简化，为了有助于对那些令人紧张不安的情节描述，他会先讲一些玛丽、约瑟、耶稣或圣徒保罗的故事。

摩西在西奈山麓搭起帐篷，准备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刻有诫命和律法的石匾，他留下亚伦还有另外两个人管理族人。“你们三人就在山上待着，”摩西·詹金斯模仿着摩西的口气说道，“我不在时，你们都要睁大眼睛，盯紧周围。”

“但你们猜出什么事了？”摩西·詹金斯问大家。“摩西回来后，看到那三个犹太人睡得正香。”

整个布道过程都伴随着拍手和踏脚的节奏声，随着布道者抑扬顿挫的生动描述，那节奏声一会儿像大潮来袭，一会儿像潮水退去。布道后，再唱几首歌，再做几次祷告。像这样的礼拜仪式会经常持续到凌晨1点。仪式结束后，人们都排队来到教堂外，这时，外面一片漆黑，人们低声交谈着，带着欢笑结伴离去，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家。

对于黑人来说，宗教使他们充满了希望，将来他们会拥有今生不属于他们的平等。我对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就是黑人他们拥有的天赋，能让自己信仰的宗教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接受或摒弃，一直到发现和自己相适应的宗教信仰模式。有的时候，他们的叙述见解准确，又和现实相关，这就难免

心生疑虑，因而变成怀疑论者。我的朋友、海军上将凯瑞·格雷森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务实地对待天国里的事情的做法。

故事是这样的，有位黑人上了年纪，打算入教，希望在那里得到教会的安全感。他向教堂执事提出申请，执事说：

“亚伯拉罕，你先要有信仰才能入教，这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安全感。《圣经》上说的你都相信吗？”

“相信，先生。”亚伯拉罕回答。

“约拿和鲸鱼的故事你相信吗？”

“相信，先生。”

“丹尼尔和那些狮子的故事你相信吗？那些饿着肚子没有食物的非洲雄狮？你知道，丹尼尔径直走进狮子窝，他还扇了狮子耳光，而狮子竟然对他什么也没做。”

“饿着肚子的非洲雄狮，他还扇了狮子耳光？”

“《圣经》上就是这样讲的。”执事说得非常肯定。

“那我相信。”

“希伯来儿童在烧红的熔炉中的故事你知道吗？希伯来儿童走进熔炉里，脚下是炙热的燃煤，他们被烈焰包围，但他们居然没被烧焦。”

“一点儿也没事？那是平常的火吗？”

“是的。他们的身体一点也没被烧焦。”

亚伯拉罕这时终于摇头了。“执事，”他说，“我有点不信了。”

“那你就不能入教。”

亚伯拉罕拿起帽子，他慢慢走出教堂。到了门口，他停了下来，回头望着执事。

“对了，执事，”他说，“丹尼尔和狮子的故事，我也不信了。”

///

我在赫伯考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其中只有一次是因为黑人遇到了比较大的难题。在赫伯考，白人小孩很少，所以不用为他们专门建一所学校，这样，有位年轻的女教师被请去给哈克斯·凯因斯的两个女儿上课。那时我正和家

人在北方，一天，女教师带着两个小女孩乘坐双轮小马车从松树林中经过，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出一个黑人，他把女教师拽下车来。

两个孩子吓得尖声喊叫，女教师顽强抗争。当她几乎筋疲力尽时，突然镇定地喊叫道：“啊，感谢上帝，哈克斯先生来了！”

这个计策果然很有效，黑人向树林里逃跑了。

黑人性侵女教师未遂，消息就像非洲鼓报信一样很快传开。乔治城的一些男人乘船来了。还有人是从小赫伯考遥远的北部骑马来的，他们挎着猎枪和来复枪。很快，森林、湿地、沼泽和水道，到处都布满了民防团^①的队员。

经过排查，这个黑人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来自外地。在赫伯考，我们很少雇用“新来的”黑人，对于外乡黑人来此也不欢迎。

几个小时后，这个黑人被抓获，被带进我们的院子。县治安官、我的总管家哈里·纳尔森和吉姆·鲍威尔上尉都来了，周围站满了人。大家强烈要求吊死这个罪犯。有人将一根绳子挂在垂着苔藓的一棵橡树的枝干上。

吉姆认为用私行处死罪犯不妥，他大步走来，让大家听他的安排。

“不要在这个院子里用私刑吊死罪犯，”他恳请大家，“如果那样做了，安妮小姐”——这是指我的妻子，“贝尔小姐、蕾妮小姐”——这是指我的两个女儿，“她们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样做会让这个地方毁掉的。我们还是把罪犯带到赫伯考的北边去处置。”接下来场面有些混乱，治安官把黑人罪犯押上船，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已经走上了去乔治城的路。在南卡罗莱纳州，强奸和强奸未遂犯可以判处死刑。上诉法庭审判时，罪犯在陪审团前受到审判并被定罪，最后这个罪犯被判处绞刑。

在南方，多数人反对使用私刑绞死罪犯，认为这是南方残留的污点，县治安官和吉姆上尉正是代表了他们的意愿。我曾提供资助，谁使用私刑处死人，他就要受到拘捕和起诉。还有一些与我意见相同的人，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努力铲除私刑。

随着时光的流逝，赫伯考的黑人村庄在逐渐减少，看到村庄在逐渐解体，我感到很高兴，那些曾经熟悉的黑人，我想念他们，我知道村庄的衰落正说

① 民防团，指美国过去由县治安官召集的帮助抓捕罪犯的组织。

明了黑人的进步。

黑人离开赫伯考到外面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战争爆发时，很多黑人应征入伍，他们因此有了新的生活观念。从陆军或海军退伍回来的黑人，他们的体魄更加强健，也更懂得遵纪守法。

黑人离开这片土地，他们的目标是北方和南方正在发展的城市，政府农作物价格支持计划下的田亩耕种限制政策，使这个过程进展得更快。

回想曾经的岁月，我觉得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教育和经济发展似乎是黑人进步的关键因素。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毕业时，班里也只有一名黑人学生，他是辩论高手，学问大。毕业几年后，一次在街上碰巧遇到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同学聚会。

“我本来以为能提升本种族的地位，”他对我说，“可是我一直做不到。”

现在，有哪个黑人大学毕业生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黑人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受教育越来越多，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比如拉尔夫·布恩奇和杰西·罗宾森，我举出这两个例子，他们不仅作为黑人，也作为全体美国人中的一员，他们获得了成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黑人正处在变化的激流中。河流奔腾向前，它不会回到从前。虽然河流的前方险象环生，但每当想到我们已经踏上征程，我就信心百倍，相信将来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勇敢地克服。

第22章

未来岁月

有些人早早地就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规划，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让梦想成真。说实话，我并没有这样做。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相互冲突的愿望，我常常被它们所困扰。在人生中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就是由这些突发事件所决定的。

虽然当初我在华尔街时还没有注意到，但事实上，国家此时正处于时代的转折关头，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一些在当时对金融业具有影响作用的人物，如摩根、哈里曼、莱恩、希尔、杜克和洛克菲勒，他们的影响正处于最高峰。

当我看到他们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时，我心里这样想：“他们能做到，我就不能做到吗？”我努力模仿他们，特别是模仿哈里曼。我认为，哈里曼充满魅力和自信，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哈里曼是个牧师的儿子，开始时他一无所有，我的起点也是零；他赌赛马，赌职业拳击赛，还有竞选赢家，而这些都是我所热衷的。

在对铁路公司做研究时，我曾为此兴奋过，因为我发现哈里曼所收购的太平洋铁路，那铁路锈迹斑斑，但哈里曼却让它来了个大变身，成为美国最好的铁路线之一。我很喜欢有关哈里曼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次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问他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哈里曼是这样回答的：“就是我听说某件事情无法实现，我会全力去做，争取完成它。”

但我没有成为第二个哈里曼。我可能根本就不是他那样的人。然而我现在发现，被一些作者称为“强盗大王”或“创世之神”的金融界巨头，他们能够生存的条件正在一点点地消失。1898年7月4日，当时美西战争即将结束，我利用这个时机在证券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在当时我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崭露头角的年代，美国金融界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时代也达到了峰巅。

原因之一就是进入新世纪后，金融竞技场变得过于宏大，个人或集团都无法对它施加影响。如果像摩根一类的人在1907年还能阻止一场金融危机，那到了1929年，当洪水冲毁堤坝时，那就谁也无谓阻止洪水的泛滥了。

股票本身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时代的演变。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98年上市的股票铁路股大概占了60%，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南北战争时，在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地域上打败并跨越北美大陆。到了19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铁路股所占比例已经不足40%，到了1925年，则降到17%，而到了1957年，仅剩13%了。

外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的融资还很少，大概只有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和日本为准备日俄战争所做的融资。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外来融资最重要的中心。

发生在两个时代的演变，其原因也在于两代人的变化。摩根和洛克菲勒都比我年长30多岁，哈里曼大我22岁，莱恩比我大19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赚钱还不能使我们满足。从我个人来看，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你有了钱，你去拿它做什么呢？”

时间飞逝，整个国家也在力争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为了回馈社会，那些富有的金融巨头也开始捐出钱来。特别是很多社会变化和情感洪流的风起云涌，它们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鲁·威尔逊的进步理念中都得到了宣示。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政治哲学的掌握，我做得很慢。我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是在1892年，我投给了格鲁弗·克利夫兰。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时，当时我的脑子很乱，至今都回想不出当时给谁投了票。威廉·简尼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到纽约来拉选票，他的演讲我去听

了,他的口才雄辩,让我激动不已,但当我从他演讲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离开后,他的声音也渐渐远去,对我的影响也随之减退了很多。

我几乎是下定了决心要投麦金利一票以示支持,就在这时,舅公费什尔科恩开始和我谈起“败局命定论”^①以及战后的重建问题,他曾在博勒加德将军手下做过电报员。他对我说,如果在共和党人的选票上留下痕迹,我的手臂将要烂掉。我的选择很可能给约翰·帕尔默(John M. Palmer)投上一票,他是个民主党人,我父亲对他也是支持的。

但当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我为他投了支持的一票,因为他反对“土匪联盟”^②。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交易所收市后,我就会感到焦虑不安,没有满足感。在办公室,我从窗子俯视华尔街和三一教堂,格雷的《墓地挽歌》时常萦绕脑海,我不知道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医生到底对不对。

那时,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格雷特·盖瑞特(Garet Garet)就来看我,他任职于《纽约晚间邮报》,后来担任过《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星期六晚间邮报》主编。他经常在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来我的办公室,我就边想边给他说说我的想法。他离开时对我说:“巴鲁克,你不属于华尔街,你该待在华盛顿。”

///

但我对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全面思考,真正发生转折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爆发,让国家暂时将历史悠久的自由放任传统搁置起来,政府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人们没有忘记政府在大战期间的表现。从这以后,形势一旦出现危急情况,比如像国内危机的大萧条,还有就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都能转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府所形成的行为模式。

就我个人来讲,我见证了国家思维和政府角色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历程。这并不能说明我有什么远见。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还不能从全球

① “败局命定论”是美国南北内战后南方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认为南方邦联从战争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因为他们面对着北方联盟“在军力和后勤上的压倒性优势”,但他们仍然为维护南方各州利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② “土匪联盟”(plunderbund)是指商业、政治和金融等利益集团结成的剥削、掠夺普通民众的一种联盟。

的视角思考问题。军事战略在当时于我没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说是毫无意义；对于全面投入战争，国家经济需要做些什么，我也不甚了解。

随着战争激烈地展开，我也开始了思考，美国一旦被卷入战争，我们就要有一番作为。我平生第一次走进白宫，这是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William G. McAdoo）安排的，我为国家防御动员经济资源起草了一份计划书，部长让我向威尔逊总统就此做出解释。

当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咨询委员会成立时，我也成了其中的委员，我的职责就是为备战计划获取原材料。原材料与制造业的所有环节相关，为此我必须对每个经济部门加以关注。我很快发现，如果像平常处理交易那样做，我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我需要出台一套全新的工作方式，我要将所有的工厂和原材料、所有的工商界领袖和职工都纳入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之中。

我要将自己已经领会的东西，想办法向其他工商界人士做出传达。这样的工作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开始与那些工商界人士会谈时，每当有工会领导人发言，咨询委员会中就总有人打断发言。这时，我常会情不自禁地说：“请让某某先生讲完话。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在这支新的产业大军中，作为金融界或工商界原先的将军级的人物，常常要屈尊扮演尉级军官甚至军士的角色。许多工商界领袖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做法，他们容不得政府或其他什么人来干预他们的经营活动。对这些人做工作，让他们抛开极端个人主义而接受政府的指令或与竞争对手合作，这不是件容易事。

让这些工商界领袖考虑问题时从国家利益这个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做好的。比如，亨利·福特，我曾去华盛顿他入住的宾馆看望他，我对他解释有关用于生产车辆的钢材需要为战争服务的问题，为此必须削减民用车辆的生产。

福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可以同时将生产轿车和制造军火两件事都做好。他说：“你告诉我需要什么就可以了，我去办。”

我向他解释目前没有足够的钢材同时满足战争和民用轿车的生产，对此

他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一些人，尽管他们也和福特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作风，但毕竟看得比较长远。一天，我邀请詹姆斯·杜克共进午餐，我们一起讨论了有关烟草行业的计划。杜克提出了抗议，他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我把委员会中负责烟草行业的委员叫来，我对他说：“杜克先生现在让烟草业动起来了。”杜克表示反对，我说：“既然你反对我现在行事的方法，那就请你告诉我怎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

杜克提出的一些建议很有价值，虽然在政治上他对威尔逊持反对意见，但还是成了一个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总的来看，前面所讲的就是我在处理战争资源动员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战争还在继续，从时间上讲，我们没有机会让所有的工商界领袖转变观念。但就每个行业讲，我还是能够找到一位或多位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会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关于丹尼尔·古根海姆如何协助我们将铜价降低一半以上，我已有叙述。我们后来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决定政府用来收购造船的钢板的价格。我去拜访弗里克（H. C. Frick）。在他个人著名的图书馆里，我们见了面。我向他询问政府所应支付的价格。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弗里克提出了抗议，“我是美国钢材委员会的主席。”

“我来拜访你，不是因为你是钢铁业的人士，”我表达了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你是一位爱国公民。”

“每磅 2.5 美分。”他气冲冲地回答了我。

在当时，一些钢铁公司的发言人向政府索要用于造船的钢板的价格是 4.25 美分，黑市的价格已经高达 18.5 美分。

很多工商业人士也像弗里克和古根海姆那样，他们做出的回应都是积极的，比如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克利夫兰一家钢铁公司的普莱斯、麦金尼（Price McKinney）、圣约瑟铅矿公司的克林顿·克雷恩（Clinton H. Crane）、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艾尔弗雷德·贝特福德（Alfred

C. Bedford）、新泽西锌矿公司的埃德加帕尔默（Edgar Palmer），还有很多人，就不一一举出了。

假如我没有在华尔街的多年经历，能否克服困难完成我的使命，我还没有把握。多年从事金融交易，使我了解到很多工商界领袖的个性。我清楚哪些人对爱国主义的诉求会做出积极的回应，而对另一些人，我也很清楚，如果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要以事实向他们证明政府是强有力的，它胜过任何一个人。

到了这样摊牌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此之前，我在华尔街以一个独立操作者的身份已经赚钱。假如此时我的财富要依赖某个特定的产业所持有的股份，我就有可能屈服于正得罪其商业利益的人所施加的压力。比如，当确定钢材价格的问题提出来时，价格控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认为，那些大型钢铁公司会把他持有股份的一家公司搞垮，使用的办法就是把这家公司的业务拿走。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我来处理，我对他解释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在华尔街的经历对我很好地履行职责，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事实上，让我常常感到吃惊的是，我在投机获得中所使用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战争资源动员问题的解决。

比如，我很快明白了，很多物资短缺的问题，实际上都来自心理因素。制造商担心得不到自己所需的物资，因而就要过度地采购，也有供应商认为价格必然要攀升，于是囤积材料不肯出售。

股票交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市场上涨趋势背后的思维连续性被折断，一次牛市行情反转起来会有多迅速。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重要战争物资的价格需要削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普遍的心理预期，就是认为价格必将连续地上涨。

华尔街的经验还告诉我，制定一次成功的金融交易计划，和制订一次军事行动计划很相似。在采取行动前，需要对双方的优缺点做到知彼知己。

对那些不肯合作的人，我们会经常针对他们的缺点施加压力，以此来换取合作。我们在国内使用过威胁的手段，如果某个制造商不肯合作，就对他

提出征用燃料或切断他的铁路运输。而对于外国策略有所不同，但原则是一致的。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代表就坚持认为，对加尔各答的黄麻纤维的价格他们无力控制，原因在于印度是一个独立政府。我找到麦卡杜部长，请他对一些运输白银的船只加以扣留，印度的币值需要这些白银来稳定。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向伦敦派出一个由利兰德·萨莫斯（Leland Summers）率领的外交使团，他对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即使孟买和加尔各答的交易所被迫关闭，我们也要坚持扣留船只，英国人很快便找到了控制黄麻纤维价格的办法。

有关硝酸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遇到的至关重要的供应问题。肥料和炸弹都需要硝酸盐，在当时对于硝酸盐的需求是任何生产能力都不能满足的。即使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每一次在死亡线上长途运输硝酸盐的船只被击沉，打击都是非常沉重的。

美国宣战后，硝酸盐的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猛涨了 1/3，三个月之内就翻了一番。硝酸盐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更加疯狂的抢夺风潮，投机者企图获得大量的硝酸盐加以控制，让它脱离市场，以便囤积起来迫使价格再涨。

大约就在这时，威尔逊总统召见我，他让我将别的事务都放下，集中精力专注此事。我搜肠刮肚希图找到一个妙计，但终于没有实现。一个代表团来到华盛顿，这是由军火商组成的，他们询问怎样才能搞到履行合同所需的硝酸盐。我请他们放心，硝酸盐能够满足供应。

会谈结束后，负责我们化学品部门的查尔斯·麦克道威尔（Charles MacDowell）对我说：“头儿，那拿什么来兑现承诺呢？”

“这个我也没把握，麦克。”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们总不能让他们觉得政府也没有办法吧。”

此后的几天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废寝忘食，即便是喝水也觉得嗓子会被噎着。我觉得这次经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最为恐慌的，我几乎被它搞垮了。一天早晨，我在穿衣镜中发现自己脸耷拉着，面色苍白，一副苦相，

我高声说道：“你这个窝囊废这是怎么了，你该振作起来，你要像个男人。”

接着发生的事情使我很疑惑，我想是不是老天在眷顾我。我对自己提出要求，要吃早餐，要走进办公室。在办公室还没坐多久，海军情报处的一名军官来了，他带来几份截获的电报，电报上说智利政府将黄金储备放在了德国，要德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但没有结果。

我有办法了。在几天后智利大使来见我。他抱怨说，因为很多物资的短缺和控制通胀遇到的困难，国家遭遇了困境。我清楚在智利有大约 20 万吨的硝酸盐是属于德国的，但一直无法运出。我向智利大使建议，假如智利将这些硝酸盐没收，我可以按每磅 4.25 美分的价格全部吃进，并在和平条约签署后 6 个月以黄金支付。大使离开后，我就安排此事，向智利派发足够数量的船只，这样一来，拿到硝酸盐在时间上就不会有什么浪费。

但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却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对敌贸易法》，因此持反对意见。对此我感到很吃惊。“你们的意思是”，我向他们质问，“难道我不能买德国的硝酸盐制造炸弹去炸德国人？”

向威尔逊总统上报后，得到了他对我支持，结果是我们达成了满意的交易协议，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非常急需的硝酸盐，同时也帮助智利政府走出困境。但如果我们对智利政府的需要没有了解，如果不能因此根据这一需要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这个协议还是难以达成的。

满足双方的利益，到现在仍然是国家间达成一切协议的最好的基础。表面看去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表明，在如何将这个道理运用到我们与盟国的交往之中，我们还没有学到家。我们看中的是条约的正式文字，但把需要做的事情给忽略了，而这一点关系到与盟国的共同的利益结构。事实上，只要将共同利益结构加强了，维护长期的同盟关系就有了保证。

在国与国交往中，用金钱是换不来真正的友谊的，靠这种方法结交的“朋友”是随时都会翻脸的。但是，如果国家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对于各自未能做到的事情就能给予谅解，对于各自的短处也能包容。

除了要满足共同的利益外，在与盟国交往中还要做到诚实公平。“己所

欲，施与人”，这个黄金法则可以稍作改动，就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与盟国间的关系时很适用。

伍德鲁·威尔逊第一次代表美国对这一原则加以阐明，他坚持认为，我们为战争购买的所有物资，都应该以自己支付的相同价格让盟国使用。

对这一原则曾发生争执，在此期间，我第一次在温斯顿·丘吉尔身上发现了他的伟大的品质，明白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领袖。于是我们做出提议，英国在美国购买任何东西所支付的价格与我们在本国购买的完全一样，而美国在英国购买的所有东西的价格，也应该与英国在其本国内购买的完全一样。对这样的提议英国有些商界巨头提出反对意见。丘吉尔时任英国军需品部长，对我们的提议他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是盟国之间交往的公平之道，而且是唯一的。

在对从智利购买的硝酸盐进行分配时，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视同仁的原则进行的。有些人提出利用我们对这批硝酸盐的控制来使美国受益，对这样的建议我拒绝了，我们提出建议，设立一个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向所有盟国公平分配硝酸盐。事实证明，这个执行委员会成了联合理事会的示范机构，联合理事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所有盟国进行稀缺物资的配置。

我提名由丘吉尔担任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后来他还经常开玩笑说，是我让他成了“世界硝酸盐之王”。

和丘吉尔做朋友已经 40 多年了，在此期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他没有做过哪怕一次刻薄或不光彩的提议。他以迅速的行动捍卫英国的利益，同时对美国的利益也一直保持谅解，这样的举动让人感到温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们面临食品困难，需要从英国调用日常必需品时，被他一口否决，听他怎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现在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困苦之中，已经到了极限，对于他们的食品供应是绝不能削减的。”对于其他英国人对美国及美国领导人的诽谤和中伤，他也给以强烈的抗议。

有一次他为我举办宴会，地点在伦敦，当时在场的有一些托利党人，他们是讨厌罗斯福及其新政的。有位先生想和同伴逗乐，就让我来猜个谜——

罗斯福和哥伦布为什么很相似？他的答案是罗斯福和哥伦布一样不清楚自己在走向何方，等到了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等到返回了又不清楚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我站了起来，说：“罗斯福和哥伦布或许真的有些相似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对新的领域做出探索，他们开拓了新的视野，他们促成了新世界的诞生，这样就让旧世界的纷争平息下来。”丘吉尔连连敲击桌子，高声表示了他的赞同：“你们都听听，你们都听听！”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人中，特别是那些工商业人士，都在尽力回到战前的生活状态。而我却没有这样，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主要是我体会到，与赚钱相比较，从事公共服务让我感到更为开心。但我也发现，很多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用“顺其自然”的理念去处理是不可能解决的。

于是，我有许多同事都努力去复兴自由放任的传统，我的努力方向却是继续解决政府在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威尔逊总统召我去巴黎任顾问一职，协助他起草《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为了使美国进入国联，我还和他一起为此而努力。此后，我还要为农场主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份额而努力；我甚至做出了一些计划，想对国家铁路加以重组，还有就是打破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形成的僵局。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比如很多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去解决的问题——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直到美苏的冷战，我感慨的是有关问题都紧紧地围绕着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14年以来，我国以及其他国家，都经历了战争状态。我始终坚持认为，和平时期的经济规则和社会规则应该与我们的需求相符合。但从1914年至今，没有一个年头我们不在经历着战争并饱受战争的影响。

无论是农业生产过剩还是国家债务融资，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都源自战争的破坏。我们有生以来已经有过两次倾尽国家资财来满足战争的需要，接着再回归和平。

回顾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战争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在战前所酝酿的变化，在战争爆发后都能得到强化和发展，比如，如果我们没有因为对敌人的惧怕而完成原子裂变，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突破也许我们还没有实现。

从政府的治理能力来讲，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还没有真正完全地解决。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就像在追赶永远也赶不上的列车。

在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我计划对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重要关系做细致的分析，从自身的经历中找出能够吸取的教训。我可能需要在这本书的几页中对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对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性质加以阐明，还要说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何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

对于现在所面临的考验，我们一定要从实质上将其视为对我们治理能力的考验。我们不缺少物质资源，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人类迄今可以运用的力量，都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们缺少的是一种能力，就是怎样对这种力量加以控制和引导，还有就是对生产性资源的能力的控制和引导。

对自我治理能力的考验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考验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为了其他事物获得安全而应放弃什么。

第二，就是考验我们的理性能力，也就是考验我们是否具有对问题全盘考量并有效地加以解决的能力。

第三，就是考验我们自我的约束能力，也就是对我们是否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坚决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的考验。

关于国防开支究竟该有多大，通过这个问题就能对以上三个方面做出很好的说明。有人断言“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但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证明，为了争取和平，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能够担当起比任何人的提议还要繁重千百倍的任务。现在我们和盟国能够处理的物资已经超过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我不会认为我们无力为捍卫自由而付出，这是和任何企图破坏人类自由的敌人所付出的同样多的努力。

我愿意约束和阻止自己去做到的，才是我们的经济能够承受的极限。对

于同时拥有所需的国防和其他所要求的东西，这是我们无法同时兼顾的。但只要我们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需要做出削减，经过这样的努力，就能拥有为这种努力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对这个问题的选择，现在尚不明确，因为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分摊国防成本。从每个人口主要部分的压力集团看，他们都希望将国防负担转移到别人身上。这种“控制他人但不能管我”的态度，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爆发通胀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还在延伸，已经影响到冷战中的通胀。

从解决国防成本的角度讲，在其他社会出现的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后的局面，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还没有出现。

为了求得生存，政府在冷战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未做出通盘的考虑。有的人只想着减税，他们没有意识到，凭借征税就能获得必要的国防力量。但还是有人接连提出联邦政府应大规模开支的新计划，但忽略了征税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各种局限。

随着税收负担的加重，要想做到负担在人口所有部分之间的公平分担就更困难。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在战争环境下，每个人都公平地承担起为国家而担当的义务，这对于维持全国的斗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认识到，有些事情需要暂缓进行，这样才能满足更关键的需要。冷战要求我们做出类似的考虑，但我们对此似乎尚未有所认识。

假如征税权力因为别的不很重要的计划而使用到极限，或者我们的税收和通胀制度允许对一些公民施加不公平的负担，那么即使是最重要的政策，在公众那里的支持度也会被削弱。要打好一场冷战，不能使用和平时期的经济标准和公众道德。

对于支付较高的税款我一直也没有怨言。当然我也认为在政府支出中有很多的浪费是不必要的，但我依然不赞成减税，除非我们的国防已经很安全，政府的信用度也很稳固。需要强调的是，稳固的政府信用对于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失去了稳固的信用，政府在应对任何可能的危机时对国家的管理就会被削弱。

现在，人们常听到一种议论，是有关新式“终极”武器的，许多人认为这种武器能够解决我们的安全需要。洲际弹道导弹一经研制出来，很可能对战争技巧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即使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得到完善，在自我治理能力上我们仍然面临考验，这就是考验我们对问题能否做出通盘的考虑，表现在自我约束以优先解决最重要问题的能力上。

在我 87 年的人生阅历中，我见证了一连串的技术革命。但在革除个人品质或思考能力的需要上，还没有哪一项技术革命做到了。

///

对约束和思考的必要性的谈论，听起来就像老派的布道词。给我们社会带来困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古老的真理的不屑一顾。我们很多人也认可这些真理，对其中的原则也能接受，但就是不愿付诸实际。因为对这些古老的真理还没有认真地思考和应用，所以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遗憾地看到，教育中的主流趋势对这种忽视行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学校对于年轻人不仅不去鼓励他们思考，反而认为一旦学生保持了兴趣，自身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学生的课程是丰富的，包括了所有的科目，但训练的方法却难让人赞同。在学校接受了专业化的教育后，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就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然而，获得丰富的信息，还不能代替思考。我举个实例来加以说明。这个实例离现在不算远，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有不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做出了预测，认为战争结束后将使 1 000 多万工人失业。这个预测有着大量的统计数字的支持，给人的感觉就像大难将临。

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拜尔尼斯请我和我忠实的同事约翰·汉考克拟定一项有关战争转向和平的指导性计划。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我们的报告却告诉人们未来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冒进式繁荣”。1944 年 2 月，这个报告发布不久，我又断言，在战争结束后的 5 到 7 年内，会出现连续的经济繁荣景象。

这样的预测有什么根据呢？对购买力我们没有做任何的统计研究，对“消费者态度”也没做任何的统计研究，对经济占卜师猜测未来时所强调的任何

其他指数也没做任何的研究。我的判断依据，主要是战后半个世界将处于废墟这个事实。世界需要重建，对此我深信不疑。就像我当时对同事所讲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民族还是政府，大家都将靠乞讨和借贷度日，可能的话，还会去偷窃”，但无论如何，重建家园是肯定的，大家总要设法实现战争期间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想强调的是，有些信息不加任何判断和思考，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判断的明智与合理，来自对整个形势的把握，要着眼于全局。那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已经逐渐认识到，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熟知专门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将不同问题联系成一个整体。我们所处的世界，没有什么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有着相互的联系。如果要使某个层面上的行动真的有效，一般都要在一些支持性层面上有重大举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争用总体解决方法而不是逐个解决方法的争斗，成了长期努力防止通胀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斗争未获成功。作为国会和执行机构的多数官员辩解说，只要控制了货币总量就能防止通胀的发生，还辩解说，需要加以控制的物价属于少数，至于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可以顺其自然。对这种零打碎敲预防通胀的做法，我持反对意见。我提出警告，需要在整个国家层面上考虑采取一系列完整的行动，并将这些行动纳入所有资源这一总体行动，成为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取从总体角度解决问题，我又开始了新的努力，而这次努力关系到和平的缔结。当我们制定出全球战略以赢得战争时，我坚决主张制定与此相对应的总体战略，这样就能涵盖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所有方面的斗争，这样就能发挥出我们自身最大的优势。许多官员认为采取“总体外交”是非常必要的，但将一个统一的全球战略的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联系起来，这样艰巨的使命却没有完成。

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在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美国公众才领悟到要实现世界和平，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要付出终生的努力，才会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对于每一项行动，它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对此最好不要做出预测，还要清楚有什么地方是做不到的。

同样，要确保我们的努力一定是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核心问题，而不是次要问题，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面临的困难越是复杂，就越是要牢记这一点，因为人性中总有对难以解决的问题试图逃避的倾向。

当最为严峻的危急时刻，人们常会被一些无关琐事所困扰，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对这种纠结于琐事的行为，我怀疑它正反映了人们对形势的严峻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叫作“分心定律”的规律在起作用，也就是当人们被某个问题所困扰时，就会用一个分心物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人类一直以来都是以力量来代替理性，好像跑得快就能获得更好的方向感。我们需要经常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所做的是否集中在问题的核心上，也就是对问题起关键作用的环节上；或者问问自己，在次要问题上是否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这些问题不管我们处理得如何妥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寻求和平的斗争中，要分清主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缔结和平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而其他所有的问题都属于次要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只有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决，不然的话不可能存在持久的和平。

首先就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还有就是德国的统一问题。德国一分为二的状态，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武力统一的企图，对此，每个国家都要加以防范。北约（NATO）军队的存在就是基于这个巨大的危险。即使苏联直接侵犯的威胁能够消除，但就像在朝鲜发生过的那样，苏联卫星国趁机以某个借口对德国发起全面侵扰的危险依然存在。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德国的某些集团利用内部的“革命”或军事政变来统一德国。

要防止第三代世界大战的发生，有必要在铁幕西边驻扎军队，以防止这样的企图发生。这些军队能随时投入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上。

即使协议生效，苏联和美国的军队根据协议分别撤出东德和西德，北约组织依然有必要存在。在美苏比目前有了更多的相互信任之前，双方的撤军只能算是一个有所提防的解决方案。

德国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裁军。

要实现持久的和平，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形成一种完全的机制，用以对各种形式的核能加以检查，违约的行为一旦发生，就严惩不贷。只要协议一经达成，就不允许任何一方毁约。

我有幸曾代表美国政府将国际核能控制计划向联合国做陈述，并没有假定美国将永远保持核能的垄断地位。当时我们很清楚，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发展是迟早的事。无论是 1 个国家还是 61 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有一个事实却并不改变，这就是任何国家对销毁核武器都无法拥有有效保证，除非有一个可以确保防止核能转向军事用途的国际机制。

如果说到不同，那么对核能控制的必要性将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增多而上升。对于这一点，苏联人也在逐渐认清。安德雷·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当时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他离世前几天，曾邀请我出席一个酒会，这是由苏联驻纽约领事馆举办的。酒会进行当中，我发现身边没有别人，就告诉他，我认为他们的政府反对有效控制核武器是不明智的。

“现在很容易就能制造出原子弹，”我提醒他，“别的国家很快就能拥有核武器，甚至连你们的卫星国也能拥有，到那时你们怎么办？”

接着，我说：“有句格言在美国西部边疆流传已久，说的是男人拥有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就能做到人人平等。小国一旦拥有了核武器，甚至能对大国形成威胁。现在相对容易的是控制问题，因为现在还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这种武器。等到其他国家也拥有了，那时再想出台一个控制机制，恐怕为时已晚。”

这次酒会后，在与苏联高级官员像安德烈·葛罗米柯、雅各布·马里克、德米特里·谢比洛夫等举行的其他会议上，我又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对这个观点他们是否能充分理解，对此我还不清楚，但在 1956 和 1957 年的裁军会议谈判中，和这种观点相似的考虑，大概对苏联人的态度发生了影响。

无论苏联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世界所面临的选择还是没有改变，就是在真正实施控制与毫无控制之间做出选择。禁止核武器试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核试验即使被中止，核攻击的致命危险还是存在的。让小国永远接

受只有大国才能拥有核武器的现状，对此我们不能心存希望。除非小国得到保护，能够免遭核攻击，不然的话它们会努力寻求获得核武器的方法，这就必然促使核试验的发生。

如果所有核武器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人们一直担忧的放射性尘埃的危险就将不存在，也无须再做任何的试验，全世界科学家将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核武器、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士，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而不只是对核武器的限制。

同样的道理，为了和平利用核能，任何措施都同样值得赞赏，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建立国际原子库的提议。但是，无论不同国家将什么交托给某个核能和平利用机构负责，它们仍会将较大部分开发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隐瞒起来。核攻击的危险是不会减少的。

如果核战争的威胁不能消除，当我们面对核威胁，相比被某种毫无意义的协议欺骗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要好多了。

对于寻求有效控制手段的努力，我们一直也没有放弃，任何国家做出的有关提案，我们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我们的双眼不能让对和平的渴望或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心理所蒙蔽，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要维护自由，同时要拥有包括苏联在内的每个国家都能享有的真正的和平，我们就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几年前，我曾为大学生做过一次演讲，对自己的行动准则做了总结。

在演讲中，我强调了一点——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衰退、奴役与自由，它们的周期性交替循环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每次大战后，都会出现重建，而重建又会大幅提升人类的成就。这一点，至少能从物质标准得到证实。

但是今天如果再来一场周期性的大破坏，我们的文明能否经受住，就很值得怀疑了。我们不愿看到再次出现循环往复的破坏和重建，人们都渴望建立某种能够保持持续进步的体系。这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我对此坚信不疑。

要改变这种破坏和重建的循环周期，就必须避免一种倾向，就是从—

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我们需要发现一条理性之路，实现自我的约束，避免无声的屈从和盲目的反抗。

我是相信理性的，这不是因为人类曾经表现出的智慧，而是因为理性至今一直是人类做自我治理的最好的工具。每当人类社会被某种疯狂之举所笼罩，理性就有可能成了牺牲品。人类无法掌控完美和乌托邦，但如果过于狂热的希望始终不能成为现实，就要设法避免极度恐慌所造成的绝望——只要我们学会全面地思考问题，学会认清最令我们珍惜的事物，同时学会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行事，都要分清主次和先后。

伯纳德·巴鲁克的投资智慧

自立。

必须独立思考。切忌情绪化，去除一切可能导致非理智行为的环境因素。

敏捷。

善于发现一切可能改变形势的因素，以及可能影响舆论的因素。

判断。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沉思片刻。千万不要让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勇气。

不要过高估计当一切都于你不利时，你可能具有的勇气。

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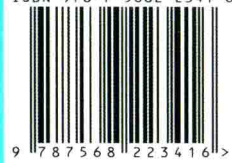
股市于你有利时，就更要谦虚。当自己认为价格已经达到最低点便着手买进，这不是谨慎的行为；最好再等等看，晚些买也不迟。执意等到价格升至最高点再卖出，这也不是谨慎行为——快些脱手大概更安全。

灵活。

将所有客观事实和自己的主观看法综合起来考虑、再考虑。必须彻底摒弃固执己见的态度——或是“自以为是”。执意在某个时间段内赚进某个数额的想法会完全破坏你自己的灵活性。一旦决定，立刻行动——不要等待、观望股市会怎样。

上架建议：财经·传记

ISBN 978-7-5682-2341-6



定价 49.80元